杜导正　著

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谨以此书纪念

赵紫阳同志逝世五周年

书 名——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还说过甚么？
作 者 杜导正
责任编辑徐庆全、续心
出 版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页码为原书页码)

下篇：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附录：

编者的话

赵紫阳秘密录音成书的《改革历程》与杜导正这本《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所记录的是同一段历史：以 1989 年 「六四」为分野的当代中国政坛；同一个人物：赵紫阳。前者为赵 紫阳向历史所作的正式交代，可看作是「政治读本」，后者是杜导正的私人记录的赵紫阳忧心国是的心路历程，可看作是「民间读本」。

书中上篇、中篇所记述的赵紫阳秘密录音过程，对《改革历程》的成书有独家揭秘之「旧闻」，而作者在操作录音过程中，对被软禁中的赵紫阳处境、神态以及生活状况的生动、细致的描述，也同样具有独家揭秘之效果。更重要的是，作者披露了赵紫阳「政治读本」之外的毫无拘束的三十多次私密谈话。这些谈话与「政治读本」有联系，有交叉，但侧重点已超越历史过程的陈述，直入理论总结的竿头。作者所记录的赵紫阳对于他所亲历的中国改革历程的反思与总结；对中国政局发展与当政者作为的点评与思考；对于他从参加革命就接受的那套理论体系在认识上的重大飞跃，等等，将成为人们研究当代中国政坛和赵紫阳思想体系最重要的「政史文本」。

下篇所记录的是「六四」后至 1992 年中国社会一个时代的画面。「六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改革的分歧明朗化。「复辟」还是「反复辟」？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平民百姓，各色人等各有纷争，赵紫阳则始终是这个画面不可遮盖的舞台人物。作者推动赵紫阳秘密录音，就有了这个时代民心所向的大背景。

推动赵紫阳秘密录音，缘于要对历史作出交代；而以日记体记录赵紫阳秘密录音、谈话及时代的大背景，同样也是为这段历史立「存照」。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录音是「正本」，则谈话是「副本」。本书被视为《改革历程》的姊妹篇，当不为过。

编者 识于 2009 年 11 月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自序一（2009 年 9 月 1 日）

对于这本书，读者与历史自然会作出品评。我自己则认为它的价值在于：

一、首次发表了赵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一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谈话。这些谈话，虽然只是概括，却也系统、完整而深邃。譬如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评价，即马克思学说的伟大意义和学说的时代局限性。他说理论与实践相比较，我们更应看重实践。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每项重大的改革实践，都首先是群众在那里创造的，再由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加以总结、肯定、推广。他还力求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从根本上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共八十多年成败的经验教训。他有些说法是很精辟独到的。

二、他的录音口述书稿，开篇关于「六四」的三、四万字口述是根据上世纪 90 年代他自己写的笔记大纲录下来的，以下十万字口述，是和我们几个老下级多年切磋后，由他自己再回忆才录音的。

可以说他这本录音口述的多半部份，也更完整、更细密了，更斟酌、更推敲了，而考虑则更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立此存照」。这是一个被罢黜的、受委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今人、后人作出了正规的交代，因而不够「原始」了，也就不那么朴素、生动了。在正式录音前及录音中，他与我们三十多次面谈，大体上都涉及到这些问题，但对同样的问题，他那时谈得活泼、生动又朴实，或者可以说大胆了许多。而且，在这么多次的谈话中，他又谈及众多的人物，我们也时有插话，有交流。我的日记中都对此作了如实的记录，现场感很强。

三、从我们与赵紫阳第一次会面到最后一次会面，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此期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时局发展，对中国政局与当政者，常有精辟独到的点评，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有许多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

四、赵紫阳问题与「六四」紧紧绑在一起。「六四」事件和赵紫阳事件，在中国当代社会前进的历史节骨眼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它不是两个没关连的个别事件，而是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因此，它是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历史现象，亦反映了他们的意愿与主张。我作为一个媒体的骨干人物，又处在赵紫阳这个人物与「六四」事件的漩涡中心，因而接触了方方面面。我自己又有记日记的勤奋习惯，从日记复习中深切感受到赵紫阳如何看待「六四」，如何看待政局，如何看待中共成败，其中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是孤立的个人观点。他代表了一批人的类似政治思想情结，他是一个代表者。所以我在下篇中记述了许多国家和省部级干部（多为离退休的）、记者、小小百姓等有关人物的语言与活动。这是一幅时代的画面，可作为对赵紫阳录音背景的交代。
五、此书是日记体裁，平常的坦然的口语的现场描述记载。文中所有与赵紫阳的谈话，几乎都有对赵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的具体描述。读起来，我以为会自然亲切些、感性些！还要说的是，因为是日记，就不可能是纪事本末体、系统严密的叙事方式，因而对一些事情的记载，会有疏漏，有前后照应不够、甚至错失的地方，但我一仍其旧，不愿改动，以保存记录的原始性。

此外，紫阳落难中，我有幸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约有百幅以上。这本书中我精选了四十多幅，在史料价值上说，这也弥足珍贵了！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友人徐庆全、舒元璋和我老伴续志先及几个子女，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最后还得再加上一句：幸有今日中国大陆当局对媒体、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较以前的宽容，我这本自然有争议的书才可能正式面世！

自序二（2005 年 6 月 4 日）

这本书初成于 2003 年 3 月，定稿于 2005 年 6 月，相隔两年多。初成书时，我拟的书名是《他还说过什么——赵紫阳「六四」后三十几次谈话——杜导正日记摘抄》。2005 年 6 月定稿时，我将此书改名为《杜导正日记——晚年思想家赵紫阳——囚禁中三十多次忧谈国运录》。

在 2003 年的自序中，我讲述了编辑此书的初衷。即官方对中国当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只作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且反复编造了许许多多为自己的错误结论辩护的所谓材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情节是关于赵紫阳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为主要当事者，被当局编派成「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所谓罪魁祸首。而他与他的朋友，却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权利。党内外铺天盖地的尽是责骂赵紫阳的所谓材料。而赵紫阳这一边呢？则是不许说话的。所有媒体都被官方，主要是那个把持着中宣部长大权的丁关根给严令封杀了。几段时间内，丁关根竟下令媒体不准出现「赵紫阳」三个字。出现了，就是犯法！于是我、我们几个老人出于严肃的历史责任意识，自然含有对丁关根们的愤慨，鼓励与协助赵紫阳撰写了《赵紫阳口述「六四」及其前后》（即已出版的《改革历程》）〔1〕。这《口述》在 2001 年完成了初稿。此时，我手头也还有几十次赵紫阳与我、与我们几位他的老下级谈话的记录材料。这些材料中，关于「六四」及其前后的内容，有些已在他《口述》中说到过，有些则没有。此外，他还说了更多「六四」话题之外的话。我想，如果能再把这些未收进他《口述》中的材料整理成书发表，对他的《口述》一书，无疑是个补充。而此事事关重大，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公诸于众，也是我与我们几位老友应尽的历史责任。所以我这书初写成时拟定的书名，便是《他还说了什么——赵紫阳「六四」后三十几次谈话》。

2003 年 3 月这本书稿初编定后，根本不存在任何出版的可能性。当局是绝对禁止的，我又不愿在境外出版。还以为赵紫阳身体尚好，还会说些什么的，偏偏这两年多，赵紫阳又被勒令不准见客。我们与赵失去了见面的机会。这样，这初稿就一直压在我的箱底了。今年 1 月 17 日赵紫阳庄严而悲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官方对赵紫阳与「六四」事件的看法直到今日，看来无任何大变化，但管制似乎稍稍松动了些。此外，我又想到，赵紫阳远走了，我也近 82 高龄了，这部书稿该从箱底中搜罗出来设法出版了。于是今年 2 月到 5 月，我一字字一篇篇，再细细阅读、校对、编辑起来。总字数十万字多一点，读了几次。读着、想着，一种内心受到震荡的事情发生了。赵紫阳跟我、跟我几位老友的谈话，其价值其意义，原来远远不可局限在「六四」这个事件里了。这位时代老人十几年来，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他的思想都飞起来了。他不只时时刻刻关注着整个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有着众多的闪耀着「火花」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性的是非，不仅是胆大无畏，而且是那么的深邃，富有哲理，贯穿着自由的求实的民主科学精神。有的是十分精辟的。譬如对前苏联、东欧，尤其中国的革命，他说这些东方的革命不是偶然的，共产党领导革命是对的，但这些革命都应该是民主主义革命，不应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应发展生产力，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建立民主政治。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错了！考茨基便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不可能长久生存。历史证明考茨基是对的。他说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种探索，一种理想，其核心是经济自由、政治集权，可概括为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邓小平创造了这种崭新的模式，但这是一种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因此是不配套的改革模式，成就很大，但遗留下一系列问题。现中央的对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尽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民营企业纳入法律（公平）范围内竞争致富。腐败问题自然亦可解决。他还说真正的中共党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都要敢于面对严酷的社会实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能力估计不足。毛泽东时代对帝国主义说「不」，正确。现在对西方一概说「不」，正符合闭关锁国的主张。中国一定要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建设一个民主国家，这条路非走不可！

赵紫阳反复说，他形成这些想法，有个思考过程。他说：「文革」前，我也是很左的。经历了「文革」我

才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赵紫阳许许多多精辟的话，这儿不胜枚举了。大家去读罢！我是愈读愈觉得赵紫阳这个人物很不简单！他不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干家，不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指挥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也不只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的一位倡导者、启动者，不只是对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普通的反思者，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是一位思想大家。我将此书书名最后定为《晚年思想家赵紫阳》是想留下讨论余地的。还得补充一句：赵紫阳当然不是神！世界上从不曾有过神。因此本书中赵紫阳说的一些话自然会有不确处，会有错误，大家可以补正、批评、反对，真理越辩越明嘛！

自序三（2003 年 4 月 24 日）

这本书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赵紫阳同志三十多次跟我及我们几个他的老下级的访谈记录。这几个老下级是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及夫人舒元璋、我和我的老伴续志先。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也几次参与。我是一个老记者了，在这些个「老下级」中又是较年轻的一个，手脚勤快，记忆力好些，因此能把每次面谈的内容及时如实地补写在我的日记中。赵的这些谈话我每次都是当日谈完当日晚上照记忆（有的是当场笔录）记录下来的。这记录，粗糙之处会有，但原意、架构和精彩的句子不会错。因为是日记，就自然还记述了彼此面谈时的说话和现场细节，也包括了我们与友人的某些谈话。我、我们几个和大家一样非常关注他的健康，每次见面总是先看看他的面色，询问他的饮食起居，想来读者也很想知道他的生活的。

「六四」后，这位赫赫一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只是被撤职被批判，而且被政治软禁了，即他的行动处在当局指派人员的监控中，其本人实际上失去了行动自由。当局虽然部份地接受了毛泽东晚年残酷迫害党内同志的教训，对赵紫阳没有像对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的置于死地，生活上给了他不算菲薄的待遇，配了专车、厨师，控制最严时，也还允许他打高尔夫球，但政治待遇是苛而又苛的。按说这十五年他虽然无任何党内外职务了，但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老党员，还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党内的事从来不告诉他；行动呢，绝对禁止他去广东。十五年间，常常毫无道理地剥夺他的会客权。一次，他家的老保姆听说他生病了，特地从河南省赶来问安，都被禁止。老保姆无奈，索性坐在大门洞内不走，才允许入内住了一宿，次日又被撵走了。一友说赵紫阳十五年这种处境类似当年被囚禁的张学良，另一友说不对，张学良被蒋介石「管束」最严时是在贵州省息峰，还能到拘留所附近二十里处自由走动呢，赵紫阳能吗？

赵紫阳是国内国外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之一。毛泽东在解决中国独立统一方面有大功，但他的治国方略除土改外基本都是失误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人物，主要包括胡耀邦、赵紫阳，发扬毛的长处，避开并纠正了毛晚年的一些错误，使中共和他执政的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走上中兴之路。人们赞誉说赵紫阳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左膀右臂，这话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可 1989 年一场「六四」政治风波，赵紫阳瞬间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打入另册。胡耀邦是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当时看，现在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因为正确而在当时被当作所谓的错误，做了错误处理。是非与历史被颠倒了。赵下台后的政治处境比胡耀邦更为险恶。

赵紫阳是中国当代最严重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首要当事人。他亲历了这段历史，承担着如实说出这段历史真相的重要责任。现在中共中央公布在人民面前的「六四」及其前后材料，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真实不符。李鹏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于私心做了许多手脚。赵紫阳有权有责任准确说清这些事实。这便于今人尤其后人去正确评价、把握这个重要事件。由于许许多多主观客观因素，我们几个「老下级」便鼓励和协助赵紫阳撰写了一本书：《赵紫阳口述「六四」及其前后》。除这本书外，「六四」后赵与我们会面时也多次谈及「六四」及其前后，这些内容或可作为对他那本《口述》的补充。

赵紫阳与我们三十几次面谈的时间是 1992 年到 2000 年九年间，其中 2000 年一年达十二次。他与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从「六四」转移到当前国内外政局上来了。赵是久经磨练的国家级政治人物，政治上几起几落，经历过我党的辉煌，也备尝了我党受挫招致的灾难，教训逼着他反思过去，逼着他思考。他常说我这些年许多想法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赵紫阳这个人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国务院总理到中央总书记都一一做过，实际工作经验是较胡耀邦丰富的，加以此人绝顶聪慧，精力过人，1989 年下台后已是七十龄人了，仍手脚麻利，耳聪目明，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友人说现在听他讲话仍无一虚字虚话。下台后他便仍能从很高的角度，观察分析国内外政情，说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来。当然，这也得益于国内外今日兴起的媒体传播，即他虽然读不到党内任何材料，但仍能知晓大局；许多朋友不能见他，但会客松动时，他仍能从朋友口中获知若干情况。赵的这些见解，历史将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有几次我们

与他在他大门口握别时，我心中就想说：「多可惜呀！这么一个优秀老党员，如能带几个秀才下去调查，给党中央提些建议，对党对国家会多好啊！」他的这些评价、建议，现在我都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了。这本书以后总会见到天日的。那时，时过境迁，读者也许不觉得什么，但大家掩卷想想，从中仍可以受到启发的。赵紫阳说，朋友们知道，我这个人过去读书面不宽也读得少，不及耀邦。「六四」后有时间读了，我读了些。我们感到他这些年能对国内外有这么多好见解，与他较前多读书也是有关系的。
「六四」后赵紫阳作为一颗被埋没的中国政治明星，他的真实语言，大家极为关注，特别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尤其希望得到真实的、准确的、具体的材料。有了这番思考，我在整理这本我的日记摘抄时，便尽力保持纪录的原始性。这样读起来便不那么系统、完整、顺畅了。但真实性高于一切。我还是让它原汁原味、甚至不嫌粗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家当会体谅我的这番用心。

1987 年 11 月 5 日，赵紫阳同志在中南海与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作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广阔地、痛切地概括了中共几十年根本的成败经验，非常精彩。谈话时，我作陪，翻译是徐慰曾。谈话后我们共同整理成篇，可惜一直未曾公开发表过，此次成书也一并收入。

上篇：
秘密录音酝酿过程．赵紫阳谈话
（1992 年 10 月－1999 年 12 月）

冲破门禁闯赵府 劝赵撰写回忆录

199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几日前，在杜星垣〔2〕处，洪达〔3〕对我说：「你可以不预约，突然去闯赵家，可以见到赵的。」洪达当时给我写了赵紫阳同志住宅的门牌号码：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

「十四大」结束了，日本天皇访北京之外也去西安了，正好今日无它事安排，便约好锡华〔4〕今晨到赵宅去。

灯市口西口，直直地往西走，走一会儿便认出了，这是我与老伴几次来外币银行的那条窄街，往北拐，南北胡同，印象中这似是胡耀邦同志住宅，坐西迎东，小门。果然，过几座西门，便到了，上写「六号」。多少年前我曾来耀邦这住宅。那时，这小门红漆剥落了，门面是苍灰色的。现在变了，鲜红底漆大门，门环是金色的，两个小石狮卧在大门两侧。按门铃，有战士打开门小洞口问话，我上前说：「想见赵紫阳同志。」他说：「你叫什么？有无工作证？」我说我叫杜导正，赵的老部下。我打开皮夹包，找到医疗证，恰无工作证。正急忙间，门内又有一人传话，「姓杜，请他进来！」我与锡华前后跨门进去。真好，无一人拦阻，见到两三位战士，无一人注目问询。我俩先经一东西外院，南面一溜五间平房，门窗也是新油漆的。往北进又一排南房，三、四间罢，没引起我俩注意，一战士说，再往北进，是一四合头小院，东面三间，西面三间，正房五、六间，都是红柱绿窗，不很新，但也是近几年新漆过的。院内几棵茂盛的丝瓜，搭着菜架，那几条肥瓜，有的茶杯般粗，二、三尺长，丝瓜北面有三、四棵柿子树，是一种新品种吧，不足两人高，橘红色的柿子密密麻麻地低垂着。院内无人，我和锡华镇静地往正房走，身后有人喊：「在南书房呢！」我与锡华转进南房。
我俩跨进南房门坎，一眼便看到赵了。他坐在东南方的座椅上，面色红润，见我们进来，他站起身，连说：「你们来了！」让我们坐下。我拉过座椅坐在他左侧，锡华坐在右侧。他笑着说：「杜星垣约好今天上午 10 时来，刚才说来客姓杜，我还以为是杜星垣呢，原来是你俩！」

我与锡华同赵握手。我不知一种什么心情，失态了，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泪珠在眼眶内滚动，幸好没有淌在脸颊上，我立即恢复常态，镇静下来。

~~~~~~~~~~~~~~~~

〔2〕杜星垣（1914-），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在广东和四川任职期间，为赵紫阳的部下。〔3〕萧洪达（1918-2005），193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经委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在中南局和广东省任职期间，成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部下。〔4〕姚锡华（1929-2009），194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1982 年，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87 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中南局和广东省任职期间，成为赵紫阳的部下。

我细细观察他的相貌。面色红红的，晒过太阳，头发全白了；两颊瘦了，他自己说：「还有一百三十斤！」「瘦了好些，我原先肠胃不很通畅，这几年通了，便瘦了些！」

他问：「你俩什么时候下来的？现在干什么？」

我与锡华避开这个会引起他悲伤的问题，没正面回答，只连连问他身体状况。
~~~~~~~~~~~~~~~~

我又说：「洪达、杜瑞芝〔5〕来看你后，说你身体好，大家好高兴。李普〔6〕、林里〔7〕、文涛〔8〕都问候你！」

赵说：「这几年，李学先〔9〕等几个人来过。李是老红军，不在乎，他先来探望了。我呢，这三年什么也没失去，只失去了打球的机会！」

赵说：「十四大前，中央九中全会〔10〕前，乔石〔11〕、宋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人找我谈话。」我说：「在这儿？」赵说：「不在这儿，在中南海。乔石说，中央维持四中全会对你错误处分的原决定！这些话是预料中的。我说了三条：第一，中央对我的两个错误的结论，我持保留态度；第二，处分我时，（处分）已见诸报端。我意见，中央应对我的错误与处分写一文件，发到党内，并将错误说清楚；第三，给我自由！他们态度倒好，答应将我的意见向中央汇报。」我说，「传说，次日中央开会，大家对你的意见持积极态度，无人责问。」赵说：「是的，次日他们开了会，会上，乔石、宋平为我说了几句好话。我和他们说的一些尖锐的话，他们没说！」

赵说：「对我的事，两方面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们不会变，我也不会变。1989 年 5 月份，事态发展到那个关头，我就知道，我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我不同意那么做，我必定下台；如同意那么做，那我要对那么处理承担全部历史责任。我选择了前者。当时，我开了家庭会，我决心走这条路。这条路是我自己为自己选择的，所以心境上无任何负担，我心情很坦然！」

赵说：「别的，我什么也不遗憾，只觉得有一件事，至今想不通，因此觉得委曲、难过。」

我想冲淡他的感情，起身添茶。他呷了几口，静静地说下去：

~~~~~~~~~~~~~~~~~~

〔5〕杜瑞芝（1920-），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佛山地委书记、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顾委副主任。〔6〕李普（1918-），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副社长。〔7〕林里，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人民日报》记者、《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广州日报》总编辑。〔8〕雍文涛（1912-1997），1935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林业部部长。〔9〕李学先（1912-2000 年），1931 年 4 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0〕 1992 年 10 月 5 日至 9 日，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同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十四大审议。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赵紫阳在 1989 年政治动乱中所犯错误继续审查情况的汇报，同意维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11〕乔石（1924-），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87 年至 1992 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3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4.26 社论（指 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后，群众情绪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因为小平同志听李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陈希同（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汇报后的那个著名讲话，在群众中传达了。一个工人便找我说：『中央最高领导是什么？』我答：『政治局常委。』对方问：『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要向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请示汇报？』问住我了。我将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国内的领袖地位如实说了，这个工人被我说服了。这话又提醒我，人们对邓的身份、讲话有意见。我出于维护邓的形象，才说了那些话。
~~~~~~~~~~~~~~~~~~

「第二件事是戈尔巴乔夫来，我与戈谈前，外交部替我起草的发言稿中有一句：『今日我俩会谈，就是苏共、中共两党关系最正式地恢复了！』按说，这是对的，戈、我是两方的总书记嘛。但我不知邓的底，我将这句话删去了。果然邓与戈谈时，邓说：我俩今日是最高当局谈话。以后，我又出于维护邓的威信，免除误会，才说了邓是我党最高权威的话。实际情况呢？在邓小平引退后，政治局开了会有过正式决定：一、政治局重大问题要向邓汇报；二、政治局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拍板。我公开讲话并未将这个底如实端出，我只说，邓是我党历史形成的领袖；重大问题，我们向他请教。」

赵说：「这可坏了！后来才知道，因为北京当时的政治局面，邓小平不愿意自己与中央保持那么近的关系，想保持一定距离。我不了解这个，只一厢情愿的维护邓的威信，就那么说了，结果是反认为我不愿承担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责任，好似将责任推给邓了。邓呢，觉得我那么信任你，紧要关头，你将责任推给我了！」

赵遗憾地说：「我与邓小平相处这些年，私交一直很好。我说多少话，做多少事，他都一概支持。上述事发生，我在邓的眼睛里便成了质量问题。我其实何必多此一举呢 !?」

我说：「目前政治敏感期，你去广东不适宜，先在北京休息，见朋友；同时快快撰写回忆录。」我还说，「回忆录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党内历史性资料；一类可以出版发表。」他表示不愿写。我说：「趁你记忆力好，将重要问题写下来，免得未来历史上留下空白！有些事，只有你们几人知道，党、国家又无正式记录，一旦你们记不起来了，别人、后人亟需知道，但无从了解，这从历史来说，是很遗憾的！你写了，是对这段历史负责！」赵对是否写回忆录的意见松动了，说：「也是，我可以写，当局还不至于搜查我的住宅！但各国领袖自己动手写的甚少，有些材料，同志们知道可以谈。中南海有个情况通报，有些批示我还有，我手头还有些文字材料，但若干重大问题的有关文献材料，在中央手上，估计不会给我的。如：一、『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我在给邓小平一封信中首先提出的；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我先提出的，邓很欣赏。这些都不在我手中。」

快 10 时多了，估计杜星垣照约要到了，赵要秘书搬来一只椅子，准备了一只茶杯。

梁伯琪〔12〕同志也进来了，她瘦了些，衰老了些，面色发黄，笑眯眯的。她一进门，同我们一一握手，还说：「连累你们了！」

我带了照像机，给赵个人、赵与梁，赵与姚锡华、赵与我，几人合照，我一一拍了照片。

~~~~~~~~~~~~~~~~~~~~

〔12〕梁伯琪（1918－），赵紫阳夫人，1940 年时任中国共产党豫北妇女部长，与赵紫阳结婚。1951 年前后曾任华南局一科长。赵与梁有六名子女，五男一女。晚年多病，长期住院，赵紫阳去世后，家人至今未敢告知她。

我将《中国禁书大观》精装本一册赠给赵。他放在案头，我在书中夹了一张一胞三胎我的三个小孙女的彩色照片，他细赏许久，还笑眯眯地说：「我家也有双胞胎一对。」

我说，广东干部、农民、知识分子都非常地怀念你。去年冬，我到中山县库充大队，你当年认识的陈二妹、上官婉仪多次问候你。赵说：「你那次去中山县，写了珠江三角洲一篇大文章，别人给我，我看了！」

我建议：「就市场经济问题，你研究一番，这个问题太大太大了！」

杜星垣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进来，杜与赵等握手，寒暄。
~~~~~~~~~~~~~~~~~~~~

赵发表一番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极精辟见解。他滔滔不绝，思路极清晰，语言运用准确，层次极分明，像他「六四」前一模一样。

我再次被折服了，洗耳恭听，想默默地一字不漏地在脑子里记下来，但我毕竟也是 70 岁的人了，只能记个轮廓，晚上写在日记本上。

赵讲：「市场经济的前提，牵涉到所有制。像老杜刚才所说，是国营制，国营企业垄断，哪有什么市场经济？是国营、国有，赢亏都是国家的，那就竞争不了，也不要竞争。

「小平同志思路很好，很实在。这十几年来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镇个企，私营，小平又搞了对外开放，有了三资、合资，这些经济可叫做我体制（国营、国有）外的经济，他们是市场经济，进货、售货、资金、价格都靠市场，靠自己，无人作后台，竞争性很强。发展了十几年，这一大块很活跃，发展迅猛，使得我国产品、商品迅速丰富起来，又安置了那么多劳动力。这些经济的发展，是十几年来最大的成功。

「这个成就，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不是我们预先设计好的。如果谁说，这是他（指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他创造的，我可以作证，没那么回事，是实践在前进。我们原来一套行不通，我们便将这一块放开，群众便在那儿创造，闯关，闯出了一个新天下！

「国营、国有的这一块。关键在于减人。但减下来的人怎么安排？安排到哪里去？看来，体制外的这一块发展了，便可以安排国营精简下来的人了。广州地区便是这样！

「国营、国有的这一块怎么搞？可暂时不管它！『六四』后说国家经济要向国有、国营倾斜，怎么倾斜？投票子、投材料，怎么样？有起色没有？没有，行不通。于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子上去。

「我想，放开，发展个体、私营、外资，这一块发展了，市场经济发展了，国有那一块就好办了！
「现在不必争论。不要争论，这是小平说的，很好。一争便要问姓社？姓资？领导人你说话不说话，说，怎么说，这是什么性质，甚么社会，我们搞了几十年啦，概念很多，很难说啊！所以我说，干，埋头干，发展生产力，怎么能将生产力搞上去，就怎么搞！

「张学良很佩服蒋经国，蒋经国将台湾经济搞上去了！蒋经国临终前，办了三件事：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允许到大陆探亲。三件事，了不起，值得我们注意。

「马克思基本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积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超前不对，滞后也不行。」

在交谈中，赵还说了以下的话：

「我 73 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

「我现在坐在这个书房，比在台上清闲不了什么。那时，批署文件，现在看书，也挺紧张的！」

「以后，我的愿望就是让我打球，昨天下午打了一次，在通县，能打九个洞，有一千多公尺。『十四大』以来，我打了三次了。」

「他们给我谈话，老说考虑到稳定，你要什么什么，无非是怕我上街说话，将话传到外国去，传到民间去。我答应我不那么做，叫他们放心好了。反正我自由些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先打个电话，我们谈谈话。」

「老杜（指杜导正），你能不能搞到外国的书？一本索尔兹伯里的《新的皇上——邓小平的中国》，阮铭〔13〕也有一本。能搞到，我想看看；搞不到，勿勉强！」

留下时间，给杜星垣与赵单独谈，我与锡华告退。赵说，不是说要照像吗？于是，大家都笑着走到内院柿子树下，在阳光处，赵、杜星垣、姚锡华、我合影，赵非常高兴的样子。

赵的书房，靠北窗台，有一半椭圆形咖啡色书桌，四周墙前摆满了中外图书的大书，一圈沙发，一台电热开水炉，还有一具烤电医疗仪。倒安闲、清静、整齐。

几次细瞧赵的形象、动作。赵明显地瘦了，往日魁梧的形象不见了，你再注意观察，他两只手好似，不，是瘦了，小了。过去，他手掌白白的，红红的，厚厚的，大大的，现在小了。一是年逾七十，二是心情不佳，等于蹲了三年牢笼。他说，我被软禁了三年！

谈话中，进来一个 50 岁年纪的中年人送报纸、旋退出。临别，请他留名字，他说我叫王天生，还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家电话号码：××××796，赵这里电话：××××645。看来，颇中肯，老诚。

赵说：「陈立夫学周易，长寿！活到 93 岁，耳聪目明，搞政治则或喜或悲，不易长寿！」

赵说：「他们想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心转意。派王任重来，王与我关系还可以。王找我谈话，说我右，意即照我思路做下去，中国资本主义要发展了。我想，我不右，而是你（指王任重）左。谈不拢，他们也便对我死心了！两方面都是以不变应万变！」赵还说：「王忍之知道那个『社会主义说不清楚』的来历。一次谈话，我是说过一句社会主义说不清楚，我非郑重说的。王『六四』后抓住这句话批我。其实呢，批我是假，批邓（小平）是真。那文章的矛头指向谁，谁看了也明白。」

~~~~~~~~~~~~~~~~~~~~~~~~~~~~~~

〔13〕阮铭（1931- ），理论家，曾为胡耀邦所倚重。1988 年后旅居美国。

从赵的北院出来，到南院有三、四位战士模样的人在闲聊天，对我们的行踪似乎不很在意，我心也就轻松了些。

记下这难忘的一次会面罢！

非常地惋惜这英才被埋没在窄窄的小院里！

我说：「『六四』后，他们组织了班子，拟好了题目，将你的材料，主要是你的十三大报告，梳了辫子，要全面、系统地批判。邓小平同志 1990 年初一次讲话，说：『十三大报告是十三大正式通过的，一个字不能动！』这才将那个险恶的批判行动阻止了！不然，不是批了赵，而是批了邓，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可就太危险了，后果不堪设想！」

1992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到紫阳同志门口，昨晚电话约好的，赵的秘书王天生在我按门铃后开门出来，握手。我进门便去后院。送下照片即离开。昨晚，今早，我选了 21 幅，照相的功夫可以，是珍贵的纪念。我顺手给赵一信，写道：
~~~~~~~~~~~~~~~~~~~~~~~~~~~~~~

「紫阳、伯琪同志：照片冲洗了 21 幅，奉上，不够很理想，留作纪念罢！索尔兹伯里那本书，我正寻找，找到即送上。另，星垣、锡华处照片也另付。敬礼！杜导正。1992 年 11 月 7 日。」王天生说，赵正做香功，便告辞。回程路上，心里窃喜，想，赵看到这些照片，会欢喜的。能看到自己心境坦荡的丰采，看到老朋友们浓厚的友谊。我为自己能给他一些欣慰而感到高兴！

赵紫阳谈中国腐败的根源与特色

1993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洪达提议，过新年了，星垣、导正、锡华、洪达夫妇，一同去看看老头（赵紫阳同志）。大家都想去。事先我与赵的秘书王天生联系。王家电话我有，一拨便通，他答应报告赵。次日王秘书来电话说，「欢迎来！只是 1 日早晨赵家有些家事，你们上午 10 时来好了！」我通知各方。

昨晚，我准备点见面礼，他别的嗜好没有，只睡前爱喝两口，我准备了两瓶汾酒。今晨爬起，与老伴乘锡华车去洪达家，星垣脸色红红的也赶到，说些过年吉庆的话消磨时间。9 时 45 分，萧、杜一车，锡华与我家一车，先后驶入富强胡同。这天街上车辆较平时略少些。富强胡同六号南门有一车，不知是干什么的。车近六号门口时，北方驶来一辆四环黑色卧车，与萧、杜车迎个正着。我正想如何错车时，锡华却说：「那不是赵吗！」果然，这么巧，赵下

~~~~~~~~~~~~~~~

〔14〕王任重（1917－1992），1933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在中共冀南区和中共中央中南局任职期间，均与赵紫阳为同事。「六四」以后，中央成立了赵紫阳的审查小组，考虑到赵紫阳性格比较倔强，决定由与赵关系较好的王任重任小组长。王主持了对赵的审查工作。〔15〕王忍之（1939-），1950 年加入中共。1987 年 2 月至 1992 年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92 年底，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是主张武力镇压「六四」的活跃人物之一。

进门，看这院子比两月前那次看得真切。这是一座三进门即三院式中式房子，第一进，南边车站在门口，正望着我们呢，他同我们一一握手。今日，赵穿深灰色夹克、皮鞋，脸色红红的，平滑滑的，甚少皱纹，略嫌清瘦。他说，当老百姓了，几年来，我今日第一次去看望一位亲戚。

一排平房，约有五间，西房两间，东房一间，从东北角有夹道进第二院子，南房四、五间，西房一两间，东房一两间，这南房即上次会见赵时那个现代化书房。往西拐十数步，北有门楼，即第三进门，正院，北房五间，院里方砖铺地，那果实累累的红柿子树已枯萎了。赵将我们带进他的卧屋，这房屋正中堂屋不到十二个平方米，正面一沙发，两侧各两个深绿色灯芯绒的单人沙发，老式得很，但坐起来还觉结实。赵坐正中，星垣、洪达坐西侧，锡华与我坐东侧。堂屋座位不多，我的老伴续志先和于华（萧洪达夫人）、舒元璋〔16〕被赵的夫人梁伯琪领进堂屋边的一间房——赵的卧室了。梁笑眯眯地将门闭上说，你们男士在外面谈，我们妇女在里面谈。

赵问候大家好，还说：「听说导正到广东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答：「我这次去广东，见到了林若〔17〕、杜瑞芝，大家都问候你！林若要来看你。」锡华说：「洪达、杜星垣几日后也去广东。」赵说：「过几天，我也去广西看看。前些时，我写过一个报告给他们，说我想去广东看看。上边派人来了，也不说不能去广东、福建，只说可以到江西、湖南、四川、广西。我说为什么不能去广东？他们支吾说：香港事件正闹得尖锐。我也便不说了。估计，除广东、福建外，别处均可去。」接着，他要我谈广东之行的感受。我说了广东蓬蓬勃勃，有些同志担心过热。此时他说：「广东、福建经济建设，多为外向型，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售，都面向大陆以外。这样速度快些，不会出现问题。所谓过热，表现为三点：一、票子发多了，但无商品作后盾；二、基建投资过大，但无后劲跟上去；三、加工部份很强，材料上不来，成品出不去。这三条，广东都不存在，所以不必担心。北京的弊病是，一说过热，便反眼睛盯住沿海，要沿海压缩，这不符合实际。问题在内地攀比，不顾自己的条件，也大干快上，这会出事。」谈话约半小时了，洪达说，我们
~~~~~~~~~~~~~~~

回罢，让他休息。

赵谈兴未减，眼睛瞅着我：「老杜（指我），你说下去！」

我说：「广东老同志们谈论少数党政干部腐败的问题。我看广东腐败亦严重，但老百姓多数生活好，干群关系便不显得那么尖锐。去广东前，我去了山西省的吕梁山，接触了知识分子，那儿干群关系非常尖锐。几位知识分子跟我说：一、共产党现在的腐败超过了国民党；二、现在腐败已渗透到每个角落；三、共产党已整治不了自己的腐败；四、邓小平在，中共地位仍能维持；五、邓小平走，腐败问题便会爆发，要靠另一个力量解决中共腐败问题；六、如中央处理得法，中国共产党的这场危机也许能避开去。」

赵听完我这一通宏论后，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老杜讲得对，沿海这个问题缓和些，内地尖锐，但沿海到一定程度也会尖锐起来。」他说：「问题不在市场经济引起的干部腐败。市场经济中，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中国市场经济中，那些投机倒把之类问题，倒容易处理。

~~~~~~~~~~~~~~~~~~~~

〔16〕舒元璋（1930-），姚锡华夫人。1953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传记文学》编辑室主任。离休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是把赵紫阳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的主要操作者之一。
〔17〕林若（1924-），1945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不再设第一书记）。1991 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问题在我们以前是计划经济，党政干部操纵着控制国计民生这些命脉的经济部门。这些干部中许多人以权谋私，拿特权在市场经济中捞外快，一下子便是几百万几千万。权力、特权与市场结合，这最易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集团，也利用特权参与市场，但他们人数少，我国是层层官员集团，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尤其是领导干部子女，谁晓得他们搞成什么样子！」以后他又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政治上要改革，发动人民监督我们！」这中间，星垣、洪达偶然插几句话，我也说了些反映实际的话。

快到 11 时了，我建议照相。赵女妞妞取出照相机，梁伯琪也取出自己的照相机，在院子里左一张右一张拍了许多。

离开赵的堂屋客厅时，我们到堂屋东侧房间招呼女眷们一起走。进得门来，赵也挤进来了，他笑着说：「你们猜，这沙发、这张桌，这张草编席，是干什么用的？」他神密地用右手指着这物件，心情蛮好地问询。看这沙发，米黄色帆布罩，靠背上放一块浅色棉垫，小木桌上又放一灰色棉垫，沙发右侧摆一尺见方的草编席。大家乱猜，我想，这些大都是使用保健按摩器时用的垫子吧。赵狡狯地、笑眯眯地说：「你们猜不到，是罢？这沙发上的棉垫，是小狗睡觉的地方，木桌上的棉垫也是它睡觉用的，那块草席斜放着，是防止小狗爬到我的床上。」他爱小动物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我四顾这房间，大小与堂屋同，不足十二平方米，中间置一双人老式大木床，床上是极普通的床单、枕头和迭好的绿色棉被，给人一种 60 年代普通干部卧室的感觉。大木床北置一小木床，放些日常生活用品与衣物。我老伴说，原以为这是梁伯琪的卧室，谁想这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原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卧室呢 !?

赵的南面书房，蛮考究的，现代感甚强。有高架金属框书架、地毯、高背软座椅、硕大的办公桌。但这卧室、内客厅可寒酸多了，尤其是卧室，简陋得出乎预料！我想，这也反映出赵的心情，赵爱小狗，更可理解为是一种心情寂寥的无奈现象。上次谈心，赵一再说：「我心境坦然！」这自然也反映了真实的一面，即自认为自己正确；他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自有平衡自己、克制自己的教养。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人，是有血有肉之人，有七情六欲之人。他曾是中国当代第二号人物，又是轰轰烈烈改革开放之二号人物。想当年，1987 年十三大闭幕，他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人大会堂接见几百中外记者，他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对答如流，泱泱大国领袖，何等光彩夺人！他正春风得意，「六四」不公正地一下子把他从巅峰
~~~~~~~~~~~~~~~~~~~~

打落万丈深渊，传说一些老人甚至主张召开公审大会，由最高刑事法庭起诉，将他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以后，虽然邓小平、陈云放了话，调子降下，但跌入冷宫，失去人身自由，过着孤苦伶仃的悲惨生活，他心情能坦然吗？能平衡吗？

「香港的统治模式值得借鉴！」

1993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中午赵的秘书来电话，问下午我能否去赵处谈谈，我答应了。

下午 3 时 20 分抵赵处，在他的书房谈。他开宗明义，说，上两次你来言犹未了。你是记者，接触各方人物，了解情况多些，给我敞开说说。我说了一小时许，说了我党腐败问题，说了地方工业（国营部份）凋敝、地方财政枯竭，说了「六四」问题会在邓去世后提出，顺便说了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二杨」事件在地、军干部中的议论。

赵几次插话，后有大段谈话。要点如下：

一、「二杨」

邓南巡讲话及 6 月两次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讲话，都说明邓对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体制很为不满。给人印象：要解决江、李体制。江、李那个时期，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时，杨尚昆、万里〔18〕误以为邓（小平）换江（泽民）、李（鹏）的决心下了，便做出以杨（尚昆）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以代替邓过世后做「最高权威」。万里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便是说有人要变！」

「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二、腐败

我上次说过，最可怕的是我官员利用手中政权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会出现（「超额」、「超级」）的盘剥、敲诈等恶劣行为，引起人民极大反感。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干部腐败问题没内地尖锐，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这个问题也会尖锐起来。这个问题怎么办？看来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动手治疗有困难。我党党内腐败到如此程度，靠我党目前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去整治，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以为，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蒋经国这个人物也了不起，临终前嘱办三条：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这也是蒋经国

高明之处。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不许动、不能动，但个别人员可以撤换，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这种思路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不允许挑战，但执政党的官员可以变换，可以监督。这个办法看来是聪明的。

三、邓小平十几年改革开放，有大功

～～～～～～～～～～～～～～～～～～～～～～～～

〔18〕万里（1916-），1936 年加入中共。1977 年 6 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六四」后，这条路线邓小平没有动摇，坚持下来了。1992 年南巡讲话，都是过去他讲过的话，无什么新鲜语言、新鲜思想，但在当时那种国内时代背景下说这些话，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邓一直坚持中共集权。党内他一贯不主张，也不赞成民主。他不喜欢别人提出意见，不喜欢民主协商。他说，美国那种民主，程序繁琐，效率很低。中共呢，一个政治局会议，将大问题拍板了，解决了，我们效率很高。邓常说，党内办事，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一套，大的思路仍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源于革命战争中培养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前些年这个问题上，邓还开通些，现在年龄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经不可能改变，不会改变。这样，便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议论、都在预测、都好象没办法的大问题。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我插话说，新加坡李光耀，台湾蒋家父子，南朝鲜李承晚，都是政治独裁下维持国内安定的良好秩序，放开经济；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这时人民与执政党关系缓和了，这时再搞政治改革，开放民主与自由，执政党与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承受能力都强些，好似效果不错。赵说，人民生活富裕了，照样闹事，这样例子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南朝鲜金泳三上台，泰国军人垮台，连缅甸都在变革。

四、预测

他说，江、李政体，是完全在一种突然的状况下产生的，这么多的问题，很难说他们能处理得了。我插话说，党内外高中级干部与知识分子多数，主观上还是寄希望于我党执政，希望我党能找到一条躲过可能危机的道路。即我们经济上去，政治改革也稳步进行，取得人民内心的支持、拥护。希望我党不要垮台。赵接着说，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问题，什么形式能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协调。他说，人民会去创造，我们多听听人民的意见，便会找到一个办法，当然这中间蕴藏着危险。

五、其它

「六四」后，邓有一次说到中国农村还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这段话未向下传达。如传达，不得了。但这段话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时机抛出来。邓也有政敌。

从下午 3 时 20 分谈到 5 时 30 分时，他看了看表说，在我这儿吃饭罢，边吃可以边谈。我说司机在门口，他说，也好，再谈一会儿。他又说下去，说到晚 6 时了，他说，你告诉司机回去，我们边吃边聊，我派车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来，让梁要车。一会儿，梁进来说，司机感冒，不能出车，我叫车队（指中南海中央车队）派车罢。赵接着谈写回忆录事。我说分两部份写，一部份是存档案的不能公开的数据，一部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东西。他说不好那样分开。他说，你上次提出写回忆录的意见后，我考虑过，觉得也可以，但数据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费力。我说，记录下这些数据，可供今人或后人研究，这是你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当场我俩商定：搞一份「内部情况」，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报数据；待他从广西回

家，他、我、锡华商量一下，定个计划；先搜集资料，再初整理，再细整理，两三年内完成。

晚饭，他要上茅台酒，我说汾酒，他斟酒给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烩饼，副食是青菜、腌黄瓜、牛肉土豆。清淡但营养不足，亦不精致。厨房、饭厅也不够整洁。不如萧洪达家，也不如我家。中共总书记啊！今天怎么活成这模样儿？我喝一杯酒，吃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半碗烩饼；他呢，喝酒两杯，吃几口菜，好似未吃饭。

饭后，来人说中南海车队派不出车来，因天晚了。

这有一种可能，天晚怕赵出事，故意推脱不派车。如若当年，不说梁伯琪夫人要车，就是赵亲戚用车，一句话，车队也屁滚尿流派车来了。对这些事，赵镇静自若，但绝顶聪明的他，不会没有感慨！他说了「我饭后派车送你！」竟然因专车司机病了便要不到车，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来出租车将我送回万寿路！

中国政治，可悲！

赵，一位当代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被整得失去光彩，送朋友连一辆车也要不到，真使人哭笑不得。

赵，内心会何等悲伤啊！

1993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将赵要的书《变动中的政治秩序》与元旦时拍的赵的四幅照片，置一大信封，送到赵家。

「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苏联解体值得深思！」

199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紫阳同志处王参谋昨日上午来电话，问我在不在家。我老伴接电话听不清楚。中午我从办公室回家，老伴说的含糊。不一会儿，锡华来电话，说赵问你在家不？再一会儿，王参谋又来电话问，我约好锡华、洪达去赵处。

今日上午 9 时许到赵书房，老人已久等了。坐定，赵先说：「3 月末，不，4 月 1 日，从湖南回来，到广西，省四套班子一把手一齐来表示欢迎。春节，一起来贺年，公事公办，这也好。彼此不认识，我便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在南宁，住邕园，好大的一片园地，有泳池。女儿、四军、小儿子先后从各地赶来。几年了，第一次全家这么热热闹闹过年。我只乘车逛过一次南宁，哪也没去过！以后从广西到湖南，那儿气氛缓和些，熊清泉（省委第一书记）单人一次来见，几个领导人，也不是约好一次来做例行公事，来了便谈谈心。有一位离休的，谈了两小时，谈得很大胆，我不熟他，不说什么。别的都是官场故事！老百姓、一般干部不知我来。」

锡华插话说，「昨晚法国电台说，赵紫阳去了广西、湖南，湖南报纸还登了赵的一幅照片。」赵说：「没有的事！」赵说：「我住那里，那里的护养工人、管理人员当然知道我了，不少人，乘无人在我身边时，便凑过来说些亲切的慰问我的话。有位老工人说：『这么做，不公平嘛』！」

因为要修理紫阳书房的电视机，我们转到北屋小客厅继续谈，从上午 9 时 10 分一直谈到 11 时 45 分。赵讲了许多，以下是一些精彩的片断。

「今日的美国，北欧尤其如此。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去创造财富；资产阶级国家，则通过国家，将社会创造的财富，予以再分配。这种分配，避免了财富过度集中，使广大公民生活过得去，得到保障，得到改善！

「我的儿媳，在美国生了双胞胎，住进最好的医院，婴儿体弱，在暖箱生活许久。照美国医院收费标准，这一次生育，至少得花费十万美元左右，但最后交款，只留下一个地址，有可能要补充十分之一的款便可以了。儿子说，我笨了，如果我当时不留地址更不用交分文了。美国遇到病人，先收进治疗再交款，美国一套保健措施很完善。

「对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会有不满，有的，有的，但人民可以接受，并不愿推翻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已消灭了。科技发展的结果，蓝领阶级也没有了！这个制度已非 19 世纪那个粗暴的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阶级的那个制度。今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自我不断纠正、不断完善自己，人民稍对什么不满便登报、集会、游行，然后政府便接受意见，加以解决。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我在欧洲看到，以为是年轻人游戏，现在看，不对，它能制约政府在防核上约束自己。美国政府首脑更迭一次，将政策纠正一次。

「马克思见到的、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 19 世纪的，许多结论、公式，那时看是对的，现在有些可以存在，有些不适用了。

「苏联解体时，叶利钦宣布解散苏共，人民砸克里姆林宫塔顶红五星、砸苏共牌子的情景镜头，逼人深思！到现在，苏联生产、生活那么糟，但人民并不留恋过去的苏联制度，不想恢复那个制度。从苏联看，人民大多数抛弃了那个制度。这非常地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要敢于面对冷酷的现实，要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不然，对目前的社会，对我们的改革，对苏联东欧的改革，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老干部会头脑困惑，年轻人现在则根本抛弃了我们这一套。

「形势非常严峻！

「今日要从理论上说明这些，作出科学的解释！」

他多次说到要从理论上彻底地、科学地面对现实，做出正确的解释，以凝聚全党、凝结全国人民。光是四个现代化，光是共同富裕，这不行。

赵还说，在广西，他们事先给我做了安排，生活上待遇优厚，住的、吃的、行的都很好，但怕我接触人民。我到北海去也不行。回到北京后，只许我到一个高尔夫球场去，我去养蜂夹道俱乐部打弹子，也说不行。我火了，说我步行去，以后，派辆车来去了。并解释说现在不是说不让你去，而是警卫有困难，使你不能去。可我去了以后，养蜂夹道俱乐部却清场了，我什么人也见不到了。他们一直盯着我（上次他说，他们一直把我的存在看作是对他们统治的威胁）。

我开玩笑说：「你现在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身自由！」

中国这个党，中国今日这个社会真是莫名其妙，他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怕赵紫阳，怕这怕那，就不怕对不起人民。

关于「赵紫阳回忆录要怎样写？」的讨论

1993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

下午，先与锡华到洪达处，然后一起到赵家，赵已等在书房了。赵要我们先谈。锡华谈了「大事记」与那日从赵处拿来的剪报。他说了几条：此回忆录以议为主？以叙事为主？又说以编年体一路叙述下来。我说：「一、写粉碎『四人帮』到 1989 年 5 月，共 11 年半，避开六四和六四后这 4 年；粉碎『四人帮』前暂不写，这一前一后，待以后写。二、写三条线，四大块，即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以五湖四海、不搞政治运动的组织路线。四大块，即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我说了一通包产到户为中心的我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中国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位置与意义；十几年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多次斗争；赵的功绩、贡献。写时要高屋建瓴，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只求科学、客观，不考虑别人如何评说。

然后，赵说，可照导正意见写。一、只写我回中央后到「六四」前十年改革开放；二、按问题写，从近往远写；三、以议为主，写观点，写事实，大家都知道的不写；四、我这个东西是「立此存照」，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五、我可先搞个东西，你们几个再修改，再整理；六、参与者就我们几人，不扩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赵谈了两个问题：

一、「我不知道要胡耀邦下台」，「胡下台不是我那几封信引起的」。详述了 1986 年夏，邓小平、陈云〔19〕考虑胡下台的背景、经过，详述了自己给邓、陈一信的内容、经过，谈了对胡的长处、短处的看法，说 60 岁人中无人能代替胡耀邦总书记一职。但胡说话有随意性，不受集体约束。说邓、陈如出大事中央会出事，建议在邓、陈健在时，中央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即投票制。

二、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具体措施、政策，可不多着笔墨，这些并不规范，但是都朝着以下两个目标前进。这两个目标是：（1）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2）进入市场经济。

赵说，下周不谈，大家酝酿一下，下下周再谈。谈话中赵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

1993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

看杜星垣去，与锡华同往。杜说有关方面对赵紫阳问题如此紧张，一是不愿他接触人民；二是国内治安不好，恶性案件多，黑社会已进入大陆，要保护赵的安全。对赵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赵威信没邓小平高，邓比赵民主。赵有的方面对，但有些事武断，办了，出问题。赵聪明转得快。写赵紫阳十年回忆录要客观，赵的失误也要写。

～～～～～～～～～～～～

〔19〕陈云（1905-1995），1925 年加入中共，是中共元老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的基本思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

1993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昨日，赵处王参谋代赵通知我去，我约锡华同去。从万寿路口乘出租车，到灯市西口下。赵书房闭，敲门，赵从内门出，坐定。赵说：「一个多月不见了，今日说说话。」

我说：「《解放军报》一、二、三、四把手因将江泽民给美国记者谈话稿登四版，此种事已三、四次了，前几日被军委下令全部免职。」说到此处，赵说：「尚昆自以为得到军内外老同志尊重，但老同志如张爱萍〔20〕、萧克〔21〕、杨勇〔22〕全反对他！」我说了意识形态界人事变动，十四大后，宣传领域宣传邓的路线坚决了，但别的方面无变化，引出赵的一篇长话，他讲话要点如下：

一、我党我政权腐败大量存在，大量地将国有财产、国有资源，通过不正常渠道，向私人手中转化。今日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大量转入私人手中的长过程。苏联、外蒙转公为私，还一人（每个公民）有一份，今日中国是与权力、特权结合一体，官员本身、与官员有关系者，靠权以种种名义，窃公有为私有。这种状况，日盛一日。「六四」前，小礼小送，现在，股票、红包，大批大批入了私人腰包。今年现在比去年严重。看罢，今后一两年，还会盛于今日。

二、这种转公为私的情况，如此严重，自然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且因：（1）我们过去做了四十年社会主义精神灌输，用一种崇高的价值观教育人民，如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廉洁无私，人民对我党要求很高。（2）中华民族自古便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因此对目前这种腐败更强烈不满。（3）这种转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皆源于小平同志的「经济自由、政治集权」。我们经济改革开放，开放了，这很好；但政治一套，还是我们的老一套。即专政、专制，党外无民主，党内亦无民主。如舆论，操在我少数人之手，官员贪污腐败，无任何人敢于揭露，批评。王家那些腐败行为，谁敢说一个「不」字。（4）因此，小平健在，靠小平的巨大威望，我们目前这种局面尚可维持。（5）但是小平一走，无一人有小平那么高的威信统一全党全国。那时，这种局面我以为很难维持下去。那时会出现三种方案三种前途。第一方案，在人民强大压力下，我党主动整改，实行政治改革，加大民主自由，取得人民的支持。这是最佳方案与前途了。第二种，我党政治上不能顺应民心改革，国家会因人民不满，动乱，会被各种力量加以利用。第三种，动乱后保守力量利用人民的不满（人民那时还可能产生盲目的不满情绪），将国家拉回到老路上去。这第三种可能性小。

～～～～～～～～～～～～～～～～～

〔20〕张爱萍（1910-2003），1928 年加入中共。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任团政委。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解放战争中，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1949 年后曾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1〕萧克（1907-2008），1927 年加入中共。1928 年参加湖南起义，上井冈山，曾任红军第八军军长、第六军团军团长。长征中任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任八路军 120 师副师长；解放战争任华北军区副司令、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1949 年后曾任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等。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2〕杨勇（1913-1983），1930 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赵还概括了邓的基本思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两手硬，并不是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非也，邓在政治上是一贯反右的，不反左的。如以为邓政治上反左，那便错了，要上当！邓在经济上反左，

如以为邓在经济上也反右，那也错了。邓力群〔23〕「六四」后错在「冲昏头脑」，以为邓要全面反右，邓力群便在政治上反右得手后，在经济领域也反右。邓力群提出走资派还在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便触痛了邓的神经，引出小平 1992 年春这篇南巡讲话。

提到写回忆录事。赵说，原以为十四大后，给我自由。实情非也！对我还是很警惕。我从长沙回京后，打高尔夫球，只能到一个农民办的场去。我到养蜂夹道俱乐部去，不让我接触任何人。听说胡绩伟说：赵是只活老虎，他们怕他出笼啊！

赵还说到江泽民。「六四」后，江提出改革开放的两种「观」，即资产阶级改革观、无产阶级改革观，或资本主义改革观，或社会主义改革观；反和平演变代发展生产力，也是江的发明。江还说过些别的不当的话。近日，江在华东经济工作会上讲话，八面光，很圆滑，实际不解决任何问题，这样不行。

说到回忆录事，他说看来得缓缓，免得他们生疑，疑做什么事。他们已高度戒备我，但这种状况不会持久。他说，我缺助手，连查个资料，都无人查。身边是他们派来的秘书、参谋，我不敢说，说也白说，他们要向上汇报，否则上级怀疑他。他说到这里，我说，写回忆录，事关你对这段历史负有严肃责任。过几年，记忆力弱了，便难做了。所以，我的意见：一、决心不变，坚决写；二、方法讲究，可从长计议。你先自己写，要求不要高，想起多少写多少，无次序，漏掉什么也没关系。先写素材或事实经过，以后便可整理。赵说，那好！我还是决心写下去，只难处多些。原来的秘书局、老人、熟人，我借个材料，还给，如这个材料，便是他们给的。现在换了新人，不会给了。

老人面色、体质无变化。他自已说，眼睛差了，看东西一个小时后便模糊。

临别，我看到中间院有一棵石榴树，树梢长到墙头，橘红色的小花，红彤彤的，开满一树，千百朵。我说，这树今年花开得好热闹啊！他在我身旁说，这棵树长在太阳光下，开得便好。里院那棵被高墙挡住见不到阳光，开得便差。我心里特别凄凉。

一位绝顶聪明，实实在在，积累了宝贵经验的一代英才，就像里院那棵见不到阳光的石榴树，日见萎缩，花都开不出来。今日，说他获自由，实则被软禁，郁郁的，一介小民，连小民都不如。他名义上，处境比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四人帮」押在京西宾馆好些〔24〕，实际上，那时，大批干部被押，被处分，他不会觉得十分孤独。今天呢，真是孤零零的，又是一代总书记，如此处境心情之凄凉是可以想见的！

～～～～～～～～～～～

〔23〕邓力群（1915-），1935 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82 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 年中共十三大中委选举落选，改任中顾委委员。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赵紫阳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邓小平点将的。在邓小平 1975 年整顿过程中，他坚决执行邓的方针，四川面貌大有起色，邓非常高兴。「四人帮」批邓后，便将赵紫阳召至北京，关押在京西宾馆审查。
他平生嗜好，只爱睡前喝一盅。今日我又带去一瓶法国名酒。临别他说，老杜，你每次来，都带一点礼物！说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意。我作为他的老下级，老朋友，我内心敬重他，为他的蒙冤，心里充满同情，对一些整他的人很愤怒！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该再发生这种不公平的事！

秘书评论赵紫阳的为人

1993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

亲人们绝不可能忘掉「六四」。今日与老伴到翠微商场买东西，从翠微路往西回万寿路口，在人行道上及右侧草坪上，多处发现白色铜钱样纸张。这是我国北方尤其是北京祭奠亲人用的。《茶馆》尾剧三位老人，在乔四爷提议率领下，绕茶馆饭桌一周，边给自己唱悲哀的挽歌，凄凉的挽歌：「再见了！」边向天空撒这种纸钱。纸钱旋转着，轻飘飘地飞满上空。这是一种向人间不公的抗议，一种自己向自己告别的表示。这纸钱，我在「六四」后不几日，就在这万寿路人行道上见过，当时心中一怔，疑是附近亲人向「六四」亡灵致祭。以后我与老伴常去万寿路，平时见不到，独独年年「六四」后能见到这种纸钱，肯定是一个家庭在一个有心者主持下，顽强地纪念「六四」他们失去的亲人。「六四」中，这万寿路东段是我军开枪打死、打伤人的地方。

1993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下午，赵（紫阳）处秘书王××来我家小坐。王坐下来谈了些心里话。

「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局长。上级在 1989 年 8 月派我来赵处任秘书。上级说，你合适，去罢！任务是体现政策，为赵服务。体现政策四字，我未向赵说过。十四大前，大家不便探访赵，赵也避免给大家麻烦。有几年，过年过节，梁伯琪老人不在，孙子不在，赵孤零零的甚是可怜。我便去探望，赵跟我说了许多心里话，赵说历史会作出结论。看到邓小平评价 1984－1989 年巨大成绩的一个文件时，赵高兴得什么似的。他说这个文件你们先读还是我先读？我说你先读。他先读后，交我们读，又拿回去细读，读得很仔细，还跟我说：『小平同志对那五年的工作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虽未点我的名，但那五年是我主持中央工作，对我工作便作了充份的肯定，我心满意足了！我感谢小平同志！』」我（杜）插话说：「紫阳同志对邓小平路线是忠心耿耿的！」王××说：「我以为中国党内领会小平精神最好、贯彻最得力的，除赵紫阳外，别无第二人！」王继续说：「赵生活极有规律，极顽强，干什么事极认真。先在院内打高尔夫球，挖一小洞，置高尔夫球，取出，用杆打到大网上去，一日要打 150 杆。后发现腰部不适，原来老是这动作，使身体出毛病了！」十四大后，他去顺义高尔夫球场，去七、八次了，也是回避外人。遇到外人，赵便回避。赵说：「我不会给中央招惹麻烦！」「赵对我满意，几年了，跟我发过三次脾气，那不是针对我，是针对别人，我懂！事后赵马上找我谈话，自我批评，安慰我。」「赵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完全的自由！今年初，赵想到广东省，中央不同意。去了广西和湖南。这次又提出去山东，上边又说山东是沿海，他不便去。于是赵先去黑龙江了！」王××对赵表示了深沉的理解、同情。

我今日送赵一瓶茅台酒，致一信给他说：「你无嗜好，只睡前饮一盅，送上一瓶茅台酒，表示我一家老小的一点心意！」赵在落难中，心境绝不会平静，我作为他的老下级，了解他，无限地惦念他、同情他，为他鸣不平！我尽我一份心意而已！

「反腐败，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去查)！」

1993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赵处。梁伯琪几次询问我在家不？昨日，舒元璋在家，转来赵处王秘书电话：「赵说，明日，杜若在，希望杜、姚来坐坐！」

今日乘出租小面包车，与锡华到赵处。8 时出发，9 时前经灯市西口拐到富强胡同。静悄悄的，没见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敲门，赵已在书房等候了。

他，面色红润，有光泽，好似刚理过发，那白色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穿一件藏青色夹克上衣，挺精神的。他说：「聊聊天，几个月不见了！」

他说，「到黑龙江一趟，住哈尔滨，全家大团圆，除老大老二外，都到了。我往日忙于工作，与儿女们缺少接触，这次好了，大家高高兴兴，天伦之乐吧！」

「这个时期，社会上议论的热点是什么？」

我与锡华尽我们所知，就反腐败这个大题目，详细地做了汇报。从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干部作风腐败，谈到四川省仁寿县农民暴动事件，谈到湖北省武汉市 7 月份农民闹事，谈到江泽民今年视察两湖痛感农村不稳，中央发出五条，江泽民抓农村清理白条，进而抓反腐败，准备搞反腐群众运动，向邓小平报告，邓说：「如何收场！」近日军队只搞正面教育。再是广东惠州公安局长贪污三百万，天津大邱庄禹作敏被判刑，然后谈到党政腐败、高层干部腐败的劣迹，人民的忍无可忍，再谈到对政局的忧虑。中间赵插话说：「我一老友，是我的挚友，一高级技术人员，从东北来，说的与你们一样，说共产党下台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了！」我又谈了「六四」、谈了杜星垣挽救时局的三条。

赵听了后，说了以下一篇话。

「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群众说清楚。
「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

「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

「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

「现在有个有利条件，有个大变化，即农民闹事，等等，都是分散的，个别的。作为政治势力，在于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分成两派，一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一派仍坚持中共对国家的领导，但中共自身必须尽快实行民主政治。但这两派，都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暴力革命」，都认识到，暴力解决后，建立不起民主政治。

「中国民主改革、政治改革跟不上去，腐败延续下去，日盛一日，人民便把腐败的账算到改革开放头上去。反对改革的人与反对腐败的人连手起来，可就麻烦了。

「今年『六四』前，童大林（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女儿从美国回来，他爸爸要她一定来看看我，她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讲「中国政治学」。我说了，『六四』的性质，是否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那样处理『六四』的办法能否避免呢；为什么拖到现在善后不了；我现在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悔吗？有无新见解？

「『六四』不能说就是邓走后的导火线，但肯定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佳方案，是邓走前，邓自己妥善处理。如不能处理，留下一个方案也好。看来，都难！邓现在的态度是：『六四』已过去了，『六四』事件万万万不能改动，一动便乱了，乱了便完了。

「邓现在不了解下情，他周围的亲戚、朋友、下属，都只向他讲好形势，一片大好，不使他操心，这叫做精神疗法。你们讲的下边的情况，他恐怕一概不知！」

谈到我国形象，他说：「六四」时中国人民直到共产党开枪流许多血后，仍不相信共产党真会开枪，这是几十年历史人民对我党形成的一种信任。一开枪，这信任毁了！国外，我国的形象自毁了。美国这么对待我国，与美国民情有关，现在只剩下我是一个大国的问题，他们不得不考虑。

9 时谈到 12 时 10 分，锡华与我告退。

1993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

下午，文怀沙来（《楚辞》研究专家，古典文学家）。83 高龄了，博学强记，能说会写，敢于直言，不拘小节。今日他说，你若见到赵紫阳同志，切代我问候！若可能，我想看望他。又说：邓公改革〔25〕开放有功，但那么对待华国锋不公；耀邦多好的人，说撤就撤；对赵亦如此的。

文怀沙最重的一句话：「告赵，如邓走，有人极可能想将赵除掉。邓在，他们不敢。」

1993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

收文怀沙老 10 月 4 日一函，阅《炎黄春秋》10 期，说《炎黄春秋》编得越来越好，可喜可贺！目前形势下，办这么一份杂志不易！又说，「请考虑，能否给我个机会去拜谒一次赵公。如现在不方便，至少烦你转致我的良好祝愿，一定要他注意健康。何必住在北京，回河南老家躬耕南阳卧龙岗不好吗？」一股爱国、正直、才华横溢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情，令人感动不已。

晚，观京剧《姚期》，写刘秀坐东汉皇位后，将起兵时所有功臣，文的、武的一概杀绝。自古忠臣无好下场！一哭！

中央与地方，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

～～～～～～～～～～～～～～～～～～～～～～～～～

〔25〕华国锋（1921-2008），1936 年加入中共。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80 年冬卸任。

199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照约，我与锡华在今年首次寒风中乘「夏利」出租车赴洪达处。不久，杜星垣来了，接着，赵与夫人来了。两月余未见，他面色仍好，只两眼看上去迷蒙了。再次谈起国内形势，他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谈不到，不会变。中国即使主张激烈变动的力量，也不主张使用暴力。所以邓走后，国内政局短期亦不至于激变。」

他说，「现在的问题，集中在我党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理解？怎么进行？目前的问题，都出现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撞击上。我们继续坚持公有制（国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体的企业负责人，虽承包，但无权真正自主经营，盈亏都可不负责任。盈了是国家的，亏了，你罚我什么？职工呢？福利、工资都看着国家，盯着国家。你是国有制企业，我是国有制职工。国家这样承担着、包揽着这么多职工的生活保障义务。这样是背不起的。现在人人挖国家财产的墙角！但中国实行国有制私有化也不行。我的设想是国有企业这一块实行彻底的承包制或租赁制。即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彻底承包国有企业。彻底承包制，实际上解决产权问题。所谓产权，真正的含义，是指三权：使用权、分配权、转让权。使用权指这个企业如何动作，如何进入市场，都由我董事会决定，国家一方每年只收多少费或我一次交齐多少费用，别的，一概无权干预。分配权，指利益分配，完全由我董事会决定，国家一概无权过问。转让权，指我董事会有权拍卖、转让这个企业。这样，这个企业便完完全全地与国家脱离了关系。这个企业必须真正自由经营、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游泳，游好、游坏，全由自己负责。这个企业职工有事只找企业，不找国家了。所以，没有三权的企业，不解决放权问题，实行市场经济便只是一句空话。中国在实行企业多年承包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实行彻底的承包制看来是一条路子！

「农村呢，实行土地长期使用机制，农民可以转让、出租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得到一笔款，这款可转投入到别的行业。土地便可以向有财力、有劳力、有技术的农业大户集中，提高农副产品产量！」

「总之，中国目前发生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碰撞，如何具体解决，得有个思路、有个章程，不能空嚷一通，空嚷无效！」

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他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

「中国沿海现在遇到大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万不可错过！我们几年的发展是发展一段，内地也大发展，内地发展出问题，一出问题，便在全国整顿，一整顿，先将沿海整一通。实际上，整顿一次，将沿海发展打击一次，不行了，再放，又发展，内地又上，又出问题。这么往返发展——整顿——发展，这不行！」

临别前照了像。

1994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

上午 9 时 40 分，杜星垣、萧洪达夫妇、锡华夫妇、我与老伴分乘两车去赵处，顺利进入赵家内院，赵与夫人梁伯琪从北屋迈出。赵面色红润，似消瘦了些，戴眼镜，着米色夹克衫。这北屋装修成客厅兼着球场，球桌，桌腿粗黑，比（雍）文涛的漂亮。坐定后，先由洪达交他一手抄件，内容为军委会上江泽民口念的一段小平的插话。大意：一、世界新的战略格局尚未形成，两极变为多极，中国至少为一极；二、强权国家侵略第三世界，但主要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三、海湾战争事件后，美国得分并不多，如今法国与日本都敢向美国说「不」字；四、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现在要糊涂十年，趁机集中力量，将我国内事情做好，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了，什么事好办了；五、所以目前中国要忍，忍受几年。

杜星垣向赵、向我们几个谈了国内几件大事：一、国内物价因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出台，使居民心里紧张，盲目抢购，抢购粮油，抢购家电，抢购黄金手饰，此风在中小城市最热，北京上海好些；二、明年基建投资数压不下来，又引进一百五十亿美元，折人民币一千五百亿元。国有经济不好，所以明年物价预计增长10%打不住；三、江泽民目前不抓具体的，最棘手的问题交朱镕基抓。朱敢抓，但得罪了下面省市与中央部门，而邓小平处并不十分支持，真是腹背受敌，很难搞。所以朱镕基说，我要不行，我愿辞职；四、李鹏身体不行。
赵说，一个农民问题，一个物价问题，甚尖锐，未深谈。

我送赵一精致的 1994 年挂历。

1994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下午，读给赵紫阳从港购来的《顾准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将我吸引住了。

「领导人现在为什么说话、写文章尽说空话？」

1994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

洪达前日来电话说，赵回京了，过几天去拜访他。

昨日中午我回家，老伴说，锡华来电话说，赵约你与锡华明日上午到赵处见他。晚上落实，锡华说，是赵秘书来三次电话催办的。

今日晨 9 时近 30 分才赶到赵处，路上堵车厉害。赵书房门已斜开，知赵在，锡华与我进去，坐两只大沙发上。赵坐单人沙发，穿一件白帆布夹克。我两个多月不见他了，先自然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所以握手后，我坐定，便细细观察他的脸色，他头发白了，疏了，但面色红润有光泽。他先说，我先去贵阳后去四川，生活待遇很高、很周到，与在位时差不多，但不让我接触社会。四川，一些熟人来了，司机来了，很热情。以后回北京听四川一位书记来说，对他（赵）热了不好，但四川照样热。锡华与我谈了他离京后近三个月听到看到的情况，赵最后概括了几条：

一、目前我党我国存在农村问题、价格问题、大中型企业问题、腐败问题、社会治安等五方面问题；
二、现在中央采取的治理这五方面问题的措施，从根本上说，一个也解决不了；
三、为什么？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思路上，经济上放开，搞自由、开放，政治上搞集权，这两者不协调。如此，干部、官员权力不受制约，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四、怎么办？拖，但越拖越严重。只一个朱镕基想秉公解决问题，大家恨他，出了事，没有人保他；

五、邓的健康状况，是国家绝对机密，连江泽民恐亦不知。1988 年，邓去上海，路上休克，谁都不知。现在有关邓的健康，他家的人说法口径一致：好，能散步，想 1997 年去香港看看，实况大家不知；

六、薄一波〔26〕与陈云不一样。陈确是自己的一种主张、一种见解，以为邓的路线右了。薄呢，左右逢源。他的主张与陈云一致，与陈不深交，但见风使舵。他的话不可信。

赵还说，我国不解决改革不配套这个根本问题，必表现为目前这种改革上的进进退退，如价格改革刚放开，老百姓一叫，退回去。用行政手段控制二十三种物价。

领导人现在为什么说话、写文章尽说空话？是不得不为。都争取给地方、给人民一种好形象、好感，所以谁也不得罪，到处说奉承话，目的是拉选票。

在闲聊中，赵还说，收藏中国画，做画的生意，不只可保值，还能增值，值得投资。未来亚洲是世界经济、文化热点，中国画必受青睐无疑。

谈后照相，我与锡华 12 时回家。

1994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

上午，依约，赵来洪达家坐，与雍文涛、杜星垣、洪达、锡华与我聊天。说了一通茶学，转入正题。赵说，我形成一个新的看法：邓谢世后，江、李体制，为维持已得到的权力，必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呢，邓在，这一套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不会变，怕邓说话，不敢变；但邓走后，不一定由于主观上的看法，而是

那时，经济改革、政治停滞带来的负面问题，更集中性地爆发，老干部、老工人有意见，将抱怨归到改革开放路线上，于是在困难面前，渐渐地，不由自主地，从改革开放路线上后退，退回到集中的有计划的体制上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便停滞了，不强调了，退回去了。

赵说，现在，领导人不是不想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风险大，问题也很多。没有这个魄力，不敢决断。赵说，说来说去，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适时跟上。我们原先又是社会高度集中型体制，与南朝鲜、台湾、新加坡不同，高度集中型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漏洞很多，必定产生权钱交易，这是一种官僚资本。官僚与官僚有关的人，利用官僚手中权力，取得优惠，取得优势，可以发财，可以暴富。

赵说，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家可以说话，可以对执政者品头论足，执政者天天处在公民监督之下，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在批评、漫骂中发展。

赵说，我反正在他们手中捏着，倒安全些。他们要考虑舆论。我不想那么多了！

屋内燥热难挨！锡华说，国内外都盯着邓的生命。我说，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的领袖，决定着国家的安全。赵说，邓天天说，国家不要太看重我个人的作用，实际非也。杜星垣说，邓的身体我看过不了今年，国内如此情况，大家都看着呢！等着呢！

～～～～～～～～～～～～～～～～～～～

〔26〕薄一波（1908-2007），1925 年加入中共，是中共元老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下午 7 时 1 分，听中央电视台新闻，宣布金日成昨日晨 2 时突发心脏病逝世。我以为他建国有功，但建设路线错误。对我国有沙文主义情绪。他今年 82 岁。邓小平看来过不了今年了！

赵说，江、李盯着六个人。台上三个：乔石、李瑞环〔27〕、田纪云〔28〕；台下三个：万里、杨尚昆、赵紫阳。赵说，反正我实际上处于软禁地位。身边都是他们的人，只有我的家属是我的人。说话时无奈的样子。

赵紫阳的随从形迹可疑，是否身上带有窃听器？

199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昨夜洪达夫妇急匆匆来锡华家。洪达小声说，周六（指 7 月 9 日）上午赵来我家，我大意了。赵随从人是五人，内二人是司机，三人为服务人员。赵进到我客厅后，其中二人站立我们客厅南走廊东侧，即于华卧室外。于华说，其中一人始终不说话。于华说此人行迹可疑，是否身带窃听器？不带，亦能听到我们里边谈话内容。洪达说，司机中一人我熟，往日打招呼，热情和气，那日呢？态度生硬。洪达神情紧张，似有大祸临头感，说，我们没做亏心事，不会给赵带来困难。又疑说：（雍）文涛那日来不久藉病告退，是否真有病？总之？洪达疑神疑鬼，甚为不安！我说，一、我们谈话光明磊落，内容无错；二、当局不会对我们这些下台无权无势人物太看重；三、想整我们但也整不起来；四、我们这些人，七老八十了，怕什么？我心里想，怕他个鸟！

「中国已出现新生官僚资本阶层」

1994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
下午赵处通知锡华，要我与锡华去坐坐。下午 3 时 20 分到赵处。门前有一大众白色车。我一通知姓名，自自然然地进了赵的中院。一个参谋说，进去罢。赵在书房。跨进去，握手，先看他的面色，问候身体可好。我注目良久，看来，他面孔红润，有光泽，我连说比上次见面好。上次在洪达处，你好像房中呆久了，脸色发黄。他连说，会变化，会变化，那时也好。又说，今日上午晒太阳，院中走动，也许气色更好些。他说去了吉林二十几天，去了长白山。孩子们都聚会了。他谈兴很浓，一边插话，一边理他的思绪，谈了腐败、政见，谈了经济局势，最后谈了他听到风声想得到证实的几个问题。

说到腐败，他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

～～～～～～～～～～～～～～～

〔27〕李瑞环（1934-），195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 年 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九届全国政协主席。〔28〕田纪云（1929-），1945 年加入中共。1983-199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93-2003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赵说，今年 3 至 4 月，7 至 8 月，两次农副产品价格大涨，非典型。我看不清楚，恐不是通货膨胀的结果。现在我国，一方面三材：钢铁、水泥、木材剩余，铁路运输力剩余，电力也剩余，说明供过于求，为什么粮、油、肉、蛋独独价格暴涨呢？应该说，这几年农业用的生产数据价涨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正常的。我们流转环节上，又是垄断。前些年棉花就是这样，丰收了，国家不管，歉收了国家垄断。现在又垄断了，一垄断，农民便不好好生产了。这样做，多少年证明不成功。另外，本可以使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我与印度总理一次谈话，他给我启发。那时两国都搞社会主义，但印度农业上比我们成功。他说，「印度粮食丰收了，便出口，粮食收售平衡，农民便不会谷贱伤民。粮食欠收了，我们组织粮食进口。平衡粮价，城市有饭吃。」我们不是这样，要不农民吃亏，要不城市吃亏。

说到邓力群一次会上说，赵将社会主义改变了，痛哭流泪，有无此事？又说，邓力群说党内有新右派，说薄一波、胡绳〔29〕就是。我说，曾听到此传说，说薄、胡是新右派，绝不可能。

赵说，1987 年后传说胡耀邦下台前我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控告过胡耀邦。我当时听到此讯，不大在意，后有的文章提到此事，我想耀邦夫人可能也听到了。我找出了我那信的底稿。
赵找出复印稿给我（杜），锡华当场看了。一页纸，大意是国家现在是最好时期，趁着你（邓小平）健在，在党内立刻解决体制问题，领导体制问题。赵解释说，所谓领导体制问题，即是民主集中制，任何问题，实行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我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胡与我自然会有些分歧。如此而已。但大的方面我俩是一致的。我曾与邓小平同志说，如今 60 至 70 岁中间的人中，无任何人能代替胡耀邦。

给他照了一张相片。
赵还说到美国资产阶级诞生、成长的历史。说当时的资产阶级人，有一种信仰，一种拼搏精神，一种勤俭

精神。我们叫解放全人类。他们叫替人们向上帝赎罪，有一种信仰。我们现在的人无信仰，旧的没有了，新的没有，脑袋里空空的，这不行。
陈云对赵紫阳的问题表态：「党内路线问题，绝不可开除党籍！」

1994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依约，上午去洪达家。我带上一瓶法国白兰地。杜星垣来了。
杜说，江泽民从上海 1989 年 6 月调京后，曾亲口向我说：「赵的问题快解决了！」当时，陈云说了话：「党内路线问题，绝不可开除党籍。」乔石又说了话，意思是说，赵的问题不能这么处理！最孬的是李鹏，1989 年这场事件是李鹏一手导演的。杜说，江这个人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本分，只缺少主意！

「本该给我多些自由，但国外电台帮倒忙」

199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上午，9 时前，与锡华夫妇赶到洪达家。杜星垣到。洪达家作了周到的招待准备。
9 时 10 分左右，紫阳到了，穿一件浅褐色夹克，刚刚理过发罢，面红红的，有光泽。坐定，大家先问候他眼睛摘除白内障的情况。他说，手术半小时，顺利，只换掉一只眼球的晶体，另一只未换，这样，两只眼睛视力作用不协调，看东西便非常吃力，四号字可看到，五号字看一会儿便头脑昏昏。
～～～～～～～～～～～～～～～～～～～～～～
〔29〕胡绳（1918-2000），1938 年加入中共。历史学家、理论家。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星垣谈了经济形势。接着赵就「平均主义很可能复辟」这一主题，谈了他的想法与忧虑。他说，现在两极分化严重，且在急速发展中。也可以说，正出现新的阶层罢。这个新的富裕阶层，两三年后，会成为「气候」。这个新阶层，有些是前些年刚改革时，运用心计、智慧，藉我们政策发达的，正常一些。以后，便绝大部份是我国高干、中干、低干及其子女、亲戚朋友这个圈子里的人，利用权力，巧取豪夺，掏了国家的财物，钻了国家空子发达起来的。一位最高领导人的女儿××，在香港公开做房地产交易，×××在各地均有公司，××是香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例子多啦。这是社会的一面。另一面，国营企业多经营不善，体制未变，发不出工资，多数工人领不到正常工资，而物价飞涨。中国历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样，这种社会矛盾便非常尖锐，非常紧张了。一两年后，会更紧张。此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他们不敢丢改革开放的旗帜，不敢公开反对，不敢走回头路。而邓一走，面临如此尖锐的社会压力与矛盾，怎么办？一是迎难而上，继续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中找寻出路，但那要冒风险。他们一伙同意？他们本来就不太情愿搞改革开放。他们搞老一套的社会主义又驾轻就熟，所以他们可能逐步地恢复老一套。那么做，也无出路，但我政权可以维持长一些。所以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跟上去，经济则完全放开了，权与钱之间出现许多漏洞，这些干部及其子女便钻了空子。

赵说：给我的结论也几年了，本该给我多些自由，但国外电台帮倒忙，巴黎电台近时发三篇文章，第三篇文章说赵可能是「邓后」幕后策划人。

赵说，有一本书，叫《九三断想——谁是最丑陋的中国人》，写中国改革目前出现断层、空白。人无信仰，物欲横流，什么奇怪思想、现象都出现了。此书你俩读了没有？我与锡华摇头，他说，「没想到你俩也如此闭塞，本想请你们帮我买此书呢。」

赵谈了《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说：「我第一次读，没有读懂，有些想法模糊。第二次读懂了。此书思想条理很清楚，此书说了些发人深思的话，但根本反对改革，说目前出现的一切负面，皆出自改革。其基本点是：一、知识分子一臭二空；二、中国农民只能限在土地上，不能让他们流动；三、中国城市搞现代化，搞重工业；四、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集权，政治权力垄断。实际上，无限怀念、坚持斯大林一套治国理论、毛泽东晚年一套治国理论。所以，王蒙（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说，读后，有时击掌喝彩，有时毛骨悚然！

赵说到万里任总理的事。他说：「田纪云说过，让李（鹏）任总理不如万里」，但「万里任人大委员长都很难通过。邓小平让他找老同志谈谈，认个错。他去找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副主任），说自己有些话不妥。万里在 1986 年前，思想比我还活跃！在改革开放上，他与我意见完全一致！」赵临别时说：我今天有的话（指那句批评我俩「闭塞」的话）说得可能重了些！他头脑十分清晰、有条理，议得深刻有理。最后合影。

林若等关心赵紫阳写回忆录，我为回忆录拟定一个提纲。

199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广州副市长陈开枝〔30〕再次催询赵个人大事录写作情况。早在 1993 年我在广东冬休时，陈便说，你在他身边，他信任你，你又是文人，这件事你做最合适。

昨晚从广州临别时，陈开枝请便餐。餐后他交一个小包给我，要我转交赵。内有一万元现金，他特地交代了一句：「这点钱是我工资的积蓄，让他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他说赵已成历史人物了，但对重大亲身经历事件还是要有个个人的忠诚的交代。不知你操作得怎样了？不然，身后，任人评说，缺少依据，不好了。哪怕零散些都好，有多少记多少。一天三小时，可以嘛！整理好，就好，得存好。

1995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

照约，上午林若来坐。他说，此次全国人大，沉默，大家知道说话没用处，不说了。开得倒也安静、「和谐」。偕到颐和园，二十分钟便到了。还是两天前的路线，从东门往西走，穿过「慈禧」院落、长廊。只今日天气晴朗，和风习习，游人很多，照了些相。回家吃家乡饭，我打开一瓶茅台酒热情接待。临别，他说：「不可忘了那个写作大计划（指赵回忆录）！」

199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下午打听赵回来了。我预约去。我遵照紫阳的意见，拟就了一个《回忆录》的提纲。

电话预约赵女婿王志华。开始别人接话，志华接后，我问了赵回家事。我说广州有人送一小点点礼物给赵。我想去。志华说联系好告我，等了几小时不见回音。晚 9 时，我再拨此电话号码，是别人接线的。我说：「找志华。」答「不在！」我说找妞妞，答「不在！」答腔粗暴。我心疑，这是管制人员或监视人员在说话。

晚给杜星垣打电话，答「中央有一文件，你看了没有？」我说「怎么了？」答：「形势很紧张！」

「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

1995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中午午睡后，电话响，赵处参谋的声音：「赵请你今晚 8 时到赵处坐。」

我来到富强胡同六号门口，那古式高大的门楼，油漆一新，鲜红大门，新饰门灯。我揿电铃，有人开门，问我「找谁？」我答后，转眼间门开了。一战士，便衣，随我去二进院，赵迎出来，同我握手。我专心注目他的身体：他上着蓝色夹克，内淡色毛衣，脚穿皮鞋，蛮精神，脸色微红，脸颊丰满了些，明显较前健康许多。

我急着到内院见梁伯琪大姐，将广州陈开枝带的一万元钱亲手交给她。大姐收了。我还送她一盒精致包装的汕头铁观音茶，大姐觉得茶叶很新鲜，赵在旁说：「家里有。」

赵领我出卧室，穿内院，显眼的是那内院铺地青砖新换成了彩色花纹的小型砖，整齐漂亮了许多，往内院四周看，正房、东房、西房门窗、走廊柱全油漆过了。穿中门，中院如内院同。赵说，房中无装修，只是门窗油漆、铺地砖换了；厨房内装修了。我探头看，有圆形餐桌、白色罩布，阔气多了，给人一种新鲜感。

～～～～～～～～～～～～～～～～～

〔30〕陈开枝（1940-），1960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常务副市长，广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到书房，我靠南沙发坐定，赵坐老地方。赵拧开了加湿器，那白色像浮云样的气体，一缕缕飘了出来。我将星垣借我的一书借他。

我先询问赵的身体、眼睛视力，再问几日回京？安徽怎样？赵说：「出去四个月了，江西三个月，安徽一个月，4 月 9 日从合肥回来。这几个月，孩子们分批来团聚，我心情安静，什么地方都不去，什么企业、村庄都不看，读了《曾国藩传》，眼睛看老五号字可以。报纸可以看，不用戴眼镜。胃口好，什么都吃，自己也觉得较出京前身体好些。」我说：「磅一下，重了多少，便清楚了。」他说：「我从不上秤。」再细端详他，灯光从他头顶上洒下，脸上泛着光彩，他明显地较去江西省前那次在洪达处时红润了，光亮了，实在使人高兴！

我说了我去海南一周、广州一月的观感，然后自然说起总书记（江泽民）近时很想在反贪污、反腐败这个关系党国命运的根本问题上有所作为，我身边的人对此有两种反应，一种以为此举符合民心，可得到党、军、人民支持，虽困难，但有结果，对党有好处；另一种以为，难度太大，总书记力不从心，甚至捅大漏子或「玩火」。

这引出赵一大篇宏论。他说了许多，要点如下：

一、邓的治国大纲，概括为「经济自由，政治集权」。这种体制，必导致有特权者经济上巧取豪夺，政治上贪污受贿，党政腐败。

二、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工人残酷剥削，非常野蛮，但他榨出的钱财，用作新增资本，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多勤俭持家，要求子女甚严，资本家开发初期，耶稣教新教盛行，提倡替人民赎罪，有一种信仰，一种理想。我们现在的「大款」们，赚了钱，便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有的腰缠万贯，身揣出国护

照，随时准备应变外逃。这和我们是一种公有制向新的所有制过渡，他们（「大款们」）心境不踏实有关。他们担心他们的财产，随时有被我政府剥夺的可能，由这心理导致他们的恶性腐化行为。

三、邓小平这么主张，这么作法，还是一种探索，一种理想，一种主张，虽然产生了许多问题。现在主张改革的人，怨他；反对改革的人，更怨他。目前这种困难局面，可说是邓「经济自由、政治集权」的必然结果。

四、现任的人，则不是邓那样有一种主张、见解才去说话，才去做事。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保持统治地位，维护党的统治地位。毛主席说，没有武装，便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现在是，没有统治，便没有我的地位！现在不是靠政绩，靠信仰维系人民，而是靠强力。现在政绩无政绩，信仰无信仰。

五、中国现在，人民经十几年改革，绝大部份人能维持生活。中国人最善良，只要能吃饱穿暖，他便不会起义、造反。国内外，包括那些最激进、最偏激的人，也以为中国不可大乱，大乱，中国要倒退多少年。因而主张「和平演变」、「和平渐进」。这看法，可说已取得共识。加以中国党，一个军队警察系统，还会听话，服从命令；一个官僚系统，为保护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然要维护这个统治。所以，党虽不是那个有力的党了，但有军队，有官僚系统，人民只要生活得还可以，中国至少若干年不会大乱。

六、邓后，局部骚乱，罢工、游行之类，我们解决矛盾，刚柔相济，包括暴力镇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七、当然，这么做，只是延缓局势紧张，缓和矛盾，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拖下去，拖几年，再以后，便不知怎样了。

八、中国这么大，人才这么多，中国总会有前途，不必悲观。赵说，当然，不排除意外情况。苏联七十年的党、政府，顷刻之间瓦解了。

他还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他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乔（石）就不一定听江的。

谈到反贪污，赵说，现在这个办法不行。不改革政治体制，体制不贤不公不明，很可能使反贪污，变为内部派系相互倾轧、斗争的一种工具，这要看谁掌权了。谁有权，谁就用反贪污这根棍子打击对方。双方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对方都可以捉住打你。

现在，党已不党，都在聚集自己的人马，拉自己的山头。党内已是派系林立。以后，派系更多更实，斗争手段更多更辣，可能会出现党内派系倾轧的可悲情况。

不能对反贪污抱什么希望。当然，整掉一些人，也会好一些。王宝森〔31〕自杀，这种现象，不简单，谁知背后隐藏着什么？

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作者，我认识。他叫李志绥，他崇拜毛，以后绝望了，书中事实是基本可靠的。

说到陈云逝世，他说，陈云正派厚道。50 年代，毛搞大跃进，他反对；毛搞一大二公，他说（要）大集体小自由；他说对资本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他有功，他是一种见解，并为这种见解而奋斗。当然，他老了，脱离实际，脑袋里还是那一套旧的治国主张。但他是认识问题，我崇敬他。陈逝世后，我想去吊唁，有关部门不准；我想去八宝山向遗体告别，又不准！

讲到赵的安全，赵说，我在京、出京，都在他们手心里！我不想那么多了！

讲到最近的几个大案，赵说，这几个大案是高检亲自抓的，有的是冒出来的老案。江（泽民）曾指示高检，「凡涉及×××家的案子，不要追下去！」这怎么行？

赵说，这几年对邓小平的宣扬宣传，搞了神化，不好。如邓小平什么都是理论，有经济理论、法制理论、文艺理论，哲学理论等。邓有什么文艺理论？这么做，适得其反。邓的根本长项，在于求实，在于胆大。现在这么宣传很糟！江泽民原并不坚决执行邓的一套，以后为解决自己统治合法化的问题，便抬出自己紧跟邓的理论。

赵还说到，广东东莞的欧阳德，已被捕。欧阳德刚提到省人大副主任。
谈完，我打出租车回家，回到家 10 时半，在赵处近两小时。
～～～～～～～～～～～～～～～～～～～～
〔31〕王宝森 ，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因贪污腐败而畏罪自杀。

赵紫阳谈邓小平后的中国出路

1995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

晨，浓阴，与锡华乘车去洪达处。

洪达，昨夜腹痛，脸部稍肿。杜星垣到，他体重不足一百斤，但精神矍铄。

稍候，9 时许，赵（紫阳）到。他穿白色短袖上衣，有背带的西装米色裤，皮鞋。头发全白了，刚刚梳理过罢，很精神，面色红润，皱纹甚少，两眼灼灼有神，他健步进来，与杜星垣、萧洪达、我、姚锡华一一握手后坐下。

他先说些治久咳病的一种川药。他说：「我久治不愈，服这种药后，咳止了，一日一点点。这医生说，他还有一种药，可根治我咳嗽的病，我呢，吃这种药好了，我便不愿再吃他根治的药了。你俩（指萧和姚）可去四川看看。」

我问赵，你左眼动手术摘除白内障后，现状况如何？他说：「开始，因右眼未摘，看东西时，两眼视力不统一，挺别扭，我只好在右眼镜片上涂一种黑色，仅用左眼睛看东西，现在一般读物可以看了！过几天，我去医院动右眼睛的手术！」我们都说，你面色这么好，不易呀！他说：「从安徽回京后，我与老梁都好。」他夫人老梁说：「他现在能吃能睡！」赵说：「我现在一星期去高尔夫球场打两次球，一次九段，晨 7 时许去，10 时左右回家。再一条，我一日打七次简易太极拳，这拳法易学，我学四次，便掌握了！」我说：「你表演给我们看看！」他起身在洪达客厅外的小院表演起来，果真不简单！

杜星垣、我说了些国内形势的话，赵说了如下一些重要的话：

「邓呢，因为中国领导层这种特殊待遇，中国又有一套保生法，所以拖一年两年都可能。但他不能思维了，不能说什么话了，邓去世与否对国家政局已影响不大。邓小平的一生，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了！

「邓，开辟了中国目前这种崭新的局面。这是一种新社会形态，但他遗留下众多的一系列的问题。

「邓，现在处境很不妙。支持他的、支持改革的人骂他；反改革的人骂他。人们目前普遍有不要动十几年改革的积极成果前提下，怀旧，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那时的廉洁、社会清明、公平。

「邓走后，名为批判『现实』黑暗面，实则批『邓』的一种潮流，看来不可避免！

「江，可维持一段，但此同志从好的方面说，或者从坏的方面说，我以为他皆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如乔石、李鹏，他都驾驭不了！」

然后，谈话转到国内出路何去何从？

赵说：「中国目前局势，或者用进的方法解决，即真正用改革方法解决，这最理想，但有风险。另一种方法，用退的方法解决，即用我们十几年前方法解决，即计划经济、行政手段去解决，这个办法不行。可惜，现在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这方法我们干过三十年啦！不成。现在又搬了出来。种棉花多少，收粮多少，省、市包什么米袋子、菜篮子，派多少检查团下去。我看了这些消息，便觉得好笑！我们用了几十年，无效果、无饭吃！以后才改革。改了十几年，又用起老办法来了！朱镕基这一套，是老办法！这些办法也不能说一

点作用没有，但只能缓和矛盾、积累矛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根本问题，在我在台上时，我们便遇到了，想方法解决，这就是两个方面的两大块。第一块，是中国东方一块与西方一块的问题，即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问题。东部，要不要放开手让他们发展？能不能放开手让他们发展？东部经济发展了，它能吸引西部几千万劳动力，解决西部剩余劳动力问题，它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再用这部份资金援助西部地区。这样，我国东部地区趁太平洋东面地区经济繁荣这个机会，将经济发展起来。

「现在可好，现在又是一听西部叫苦，便叫什么：发展东部，适当照顾西部。东部从不曾发生过什么过热的问题。他的原料，国外进来；生产出成品，出国去，这有什么热？现在，将对东部优惠政策取消了，限制了，从东部拿钱养活、照顾、周济西部，撒胡椒面，这样不行的。

「再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这一块与社会经济（或叫市场经济）的问题。我们摸索的路子，是放手发展社会经济那一块，即私营、个体、合资那一块。国有这一块呢，又要区别对待。社会福利部份，如电，自来水，钢铁完全由国家经营，其余一部份可拍卖，办股份、兼并。把社会经济那一块大大发展起来，中国经济也便搞活了。

将这两块搞活，这就牵涉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只管军队、国防、外交，管一部份国家大型经济。别的根本不去管，那样，地方上也就不向你伸手，要这个要那个了，你也轻松了。」

他愈说愈有劲，看时间到 11 时半了，才把这个话题结住。他又继续说：「两极分化这个说法，要有新解。旧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人民向两头即两极背道发展，今日中国的方向是，改革以来，都在向富裕繁荣的方向发展，是朝着一个方向，只是富的快点或慢点，多点或少点，怎么能说成上两极分化呢！」精彩极了。

他还说：「我这些想法，对中南海的同志来说，都是异端邪说。他们听不进去！」
我说：「你是 60 岁的身体，50 岁的头脑，40 岁的语言。」他不说话，这不是赞扬，的确如此！

1995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昨天中午，我从北图（北京图书馆）返家。老伴说，洪达电话，要你和锡华明日上午 9 时到赵处。晚上，与洪达订正。今早 8 时许，与锡华步行出万寿路北要出租车去。灯市口西口下车，手表指针才 8 时 30 分。附近散步，9 时前到。进赵家门，今天秋日暖暖的爽爽的阳光，洒落在他书房北小院结满果实的石榴树上。这树不高，枝梢未及墙头，但茂盛异常，果实累累。进到赵书房口，他迎出门口，握手、坐。刚刚落座，杜星垣、洪达到。赵喊梁伯琪，梁到，已准备了几大盘桃子。赵说：「山东肥城送来的，肥城桃，有名呢！」我剥皮切开给锡华、洪达、杜星垣、于华吃了，赵不吃。我说，「今日中秋，团聚不易，吃一点！」他欢欢喜喜吃了。大家都说，果然好吃！众人围成一圈，只谈保健事项。赵说了去动眼睛手术情况。说：「8 月 15 日进院，16 日动手术，20 日出院。动左眼睛，一种新技术，将晶体摘去，换一美国制人工晶体。此次左眼手术，打麻药针，好，无痛感！上次右眼摘晶体时，下边一针麻药好，下边手术时无痛感，上边那一针麻药不好，疼痛，又捕一针，还不好，疼但可忍受。手术后，左眼现在 1.2，右眼 1.0 不错了！稳定一会便可以了。」然后他询问洪达咳嗽情形。赵大谈止咳经，大意是：一、你到四川找那位医生去；二、「中山装」实在，对咳嗽病人好，他可以保护喉部部位与呼吸道气管。我们尽谈些家常琐事，基本未及国家大事。只杜星垣说农业情况不好，国家仓库积压商品四千亿元，补贴费高达八千亿元，这样下去不行。赵说，近日棉花又实行「三不」，这是老一套，老办法，不是好办法，都是老的，我们过去的一套。我们正一步步往回退！聊天中，杜星垣说，你（指杜导正）那个杂志，中央有什么反应？要听听！我说，「无反应。」杜说，我遇到周惠（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第一书记），周说：「现在这么多报刊，只《炎黄春秋》可以一读。」及格吧！11 时，握手，我们离去。

赵紫阳详细澄清胡耀邦下台原因与经过建议中共常委轮流担任主席

199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9 时 25 分左右，依约，我与锡华到赵处。算提前拜年。洪达几天前来电话，说上面同意赵去苏（江苏）南休养，行前望见你们一面。昨日我打电话给志华、王秘书处，隔一会儿答：「可以，周四上午 9 时半后到。」战士开门，我们到客厅，听到洪达的声音，洪达夫妇已到了。室内有喷湿器喷出缓缓的白色气体，舒适暖和。我和锡华落座，赵坐老沙发。我们先谈洪达与锡华去成都治疗哮喘病事，赵谈他将先到无锡，再去南京，约明年 3 月返京。
我说起中央对胡耀邦系统干部亲属近时亲切照顾事，引出赵一长篇谈话。我说，胡 80 诞辰纪念，李昭（胡耀邦夫人）率家属八人、团中央旧部四人、老秘书四人、作家记者四人共二十人队伍，到江西（省）共青城祭灵，并看望胡家乡。江西、湖南两省主要负责人亲自迎送，共青城有几千人放鞭炮迎送。看来，中央对胡系统干部照顾使用改善很多，但对赵系统却歧视照旧。赵说：「老杜（导正）说的对！」

赵说，最近一个时期，看来有人有一个部署，或者说有一种策划，即在胡（耀邦）、赵（紫阳）的关系上做文章，突出胡赵矛盾，以此来贬赵褒胡，丑化赵，进而冲淡、掩盖「六四」事件。外面不是早就传北京有抑赵拥胡和抑胡拥赵二派吗？前两年，阮铭写了本书，说胡的下台与赵给小平写的一封信有直接关系。阮在美国，虽这么写，影响不大，最近吴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在香港又写了本《十年的路》，也是这么说的。香港还为此发表了不少书评，似乎认定赵对胡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吴江在国内，又是更知名的学者，影响就比阮铭大得多了。

关于胡赵关系问题，有四件事需要澄清，因为这些传说与事实不符。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平写信的问题，这点我上次已经跟你们俩谈过；第二件事，是说有一次小平在赵胡都在场的时候说，我准备退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胡当即表示，说我举双手赞成，赵则说，现在党还离不开你，目前你还不宜完全退。邓由此感到胡不可靠，后来遂以赵取代胡；第三件事，是说赵曾与陈（云）连手，共同反对胡；第四件事，是说在邓主持的一个会上，赵尖锐地批评了胡。

现在说第二件事。邓从未在胡、赵在场的情况下说过要退的事。他也不可能在我们面前说这样的话。1986 年夏季，胡对我说，去北戴河邓对胡谈了十三大人事安排，意思是邓与胡都准备退，不再担任原来的职务，让更年轻的同志来干。邓对胡说，我不再当军委主席，你也不再任总书记，这样就带了个头，可以使一批老同志退下来。胡还对我说，总书记这个职务，我看你来干就比较合适。我当时即表示，我同你是属于一个年龄段的。过去我就多次讲过，在 60 至 70 岁这个年龄段的同志中，胡是唯一适合于做总书记的人。我不谈其它人，如 70 至 80 岁这个年龄段，邓、陈（云）都合适；也不谈 50 至 60 这个年龄段，那年龄段有胡启立〔32〕、乔石等。既然因为年龄的关系，胡（耀邦）要下来，那我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人，自然是不合适的。

我还说，我对意识形态不很熟悉，也没有兴趣。我的兴趣在经济方面，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有了一个总的设计，如何把它具体化，在实践中贯彻下去，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出个眉目，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我想花点力气去干的。别的人搞，我还有点不放心。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从我这方面说，这也是个办法，我赞成。

我不知道胡（耀邦）北戴河同邓是怎么谈的，也不了解邓提出这个方案的用意。看来胡本人也没有弄清楚。

现在看来，以「年轻化」来作出这种人事安排，只是浅层次的理解，可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

回想起来，邓对胡早就有了一些看法。邓提出的反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涣散，反对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不都是对着胡吗？早在理论务虚会议时，胡（耀邦）就对反自由化不热心。由胡主持的这次理论务虚会，本意是研究如何进一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可会上有些人偏离了这个主题，逼得邓不得不出来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3 年反对精神污染，虽然提法不是那么准确，意思是明白的，邓后来也感觉这个口号不甚妥当，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当时建议，经济方面不搞，农村不搞，方毅提出自然科学界不搞，我也赞成，这样就把反精神污染加以控制了。但胡（耀邦）对反精神污染一直持消极态度，说话又不注意，多次直接指责反精神污染，说它界限不清，混淆两类矛盾，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等，这不是同邓唱反调吗？后来发展到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不少人起来反对反精神污染，使一些原已商定的人落选。

另一件事，就是胡与陆铿（老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主编）的谈话。这篇谈话许多人看了都很不高兴。开始我不知道，一次尚昆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即叫中办找来送给我。我看了觉得胡讲话太随便了。陆铿有些地方是明显地挑拨，如，你（胡）为什么现在不把军委主席一职担当起来？这时胡本该严辞驳斥，指责他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胡却是嘻嘻哈哈，说什么现在主要搞经济建设，军队没有仗打等等。

许多同志认为，胡要为自己树一个温和开明的形象，在公开场合，他不大多讲反自由化问题。邓曾两次要人给胡打招呼，一次是请胡启立，一次是请胡启立和乔石，要他们转告胡两件事：一是要胡公开讲讲反自由化问题，因为他讲比别人讲效果会更好些；二是胡与陆铿的谈话，要胡用适当方式加以澄清。但这二件事，胡都没有办，邓是很不高兴的。有一次我和胡（耀邦）去邓那儿，邓当面批评胡说，我已说过，要处理方励之〔33〕、王若望〔34〕、刘宾雁〔35〕的问题，你为什么拖着不办？神态很严肃，言辞也尖锐。1986 年底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邓批评胡说，这次学潮就是反自由化长期不力的结果。

～～～～～～～～～～～～～～～～～～～～～～～～～～～～

〔32〕胡启立（1929-），1948 年加入中共。1980 年代，胡启立先后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 年「六四」事件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后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邓对胡（耀邦）是太了解了。在四川他们就在一起，胡到团中央，邓又是代表中央管党群工作的。胡对邓经济上开放，政治上集权这一基本想法认识不清，执行不力。邓担心他的这条路线会在胡的手里中断，所以撤换胡的打算早就有了。有一次尚昆告我，邓对他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失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86 年那一阵，原来对胡还比较尊重的杨（尚昆）、薄（一波），在会议上对胡的一些意见，也不再那么尊重了。看来，至少是在 1986 年夏季，邓就已下了撤换胡的决心。根本不是什么 1986 年底对学潮处理不当，才导致胡下台的。我和胡搭挡那些年，虽然我对他有些意见，但总的说相处是好的。记得在北戴河，在胡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曾说过我和胡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后来这话胡启立传到胡那儿，胡很高兴。

至于说到我不主张邓退的问题，那是在确定我当总书记以后的事情。在准备十三大的时候，有所谓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五人小组就是由我主持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七人小组是由薄一波牵头，有宋任穷、王震（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国家副主席）他们参加，研究十三大人事安排。当然七人小组的情况，也常向我通报，如政治局的常委名单，原定由七人组成，除后来正式选出的五位之外，还有田纪云、万里，但在酝酿时，万里没有被同意，最后邓（小平）说，那就五个人吧。在研究十三大人事安排时，邓提出，他要退，我建议邓不要马上全退。因为当时我考虑，全党的大事还离不开邓，还要由邓来拍板，与其在外面作决定，

不如在里面来作决定。

第三件事，关于陈、赵连手反胡的问题。胡（耀邦）有许多长处，但说话比较随便。对经济工作，他不熟悉，但又常常发议论，作指示。1983－1984 年那一阵，胡对经济工作讲了不少，他到省里去检查工作，讲了一通，省里立即就拉出一个单子，要这要那，弄得国家计委很难办。他主张加速经济发展，有些话像是要大干快上，也不符合国情。这些，国务院这边和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早有议论，都对胡（耀邦）有意见。此事，我和胡在邓那儿曾谈过一次。邓最后说，今后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由赵最后决定。胡当时虽说了自己讲话不当，但事后又仍一如既往。但有了邓的这句话，我们以后就好办多了。胡讲得好的，对的，就照你的办，反之，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胡在经济工作上的一些主张和随便说话，陈（云）很不满意的。陈对胡意见中有一些，我也是赞成的。1983 年，有一次在邓那儿谈财经工作问题，参加的有陈、胡、赵、乔等。我只谈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财政收入中，中央的收入和地方的收入的比例，中央部份在逐年下降，这对改革、搞活经济是必要的，但长此下去也不行。没有展开讨论，谈话将要结束。在这时，陈（云）说他要讲几句，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看来是有准备的，一口气给胡（耀邦）提了七条意见。这个情况，我感到非常意外。邓好象也没有料到，胡更是没有准备，显得惊讶，只好说了几句，承认自己讲话有毛病，以后要注意等等。邓没有表态，说今天就议到这里吧，这样就打算结束谈话。这时乔石提出，是否召集各省负责同志来京开个会，打个招呼？邓说，那你们先准备一下吧。

～～～～～～～～～～～～～～～～～～～～～～～～～～～～～～～～～～～～～～～

〔33〕方励之（1936-），天体物理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 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后旅居美国。

〔34〕王若望（1918-2001），作家，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8 年平反后任《上海文学》副主编。1987 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开除党籍，1989 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十四个月。

〔35〕刘宾雁（1925-2005），《人民日报》名记者，其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在当时颇具影响。1987 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开除党籍，1989 年后旅居美国。

回去以后，我和几个同志说了一下情况，至于会议开不开，怎么开，还没有具体研究，这时新华社大约是开记者会吧，请邓力群去讲话，接着《人民日报》也开会又请邓（力群）去讲话，邓（力群）在这两个会议上向到会同志吹了风，把上边这些事说了。事情很快传到我这儿，我立即找力群谈话，指出中央还没有作出决定，你就向会议吹风，影响不好。我要他立即告诉会议，吹风的内容不要再外传了，等待中央的决定。过了几天，邓（小平）办传过邓（小平）话来，说这个会议不开了。此事到此就告一段落。

（1983 年）这次邓处研究财经的会议上，在陈（云）给胡提出七条批评意见以后，我也把国务院方面对胡在经济问题上一些不妥的说法，讲了几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陈、赵连手」吧。其实我讲的只是些具体的事。在此以前，尚昆同志就转告过我，经济工作要听一个婆婆的，不能听二个婆婆的，怎么会陈、赵连手呢？

赵今天讲的这个事很重要。所以我回家后，请姚锡华同志也就记忆尽力整理一份。我也整了一份。锡华整理的比我好。今日日记记的这个赵的这个讲话，主要是抄姚的记录。

199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照原计划，今日上午到李普处，李说前不久看望了赵紫阳。赵谈了香港吴江那本书所起的影响。赵将致邓信的原件给我看了。李普说，从信中看，说的是党政分开、民主集中制，在邓、陈云在世时，处理好中央的领导制度，养成习惯。李普说，我与杜星垣都认为赵在胡耀邦的处理上还是有错误。他没有坚决与胡站在一起。

赵对怎样处理台湾、西藏问题的纯个人看法

199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

昨日晚，赵处参谋来电话说：赵已回北京，今日上午给你电话，请你下午来看看，你不在。现在要我通知你，明日上午，赵去打球，不知你下午能来否？请答。我说：好。对方说：还请什么人来，赵说由老杜定了吧。我找了锡华，杜星垣不在。

今日下午 2 时 30 分出发，到达时正好下午 3 时 30 分。我们进书房，赵满面光泽，好似胖了些，挺精神的，北京人说挺帅！他从沙发上立刻站起来，一一握手，我与姚坐。先问候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赵答：「一个星期了。」我们问：身体可好？赵答：「很好。」我问「老梁呢？」赵答：「回来时去老家探亲了。我们先去无锡、后去镇江，住在一处地方，哪儿什么也不看不问。他们招待甚好。」

「北京我的两家孩子，来住了几天，香港我另外两家孩子来住了几天，人多时，有十几口人。那么多人，一起吃饭，最小的孙子还得劝他吃，逗着吃，一顿饭要吃一个半小时！」

我讲了自己的香港之行，一个赵、胡（耀邦）误会事，我做了曾敏之（时任香港作联主席）、张江明（前广东社科联主席）的工作。一个讲香港知识界的心态。锡华讲了北京听到的事情。
赵最后讲了以下几条：

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是小平提的，好！只有他能说，别人说，那问题大了。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接受了，他活动余地很小了。我与耀邦说过，我想，一、台湾不能独立，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二、通过和平谈判，慢慢解决；三、国际上，台湾不能参加联合国，但其它国际活动，如经济、文化等等可同意他有一席之地。他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很多，给他一个席位好，不然，你一国两制，他不同意，你又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拖，那他怎么办？你不给他国际活动空间，他便要独立，闹独立！

说到香港，他说，香港人在看，在观望，屁股坐在国外，在香港办实业赚钱。你有意外，我便出走。香港资本家不在香港大投资，所以香港局面会拖下去，经济发展会停滞几年。

说到西藏。他说，我与耀邦有个相同的看法。西藏是纯藏族地区，我们目前这个做法，藏族便认为汉人与军队是他们的统治者。那里资源少，有，也运不出来。所以，好的办法，是他们只要不独立成为国家，承认是中国的一部份，我们便放手给他们自治，康熙帝、满清的政策就较好。现在班禅，达赖选了一个，我们选了一个，现在是两个班禅，这会留下后患。老百姓，藏族，听达赖的话，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几千年了，我们这么做我个人以为不够聪明。达赖认定的那个班禅，也是我们预选的四个中的一个，只因达赖一认，我们便不认了。西藏问题，非常特殊，新疆、内蒙都不能比，内蒙、新疆，我汉人居多，西藏不是。所以条件该是承认中国统一，不成立国家，我们别的都可考虑少管，少说。

以后，他说起香港因吴江一书引起的「扬胡贬赵」事，有许多误会处，这只能慢慢来解决，不能急。有人向项南〔36〕解释，项却说：「我看过文件，赵告了胡的！」项南与我有私见，主要是，他到年龄该退出福建省委书记了，当时一个任仲夷〔37〕，一个项南，都过了年龄线，以后，任仲夷也退了，只项南不退不好。耀邦下不了决心，我说项南也下好，此事耀邦同意，但他将我的意见告诉了项南，项南对我不高兴。因此，此次「扬胡贬赵」中，我作解释的话，他听不进去！我问心无愧就是了。

此外，项南执政福建时，工作不够扎实，爱提些空话、大话的口号，什么几年赶上台湾，搞什么世界湾之

类。对他的工作，我不欣赏、不满意，我有看法。但耀邦欣赏他。有人说，把项南打成「右倾分子」是耀邦定的，耀邦那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项南是副书记，所以耀邦对项南不起。粉碎「四人帮」后，耀邦执政，有人说耀邦对项南那么好，是否有「补报」思想作祟。

赵说，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这个「放小」两字一出，各地便都放了，李铁映（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体改委主任）说，放小中要坚持公有制，这是一句空话，谁还管你什么公有、私有？

赵还说，夏天北京好，我不出去了。如申请出去，我还是想申请去广东，不知他们批不批？
赵与我、姚谈兴极浓，下午 3 时半，一直谈到下午 6 时 20 分，谈了近三个小时，如我不提醒，他还要谈呢！

～～～～～～～～～～～～～～～～～～～～～～～～～
〔36〕項南（1918-1997），1941 年加入中共。1980 年-1986 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1958 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79 年平反。到福建省 上任時已 62 歲。
〔37〕任仲夷（1914-2005），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5 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补记一段 4 月 5 日赵的谈话。

我说到「香港经济繁荣，文化贫瘠」时，赵说：「恐不能这么看，我们的同志，一直受几十年文艺要教育人、鼓舞人的影响，以为所有作品，皆要给人启迪、给人教育，不然，此种作品便不可取。另外，我们几十年，文化生活极贫乏，就几个电影、几张报纸。其实呢，大家那时对港片（电影）也是持欢迎态度的。你我在广州，港片来了，大家抢着看，说好。一次，刘帅（指刘伯承元帅）看港片后，跟我说好。那时大家嘴里对港片不说什么，心里是喜欢的。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国内评价好。我在台上，调《红楼梦》片看，看了一半，停了。看不下去了！」我说香港文化呈沙漠状况时说：「这次我接触到香港文化人，他们说香港生活节奏快，大家紧张，回到家，便想精神松驰一下，于是不想看严肃的作品，而是嘻嘻哈哈，逗乐一下。因此，这种低俗的作品充斥市场，但大家喜欢。」赵持异议，不同意我的评价。意即香港文化生活这种状况属于正常状态，说我的评价不对。对此，我有看法。香港片，我看过不少，除「廉政风暴」等少数片外，多武打、庸俗之作，与大陆不好相提并论。大陆虽有俗作，但比台港高出许多。

晚，来我家一生人，带两包礼物，每袋两瓶镇江醋，两瓶腌姜，询问之下，对方答是赵的司机，受赵委托，给你送来江苏土特产尝尝。赵的一片心意！

1996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

晚赵处送来他改过的我与锡华代他整理的那份记录，很珍贵改得很细。附一言。我存起来。我以姚、我（姚锡华、杜导正）名义回信，给司机带回，信内容：「紫阳同志：材料妥收。萧洪达回京打听你，问候你。江苏土特产收到，一片心意，我们谢了。」晚上将上述情况告锡华。

一次理论色彩很浓的谈话：
「历史证明考茨基的见解是正确的！」

1996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前日晚，洪达来电话，说他与杜星垣约好，去看赵。梁伯琪作主，我们几个人可以去。时间是 5 月 4 日上午 9 时。

今日上午，准时来到赵处。公务员，一位小战士说，另两位先到了。进入赵书房，赵起身握手。我坐南端靠西沙发，洪达坐高椅子，并说高椅子舒服，先说了些养生之道的话。赵说：美国之音有一个《健康与卫生》节目，说肺里有一种抗癌的基因，有的人强，有的人弱，弱者便易受到烟的袭击，烟将抗癌基因破坏了，便易得癌症。又说，人体构造非常合理，合理得直到今日人还解释不了。以后，我请星垣介绍他的四川之行，赵说了些人事的话。

赵说，「明年国家领导人要换届，李鹏要下。李现在做两件事：安全着陆；修补形象。所以他到处说好话。」「乔石，几年来，话不多，但每次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这就很好！田纪云，老放炮，不考虑个人后果了！」

然后，赵说到目前国家形势：「邓的经济自由、政治集权路子，走到现在，已走入死胡同，已搞不下去了！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一亿五千万，城镇失业人口三千万，每年又新生一千万，这样，全国有两亿人要求工作。国家如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劳动力可以安排，当然，又带来通胀，经济低迷，这样问题便大了。国家自然要动荡不已了。这种情况下，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这有风险，风险大，此路，现班子无此想法，无此勇气，不走；剩下另一条路，是回头路，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完全放开过，完全改革过。经济上呢，几年来，已经天天在往回走路，慢慢回到我们熟悉的、过去走过的计划经济、中央集权那条路上去。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走，只能逐渐地、羞羞答答地往回走。朱镕基〔38〕这个同志，我以为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想给国家和人民办实事。他在上海，空话很少，只办实事，敢得罪人，敢负责，确实办了好多实事，口碑很好，威信较江（泽民）高。但他在国家计委、经委工作时间长，把那一套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用到今日了，把什么权都抓到自己手里，很辛苦，效果不怎么的，又到处得罪人，所以很多人现在骂他。其实呢，你别那么辛苦嘛！分权嘛！所以明年总理人选中，也不会有他。朱镕基说，我现在是抬着棺材做工作。赵说，国家到此局面，怎么办？大家都看到形势不好，这点大家有共识。我现在看，会有一次折腾（几次说到此话），会批邓。批邓已经开始了，如《万言书》就是批邓。折腾一段，不行，大家吃了苦头，再走回市场经济的路，那时，国内会更好些了？」

说到这儿，赵谈出一段理论色彩很浓的话来！

赵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变动过程，一种流程，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是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的，同意必须几个国家共同胜利的。但是欧洲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此时，只俄国胜利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政权到手了，当然不能将政权交出去。这个政权发生在东方的俄国，俄国有中世纪封建君主独裁的传统，又是小农国家。一国革命胜利，内有白匪、封建势力，有资产阶级，外有帝国主义包围与武装干涉，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这手段便是政权高度集中垄断，不惜采用暴力，（经济上则采用了剥夺小农的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手段，所谓下乡征粮、集粮——杜导正插话）列宁这么做，是不得已的，被迫的！这些年，我有暇读了点书，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列宁与考茨基有根本分歧。一本书，叫《叛徒考茨基》吧，考茨基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诞生了一个「怪胎」！这个胎，诞生在这个落后的俄

国，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发育的。历史证明考茨基当时的那些见解，是正确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他自己的规律，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志想怎么发展便怎么发展的。

总之，要相信，社会在发展，发展中有曲折、有反复，但总趋势，会越来越向上，越来越好。就是美国，现在也比一百年前好，中国也如此的，总的说，中国会越来越好，即便中间又发生曲折。这点要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不必悲观，亦不必强求。

说到公民投票。赵说：多数人会怀旧，投《万言书》的票。我（杜导正）说：不，城乡有区别。城市一些工人、居民、干部会投《万言书》的票，但绝大多数农民不会的。你问他，十几年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好，还是现在的包产到户好，农民肯定赞成现在的，绝不会再回到十几年前的老路上去！赵说，如投票，他们也不会说是回到十几年前的老路子，而是遮遮掩掩地要保留十几年前的一些东西。

～～～～～～～～～～～～～～～～～

〔38〕朱镕基（1928-），1949 年加入中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1998 年任国务院总理。

星垣说，「近日『严打』，天津抓了一千多人，北京抓了近千人，不知后果如何？」

星垣还说到了段君毅（曾任铁道部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到了地方，要人家汇报工作；他回京后，要整理成文，上报中央。此事给朱镕基说了，朱要吴邦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办，段高兴得什么似的。赵说，「他来我这里，兴致勃勃，大谈国有企业改革，其实是瞎操心、白操心，人家不理的，何苦呢？」

从 9 时半谈到 12 时，整整两个半小时，萧、杜、我告辞，赵送我们到门口，一直站在那，我们车南行百米要拐弯了，还看见他的身影一动不动。

199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上午，给赵送去他所要的《万言书》姐妹篇，送到他家门口。

赵紫阳重申对胡耀邦绝无落井下石

1996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

昨日我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接赵处参谋电话，紫阳望我当日下午或次日上午去一趟。我答应次日去。今日上午 9 时 20 分，我赶到赵紫阳处，到 11 时 45 分才离开。谈了两个多小时。

赵紫阳取出一件复印件，是香港《开放》杂志今年 4 月号文章，说吴江《社会主义中国三十年》扬胡贬赵，其中有错。特别说到赵给邓、陈一信，与原书记载有差，内容无赵批胡一事。赵问此文背景为谁？是否与曾敏之有关。我说不会，我与曾谈话在 3 月初，不会这么快发表。曾敏之无此积极性。赵紫阳说，从文章看，此作者熟悉北京情况。

紫阳今日谈了几件事，记录如下：

一、现在流传在干部中的一件事，是我在生活会上批了胡，对胡垮台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二、我在会上同时读了批胡的信。
三、实情是：1986 年 12 月 20 日左右，邓小平狠狠批了胡，说「学潮」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引起的，对「学潮」应负责，批得很重。
四、邓批胡后第二日，胡便写了辞职的报告，胡当时干不下去了。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正式会议，接受胡的辞职报告。
六、1987 年 1 月初，例行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集中批胡，帮助胡。
七、我在批胡时，说了如下的话：（1）胡能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吵架亦可；（2）胡发言不够慎重，浮话甚多，大家不好办；（3）我顺便提到 1983 年我给邓、陈写的那封信，说一个领袖，日常没什么，如威信渐渐高起来，又无制度保证，便可能独断、出错。赵说，「现在干部中，一部份人又不了解实情，我又无法正式说明。说清楚了，便清楚了，如李锐〔39〕一类同志；第二是有情绪。对我有情绪，如项南一类同志，听到我的说明后，仍无大变化。还有如社科院那个从上海调来的年轻人，不知此信来历，都会认为我真是落井下石的人。
～～～～～～～～～～～～～～～～～～～～～～
〔39〕李锐（1917-），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1989 年因支持「六四」被缓党员登记。
赵说，不必急！

赵又说，现在中央班子，扬胡。这显然是不放心杨尚昆与我两个人。对杨尚昆呢，不好公开采取别的限制行动，其实不放心呢。对我，则多方限制，我也习惯了！

赵还说了些别的事。

199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今见赵紫阳，他说，鲍彤〔40〕已假释，看管在郊外某处，不能回家。今日美国《神州日报》说今年「六四」前，北京人民大学一姓丁的副教授给全国人大致函，要求为「六四」被冤杀的人平反昭雪。现已搜集到的死亡者有一百五十人。

1996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

给赵紫阳打电话，没人接，又给他女儿女婿处志华、妞妞房打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答，「不在！」「不在！」。显然是别人代接听的。语气极粗暴。我又给赵的司机打电话，司机也说：「不在」，我问「哪儿去了？」答「不知道」。看来，此中必有故事。国内形势严峻，安全部又动干戈了！

晚上梦到赵出席广东省一个什么大会。

1996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下午，心又着急，惦记赵紫阳去了哪里，就给洪达打电话。洪达说，「现已与赵紫阳处联系上了」，我心放了下来。洪达又说：「我们听候通知去。」

「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思潮，正可以成为中南海拒绝国外正确意见的一种借口。」

199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

上午，依约，与锡华一家一起去赵（紫阳）处，9 时整到。门口人要证明，我说请通报，「杜导正与姚锡华来了。」待一会儿，门开了，进得门来，南院与往日一样，中院东侧一棵石榴树，红果实累累，嵌镶在碧绿的树枝上煞是勃勃动人。进书房门，紫阳迎上来，握手。进屋，见萧洪达、于华、杜星桓已在座，梁伯琪亦在座。照了一通相，女人们到后院聊天去了，留下紫阳、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和我。

星垣和我说了些外界关心的事，紫阳不断插话。大意是：国内思想界有个动向，一个新国学或新儒学；一个民族主义思潮，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赵说，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从来说不，抗日战争中说不，完全正确。现在改革开放，无非一个外国人关注的人权、核扩散、台湾问题等等，一概说不，不行的。这种说不，正可以成为中南海拒绝国外正确意见的一种借口，意思是，你们看，我们人民不答应啊！人权，你们说三道四，我们人民不干。

～～～～～～～～～～～～～～～～～～

〔40〕鲍彤（1932-），曾任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9 年「六四」事件中被捕，1992 年被判刑七年。刑满出狱后被软禁家中。

紫阳又说，「奥运会，美国人伤害了中国人，中国便煽动一种排外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旦煽动起来，游行啦，示威啦，先排外，然后很可能便会突然将口号转变为反贪污、反腐败、反卖国，将矛头对准政府，这很危险的！」

紫阳说，「朱镕基做汇率调整，成功了，稳定在 1：8.3 左右，没别的办法，都是我们运用过几十年的老办法，如投资分配，如扶贫分配，如收购棉花，都是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这不行的。」

紫阳说，「现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天天件件在打架，这很难的」。

紫阳说，「有人来说，总书记找了一位老同志问：『十四大后，你看局面怎样？』×××说：『杨（尚昆）家二兄弟在活动！』」

萧洪达说，「不会，杨在部队没那么高权威！有人问我，我说不会。」

看来，中央对杨（尚昆）家警惕性很高很高，中央有坐在火山口的一种自我恐惧！

杜星垣还说，「六四」后，邓小平曾说过，赵紫阳还可以留在政治局。陈云说过：「李××如进政治局，中南海就会发生唐山式地震！」

我们走到后院去，梁伯琪说，现在我们去街上，都有人跟着。这院子里估计处处有监听监视，「我们实际上是仍在软禁中。」

赵书桌上，卧着一只白色鬈毛犬，约一尺长，短腿，头上的长毛盖住了两只小眼睛，几年了，我每次去，牠总要用前爪抓我的裤脚，牠不咬人，偶然，汪汪地叫两声，赵很疼爱牠，今日说，牠的祖宗三代查清了，纯××种。赵说，这些年，我每日花在牠身上的时间约二小时，洗澡，由公务员办；刷毛，梳理，我亲手操作。老梁（伯琪）住西屋，妞妞不在家，别人不说话，朋友稀少，闲得发慌，只有牠可以终日陪伴我消遣，我和牠说的话最多！

一个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人物，应该说是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这样在一只小犬上费精力，实为人间、中国大陆一大悲剧，这大概是一种软禁条件下的产物，很令人悲哀呢！

从赵处回来后，洪达说，从赵说他一日两小时与犬说话看，赵很苦闷，我们几个多去看望是好的；赵的精神较前次憔悴，瘦了些，背有些驼。我说，赵背微驼我也注意到了，在他站起来给我们倒茶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精神还是较好的。

199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我的 6 篇关于赵紫阳的小文章，全数发表在香港《东方日报》专栏「北风窗」，每篇三百五十字，说了一些紫阳的近况，很客观的，也很公道，其实，这对中共对大陆也是帮了忙的！但这样的小文章在大陆是绝对发表不了的。

我写给「北风窗」的专栏，是我小女明明一直在写的。所以后来央我也写几篇，我欣然应允她，用的是笔名，海丝。

明儿说，这几篇文章，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她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充满对赵的关切之情。

199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

起床前，一小梦，又梦到与赵到一地出差，赵住一房间，外有警卫人员多人。我去打听，说部长休息了！说不能叫总书记，只能听部长的命令。

接着，又梦到，敌人在追捕我，我像个猿猴在山间跑，好快，身手一点不减当年当小八路时，十多米的悬崖也可以一跃而下，浑身毛发丝毫不伤。敌人一直追，追到了，说「再跑，我们就开枪了」。听到敌人拉枪栓的声音，很逼真的。心想，这回「完了」。等到枪声，醒了。

满心欢喜，顷刻，满心悲哀。

1997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

上午，人大会堂春节团拜会。约四千多人参加。今日宋木文（我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时，他任第一副署长。「六四」后我被免职，他接任）跟我咬耳朵，说，「『六四』后几天，免你职的文件就到了，我扣下，我建议王维澄（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先跟你说一下，以后上边又令我主持会议批判你。我说我主

持不合适。推了。抓把柄无非是：一、你那封『上书』〔41〕；二、说你上书之前去中南海和赵紫阳面谈一次。」

看来这是王××、李×搞的鬼！他俩是「六四」武力镇压学生、市民活跃而有罪的人物！相信他们会遭报应的。今日团拜会上王××那副孤零零独守一大桌，无人走近前问候、招呼的凄凉场面，也会使他内心自我悲哀一番的。

邓小平逝世，我们一群老人给他「三七开」评价

1997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
预料中必然要发生的大事件——邓小平逝世终于发生了！

晨 8 时，中央电视一台正式播放揪人心的哀乐。好久没听到这种悲伤的哀乐了！电视屏幕上出现围黑框的邓小平照片。

看到邓小平遗像，我坐在客厅藤椅上，不知不觉中泪水滚溢，流淌了两颊！我自认为我与我周围一批老友是邓小平派，我们认为他是中国当代史上继孙中山、毛泽东后当之无愧的第三伟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
〔41〕1989 年 5 月，在学潮如火如荼之际，我对局势的发展很着急，我所居住的甲 15 号院，一些老省委书记也同样如此。17 日早上，我上班之前到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刘杰同志家问点事，刘家里已经坐着五、六个老省委书记，在纷纷议论当前的局势，希望向中央反映自己的看法。刘杰对我说：「老杜，你是笔杆子，你的看法也和我们一致，你来起草一份上书吧，我们送给中央。」我立即坐下来，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这个紧急条陈，请大家再斟酌，然后我就赶着上班去了。我下班回来后先到刘杰家，准备在上书上签名。不料，刘杰连声说抱歉：「我们没有等你，上书已经在上午送上去了。」所以，这个紧急条陈虽然是我起草的，但我却没来得及在上面签名。

我们的评价，我以为公允。

他应得到七三开的客观评价，他冒着充当马列主义「叛逆」的风险，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白猫黑猫论」，创造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邓的失误，我们以为，一是仍坚持政治集权，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上去；二是「六四」暴力镇压学生；三是错误处理胡耀邦与赵紫阳；四是错误发动对越南的战争；五是不给「右派」彻底平反；六是子女管教不严。但不管怎么说，他开辟了中国一个新时代，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

写下关于邓小平三七开的小文章，寄给明儿。

199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

晚，接×××（新闻出版署一局长）电话：一、赵紫阳要求出席悼念邓小平会，被拒绝。二、西方电台盛传：邓小平有遗嘱：（1）「六四」被迫；（2）维护江泽民为核心。

199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

杜星垣电话说，对赵现在是外松内紧，与我们还是不能接触。我说以后再说吧！

1997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

到萧洪达处。春节前，萧、杜星垣去了广州过节，到今日三个月不见了。杜星垣也来。
洪达说与赵处联系，接通妞妞电话。对方答：「我是×××电话，听到讯号后，请留言。」过一会儿，电话通了，梁伯琪正要答，却有人代言：「大姐休息了！」看来还是不让赵家接话答话。

杜说，赵一老下级会气功，给赵治病，借机传些讯息，现在去赵家也中断了。小聚中间，我再给志华电话接通了，我说：「杜星垣、锡华与我都在萧家打麻将。大家，还有李普，问候老人！请转达我们的问候！」

关于谁来接任总理的讨论

1997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

依约，9 时前到赵处。门口通报，等一小会儿，洪达到，一起入赵书房。

赵上身穿白色夹克衣，裤子是那种蓝色运动裤，可笑的是脚踏一双老人头鞋，即牛鼻子黑布鞋。赵说，一次我说一种和尚穿的「云游鞋」好，家人便买了一双来。

赵前十日左右回京。一月前罢，先去杭州住，以后转到四川住，长期呆在成都，赵与杜星垣、洪达、我先后一一握手，与我握得很紧，但见他面色红润光泽。他坐在靠背沙发上，那灯光从头右上侧照来，我看着，面色特别好，亮亮的，也胖了些。一会儿，梁伯琪到，面色亦好。赵谈了一通「功法」，说一位年轻人，将老子道教一法与佛教一法融汇在一起创造了自己的一套，不叫气功，而叫「超度」。我听了半天，大意是一个人的健康，往往取决于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即心理上自己想通了，不生气了，气通即生理运转正常，安静了，身体便好了。

尔后，赵大谈国家大局与国家政局。赵说，邓小平同志一套的精髓是「经济上自由开放，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矛盾。我（导正）说这种经济是自由的。赵说，不对。这种经济从自由经济说，是一种半拉子自由经济，即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

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自由的，竞争的。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不完全是自由的，有自由经济的一面，而另一面，国家政权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份资源、资产，如银行。国家可以凭借这部份资源、资产与政治权力极有力地干预经济活动。印度尼西亚、南美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也是垄断的、集权的，但他们手里没控制多少资产、资源，只能以政治权力参与经济，干预经济，活动余地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力量小些，活动余地少些。所以现在的中国是，一面市场经济有了，另一面，政府权力又分两面，一是政治权力，通过政府行为干预经济，另一面，它本身有很大经济力量，这样，干预经济很厉害，腐败由此产生、泛滥，急剧发展。这样的一种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过渡型，过渡期，是许可的、不可避免的。即印度尼西亚、南美等国经济本身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只是粗放型、低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过渡；而中国比他们多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即南美、印尼是一个过渡，中国是两个过渡。这个过渡不可避免，但如果定型定性，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那便糟了！中国这种权力加金钱，权力加市场的模式发展下去，问题越积越多，这样不行的。腐败问题解决不了。

赵说江泽民「5.29」讲话，是一个「抢旗帜」的讲话〔42〕。邓力群等人从反面帮了江的忙。邓力群等人那么猖狂地批邓反邓，江泽民不得不作出回答，否则，江不会如此鲜明地维护邓小平路线，也许马马虎虎地说，也可以不说。赵说，江不举这面旗帜，便无合法存在的依据。

赵讲了朱镕基明年接任总理的事。我（导正）说，多数同志赞成朱上。赵说，上海时，江泽民和朱不和，江心眼里也不赞成朱上。但是朱上，顺理成章，他是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经济工作熟悉，不让朱上，说不过去。如李岚清〔43〕上，人家会说「都是交通大学的班底」（赵有误。李岚清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李鹏是想再干一届，但宪法不许可。中国党中央考虑人事时，因邓小平在，可发生极大变化。中共中央核心内部权力运作是「大家长」制。什么事都是大家讨论，大家长拍板，这个拍板是决定性的。我们那时都是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到邓小平那里，由邓来拍板。政治局常委要听小平的。政治局开会，听政治局常委的，常委一说，政治局便一致通过了，无反对意见，有也不起作用。政治局常委讨论，如有不同意见，邓一拍板，对方也不便说了。所以，邓小平在党的十五大前走（指逝世），对江泽民不利。邓在，江说邓

怎么怎么说，大家不好说话；现在邓不在了，江对总理人选的大事，就必须和大家（政治局常委）协商，取得一致，平稳过渡。江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平稳过渡，不要节外生枝，所以要非常非常地小心行事。这种情况下，朱镕基上，可以通过。

～～～～～～～～～～～～～～

〔42〕1997 年 5 月 29 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说了拥护邓小平的主张，是显而易见。

赵说到×××。他保守，如任总理，结果必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赵说到××，说此人城府深，军队国有化的意见，他不会说的。

赵说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金融危机问题。

赵今天还说，邓小平作为强人，活着，人们言行总要敬畏邓，有些话不说，不好说。邓小平一走，变了，大家不那么畏惧了，所以这一段，国内政治环境松动了一些。吴祖光〔44〕在全国政协一个小组会上就说：「我 80 岁人了，有话就要说，不怕什么！『六四』要有个说法，陈希同这个坏人谎报军情，将事情办绝，应该解决；毛泽东一辈子没做好事，是政治流氓！」吴祖光说后，那个政协小组无人附和，亦无人反对。王蒙主持这个会，说「散会」了事。这种情形，如邓小平在，大约不会发生，且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了。赵说，吴祖光说毛泽东一生没做一件好事，是不对的，不能这么说。说毛泽东是流氓更不对！赵两次说到李鹏做总理、或做副主席不合适，国内外形象太坏！谈话中，洪达与梁伯琪小声说话，梁说：「赵吃抗癌药三个月了，有效！」我听着，这中间似有文章，即传闻的赵肺部可能有癌细胞活动。临别，照了一些相片。

李瑞环说：「给赵紫阳自由嘛！」

1997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

张广友（原《农民日报》总编辑）来坐。说，7 月初去了赵紫阳那儿。一、赵说：「万里在『六四』后从美国回沪，李鹏代表中央给他拟一电报要他支持天安门镇压。万里说过『镇压是必要的，哪个国家也不许可这样闹！』万里为什么这么说？有几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定会影响他作为开明政治家的形象。我劝他给中央或江泽民一函，简单说，适当时机应给『六四』一个说法。这就为未来结论时，给自己留下一个说法。」二、李瑞环说：「给赵紫阳自由嘛！给他自由嘛！」那天李瑞环、田纪云都去拜访了万里。三、赵说，「对『六四』我不抱任何希望，江泽民自己怎么看，不明；即使他想处理，但自己威望不足（左派力量很大），所以他不会做。」

1997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

上午，与锡华夫妇去洪达处。杜星垣到。

洪达说，目前形势下，对赵紫阳管制不会松动，也不会更严厉。

1997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

林若要去看赵。说，带来两份礼物，一份送你，一份送紫阳。是两盒冬虫夏草，我决定两盒都送紫阳。

～～～～～～～～～～～～～～～～～～

〔43〕李岚清（1932-），1952 年加入中共。曾任对外经贸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44〕吴祖光（1917-2003），著名剧作家、导演。1957 年被错划右派，1987 年被劝退党。

1997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小陈（林若秘书）来电话，林若请你联系赵处，林希望拜访。我给梁伯琪挂电话，忽有外人答：「梁伯琪洗脚，你将电话号码留下！」待一会儿，我又打，答：「你电话错了，」打不通，我怀疑其中有鬼！

1997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梁伯琪电话：「你是杜导正同志吗？雍文涛同志逝世，赵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追悼会，但现在回话不许我们参加雍文涛追悼会了，请你代我们向雍家属问候，向有关同志问候！」

雍文涛，卢沟桥「七七」事变前中共党员，「文革」前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赵是中南局书记。「文革」后期赵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雍做广州市委书记。俩人很亲密。

赵紫阳上书十五大，呼吁平反「六四」，招来当局更严厉管制。

1997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晨，打发三胞胎（我的三个小孙女）回幼儿园，打发楠楠（我的外孙女，明明的女儿）上学。正收拾家务，电话铃响了：

「我是梁伯琪，明日林若来访我家的事，取消。上边说，『十五大』期间不许会客。」梁气愤地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接着说：「说『十五大』后可以！」

我答：「我妥善处理。他们这么做不好吧！」

「十五大」北京表面上开得歌舞升平，骨子里吓得要死。我乘出租车，问这几天开「十五大」了，北京社会治安怎样？司机揶揄地说：「国泰民安嘛！哪能不好！」民间怨言甚多，上边又这么紧张。

我将雍文涛这事告方实（原新华社政治部主任，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方实说：「这件事，从好的一面说，不准赵参加活动，是为他安全，怕惹事，招惹责任；从另一面说，恐是怕赵影响大，对统治者不利！」

下午，与锡华夫妇、我老伴一起赴八宝山参加雍文涛骨灰安放仪式。文涛德高望重，平平稳稳，离休前，他任国家林业部长，得到全票支持。

遇杜星垣，他刚从人大会堂来，说大会选十五届中委刚刚结束。刘华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乔石、杨白冰均彻底下来了。星垣说：「赵在十五大前，写一函给十五大，内容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群众动机是反腐败，不是推翻中共领导，因此不能说是反革命暴乱。此案，应平反，早平反早主动。主动平反比被动平反好；在局面平稳时平反比出现事件时平反好。目前局势平稳，是平反的大好时机！」为此，国内外反映强烈，中央方面，则对赵采取了更严厉措施。
锡华说，这几日，西方电台、电视台反复播赵的这封信，许家屯〔45〕发表声明支持赵。国外议论纷纷，天安门亦有行动，中央非常紧张。

今晚看名单罢！

在八宝山贵宾室，遇雍文涛夫人廖志，我将梁伯琪慰问的话如实转达了。廖说：「文涛走后，我和女儿一起到赵（紫阳）处送讣告，那院军人密探林立，盘察我女儿许久，然后打电话到我女儿所在单位，查问你们单位有此人吗？太过分了！」

赵致十五大函，恳请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会不会演变为一场巨大政治动荡。
实说，目前中共虽遇国企改革艰难，腐败盛行，威望下跌之劣势。但总体上，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有饭吃，民主自由也有发展，老百姓总体上是支持中共的。我们趁热打铁，将民主改革跟上去，再将「六四」问题分步骤解决，中国形势会向更好方面发展。比如，在国企大刀阔斧改革时，辅之以宽松些的政治自由，团结更多的各种见解的人士，党内如乔石、田纪云、杨尚昆、杨白冰、刘华清，都应团结，对赵紫阳，更应团结，党国兴旺。

现在看，反了。乔石、杨白冰彻底退，刘华清彻底退；重用李鹏，重用丁关根（时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之类，对「六四」平反的要求实行镇压，反抗力亦增强，一个好端端的形势又可能如 1965 年样，毁于一旦！真可惜呀！
静观吧！万万不可天真！

199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

张广友电话：对赵采取了措施！你打电话打不进去了罢！我以为张过分紧张了。我说，「国庆过后，会松动。」

199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

下午，洪达来，说赵紫阳那篇给十五大主席团函，江泽民只在常委中简要说一遍，未议。以后，派人到赵家，批评赵：「你不仅未改正错误，而且发展了！」又追查赵的这封信是怎么发传到美国那儿的，赵发了火，说，我给中央的信是直接送到中南海的，你们是怎么传出去的？怎么还来问我？生气地将来人撵走了。于是，对赵软禁加剧，规定：

一、禁止赵会客：「大会（指十五大）期间不准会客」。二、禁止赵外出散步、上街，更不准到外地去。三、禁止赵家人外出。四、赵家的一切电话联络均切断。洪达说，于华几次打电话到赵家，赵处无人接、无人理睬。张广友的消息被证实了！当时还以为只是谣传呢！左祸真的不可低估啊！

199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
将八篇小文封好，内赵一篇，敏感些，我将已封好的又拆开拿下了！寄给明儿发表。
今拂晓前一梦，记不得因为什么事，得罪当局，当局派员审查我，我寻机逃跑，在小巷里闯来跑去，好容易跑出村外一沙滩。坏了，迎面有人来围堵，我无可奈何地被捕了！系南柯一梦！
～～～～～～～～～～～～～～～～～～～～～～～～～～～～～～～～～
〔45〕许家屯（1916-），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 年「六四」后出走美国。

199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晨，杜星垣电话：西方电台报，对赵的限制已取消，我们设法看看去。我说好，过几日再议。

199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

下午，杜星垣电话，说：「赵处不允许见面了！」洪达说：「梁伯琪住院」一说，不确。

199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

杜瑞芝电话：「我已回到广州。赵那里情况我已明了，没什么，但不能会客了，你们不用着急！」

199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我坐东北角一桌，与胡绩伟（《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吴象（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起。

吴象说：传说，李鹏近日给我的熟人谈话时说，「紫阳同志的工作要安排。」我问准确性如何？他说不敢说死！

胡绩伟说：邵华泽（时任《人民日报》社长）不久前找我面谈，说，在「六四」与邓小平问题上，中央已有明文决定。你有不同意见，就在国外发表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我反问我在香港发表，香港是国外吗？邵又说「六四」呢？胡绩伟反问「你是否说『六四』不能平反呢？」邵连说：「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

思！」

我对吴象说，这是个重要信号。邵华泽乃当今江核心集团中人，也在与胡绩伟谈话时，不敢说「六四」不能平反，他们都心虚得很！

胡绩伟今日与我耳语时说，种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今后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会松动。吴象对我说想还像过去那么整人，整不成了，一来国家进步了，文明了；二来控制能力弱了。毛泽东当年，能独裁能横行，是许多条件促成的。今日领导人没有那样的主客观条件。

1998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

锡华说，与妞妞联系上了，说赵身体极好，要大家放心！

199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这《炎黄春秋》真有些神了，有些凝聚力了，今日杜润生〔46〕、于光远〔47〕都高高兴兴来了。

杜润生说，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些好的想法。如三权鼎立，中国党通不过，但可将人大、政协、政府实际上用一种改革制度的办法，制约行政权力，这就前进了一步。又如村庄内进行支部委员会选举，真正在党的基层实行起民主来，这就又前进了一步。

1998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照计划，与舒元璋、方实先到北京医院看望胡绩伟。方实先去凌云（曾任安全部部长）家等候。胡绩伟住北京医院一楼，单人间，夫人狄沙陪床。胡正注射点滴，躺在床上，面色红润，眼光有神，头脑清晰，说起国内政局，他又滔滔不绝说开了：「我已给国外寄一稿，什么魏京生、王丹，小事一桩；赵紫阳被软禁，失人权才是大事，应先解除对赵的软禁嘛！」我说：「你是党员，受党章约束。」他夫人说，「就因受党章约束，连事情的大是大非也不要了！这不行罢！」胡还是主张先在《炎黄春秋》发他们六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联合发言。

转到四楼曾志〔48〕处，亮亮（即陶斯亮，为陶铸、曾志夫妇的女儿，时任统战部局长）眼角有泪痕，迎我、舒元璋先坐走廊椅上。亮亮说，「妈妈写有遗嘱，压在枕头下，不让我们拆看，说断气后再看。这样子了，我怕误事，拆开看了。妈妈遗嘱，什么追悼仪式勿做，勿告诉任何亲人、友人，只将骨灰撒到井冈山麓。我正拿不定主意呢。我想，少数亲人、友人，得发讣告罢！不然，事后大家要抱怨的。」我说，必要的事，还得做。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她是一个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随后到病室看了曾志最后一面。她头朝东，平卧，面色腊黄，闭目，抢救的管子插到多处，嘴巴贴了纱布、胶布，床边有心电图仪器，指数倒正常。亮亮说，妈妈昏迷后，腹水，影响到肝部，肝部有剧烈疼痛。我说曾志大姐的生命以小时计了！

后又转到凌云处，凌云详谈了他在康生身边工作的情景，说康生、曹轶欧，那么疑神疑鬼，很可能是本人历史上有问题，心里有鬼，所以每秒钟都在怀疑别人不信任他、谋害他。凌云有篇文章，已写好，交我带回。

上午，胡绩伟还说：「《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政府如此为难，那国内外的形象可就太不象话了！他们也是自顾不暇了！」

199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晨，老伴给赵紫阳的女儿妞妞打电话，意外地接通了。我跟妞妞说，曾志病危，已处于弥留之际，请转告你爸爸知道。妞妞答，我爸爸去看望过了！看来赵恢复了些许自由，令人喜出望外。

～～～～～～～～～～～～～～～～～～～～

〔46〕杜润生（1913-），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1989 年因支持「六四」被缓党员登记。

〔47〕于光远（1915-），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89 年因支持「六四」被缓党员登记。

〔48〕曾志（1911－1998），1926 年加入中共。1928 年上井冈山。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是陶铸的夫人。

克林顿与江泽民唇枪舌剑，辩论「六四」

1998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

自自然然地，急于知道克林顿与江泽民会谈的情况。今日晨 9 时，先看香港电视台，克林顿来到人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受到江泽民欢迎。开场，有盛大庄严的阅兵式。以后，克、江进入人大会堂会谈。上午 11 时 50 分，江、克出现在人大会堂记者招待会的会场。

这招待会，约三百名记者罢。克与江，可说唇枪舌剑，正面交锋，比我预料的尖锐许多。
二首脑宣布双方达成核弹头、导弹不瞄准对方的协议。

克林顿意外地提到以下尖锐的政治问题：

「1989 年，北京出现民主呼吁，非暴力的呼吁，政府动用军队处理，这是错误的。」「是要稳定，但不给予人民充份的自由，将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还提出逮捕不同政见者问题。惊人的是提出「天安门事件」，在这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以美国政府名义，向世界庄严宣布：「天安门事件处理是错误的！」

江泽民进行了软弱的自我辩护，但能同意将此辩论现场直播世界，让全世界听到克的声音，这是一种胸怀！大度的胸怀！江泽民的这一点应予肯定。

克林顿首次访华，在如此隆重场合，这么尖锐地提出「天安门事件」，指出「中国政府那么处理是错误的！」是惊天之作。中国不得不予以郑重考虑！

今天，人大会堂记者招待会上，当克林顿尖锐谴责我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那么处置时，江泽民虚弱的回答如下：「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他不提「暴乱」、「反革命暴动」，连「动乱」亦不再提了。江说：「如果当时我们不采取坚决办法，那今天中国不会出现如此稳定的局面。」这就避开了天安门事件性质究竟正确与否这个尖锐问题。只说：「如果不采取坚决办法，今天稳定不了」，以这样的结果为「六四」的暴行辩护！

1998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昨日洪达电话说，赵近时，一周能打两次高尔夫球。

1998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
昨下午，接薄一波处李秘书电话，说如你方便，老人想在明日上午见你。我答：我到。

见面后谈了很多、很多。说到赵紫阳，我说中央作出正式结论后，我过年过节看望，他还问候过你。他答：「对赵，我帮助，够帮助的！」

199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杜星垣、萧洪达来姚锡华家小聚（我与姚锡华住同一大院）。

杜星垣、萧洪达说：赵处境无变化。原给赵治病的医生，赵夫人梁伯琪约他来访，医生到门口被拦住了。

洪达通过亲属问赵的情况，回答，赵与夫人身体尚好，一周两次打高尔夫球。

199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

今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年纪念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说：「1989 年『六四』，是赵紫阳纵容、支持反革命暴乱。」这与中央、江泽民近几年说法不太一样。内大有文章。说明极左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1998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

拂晓前一梦似在原燕京大学小院内，赵紫阳住一小院，院外云集赵朋友十几二十人。赵形容憔悴，但话音朗朗。久，众人方散。我与赵耳语：「近日，政治风声紧，持不同政见者遭捕。」

荒唐中的不荒唐：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今日处于一种内心的恐慌中，有时有恐怖的感觉，这种局面太不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1999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洪达处讯息：赵「六四」前不能回京。

1999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收拾书籍。紫阳谈话书稿，藏我客厅墙西柜，又搬动大沙发堵住这个柜门。

1999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王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昨晚电话：「你那篇《〈炎黄春秋〉的春秋》，好，我赞成。但今年 4 至 6 月，中央有关部门盯得很紧，你那篇文章里，说了赵紫阳之类的话又说了『六四』，这些上边是忌谈的，所以如发表，怕上级说话！」我答应改动。

中国就这么个「德性」，我忍气吞声了吧。

1999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杜星垣来了，说：
一、现在中央是林彪那两手：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文字口控制很严。江××说，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李昌〔49〕四个人文章不能发表。
二、赵 80 岁人了，无人说话，会憋死的。我们难见到了。
三、鲍彤见外国记者说了三条，（1）「六四」要平反；（2）改革开放绝对正确；（3）个人迷信绝对错误，这三条我至死不变。
四、国家形势有朱镕基在，比预料的好些。
五、今秋国有企业改革非动所有制不可。锡华说：「外电说，北京一个《炎黄春秋》，一个《中流》，还有广州一个《南方周末》是必须看的，能看到北京动向。」
～～～～～～～～～～～～～～～～～～～～
〔49〕李昌（1914-），1936 年 5 月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央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9 年因支持「六四」被缓党员登记。

绝密文件透露有人要把赵紫阳往死里整

1999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

杜星垣说，有一本绝密件，整理了赵「六四」前后言行，王××是写作组成员。这会由李×牵头。「六四」赵的对立面是李×，李×是「六四」的元凶，他必置赵于死地。

1999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

中午，杜星垣、洪达来。杜星垣说：「有一个『六四事件纪要』，由王××、曾××等六人执笔，说是征求意见稿，实则只写李×正确面，歪曲历史，很糟！很糟！」

杜星垣说：这个「纪要」，有几处很糟，又是「文革」那一套。如，「纪要」说「有人藉二十年改革开放，挑拨离间以售其奸」，「有人已钻进我们的核心内部捣乱，要在十年后跟我们算账。」又不指名谁在「挑拨离间，」谁「钻进了我们的内部」。杜星垣说，「纪要」说胡耀邦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犹豫摇摆，赵紫阳是纵容，才导致了「六四」。

1999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

下午，洪达电话说，赵已回京，到密云了，要待两个月。赵在烟台一段。吴官正（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吩咐，赵生活要安排好，他（吴官正）不去会见赵。地方官员都去拜访赵。有的地方官要赵看看企业，他说：「不去了！」说赵身体很好！

1999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

晚，洪达、刘春亭（前中共中央中南局一处长）来锡华家中坐。洪达说，赵能打高尔夫球，身体好，王志华跟洪达说，「现在政治上越来越收紧。」大家说，「有机会希望看看赵去」。

「十．一」天安门城楼上，几乎无人不关心询问赵紫阳近况

199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杜星垣、洪达来锡华家坐。杜星垣说，「十．一」时去天安门城楼，几乎没人不关切地询问赵怎样了？包括以前对赵有意见的人在内。杜润生咬耳朵说，「李×比谁都差！」说陈云对赵，只说辜负了党的重托，没说别的。

199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

晚，锡华转洪达电话，王全国（前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50〕来家坐，说见到了赵。

～～～～～～～～～～～～～～～～～～～～～～～～～～～～～～

〔50〕张根生（1923-2008），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广东省委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77 年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1985 年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杜星垣、萧洪达来姚锡华家小聚。

洪达说，几日前，拨赵紫阳同志处电话，无干扰，通了，是梁伯琪接的。洪达在电话里说，赵的老下级、老朋友们问候他，想念他。梁说：他也很想念大家。梁说赵身体好、头脑好。洪达说：大家想看望他，梁便激动起来，说：「不让看啊！不能来啊！」梁还说，我们家的老阿姨，河南省农村老妇来访，都不让见，后好说歹说，才允许见了，住一夜便被撵走了！

199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

晚 6 时，洪达电话，说与梁伯琪处电话能通了。我立刻给赵处打两次，占线。6 时 10 分通了，对方是男性老年声音，说「你是谁？」我答：「杜导正」，对方说，「听出来了！」我问，「你是哪位？」答：「我紫阳啊！」真是喜出望外！我说，「老朋友、老下级关心你，问候你。」他说，「我们妞妞与洪达处联系，你们几个可来看我。」我说，新年好，他说谢谢你们，又说「你家好！」我说「谢谢！」

与洪达通话，我说：他，一个伟大的人物，会以非常的心态面对这冷酷的不公道的境遇！
已约好，下月 2 日上午 9 时到洪达家集合，一起看赵去。

把林若两年前送来的两盒冬虫夏草备好，带给紫阳。

秘密录音操作过程．赵紫阳谈话

（2000 年 1 月－2009 年 3 月）
隔绝两年多，再访赵紫阳。他分析国内三派政治势力的较量。

2000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昨晚，我取出 1997 年秋天林若来京参加中共十五大，由广东带来托我给赵的法兰西名酒，是一种礼物，一种心意。但因没有见赵的机会，一直存在我家里，林若几次对我说，无法送去，你饮了吧。但我想，总有一天，能送给他。现在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我取出十三本《炎黄春秋》，带上照相机，与锡华一同去洪达处集合。路上顺利，8 时 20 分出发，到洪达家不到 8 时 50 分。于华病，我慰问后，与洪达、锡华一起去赵居住的富强胡同六号。门口要通报，正好，赵的新秘书来上班，问我们姓名，说知道，我们便进了大门。外院有几名战士闲走，我们经东过道，向赵书房走去。赵大约听到脚步声，走来门口相迎。「两年多了啊！」很难得见到了，简直是绝望后的相见，终于见到了，紧紧握手时有异样的感情在心里边。

还是老书房，老样子。我先注目的是赵的健康与精神状态。他头发稀疏雪白，似乎无变化，面孔红红的，有光泽，皱纹不多，步履轻捷。我们坐下，他用潮州功夫茶〔51〕接待，一种极讲究的小小烧瓷盘、壶、杯，他倒茶时，我看到他手不颤抖。
～～～～～～～～～～～～～～
〔51〕潮州功夫茶，是粤闽邻近地区一种相传久远的茶饮。多将名茶，注入壶中，以酒精煮之，然后，主人持壶对准茶杯，一杯杯倾上，敬给客人。尤其那种铁观音茶，不胜茶力者，连饮几杯便会醉倒。

先谈此次为何开禁「会客」？赵说：

「十五大时，我给十五大是写了一封信，交秘书分送给中央七位常委，另送尚昆、万里。内容不是外边传的八条、十条，很简短。

第一段，我说，对「六四」，我们原定是反革命暴乱，现在改了，说明前一种说法不能成立了，既然承认是非反革命暴乱，那么，我们用武力解决便不对了。因此，第二，我说这件事不会因为我们想让大家淡化，便淡化得了的，历史上必须对此作出结论。因此，第三，我建议，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趁目前政局稳定时解决，比未来政局困难时解决好。

此信送上后，不知为什么，西方电台纷纷广播，当局便派人找我谈话，说我此信影响安定，说我写此信不对。

我这么回答：我是党员，给党中央写信是我的权利，这封信的内容我以为是正确的。

从此，对我戒备加严。我不能外出，高尔夫球不能打了，客，不能会了。我家一老保姆从农村来，拦在大门口不准见。无非这么一封〔52〕信！此信发出前，我找个别朋友斟酌过，是赵健民，中南海知道此人的。赵健民不知从哪儿得到我这信，自己印了许多，散发了。所以后来，中南海派人找我谈：此信错在发到国外，谁发的？我说，我不知道！而且，发这么一封信，无甚差错！

「十五」大后，江泽民要访美国，他大约估计到美国后，人家会提到我被软禁这件事。于是先派医生来我

家，劝我到京郊打高尔夫球。我偏不去。又要秘书劝我打，我还是不去。这明明是江泽民要捞政治资本——说我们没有软禁他呀！他不在打高尔夫球吗！我不上这个当。

所以这一整年，我待在这儿，哪儿也没去，球也一次不打。今春先去杭州，后回京。

近日换了秘书。那日秘书新来报到，问：「你有什么要求？」我答：「软禁了我十年，『十五』大后，会客的权利也取消了，这不对嘛！我要求两条：一、到外地看看，先去广东、福建、浙江；二、会客的权利。」过两日，新秘书奉命回答：一、暂不去广东、福建；二、可以会客。我问什么客可会？答：外国人、记者不能会，其它可会。于是「开禁」了，这是近两日的事，我才打电话给洪达，告诉老杜（导正）。我曾问他们会客的客人标准？我说：赵健民，几年了，他年年来，说不准见，就坐在门口等。还有广东的李学先，也是年年来，不准见，就坐在门口等的。以后，他们回答我：赵健民可以见。这样那你们便可见了！

我们三位（萧洪达、我和姚锡华）是他的老下级，上午 9 时开始与他谈，一直谈到 11 时 40 分，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还多。

赵的书房，老摆设，陈旧，这倒没什么，只是书房靠北天花板下的白色涂料，已剥落了，颜色灰暗，无一丝生气！

～～～～～～～～～～～～～～～～～～～～～～～～～～～～～～

〔52〕赵健民（1912-），1932 年加入中共。曾任国家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接着，围绕着「小平同志不配套的改革及其后果、前途预测」，他谈了大段大段的可贵看法：

「小平同志经济上放开，政治上集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了产权改革，要不要改革？这个问题，看来已不大了（我理解：中央已同意国有企业的产权可国有、公有、亦可民有、私有）。

「今日中国一切问题集中在政治上，政治不改革。

「谁个官员贪污，治谁的罪？江西那个副省长，无非受礼，今年一笔，明年一笔，几年下来，一大笔，这要算贪污，在位的省长、副省长，谁也跑不了！所以，今日贪污的情况是，治罪了的不一定有多大问题，没治罪的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江西这个副省长，姓胡的，就是说了不少对江泽民不满的话。

陈希同与李鹏一样心理，心想我们是『六四』有功之臣，理当做中央主席，做国务院总理，怎么你（江泽民）从上海来做第一把手，心里不服。陈希同就不买账，说三道四，于是乎，倒霉了！

「现在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了，政治上腐败，这腐败情形，越发展越烈，不可收拾，看不到收敛的迹象，是发展的趋势，还要发展。

「现在的中央，拿不出治理的方案。

「现在的中央，最害怕反对的力量、不满的力量组织起来。譬如什么独立工会，如有独立工会，那就不是工人没饭吃了才闹事；不满意，就会闹事！群众只要无组织，『群龙无首』，那样，反抗便只是小型的、无组织的一种行为。需要时，现在信息便捷，行政力量动作极快，立刻可以镇压下去。

「至于言论嘛，现在中央是睁一眼、闭一眼！

「国内政治，现我以为分为三种见解，有三派力量：一种是官方派，你（导正）概括为当权派，贯彻邓小平同志的经济上放开，自由；政治上集权，控制。第二种力量，即『万言书』那伙人，这伙人不赞成『文革』，但以为『文革』前毛泽东那一套是可以的。主张中国走『反改革』道路，走回头路。这伙人，尤其第二个『万言书』所讲我国腐败、贫富悬殊、治安恶化、道德败坏的确是事实，而且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腐败继续蔓延，给他们提供的此类事实更多，所以他们越发以为自己有理，所讲振振有词。另一方面驳他们，也驳得苍白无力。只说生产发展、生活改善，这不行。第三派，我叫做『民主派』，李慎之〔53〕属此类，还有一些人，但无组织，力量很分散，他们主张迅速政体改革，赶上去。现在是三派力量较量。

「我党，我政府，毛泽东时代压反对派，靠两个力量：一个武力，一个意识形态。现在只有第一个力量（即武力）了，意识形态呢，只有官员在会议上说说，老百姓不说，官员们会后也不说。

～～～～～～～～～～～～～～～～～～～～～～～～～～～～～～

〔53〕李慎之（1923-2003），1948 年加入中共。资深新闻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获甄别平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 年因「六四」事件被免职。

「江泽民做第三代核心事，有人持异议，说是要先靠实践。江说，那我也实践十年了，办了三件大事，也可以了罢。

「一次，　江说，我坐这椅子，我有九十公斤，可以了，别人推翻我不了！
「二次，
「朱镕基实干，得力（洪达说：经济上看来也在走回头路，搞计划经济那一套）」。说到此处，赵不说话了。我（导正）说：粮食问题上很突出。赵说：「粮食那里由国家统一，建国后还没这么统过，这不对！」对整个经济走回头路问题，赵未表态。

在议论中，赵还谈到以下方面：

「近时，『极左』派提出『要给六四平反』。说这是邓小平的罪过，毛泽东没有向学生开过枪，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也只是拘留。这是个新动向。」我（导正）说这是「极左派」的一种策略。

赵还说：「我写给『十五大』那封信，目的是：我 80 岁人了，说不定哪天走。『六四』那些大事，我作为当事人，应对历史有个交代。这交代就是『六四』时我的态度。至今，近十年了，我改变了当时的看法吗？没有！我至今坚持我当时的看法。这信，当然不会被当局采纳的。

「邓小平同志只务实，胆大。他重视借外国人的钱，发展中国经济。

「什么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胡绳是学者！好人！

「『民粹主义』是个什么概念？」

赵近日要到广西去。梁伯琪身体衰弱，妞妞身体很好，她的儿子 14 岁，膀宽腰粗，一米七、八，壮牛一般。

临别照了许多像。

今日两个多小时，赵滔滔不绝，咬字清楚，耳聪目明，精力不减两年前。

2000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昨日赵谈到鲍彤与人的一番对话，别人告诉他：「一日，上级派人找到鲍，说国外大发你的言论，这危害了国内安定局面。」鲍问：「这是犯罪，还是错误？」答：「这是犯罪行为」。鲍说：「如是错误，我不承认，如是犯罪，请公安部门来人，出示拘留证件，由检察机关起诉我。既然你不出示公安部门证件，因此请你出去！」

赵紫阳 80 岁了。劝他趁着记忆力还好，赶快动手写下回忆录

2000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晚，洪达电话：我俩要赵搞自传或回忆录的事，要郑重再次考虑。他毕竟 80 岁人了，趁现在记忆力好，头脑清醒，将一些大事记下来。我说极该的。他说与杜星垣一起谈过此事，杜兴趣似乎不是很大。这样，只能靠你与李普了。我答应下来，晚上想，还得找两个年轻助手，一个张天来（《光明日报》记者），一个齐凤翔（山西某报总编）。

2000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

深圳天空蓝蓝的，白云飘来飘去，呼吸新鲜空气，与林若一家、方苞（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夫妇到深圳大鹏湾参观。路上，林若说，「你要的给赵录音的录音机和十盒录音带我已备好，我回广州后给你带回北京去。」

2000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

下午，杜瑞芝来广州珠岛宾馆谈心：一、赵在致「十五大」那封信后，还有一次很厉害的质询信，抗议当局取消他会客访外地自由的行为。二、我知赵现在在桂林，我几次想去看望，又恐引起当局给紫阳添麻烦，取消了，等赵紫阳回京后我再去看他吧。

2000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晨，剃胡须，想到政局艰难谲诡，胡诌四句绝唱：

人将八十生死丢，哪管开除不开除，况我儿女都长成，活得更该超轻松！

眼前亮起我辈在困难面前、大是大非面前，我心目中的榜样：赵紫阳、萧洪达

萧洪达「六四」时任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委员等三个职务。「六四」后，愤然辞职，三个职一起辞，主动辞。乔石再三挽留，仍坚辞。萧跟我说，这样「六四」后中纪委一切违背良心的行动与我萧洪达无关，历史上我萧洪达不承担任何责任。

赵本可让步，仍为政治局委员，至少中央委员，可赵誓死不干。

「文革前我也很左，文革后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2000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

星期二晚，锡华转告洪达电话，赵已从四川返家，希望本周四上午聚聚；昨晚赵处又来电话我家，梁伯琪大姐说，我买了几条纱巾，分送几位女友，务望你携老伴前来。

乘锡华车，先到洪达处，转富强胡同六号，萧洪达、杜星垣、我、姚锡华到。赵在书房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他面色红润，稍胖了些，很有精神的样子。他泡了功夫茶，大家分别坐定。

先问询《炎黄春秋》应克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章事。紫阳以为要害是第三期那篇，应克复说：「邓小平说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搞，那么，议会政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赵对此事，未发议论。

我说了李慎之、于光远事，我又说了林若的文章。

赵又说了张广友访他，他谈了「六四」经过，他与胡耀邦关系，胡为什么下台。赵说，我与胡耀邦，非权力之争，我无此意，胡无此心，全在反自由化问题上。邓小平以为胡接不了班，决心撤胡，我未为胡说好话。此时我说话已无用，但我也未落井下石。

我们再议了赵口述回忆录事，我说趁你健康时，首先把一些只有你知道的事录音留下来。杜星垣也同意，萧自然同意。赵考虑良久，说，我原先也同意搞，后拿不到材料，现在要搞，困难。口述一下还可以。

于是议定：一、回忆录，办；二、你们先出些题目，给我先看看；三、杜导正、李普做；四、杜星垣参加议；五、舒元璋做具体工作；一周议一至两次，多了，身边人如不报上边难向上边交代。

我带上两册香港版书，一为《赵紫阳下台始末》，一为《万言书》（三十万字）。

杜星垣说，中枢几人间不和，李瑞环、朱镕基几次想辞职。

赵说，我党现在是毛主席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有「左」派，老左，新左派，自由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基本上是西方的：个性、个人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我以前说过，「文革」前，我也是很左的，「文革」后，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党内一部份人，是这样，「文革」前左，「文革」受批，以后改了。还有一批人，如林默涵（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欧阳山（曾任广东省文联主席）、王匡（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文革」前同情知识分子，王匡总是站在他们那边，「文革」批斗他们厉害。这些人现在大翻个儿，「文革」后很左。

与李普电话，说到此事，他高高兴兴，说好，明日上午谈，他推荐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办具体事。

今日离上次面谈（1 月 2 日）以来，已隔四个月零几天了，书房北小院，那两株石榴树，花未放，寂寂几个小蕾，树冠浓绿，一股生气。人呢？赵，夫人，女儿妞妞，气色、神情都有生气。可书房内，老样子不说，那天花板下的白色涂粉斑驳了不说，且吊在那儿，象灰色花儿；地板红色的，露出白色；沙发，老式陈旧了。一种破败的感觉。

议定回忆录分五部份，秘密录音的浩大工程正式开工

2000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

依约，晨 8 时我到新华社宿舍皇亭子东门先接了杨继绳，再到新华社接了李普，8 时 30 分，便提前约两小时到了萧洪达家。

赵要到来，因是「北大」闹事，又逢马上要到来的「六四」十一周年，萧洪达家门口，摆了一辆公安吉普车，对面又有几位公安人员，气氛有些紧张。

院内树花葱茏，不一会儿，赵同夫人梁伯琪到了，入大厅。

赵有准备而来。杨继绳与我、李普、洪达一样，不会摆弄录音机，林若给我从广州带回的十盘录音带、新式录音机我当场都交给了杨。于华将自己的拿来，也不熟练，摆弄 20 分钟，可以了。

先谈「回忆录」规划。我先说：

一、赵将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最重要的想法先录下来；
二、先整理材料；
三、用司马迁《史记》手法，讲事、讲人，不用《资治通鉴》的编年体手法；
四、因此我的粗设计是五部份：（1）「六四」事件；（2）「六四」前后延伸，「六四」前搞成第二部份；（3）「六四」后搞成第三部份；（4）赵本人八十高龄大彻大悟，讲一个国家级领导人的晚年反思与觉悟；（5）调入北京前的半辈子人生。这部份赵与众多老干部大同小异，无鲜明特色，可以简略。李普说，导正意见可以。胡适口述自传，就是他本人口述，由一位作者在注释中补入材料。赵同意我的想法，说：大家最想知道什么事，我的想法，我想说的事。赵说：「老杜（导正）你先写个大纲！」赵有一个提纲式文字底稿，正是「六四」经过，一沓子。他说，是七、八年前写的。此时，他便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共 90 分钟。此事，粗粗可规划如下：

一、6 月 8 日（星期四）李普、我、杨继绳请杜星垣到赵家录第二部份；再过两周录第三部份、第四部份；
二、7 月前，我、李普、杨议一次，提问题。问题有：「六四」起因（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胡耀邦问题，四项基本原则——后果——个人），议一批题目出来；
三、然后进行第二批录音；四、秋季录完，冬天整理。年内告一段落。我自己呢，将今年以前，「六四」后赵只跟我，跟我们几个老下级的二十多次谈话要点（均在我所记的日记中）找出。我一个月用四到八个半天办此事。

录音前，赵谈了对李××同志的看法。他说，我曾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含意自然清楚，李××就不同意。赵还说李××是劳模出身。是传统马列主义培植的人物。

赵还说到华国锋，历史上有功，人也厚道

2000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下午，杨继绳、李普来电话，李去了赵处，说好，赵自己先根据手头已有的一些文字部份自己再录音，然后大家再议再录再谈。

2000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赵将五盘录音带给了萧洪达，今日上午我去萧处，萧将录音带给我，我下午给了舒元璋，舒答应整理成文字，再复印两份，萧、姚、我各存一份。大家再提问题，进入第二程序。如此，可万无一失。将这份材料，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经过原汁原味保存下来，便于今人后人研究。

「『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

2000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

21 日晚，赵处电话，赵约我去谈，洪达说，我只推荐你一人去，谈回忆录具体操作事。我去了赵的书房，原计划半小时，结果我 9 时 15 分到，近 11 时才离开。先谈「回忆录」操作规划、原则，万无一失，原原本本。分两阶段。第一段，收集材料，约四至六日；下一段，考虑成稿。材料呢？事关政治、中央高层人士、政治事件，其中有他们的分歧，所以一定要准确，保密，将来会见之于世，所以人数宜少，份数宜少，决定录音带复制成三份：赵、萧（洪达）、我（导正）各一份。整理成的文字，抹去要害敏感部份，打六份，组成五人小组，萧洪达做组长，杜导正、李普、姚锡华、舒元璋。「七一」前录好带，整成文字，杜、姚（一式二份）校阅后，分发大家，大家分别提问题，整理给赵。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

中国已形成官僚集团，既得利益，保住权力——钱，一切为我利益服务，所以不赞成政治改革。
中国一切问题在封建主义，病根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民主集中制。

赵还谈了近年对中共与国际共运成败的反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当时弊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对的。但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怎样进入社会主义，马、恩的一些想法不行；列宁、斯大林更不行。资本主义对自己已存在的问题，在自己框架内，纠正、完善，生产上搞股份制，反垄断，征个人所得累进税、遗产税，搞社会福利等等，缓解了矛盾，产生了符合人们理想社会的一些因素，此事，马克思估计不足。

东方革命。这么（东方一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尖锐，必然爆发革命。共产党作为人民革命的核心，领导这场革命是对的，但夺取政权后，应当发展生产力，搞社会民主，增长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没有这么做，都失败了。

洪达说，明确五人小组，第一阶段，小杨（继绳）不参加了。

下午找姚锡华、舒元璋谈，说妥了，他俩完全赞成。上午笔记再给姚。

2000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

与杨继绳通电话，一、谈他到《炎黄春秋》事；二、赵稿放慢，三两日内，杨将一部份录音带与文字整理稿交回给我。

2000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

最近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办赵口述稿事。洪达说，明日、后日我俩听录音。锡华说，我与舒元璋集全力整理文字。

原定萧洪达、我、李普听，李普说近几日搬家，身体不行，第一阶段不参加了。我要李给洪达打电话，晚洪达说，他未打电话，照顾他了。

锡华说，整理文字，时间较原计划长，费工较原计划大，恐要顺延些日子。李普、锡华皆好友，上了年纪的人，个人意见都较固执，此事又完全是自愿奉献，所以我也难以勉强。

萧与杜炎夏关起门窗听录音，中枢斗争惊心动魄。

2000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上午，洪达来，在我家东南角卧室，关起门窗，放赵的录音。炎热难当。听一、二、三带。边听边感到中枢斗争极尖锐，还有阴谋诡计。
晚，杨继绳送录音带与文字记录稿来。

2000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在我家，洪达与我继续听赵的第四、五、六盘录音带。赵受政治迫害皆事实，如泣如诉。太残酷了，不可理喻，赵自然满腔义愤！

2000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整个上午和下午，我遵照赵的意见草拟了请赵再口述的问题大纲，共分五部份，自觉尚可。
到锡华处，他与舒元璋据录音带整理成文字稿，大功告成，只差半盘带子了，全文在三万至四万字之间。
召小女儿明明回来，大热的天，她躲在卧室，翻录了一整天赵的录音带，一式三份。这种转录技术我们老头是不懂的，只能靠她了。

在胡耀邦追悼会上，胡的夫人李昭拒绝与邓小平握手

200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上午，洪达来。在锡华家。
一、我读了我拟的请赵再口述回忆录问题大纲，洪达补充，说可以了。明天去赵处谈。
二、已有的录音带，洪达交赵一套。
三、文字稿，整理后，待赵回京再交。
四、考虑赵回京后开始操作「回忆录」的第二个回合。洪达还谈了以下问题：
一、胡耀邦说话随便。一次他说：「我军、我干部从西藏撤出」，老人不满，王震说：「胡耀邦，混蛋，那不乱了！」
二、杜星垣作国务院秘书长、中央经济小组秘书长，万里还建议杜星垣任国务委员，赵没有点头。
三、赵在胡（耀邦）紧要关头，不会落井下石，但不可能为他（胡）说好话。
四、1989 年 5 月 14 日，天安门正闹得厉害时，赵要我（洪达）与你（杜导正）去他家谈话。杜谈了要高举邓小平旗帜，保邓，还有廉政几条。我本想跟赵说对邓要小心，邓说一不二，以劝告赵，但我未说出来。
五、「十五大」赵发出那封信后，中央成立了审查小组，李鹏任组长，给赵定「挟洋制华」罪名。

明日 9 时到赵家，8 时 40 分到萧洪达家，我与姚锡华、舒元璋 8 时出发。

洪达临行谈到李昭，说此老人很厉害，胡耀邦追悼会上，邓小平与她握手，她拒绝，并说了一句话：「都是你们搞的！」

我为赵紫阳再口述稿拟出大纲

2000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

依事先约定，今日我、萧洪达、姚锡华到赵紫阳同志书房。我前日在家起草了一个赵再自述稿的大纲，一气呵成。我又誊在道林白纸上，今日带来交给赵。他们要我先念，我念完我起草的大纲后，锡华、洪达又相继发问。我拟的大纲全文照抄如下：

第一、第二部份问题「六四」事件对赵的处置

一、除李一氓〔54〕、彭真〔55〕、费孝通〔56〕等你已提到的著名人物，对学潮性质、预测，如何处置提出意见以外，还有哪些老元帅、老将军、老领导、老文化人发表过意见？什么意见？你说你曾选了部份信件送小平同志，这些信件还在吗？建议录下来。

二、鲍彤一案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据可靠消息，杨尚昆同志曾在「六四」后说，「此案很棘手！」但政府、中央将他的案子看得极重，处置极严厉，至今据说仍在严格监控中，为什么？

三、1989 年 6 月 19 日，在中央政治局处理你的问题的会议上，你在 20 分钟内宣读了你的发言稿。这个稿子中央发到省军级，这是概括了你对「学潮」、「六四」总述、总评的正式完整文件，建议将你发言稿全文录下，以备今人后人考察。

四、1997 年 9 月，你致中共「十五大」的信，是「六四」时隔 8 年后，你对这场大事件的回顾、评价。实际上重申了你始终如一的立场与看法。这是又一件珍贵文件。建议正式录音。

五、你几次致函邓小平，痛切陈述「学潮」「六四」有关意见外，尤忧心邓小平晚年对你的误会（邓认为赵在紧要关头，为保护自己，将邓小平抛了出来，是一种不仁不义不道德之举）。这种举措，除出于你对邓小平划时代功绩崇敬的因素外（这当然是主要的），还有什么原因？你这么一个风云政治家，晚年大彻大悟的思想家，你内心是否也有「愚忠」的传统旧观念作怪？

六、陈云逝世后，你申请前去追悼。你说过，「我对陈云同志很崇敬」。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路线上，有哪些重大分歧？哪些共同点？你为什么对这位老人如此深情尊重？

七、你从 1989 年「六四」起，到今年（2000）6 月，整整十一年了，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可以说是政治迫害。而道理明明在你一边，这种情况下，你内心的痛苦一面，是不言而喻，可想而知的，你又是七、八十岁高龄的人，你怎么渡过这十一年的？你内心的精神支柱是什么？除坚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是公正的老人，认为在此大是大非上，自己绝对正确，无愧于党于国于己于友，所以心境坦荡，自然对自己周围一切，可处之泰然（这是主要的）

～～～～～～～～～～～～～～～～～～～～～～～～～

〔54〕李一氓（1903-1990），1926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

〔55〕彭真（1902-1997），1923 年加入中共。曾任北京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1983-1988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56〕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外，我又想，你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活人，绝顶聪明充满感情的人，自然同样会碰到苦恼、愤激、悲伤的事情，你怎么应付的？经验或秘诀是什么？你读了哪些书？哪些书给你影响大？你的私人爱好、饮食起居、亲朋好友对你十一年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你和张学良「西安事变」后被软禁比较过吗？你和冯玉祥在「泰山隐居」比较过吗？和彭德怀〔57〕「庐山会议」后的处境比较过吗？和你「文革」中被流放湖南煤矿比较过吗？

八、「六四」后十一年，党和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六四」后「大换班」，中央政治局常委重组，中央对原政治局常委、委员、政府部长、省委第一把手的撤与升，「清查」，党员登记等，以及宋平在西山办反和平演变训练班，政局「极左」倒退，直到邓小平 1992 年初的南巡讲话（首钢、上海讲话）、十四大、十五大、「万言书」派活动、江泽民「5.29」讲话，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腐败——决策失误，后果、前途等等，请你谈谈对这些事件的评价。

第二部份问题（你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两年半间）

一、胡耀邦问题来龙去脉

（1）有传说，胡耀邦不正常下台中，你没有为胡说公道话。在当时，你处于优越的政治条件下，你若说话，会有作用。个别人甚至怀疑你「落井下石」，真实情况如何，请你就细节，更具体地谈谈。

（2）有可靠消息证实，胡耀邦下台是胡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当然领导不力，引起邓小平对胡的整体上的不信任，决心要胡辞职。此事已过多年了，请你详细谈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这两场不是政治运动的政治运动，其过程、原委，胡耀邦究竟对与否？这两场政治运动中，你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58〕、彭真、万里、杨尚昆的表现如何评价？

（3）传说，胡耀邦与你在当时已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反腐败、廉政、增加我体制透明度、民主与法制、新闻与监督等等」，意见一致，但在经济体制改革，尤其经济建设方面，则有分歧意见。真实情况如何？

（4）你与胡耀邦作风、性格上、私人交往上，情况如何？

（5）胡耀邦亲人、朋友现在对你还有意见吗？有几年，「扬胡批赵」，香港吵得很热，你怎么看？怎么处理的？二、你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年多，看得出你已感到我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已带来党政腐败，而且正阻挠、破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成果，为此你采取了若干重大措施，如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招揽人才，解散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

〔57〕彭德怀（1898-1978），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1955 年授予元帅军衔。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被定为「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案」首领。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
〔58〕李先念（1909-1992），1927 年加入中共。曾任财政部长、副总理。文革后曾任国家主席、政协主席、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应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者），积极制订新闻法、出版法，果断结束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加紧了其它领域里的立法。这个思路的酝酿过程与运作过程中，高层内部的分歧与斗争是什么。据说王震、李先念对你这些举动十分反感，情况如何？邓小平支持吗？其它老元帅、老国家领导人支持吗？你这么做的风险是什么？前途会怎样？三、你主政的这两年，经济工作和外交工作中，理论工作中，你有什么重大考虑，重大举措？

第三部份问题（80 高龄回顾反思中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是非非）

一、前苏联、东欧成功与失败的深层因素，你怎么看？

二、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中国有两个毛泽东：建国前的毛泽东是一个好毛泽东，建国后的毛泽东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为什么？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对中共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你怎么看？

三、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关于建党等学说的评价，哪些对？哪些错？

四、对列宁的评价。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你怎么看？

第四部份问题（赵入主中南海前五十年）

一、你说：「我以前也很左，以后痛定思痛，才改弦更张」这句沉痛的大彻大悟的话，不会是轻易脱口而出的，是你一生的哲理性总结的话。

二、粉碎「四人帮」后，你在四川搞包产到户，搞重庆国企改革试点的情况。

三、你在内蒙，口碑甚好，为什么？

四、你在广东省长期工作，成败如何评价。对广东省的土改、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怎么评价？这中间与叶剑英同志的误会，与广东地方老人的误会，至今仍在。那时，陶铸同志是省委第一书记，你是第二书记。如讲责任，自然主要在陶铸同志，你的责任是什么？

五、传说你祖坟被掘。朋友们听到传说，不便过问，真情如何？

我照本读完我的上述提问大纲后，赵紫阳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姚锡华问：

一、中央对改革开放大工程起步前，中央有没有一个总体设想？如国营企业，放权让利，承包，股份制。
二、你访朝前，常委意见一致。你在朝鲜，常委将决策告知你，你同意。回国后，你调子变了。很明显，你在朝已感到北京那个对「学潮」的看法与处置法不妥。但你又表态同意，后果会是什么？从朝回京后你为什么急转直下，你是否受到鲍彤等人谈话的影响？
三、你从朝回京，知道李鹏等将赴朝前你们预定的方针改了。为此你找邓谈，但找不到。杨尚昆找邓家人谈。邓家说，你们办，邓会支持，彭真支持，此时，你为什么不可召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一下？

此外，你为什么不与学生对话。最后你到天安门说：「晚了」，可以找学生谈话嘛！

萧洪达接着提问：
第一，开会，谈话。你是总书记有权开嘛！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决定（邓在党内拍板的地位）是个根本性问题。将邓摆在太上皇。我们应反思我体制的这种封建东西。一人执政，一句话上台下台。以我（指赵）个人名义请教你（指邓），可以，组织上这么做，错了！此会（指十三届五中全会）你说这番话时，我在座。这么大的事，你事先不与常委谈，在中央开会这么决定。这件事你要负主要责任。你这是

一种陈旧观念。十五大后，我知李鹏成立审查小组，说你「挟洋制华」。
第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清除精神污染这两个政治运动，你怎么看？你说过，经济界不做，加以限制。邓说：「自由化搞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怎么看？反自由化与精神污染，这两个概念对不对？应明确表态。
第三，耀邦与这两个问题肯定有关系。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书读得多些，不容易。另外，他没当过家，说话随便。一次会上，我提出在西藏问题上，耀邦的主张大家不同意。王震插上说，胡耀邦混蛋，那么做，岂不乱了吗？经济问题上耀邦不在行，搞得赵不好搞，胡干预太多。
我在中央纪委工作，将下边的控告信送到他（指胡）手上，他情况不明便批示，弄得我们不好办。他批的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赵不可能不对胡没有意见，这不是很自然吗？
胡与赵相处不易，俩人长短不一，地位不一。俩人相处到这样，已不易。以后邓说：「经济问题赵定。」因此，赵给胡说好话，不易；落井下石，不会。有人说赵是「政治质量」问题，更不对。
第四，你任总书记时，只管经济，不管政治。「文革」前你长期在广东工作，你抓经济，陶铸〔59〕抓政治。政治上，你管得太少。对政治，你不是搞不了，而是一种观念。
第五，为甚么那么多老同志对你不满？先是上面五十人攻你，他们中有的人保守，但你作为总书记，你做了什么工作？我以为你内心对老一辈人看不上，对中国尊老国情估计不足，天真，不懂方略，失策。

大家提问后，赵紫阳同志陆续说了以下话：

一、一个耀邦
二、一个「六四」
三、一个「十五大」
四、还有「六四」前一年。可惜，我无数据，如物价，很有些反对我的活动，邓的态度我知道些，但不清楚。社会上，活跃，大赦，魏京生〔60〕问题，方励之签名问题，我马上说不出来，想一想，理一理，可以理出来。我离京出去后，想想这一段，回京来再细说。
五、整个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内部的分歧。过去，我留下一个东西，如何用？当时，我回忆，将那几年改革开放，邓小平、陈云、我之间的关系回忆过一下的。

～～～～～～～～～～～～～～～～～～～～～～

〔59〕陶铸（1908-1969），1926 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主政广东十五年。1966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1969 年在合肥含冤病逝。
〔60〕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 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 年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1997 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61〕吴国光（1957-），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六、政治体制改革。吴国光〔61〕谈的政治体制改革观点，大多是鲍彤的想法。「可以，有材料」。
七、华国锋前后事。我还记得一些事。当时主要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对此有分歧。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说，他还年轻，勿换。
要华国锋下，陈云最坚决。陈说华国锋是造反派，「这个人不能留」。

耀邦与我、老帅不赞成陈云这个说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已讲了过去的一些问题，已录音，其它大量问题，再谈再录。

「我任总书记一年，老人们为什么便不高兴我？」

2000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

昨日，北京高温，全市 39℃，天安门广场地面 56℃，今日仍高温，说全市 36℃，实际不止。

与锡华、舒元璋先到洪达门口，然后与萧洪达一起去赵家。赵门口有两个武装警察，进门，警卫要我们把身份证交给他们，萧、舒都交了。

在赵的书房，我们说了整理录音的事，文字已整理成四万二千字（包括杨继绳整理的六千字），带子共八盘，三套，洪达交一套给赵。赵说他又录了五盘，当面交给我。赵计划去烟台，大约一个月（8 月 20 日）回京。赵说，他家老五在美国生了两个小孩，没见过爷爷奶奶，为要这两个小孙子认识一下，熟悉一下，所以到那儿去。

赵讲了以下几点：

一、我任总书记一年，老人们为什么便不高兴我了？我任总书记前，他们对我还好。主要是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陈云，李先念原以为我会较胡耀邦强硬去抓，可我没那么做。我将邓力群所把持的宣传战线班子调整、撤销，老人们很不高兴。一次，李先念竟说：「赵紫阳还会搞社会主义？」「赵紫阳学习西方的东西太多了！」

二、导正几次想要我也反思中共与国际共运根本的经验教训。开始我觉得题目太大，不好谈。那日（指 2000 年 6 月 22 日的谈话）杜（导正）来我简单地谈了一下。东方革命应该，我党领导这场革命也是客观需要，是好的。问题是这样，封建主义根基深厚、民主没有、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后，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但我们却反其道行之。中国封建主义几千年，不反封建主义，不彻底反封建，任何国外好的东西进来，都会变质！中国必须彻底反封建主义，提倡民主，当然这是长期的进步过程！马克思许多东西好，但对资本主义能够在自己框架内自我演进，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估计不足。实践证明，资本主义这么做了，且成功了！

2000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

晴空、酷暑，我温度计放在我窗口外，气温高 38℃。

上午，照约，洪达来家，我俩一起听录音。赵记忆力极好，看来我送的材料（部份）他参考了。明日再听两盘，告一段落。交明儿复制。

洪达与我谈，赵录音事如何办？我说不管发生什么，坚决搞下去，保密就是。

洪达说，照目前中央这一套思路做下去，中共绝无希望。

我说，就当局关于赵的事，我们只做回忆录，又未外发、传播，只谈经验教训，这难道也不可以吗？当局是没什么可说的。至少今天他们不会。

「（民主政治）这条路非走不可，中国当下是且战且退。」

2000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

昨晚，妞妞电话：老人望你明日下午来坐，不知有无时间？过几日你方便时亦可。我说：随叫随到。我明日下午 4 时到。

今日下午 3 时出发，小尚（我的专职司机）开车，一路顺畅，3 时 35 分到。门口两个武装警察，要我通报，我拿出离休证；莉儿（杜莉，我次女。广州中山大学法语系副教授）想见见他，随我同行，拿出中山大学教师工作证，通报，可进。我给老人带一歙砚，笔一套，墨一方，我挑逗性地故意问警卫人员「这个是否也打开查查？」他说：「勿」，进去。

紫阳在书房，穿黑色短袖上衣，下.身松紧黑裤，精神矍铄，握手。我介绍女儿，女儿对赵说：广州人民怀念你！谈话将开始，我让女儿到外边去，赵说，别，她在无妨。

今日，紫阳说：

一、已整理成的文字部份（指他的「自述回忆录」前一部份），我看了，谢谢你们！

二、断文处，原录音带无错，我校过的，可能转录时断了，漏了一些话。

三、经济部份，我又录了五盘带。

四、政治部份，内容少些，我准备录。

五、1988 年事多，我要补充。

六、你拟的提问大纲我细看了。有些问题，我可补充。

七、此件（指整理这个自述材料）志在「记录在案」，鲁迅叫「立此存照」。

八、你多次要求我谈谈我老年时对国际共运与中共运动的反思。这部份，我无把握。

我说，搞的这个录音材料，你谈了真实情况、真实想法。贵在一个「真」字，有历史价值，备今人、后人研究。此事，已做成八、九分功，应该继续记录下去，搞下去。他答：估计十五万字左右，现已七万字，再搞八万字。

他接着说了以下几点：

一、关于在朝鲜期间我的回电（指 1989 年 4 月那份电报）。我为什么在回电中同意北京发来的那个电报？我这是按老规矩办。人在国境外，我只能如此表态；

二、你们问我「六四」最紧要关头，我为什么不凭自己是总书记的合法身份，主持一次会议，利用我的权力，提出另一个解决「六四」方案？那是造反，那可真（是）要分裂党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不能那么做

这个事，我想都没想过；

三、对邓小平有无「愚忠」？我很感激邓对我的器重，1988 年，那些老人攻我那么厉害，邓力排众议，保我，找我三次谈话，甚至要我将军委工作抓过来，如此信任我，在他困难时，我会挺身而出护卫他，我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仁」？「义」？还是「报恩思想」？还是中国人的「人品」？你（指杜导正）记得，「文革」中，我（那时赵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兼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从未推卸过个人责任。我以为，一个人做人该这样！所以，有人以为我紧要关头（指「六四」）为保全我出卖邓，我感情上绝不接受。为此我很难过，感到委屈。

赵让我说对「三个代表」的看法。我说，郑必坚〔62〕一文，观点与我相近。赵说，非也！我个人以为「三个代表」是为一党专政找寻理论根据。我接着说，中国经济开放，政治专断，中枢无意改变现状，在民主政治上连一个小口子都不开，这么拖下去，会怎样？你预测呢？引出赵一段宏论：

「中国这个国家，很奇特！说不准！

「中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么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

「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

「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

「江泽民这个人，无此大手笔，只是小打小闹，应付局面而已！

「可惜中国又错过了一个发展时机！凡发达国家，都十分尊重个人创见性，才有高科技。要有创造性，国家必须发扬民主。我们呢？这么下去，你看罢，中国只能落后！中国人晦气！中国会落后的！」

下午 3 时 35 分开始谈，5 时 15 分离开。
～～～～～～～～～～～～～～～～～～～～～～～～～～～～～
〔62〕郑必坚（1932-），1952 年加入中共。曾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 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2000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急于给姚锡华、舒元璋传达赵意见。

今日凉爽，到锡华家，我传达，说录音有条理，无漏洞，只转录时出现了不衔接。锡华完全同意。

2000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

晨，在床上想，周日紫阳如此与我无话不说，分手时又一再挽留，我说估计小尚到了，他说：「没到吧！」，

恋恋不舍的意思。我想这是因为：

一、他搞一辈子政治，荣耀之至，如今门庭冷落软禁生活，内心很寂寞很难过，这时有知己来，自然高兴万分；

二、我与他四十多年交情，知根知底，庐山会后反右倾、「文革」、此次「六四」，三个大考验中，我站在正确主张一边，人品可以。我在目前位置上获得情况较萧、姚多些。当然核心是志同道合，谈得拢谈得亲切。赵目前蒙尘，当局将他撇为粪土，但我为他引我为知己感到无尚光荣。

2000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

下午，整出赵经济改革的七个带子，4 时 40 分，亲自到姚锡华家，在卧室床边交给舒元章，共 1、2、3、4、5、6、7 个带子。

下午林若到，叫我约赵会见。电话约好后，林若外出，我苦等，一直到晚上近十时打通电话。办妥。明日下午我去探望他。

对中共与国际共运的痛切反思：「中国不论搞什么，要解决专制问题。」「中国一切问题，在于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

2000 年 10 月 17 日（前后）

紫阳同志单独邀我在他书房谈了两个小时。这是我 7 月 1 日向他提出的那个提纲中请他回答的最后一部份问题，也是我几次恳请他谈的问题：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什么反思？显然他准备了一下，谈的很集中，也很有条理。我当场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蓝色笔记簿中，未记录在我正式的日记簿上，因而无确切月日记载，推算在 2000 年 10 月 17 日前后，至早在 8 月 6 日以后。

下边是这个蓝色笔记簿上的原文：

反思。中国搞社会主义好？搞什么好？主要须解决一个专制问题。不解决专制问题，什么也办不成。

中国不论搞什么，要解决专制问题。

我们要从这儿反思。

为什么这样？有很多学问。苏联，列宁搞十月革命，首先以为德国、东欧也能成功，左顾右盼，不成。于是出来一个「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后，反革命力量非常怕。列宁搞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太困难，对内需要压制，对外需要抵抗。于是列宁提出镇压，需镇压，封闭报刊，舆论一律，但列宁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斯大林前期，联共开会，少数派仍可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分歧意见，在会上散发，会上发表，讨论以后，少数服从多数后，通过决议。这样看，这个专制，是不成熟的革命带来的。不是教条主义问题，而是当时的实践需要，当时的政治需要，然后才搬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这种专制辩护。中国也如此。不是一定要学苏联，而是斗争实践需要什么。

民主有两个传统，一个直接民主，一个间接民主。顾准说：「只能间接民主，否则必然导致专制。」

这就势必联系到东方革命的问题。

东方革命有两个问题，原政权太腐败，中国封建主义代理人，非常残暴，非常落后，中国产生了革命的需要，需要革命；但中国又不具备革命的基础条件。要革命，就需一个进步的革命党。这个党领导的革命，也可能成功，但问题是，它的全部问题是，革命的党革命后怎么办？不然，孙中山为什么不同意康有为、梁启超？

不管怎么样，东方革命后，当然包括中国，必须补课，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这完全可以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避开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残酷剥削。要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节制资本、如福利社会等经验。

中国革命几十年了，仍然搞专制，该说：「此路走错了！」

为什么东方革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而又不要重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那些东西？这么就产生了一个究竟

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目前照邓小平说法，叫共同富裕。这应是一个发展过程，逐步合理化的过程。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天天在变。他们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逐步合理化。

所以不是一个先搞什么蓝图，一种设计，而是演进——改良——使社会弊端逐步消除，合理因素逐步增加。列宁说，资本主义发达了，可革命。我们先革命，再搞发达社会，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不更好？

列宁说，旧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条件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但现在北欧产生了，成长了。列宁此言不对。

国家职能，一是镇压对方，二是搞社会平衡。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就认为国家不能只讲镇压，还有一个超乎各阶级、调整各阶层利益的问题。

一个人民政权，先进政党，如欧洲社会民主党，它可以更自觉地照顾工人，当然国民负担太重，以后不得不进行调整。

我们现在的搞法是否「专制」？不受欢迎？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我过去以为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为达到民主才专政。以后提出专政是长期的，目的就是专政，那么我们革命干什么？苏联搞了七十年还是专制！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奋斗的。如集会结社的权利，这是最起码的民主。鲁迅没有被绑架。三联书店，邹韬奋，上海《大公报》、《文汇报》可以存在（那时有一千种刊物）。相比之下，我们是高度集权。改革开放前，我们当时廉洁，所以我们又能理直气壮。加上我们宗旨是为人民，当时我们那么封闭。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再说我们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
我们搞的这一套集权制度，是代表人民的，这一条就不能成立了。

所以，中国革命后，要在肃清封建主义上下功夫，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加儒家学说。

西方学说，无圣人；儒家学说有圣人，有真龙天子，老百姓听信了，出了隋炀帝——再来个李世民。西方认为无真正完人，所以要监督。中国人民要求有个好当权者，并不要求监督，所以中国搞这个民主将是一个长过程，要靠教育，要逐步搞制度改革。孙中山那时搞选举，一塌糊涂，所以，中国民主要逐步来。中国反封建启蒙没有搞多久。中国严复等一批人先觉醒，「五四」新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仿俄革命。所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对的。

东方革命是个大问题。东方爆发革命不是偶然的。因为东方国家农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尖锐，如不爆发革命，社会不能前进。这些国家反动势力强大，此时，共产党作为一个坚强的力量，领导革命，所以这种革命是对的，应该的。

现在回头看这些国家的革命，不应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是对的，但革命后，不应搞社会主义，而应改变落后状态（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更大范围调动一切因素，反封建，彻底反封建，实现经济民主化，文化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真正建立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民主国家。当然，它是先进的政党领导的，所以它应避免资本主义原始阶段那些原始积累的弊病，而应当注意扶植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的，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我们也可以搞，我们更应多搞新民主主义。所以，我们革命后，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

从头反思，我们这条路从根本上说，是我们不会搞。

再说一遍，回头看，我们夺取政权后，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肃清封建主义，搞经济，搞民主。

随着生产力发展，随着落后的东西的克服，应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这是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

中国归根结底是封建影响太多。这问题不解决，生产力不发展，封建影响不清除，我们落后的局面改变不了。

中国一切问题，是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中国反封建要下大功夫。中国这个五千年的封建主义废墟，如不打扫干净，什么好东西也会变。

中国共产党专制，为什么比东欧厉害？是中国封建土壤与苏联体制结合。苏联体制在东欧国家行不通；中国封建土壤不打扫、不清理不行。看来要几代人努力。中国民主是长期过程，孙中山看到这一点，所以搞训政。

中国的病根是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既应尊重马克思一百年前的理论，更应尊重一百年来的实践。」

2000 年 10 月 17 日（前后）

在我这个蓝色笔记簿中，继上面记录后，还有另一篇赵紫阳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反思记录，与上面所记有重复之处，但我觉得精彩之至！今照抄如下：

马克思主义有些应肯定。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好的。人总要有一个理想，理想的社会，三大差别消灭，公正合理。这还是好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露、分析是好的。马克思说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好的。马克思的这些应肯定。但是马克思对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没有定论，何时实现？怎样实现？何时代替？怎样代替？历史证实他的说法不准确。这些是个实践问题。

我们现在既应尊重马克思一百年前的理论，又要尊重一百年来的实践，更应尊重历史实践！
马克思当时未估计到，一个是资本主义在自己框架内的调整（或叫演变，或叫改良），他未估计到。

因此，对资本主义框架内产生的一种缓解矛盾的或者说符合人们理想社会模式的可能性，马克思未估计到。

列宁、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在封建主义社会中诞生，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当今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在不自觉地、悄悄地产生人们理想社会的成份，如反垄断、福利、个人所得累进税、股份制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比马恩预期的时间长久。所以，马恩那种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设想、经济危机、暴力革命未能出现，今后亦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自我完善，自我改革。

马克思如活到现在，我想他也早变了。马克思生前，两次对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预测分析，作了自我批评。马克思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在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条条在那里实现了：反垄断、股份制。

马克思主张用暴力革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问题，现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慢慢一条条解决了。如瑞典。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好的，只要原来的生产关系可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它便不会革命，毛泽东以后倒过来了，毛左。

赵同意口述录音加上两段分析为何会有八九年事件发生

200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原以为赵（紫阳）生日在 10 月 18 日，洪达说是 10 月 17 日，核实是 10 月 17 日。我安排了《炎黄春秋》社务，到紫阳家祝寿。今日我家送上一幅老伴续志先画、我题字的「壮志凌云」国画，一瓶法兰西「威士忌」，一架鲜花花篮。于华懂行，说我这花篮中心两朵「红掌」每朵便值一百六十元，还有那么多紫玫瑰，很是气派，比过去送的花篮大一半。置他书房入门处桌子上，确有「满堂生辉」之感。

洪达夫妇、星垣、锡华夫妇，我老两口，挤了一屋子人。老人面孔较今夏明显红润了些，夹克上衣，蓝色的，挺精神，梁伯琪则有些老态龙钟。

说些闲话，转入《回忆录》写作正题。

紫阳说，根据你们意见，再补充两部份：一是我从四川进京到总书记前一段；二是 1988 年，即「六四」爆发前一年。这个以前未想许多，后想「十三大」后，形势本不错，为什么会有 1989 年那么大的事发生？我想，大概是「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开心，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1988 年我提了一个「改善和改造我党思想政治工作」，这「改造」二字，许多人反对；我又提了一个党政分开；第二个是取消中央政府部门的（中共）党组，许多人不接受，困难很大，这是我预先想不到的。这就是说，「十三大」以后开始了政治改革，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党内阻力很大，进度很慢，加以腐败蔓延，物价飞涨，于是矛盾尖锐，冲突在酝酿了。我（导正）建议他将这两部份立刻录出来，他同意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呢，他仍不大赞成写，但是他再说，可以，谈谈，前几天和导正谈了大概。
今天另议说，已有三十个录音带了，整理出的文字也有十二万字了，他说文字上整理一下，变成一个集子，「立此存照」。

他还说了些人事。杨尚昆，他说：「基本是一个好人」，一生中并未受到重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最难干的嘛！「六四」中他是动摇的，想办好的。对周恩来，赵说，「文革」中，周做了许多违心的事。陶铸一次跟我说，长沙一个会议，有李井泉（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毛便散发过一个材料给他们，都是历史上周恩来的过错。他们看后，毛又收回去了！周随时可以被毛整掉，所以他毕恭毕敬，甚至到了「顺臣」程度。「文革」中许多大冤案，是周批的。所以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命令我们将周恩来所有材料一律销毁。

今日去赵处，与往日不同处：一、门口增二个警卫；二、进门收缴了我的离休证；三、书房外石榴红了，其它无变化。

「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

200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今日上午又应紫阳邀约，前往他家谈话。先记下赵与我今日谈话要点，以后补记。
一、1988 年，酝酿倒赵。李先念在上海对下级公开骂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联名上书邓小平，弹劾我。有人警告过我。「六四」不是偶然的。

二、目前政局，经济开放，政治收紧。国家形势：致富者三种人：官僚、个体私人经营者，知识分子发财，但不均、不公平，矛盾尖锐。中央不想政改，靠五种办法拖延统治：（1）依靠军警；（2）控制舆论；（3）将事件灭于萌芽中；（4）防止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让百姓处于一盘散沙中；（5）笼络救济，勿让饥民铤而走险！前途，统治延长但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可能总爆发。

三、中国统治不搞民主政体，亦不做民主政治准备，群众中没有有组织的党、团，好了，一旦乱了，会群雄割据，谁也号令不了，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会大乱一阵子的。这样，国家，尤其百姓，可就损失大了。

睡前，补上午谈话。

我一个人至赵家门口，先查证件，我交上离休证，门卫战士说：「你先等等！」一会儿，他出来说：「请」，证件扣在他手里我进去。

门口无变化，书房门紧闭。我进去，赵正坐在沙发上，他站起同我握手，面色正常，精神似比 10 月 17 日抖擞些，他穿棉背心，内紧身夹克。他说先与我谈「回忆录」事。

我说，这件事，基本办成功了，已录三十多个带子〔63〕，再录几个，这样，这段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即使是一家之言罢，也正式留下来了。目前政局下，要保护好，谨防这材料被他们没收了，毁了，这在历史上就是很大遗憾了。下一步，照你 10 月 17 日意见办。一个是，你自己再录两部份材料的带子，我与姚锡华、舒元璋先作文字整理，整理一定要原汁原味，只作文字校对整理，这材料才更可靠、更准确，更可贵！他点头称是。他说，文字多少不必考虑；又说，我想得比较多的这一段，是 1988 年，这一年很紧要。1988 年是 1989 年的酝酿期、潜伏期，1989 年整我明朗化、表面化，实际上，伏笔在 1988 年。我过去想这个少，1988 年我在台上工作很忙，顾不得想这些「背后」的事。这几年，包括我整的一些材料，也只是就事论事，没想很多。这些天，想了些，觉得 1988 年，远比我原想的复杂，微妙，值得深思。1988 年 5 月，我在政治宣传理论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老人们对我大体满意，因为在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问题上，我好似是个「中立」人物，他们容我。我 1987 年十三大上任后，将反自由化火力限制了一下；将邓力群免了，将邓力群为首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了。于是，李先念、王震认为我这个人不行。我上任时，李先念就说过：赵作总书记，我同意，但传个消息给他：他学习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我撤邓力群，解散政治研究室，他们说我做了胡耀邦想做都没有做、不敢做的事。薄一波肯定也参与了。1989 年 5 月初，我从朝鲜返京，一次到西山拜访薄一波，临别，薄一波儿子急急上来说：「我与我父亲不一致，广州建中外合资飞机工厂，我同意，我父亲不同意！」但看来，小平保我，直到 1989 年我赴朝鲜前（4 月 20 日），找小平，小平还对我说：「你回来，我们再议两届领导班子。」小平说：「军委主席，我不做了，让你做，你好工作，下一届你做一届！」又说：「此事我已与先念、王震说了，他们同意！」从此事看，1988 年 5 月前，老人们对我满意。5 月后变了，又赶我下台，但小平不同意。直到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小平要我下，这事便不可挽回了！

就当前，今后国内时局，他继续谈了一个半小时，很系统，很有逻辑，很概括，很精辟，大体是：

～～～～～～～～～～～～～～～～～

〔63〕我在《明报》刊登的《改革历程》序中说，共录十六个录音带，是记忆有误。

一、江泽民沿小平路子做，小平路子是经济开放，政治收紧，或曰经济改革开放，政治集权专制。加入世贸后，这一形势还会继续发展，即经济开放更开放，但政治更集权更专制。

二、政治集权下的经济改革，私有化，官僚资本主义，受不到制约。无法可依，因此，只顾发展速度，而不讲公平，不讲平等。目前三部份人急速致富，一是官僚，凭手中政治权力，谋私利发财；二是私营企业家，个体户钻国家政策、法规空子致富；三是一批知识分子，凭科技凭知识致富，一个大学教授，讲一课几百几千元。

三、这种形势下，正确出路在加速政体改革，将民营化纳入轨道，大家在法律（公平）范围内竞争致富，腐败问题自然亦可解决。但中央现方针，是一靠军警；二靠舆论一律；三靠迅速调动军警压制，所谓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四不准人民组织起来，任何组织都不准存在，不让政党活动，让老百姓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又不关心国家大事，只顾个人发财；五是救济，照顾生活，大家生活过得去，免得饥民铤而走险。

四、江泽民心中只想维持中共统治，所谓「红色政权勿在我们手中丢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样，有这么几条，这个政权我以为能拖多年，矛盾一日日积累，但历史要前进，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有朝一日总爆发，

这种爆发，破坏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后，军阀割据。（我插嘴说「群雄并起」）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但这条路子，江泽民肯定不敢走，不愿走的。

紫阳又说：中国知识分子现分三派：一、「万言书」派，压根儿反对改革开放；二、难免论派，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是转型期（过渡期）难免的，不必惊慌！三、是打劫派。赵原话是「财富重新分配派」。即乘改革机会，掠夺国家、人民财富，据为己有。

紫阳说，1988 年潜在倒赵事，李锐可能知道些。你方便时，可找他当面谈谈，帮我回忆一下。紫阳说苏哈托统治印度尼西亚，经济也不能说发展不快，人民也受益了的。一个金融危机，哗啦啦倒了。印度尼西亚无强大反对党，所以，瓦希德上台，很困难，乱哄哄的，还会乱下去。中国亦然，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

「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可能导致革命。」

200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昨晚，赵夫人梁伯琪又来电话：「老人想见见你，一个月没有见了，你明天上午能来吗？」我诺。今早不足 10 时，我到。门口两位解放军值勤，我递上名片，进去。紫阳穿黄白色棉背心，似红胖了些。我说了广州行，引出他一番话来，大意如下：

一、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么做，不会产生今日这么多下岗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

二、对国家政局，江是且战且退。江不是观念上有新觉悟，而是在老一套观念下，迫于形势，国内外的推动下，不退不行。譬如打仗，打不过，退一步；新筑防线再打，又打不过，又退；又筑防线再打，再退。（步步为营）如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也是这样。这么改，这么退，使国家失去许多珍贵的机会！真可惜啊！

三、所以，对时局我不看好！我是悲观的！这么下去，会引发一场动乱的。

四、邹俞（曾任中共广东省地委书记、国家司法部部长）此人，人好，但一贯左。那日来我这儿，说了一通东欧、苏联败在戈尔巴乔夫手中，对戈愤怒透了，说他这篇讲话在一个什么会上，得到老人们的欢迎。他给我讲时很兴奋，想得到我的同情，我不说话，他才收敛了些。

五、我在 1988 年的事，可以写，可惜手头材料少。政体改革部份，我关心。经济体制改革，大家知道，我那些材料似乎不新鲜！我改了一部份。这份文稿保存好，影印一两套你们改，要自己人搞即可，不会传出去。

他计划月底往宁波休闲一时。

赵紫阳分析中国当前的几种思潮，说新左派值得注意。

200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

今日是高效率的一天。

晨，与明儿搭小尚的车去紫阳处。姚锡华感冒了，去不成，舒元璋陪他，也不去了。去花店买一束百合花，路上清静，到时，萧洪达正到。

赵在书房等候。又胖又红润了些，先一一握手，我介绍了我的小女儿明明。赵说：早听说你有位漂亮的千金！是这个罢？他问了年龄，说：「30 岁样儿，比妞妞长得年轻！」说起养病养神，他说了一通中国有古典含义的普通话，如「放心」二字，心放下，就什么事好办了；说「提心吊胆」，「文革」初受冲击时，不知怎么回事，心提到胸口了，愁得太难受，真正是提心吊胆。然后话题转到当前政局。他说：

一、中国当前有几种思潮？一种新左派，年轻人居多，美国留学生居多，反帝，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极黑暗，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不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行。怎么办？主张集权，建设国家，民族独立！老左派不行了，无市场，这个新生左派值得注意，你们可研究一下。

二、对国家政局，我看透了，看死了，不会变的。

三、因此，人民现在一个盼望清官，一个盼望陈胜、吴广。

四、现在这一套，贫苦人民一面，照顾太少，财产被掠夺，贫富悬殊；

五、对前途我不看好；

六、有搞「文革」的可能。反法轮功，那样的做法，不是「文革」式，又是什么？定一个调子，批、斗。

当局又取消赵紫阳的会客权

（从 2001 年 6 月至 2004 年 9 月）

200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昨晚一梦，随赵到一村去。遇一老年农民无限同情赵，老农写一纸，送赵二十元人民币，纸上充满同情之句。赵与我看完，眼睛湿润了。

想来，与赵一起下乡搞调研、搞「四清」、搞「蹲点」的陈年往事，还是经常在脑中浮现，即使白天意识不到，夜晚也会顽强地潜入梦境，又跟他当下蒙受的冤屈纠缠在一起。

200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昨日，我向洪达表示，春节了，要千方百计去探视紫阳。洪达说，我从广州回京后联系过，答：「外地部长以上干部可会见。北京的，不能。锡华（副部长级）能来，」我再表示想去，洪达说，看来很难。

春节，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家人团聚，朋友互访，人之常情。连这也要剥夺，还谈什么「祥和」？用这种手段换来的安定会是真的吗？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跟北京外地，跟行政级别有什么关系？这算什么执政能力！

2002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

昨晚，洪达电话。说：杜星垣告他，已有紫阳回京的信息。我说，我们想看望他，恐怕仍然很难。他说，是的，以后再说罢。

八旬老人，到了晚年了，还要受这份孤独寂寞的煎熬，真可怜。

200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

昨晚洪达来电话说：「我挂电话给梁伯琪，梁把电话机转交赵，赵说：『身体好。一星期打两次球』。赵说：『萧洪达、杜星垣、杜导正不能来；姚锡华可以。』我说：『锡华出院后，你俩先谈谈，可否？不勉强！有了消息告我。』」洪达接着对我说，张学良被软禁时，仍能在周围十五里内活动，可以会客。我们这么对赵，是干什么啊！

王玉茹（原《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夫人）明日去看妞妞，谈拍卖国画事。我托她给赵带去四册香港杂志，内夹一份朱镕基的「检讨」。

身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居然要从港澳报刊获得一点真实信息，这种「特色」要维持到何年何月呀！赵的闭塞、清苦更甚于我等。送去一点外面的声音和我们这个圈子尽可能找到的「内参」，多少满足一点他对政局的关切和对老朋友的思念吧！

200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

赵处送来一纸箱「增城荔枝」（广东省增城县历朝历代的贡品）。赵先送三盒到洪达处，再托洪达转来我、

锡华各一盒。老人想念老下级呀！

增城荔枝以肉厚、肉细、核小、汁多、清甜可口著称，今日品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当年在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下在广东工作的日日夜夜，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两位卓越的党内老干部，竟然有如此相似的结局。陶铸，「文革」中被迫害死于安徽。我们的党怎么啦？叫人心寒呐！

200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

上午，应邀去杜星垣家，洪达来了。我说了些时局方面的话，洪达对当局如此监控赵，很愤怒。说：「什么玩意儿呀！」我将上个月洪达与紫阳同志电话里约好的，等锡华病好些后一块去看望赵又说了一遍。

2002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

洪达晨电话：赵好好的，一周打三次球。昨日徐孔（我的老战友，作家，《炎黄春秋》副社长）说，友人在天安门见到游人，说赵死亡，中央五不准：不准发讣告、不准举行告别仪式、不准播新闻，我当场就对徐说是谣传。后把这社会上的传言告诉洪达，洪达问了妞妞，今晨给我以上电话。

不断流传赵去世的谣言，特别是所谓「五不准」，无非反映了群众对领导了改革开放的老干部的一种关切和惦念。说到底，反映了对「六四」一案不服、不平的社会心理。也该让当局者知道知道群众的呼声！但是，恐怕越是这样，上边越不肯给紫阳同志宽松的待遇了！

消息是假的，一次次传播却不能不触动我。紫阳同志被他们屈枉了，但他一天也没有放弃真理，在不屈不挠地为真理而斗争，如何把这个倔强的人格记录下来、传于后世呢？责任，在我们这些老党员、老战士身上！

200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

今日整理有关赵的日记。先挑好十册，又选出若干册。前十册下午交舒元璋同志带去。给她之前又翻了一下，满意。我请她一字字誊出。我越翻，越觉得此事重大，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对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物、伟大事件负责。自然，我作为个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第二批日记放客厅靠西墙的木柜下皮箱内，还有一些放我卧室三层铁柜，有了空还要查一查。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记录这段历史，记录我党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这任务也交到了我手上，我没有权利让她烟消云散。从长处说，这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文革」封建法西斯强权政治作斗争的延续。我和几个老人的工作，就是要让子孙后代知道，我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这样违反党章、践踏宪法法律的行径在有组织有系统地实施。让这铁一般的事实变成白纸黑字，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日。

2002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

洪达来电话，赵 10 月 17 日生日，说我们现在仍无法去探望。我们只能默默地祝赵愉快罢！

200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

洪达电话：10 月 17 日赵生日。前几天于华与梁伯琪约好，前日送

去祝贺赵生日花篮，可不让于华进门，只能送至门口，由赵处警卫接走了。连我的司机也不让进门。「他

妈的！」洪达气愤地说：「我不为个人叹气！为我们党叹气！这么害怕一个人，这是干嘛呢！」

200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星期四）

送赵花篮。

晨 9 时半。两个花篮，我一，舒元璋一，非常大方、漂亮、高贵。送到门口，捺门铃，一军人出，通报，要了我的证件，一会儿出来，拿去花篮，带进去，但不让我们人进去。

200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昨日盛传赵在杭州远走了。慌给志华电话，答昨晚还好好的。又是虚惊一场。

20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

洪达电话：赵在杭州一切好，身体也还好。

2003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

上午洪达来电话说：「我去看了梁伯琪，她好像呆了！我坐了一会儿，她才认出我来」。又说，「赵 7 日回京，」「中纪委一负责人来我家说，现在像『文革』时一样的紧张。」

看来台上台下都有一批干部不满意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位上而不惧怕红色恐怖，是良知未泯的好同志，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多数，只是说话分亲疏分场合罢了。那些逼着别人讲假话的人，自己未必能得到多少安稳的感觉。

2003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

赵处送来「龙井」茶。

2003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

下午 4 时，志华准时到我家。说赵心情尚好，肺部历来不好，但自我感觉还好。近来打高尔夫球、练字、看书；梁伯琪 85 岁，四次脑血栓，头脑不太清楚了。我托志华向赵转达洪达与我想拜访赵的意思。又托他给赵带去香港的香烟一条，今年 1－9 期《炎黄春秋》杂志，还有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的《王力反思录》上下册，标价港币二百元。

2003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

下午，林若来家说：与赵处电话，想拜望赵，妞妞回话说，现不行，不能来，以后再说。

200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

筹划几日。今日上午，舒元璋代我与姚锡华两家到赵紫阳老人处送上一大大的花篮，向他 84 岁华诞表示祝贺。晚妞妞来电话：「花收到了，老人很高兴，托我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

200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晚 10 时不到，妞妞与志华开车来坐。约一小时。我询问了赵身体状况，说不错。我口述了中央内部争论的一些情况，说了「三点水」的要害，然后带上《晚年周恩来》一册，内参九份，《炎黄春秋》四册，另林若托我转交的冬虫草一盒，我另赠冬虫草一盒，尽了一份心意，心里踏实，晚上静静地睡了一觉。

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带交我女儿秘密带往香港，存入保险箱

2003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这几年帮助赵口述的录音带，先是藏在赵、萧、杜三家，后萧一份交姚锡华家存。万一谁被抄家，总能存一份在人间。我家的一份，由于我负责总领录音带操作，最全。但我日夜总担心，万一被抄家，怎么办？接受「文革」的教训，我想过许多办法。但越是担心，越不放心。这一段藏我卧室，过一段转到幼女卧室。最后又藏到幼女置内衣的衣柜内，将录音带与文稿用她的内衣包裹起来，但是这还是不可靠。于是下決心交幼女带到香港去，存到香港保险柜里，这就万无一失了。这样，国内政局如动荡，抄家、没收、监禁，我都不怕了。对得起老人，对得起良心，可完成平生一件大事。今日下了决心。

2003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

上午将赵与索尔兹伯里中南海谈话抄好，八千字极精彩！放在客厅柜中。

明儿今日下午带全套录音带到香港去。我又非常担心明儿过海关时出事，那就全坏了！一直悬着一颗心。晚 10 时明儿来电话，她说：「过海关时她紧张得够呛，心都跳到嗓子眼了，而脸上居然能坦坦然然，没有被搜查行李。过了海关到了香港，轻松多了。现已平平安安到了香港宿舍，明日上午就到香港某保险单位，将东西存好。」明儿还是粗中有细很周到呢！
我踏实了。至此，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总算告一段落。

2004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

昨日下午给妞妞电话接通了。她说老人身体好，向大家问候！我请她转达我全家对老人的祈祷！

2004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

下午，与舒元璋、明儿看望萧洪达、杜星垣。

杜星垣说：江泽民刚到北京时，我见他两次。其中一次他说，「赵的问题会解决的。」

星垣说，据我知：一、王任重是「六四」后赵紫阳审查小组负责人，审查结果是赵与天安门等事件无关，但这个结果一直不向全社会公布；二、王任重说，张国焘是要消灭毛泽东，毛仍让张国焘当中央委员；三、王任重建议给赵一个好的结局。星垣说，我准备先与贾庆林谈谈，如贾有松动，我再与江泽民谈。

我与洪达说，洪达曾与星垣商量以我俩的名义上书，给赵大些的活动余地。

2004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下午去张根生处，他说：我昨日去了赵处，赵身体还可以。肺部纤维化，说话吃力。赵说中国胡锦涛、温家宝是好人。但中国更需办事果断、有能力人，不然局面扭转不了。

田纪云说：「中国的体制，只能培养两种人，两面派和专制者。」

2004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

下午 6 时 20 分到永安宾馆二号楼。田纪云早在那儿了。我坐在他左侧的沙发上，方实、徐孔、杨继绳、吴思〔64〕坐定，我幼女杜明明陪坐。第一次面对面与田近距离谈话，没料到田谈起来可说毫无顾忌，没遮没拦敞开心胸。田对我如亲人，双方距离一下子接近。他饭前谈 40 分钟，饭时又滔滔不绝谈了一个多小时，别人几乎插不上嘴。

他涉及的话题极多。要点是：

一、关于赵紫阳。保健处（中央的）说，赵的肺已纤维化，功能很差了，什么药也不济了。很可悲的；外传我给胡锦涛写信，请中央放宽赵活动空间事。事实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去了北京医院院长办公室，说，我今年 75 岁了，赵大我十岁，85 岁了。请让我见他一面，我想看看他。赵回话：你不来为宜！赵给胡锦涛一函，请求多给会客权，或者定下来什么人能见，什么人不能见，内定单子也可以。胡收信后未覆！

二、关于我（田）「六四」后在高级党校那个报告，在许多干部中引起轰动。李先念、王震为此要整我。我将我在党校的那个报告录音带，托邓小平家人带给邓。结果，我的观点与邓一模一样。只多一点解释而已。邓以后说，「田纪云是个干工作的人，没有什么」。这才保住了我这个政治局委员！我现在关心政治，但不参政！我写可以发表的文章。除纪念小平一篇外，我要写回忆耀邦的。还有许多材料，只有我们那个圈里的人才知道的情况，应该留下来，我写不写呢？拿不定主意！（我与方实劝他无论如何要写下，藏起来。）临行，告别时，我对他悄悄说：「赵的材料，我们帮他录了音，已整理了几万字！」他又说，保重身体！我每周两次打高尔夫球。

～～～～～～～～～～～～～～～～～～～～～

〔64〕吴思，《潜规则》作者，现任《炎黄春秋》常务社长。

三、关于邓小平和胡耀邦。小平是时代巨人，有巨大功劳。一次会上，邓说政治局常委可由大家选举，只前边七个得票数多的当选，中央都不要提什么候选人！多好的设想啊！由于左派们反对那样搞，小平的设想无法实现，于是赵紫阳提出「轮值」的想法。「轮值」可以废除一人专制，以后搞差额选举，也好啊。可惜邓小平一是权力稳固后，不愿搞政治改革了；另一个，两次被「学潮」冲击，邓怕乱，不敢搞了。至于胡耀邦，这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很好的，很应该纪念的。

四、关于胡、温。胡是明白人，温很好。有一个力量想反他俩，不行。国内外舆论站在胡、温一边。

五、中国的问题在体制。这种体制下，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两面派和专制者。两面派，非如此不可，不然不能生存，不要说升迁了，而一旦到了第一把手位置，有了权力又巩固住了，就要专制，就不知所以然了！如能民主些，平和些、朴素些就已经算非常好了。

六、中国现在是说假话，两面派。我接触的现任几位省委书记，工作场合谈一套，就是官面上一套，私下里跟我当面谈又是另一套。会议刚刚开完，他一出门，跟我说悄悄话，他的观点与我的一模一样，有的还激动地掉泪！这时他们说的是人话、真话！

七、李慎之、李锐是说真话的好人，很难得的！杜润生、于光远，我敬重。过一段我去看望杜老！

八、关于《炎黄春秋》。这刊物说了真话，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部个人订户掏自己腰包，十几年办下来，很不容易！要说真话又要「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分寸。我继续写文章给你们。我支持你们。

今日谈话，类似赵处，他毫无顾忌，高谈阔论。回想起二十年前赵从四川调他回北京任要职，我对赵还有意见，提醒赵：妥不妥？「六四」后，田纪云一句「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海南岛说的；另一个

他在高级党校一个报告，针对批赵反邓高潮，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我听到后拍案叫绝，索来他报告录音，我复制几盘，送给我几位老友。从此我、洪达把他引为同道，内心敬重他！今日与我畅谈心事，果然是一个有识之士，胆识俱佳！只要这批人在，中共不会亡！中共可喜的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他是其中一位。

赵紫阳病重，仍然禁会客

2004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

晚 8 时整，志华来，我与舒元璋接他。我送上几本香港杂志，鲍彤回忆录，一瓶洋酒。我说：「无法看望赵，请你面告他，一份录音带已存安全的地方。」志华说：赵肺部纤维化；肺下部是紫色，上部好些，多气泡；呼吸困难。他瘦了，运动少了，过去打高尔夫球，这半年来不能打了。前十天左右，中办一副主任等三人来坐，后二人不说话，那副主任问候几句。赵说，我会客自由权都没有了，没有道理。就依你们，我不发表不同意见，但我是中共正式党员，我是中国公民，现在你们讲法治，我为什么不能够会客。对方说，我们将你意见一定转上。说你身边秘书将你类似意见也说过，我们回去后将此意见向上级汇报。

志华说，京外熟人张根生、吴南生〔65〕来过，外地的可以来。但北京的不行。

与赵紫阳的最后一次会面

2004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昨日晨 8 时许，紫阳同志女婿志华来电话说：「昨日（10 日）上午，安志文〔66〕老人来家看紫阳同志了。不知怎么搞的！客人来赵处的管制是否松动了些！安志文既能来，赵便产生了一线希望，给管理人员提出请你来的申请。已提了。估计，你能来。你听候消息。今晚，我若不给你电话，那就是成功了。你明早 9 时，在你大院南门口等我，我驾车去接你。」

9 月 1 日晚 8 时，我与舒元璋同志，已在我们宿舍院南路东拐角处一茶楼，与志华碰过一次面。我有些信息面告了志华，请他转告赵。我执意打听了赵的健康状况。几年来，国内外一直热心地关注着赵的处境、赵的健康。我于是写了「赵紫阳肺病，两种说法」一小文，发给香港《东方日报》「龙门阵」。不日，小女明儿香港来电话说，这小文已见报了，很多人来信呢。这一次我带给赵三本《炎黄春秋》，三本新近香港的厚书。另一瓶法兰西名牌洋酒。我知道，赵这几年已不敢近酒了。但出于一种敬意，还是送上了。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今早从被窝爬出，着普通便衣，只带上照相机、手机，又带一笔记簿一枝钢笔。一想，又带上了离休证、居民身份证。别的，担心在赵门口发生枝节，什么都不宜带的。待我走到大院南门口，志华已在门口等了。

开车约二十几分钟，顺利到达富强胡同六号院赵宅。熟悉的大门洞，通报，两个小战士开门，询问，志华代答，姓杜，战士答：知道。顺顺当当，平平安安进到了赵的大书房。

书房与内院门楼之间，有处狭长的小院落。还是旧日那两株石榴，叶儿密密麻麻的，少许的叶儿微黄了，可那果实，一串串的，个头很大。

进入赵的大书房，赵从黑色大沙发上敏捷地站起来，向门口走来握手。我面对许久许久不曾见到的老人，这熟悉的面孔，这眼睛还亮晶晶的面孔，一时激动，嘴里不知说什么好。他与我紧紧握着手。说：「好不容易，又见面了。」他面上戴着吸氧器，坐下；我坐沙发。那沙发远些，我拉来一只木椅坐下。我这时定下神来了。说：「不能见面两年啦！『十六大』到今日两年啦！」他说：「不对！两年三个月啦！人家不让我们见啊，等啊等啊，今日这不又见面了！」说到此处，老人感情有些控制不住，双眼沁出泪水。那吸氧气橡皮管架在鼻梁上，泪水滴在鼻翼上，他用手扶了扶氧气管，用手拭泪。

我说，静一静，静一静，慢慢说，有的是时间。

～～～～～～～～～～～～～～～～～～～～～～～～～～～～～～

〔65〕吴南生（1922-），1937 年加入中共。1975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79 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1985 年后，当选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66〕安志文（1919-），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 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抬眼看这书房，装修过了。顶棚，前几年，粉沫跌落，被蜘蛛网丝缠着挂在天花板上，摇摇荡荡的。今日，天花板是方砖式白色涂料板。再看地板，也已在原地板上修饰过，紫红色的，新漆了一遍。那硕大的读书

桌是老的，那赵一直坐着的黑皮大沙发是老的，占满东壁一墙的书架和图书也是老的。电视机新换了。他说，「今年 5 月份，整修房子时，那台老式的电视机不知怎的损坏了，这台新颖，但不及老的好用。」这偌大书房，还是旧日气氛，冷冷清清，静静的。就这么一块地方，一位老人终日待在这儿。志华说，「爸爸近年身体弱了，可生活习惯不变。早餐后从内院来到这儿读读书报，看看电视。午餐午睡后又来到这儿。这是他唯一的一块活动天地。」

我细细端详隔了两年多的他，身体、精神有什么变化？两年来，外界风传他肺部坏死，患了肺癌，几次说他已亡故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赵紫阳究竟身体怎样？眼前，赵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两眼炯炯有神，面色红润，谈吐有力，用语准确，只明显地瘦削了。他自己说，两年体重减了十几斤。细看那双手，很瘦很瘦了。

我说，「老朋友们时时非常地挂心你的身体。半年来，萧洪达两次伤感地跟我说，这一辈子难道再看不到赵一面了？」9 月 1 日，我从甘肃省敦煌回来，次日，听说萧洪达病重住院。我急忙忙去探望，他躺在三○五医院病床上，也是鼻孔里安装了吸氧气胶皮管。身体很弱了。说二十天前，肺心脑衰竭，差点走了，抢救回来了。他轻轻地一字字吃力地询问赵的身体。我将志华转告的说给他听。他说，赵，85 岁，我 86 岁，双方又都病成这样，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临终见个面呢?!杜润生老人，在今年 8 月 24 日晚东交民巷饭店应田纪云邀，出席田设的便餐时，头一句话也是向田说：请你多关照关照老赵啊。我简要说了老朋友们关切之情的话后，急切地对赵说：「还是先谈谈你的健康状况罢！」

赵说，「我还是先说说，你今天怎么能来会面，再说我的病情不迟。」

紫阳说，「其实不是『十六大』前，而是 2002 年夏那本《天安门真相》书出版后，当局并不说明什么，便将我会见老朋友的权利取消了。我曾正式上递过一个报告，提出一个想会见的三个人的名单，有赵健民，有萧洪达，有你。几天后，对方明确答：不行。这一拖，拖了两年多。这中间，我向身边的秘书，参谋（他们派来的），也几次提出，我年事这么高了，身体又一日不如一日，说不定，那天就要走了。我想见见老朋友。老朋友也很想见见我。按道理说，就按你们说的我支持动乱分裂党，那也是认识问题，是所谓错误。我还是中共正式党员嘛，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嘛，为什么就不能会客了呢？你们天天说我们强调法制，是法制国家，那么凭什么不许我会客呢？这些意见，估计如实地上报了。但如预料的那样，没有回音。今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一位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一位中直党委副书记，来看我。只那副主任说了几句客气话，另两位什么话没说。我又重申了我希望会客的愿望，重申了我有会客的公民权利。我说，如再不给我会客，那你们在历史上必将承担「终身监禁」的责任。我还不高兴地说，我几次提出会客愿望的报告，为什么一直不回答。那副主任先替派来我身边的人开脱，说他们将你的意见如实上报了。这事不怪他们。又说，我们回机关，会将你的意见上报。」

赵说话一口气，还是那样宏亮，那样抑扬顿挫，带着感情色彩。知他呼吸困难，我与志华请他喝口茶，休息休息再说。

我乘机照相。志华、妞妞与赵，我与赵，赵单独的，都拍了几张。给他拍照时，他将鼻内的吸氧胶皮管摘下。

赵说：「上星期五，安志文到我书房来了，来之前，自然电话报告。说，听说赵身体不行了，作为老朋友，我是一定要到赵住宅亲眼见见赵的。口气很硬。这儿管制人员报上去，上边同意了。星期五上午，他果然来了。」我说，「安志文大约八十八、九岁了罢。」赵说，「差不离。身体不错，但聋得厉害，我得大声说话。」志华说，「爸爸那天简直像叫喊一样地同他说了一个半小时。」赵说，「安志文那天是有备而来。他有许多考虑很久的想法，想向我说说，听听我的意见。」

赵说：「同意安志文来，这是一个形象。这几年，外地朋友可以来，好像不那么严格。所以广东的吴南生、张根生来了。北京的，部长以上的不能来。这次安志文来了，我想，你们几个老朋友，也许能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情，给他们提出请你来的意见。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可以。所以，你今天果然来了！」

说到今后能否恢复他的会客权，恢复到「十六大」前那状况？即北京的部长级老朋友，可上门探访他？赵说，「这现在还说不准。此外，他们绝不会说，以前不准，今后准了。也可能就这么马马虎虎地，半推半就地，逐步增大我的会客权。我现在是很想见见老朋友，说说话。当然，一切都想开了，就是不准见，再不准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无所谓！」
然后，话题着重转入他的健康状况。

赵说：「我这肺部的毛病，1992 年时，医生就说有了。医生说我肺部纤维化。我有咳嗽的症状。以后多年，医生说我肺纤维化渐重，有时又说看片子很严重，可见到我的样子，我说话走路，又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前年冬，我去贵州省休养，那儿海拔一千三百米，我不觉得什么，照样打高尔夫球。几次感到气不够，球还照打。以后，要回北京。北京闹『非典』，我转到山东威海，仍坚持打球，坚持散步。后来忽然患感冒，气力不足，精神差了，住了七、八天医院，好转后才回到北京。今年 2 月，又感冒了一次，来得好快，高温到 38℃，到医院去，走不动了，要人搀着走，住院，打点滴，医生查体，说没有炎症，仍是肺纤维化，肺气肿，但没有波及到心脏、肝脏、肾脏，说别的器官尚好。病好了，出了院。但体质差了，弱了。今年 4 月又感染一次，查肺，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是感冒。西医说是肺纤维化兼肺气肿，只能靠补气维持。西药无能为力，要我一日二十四小时靠氧气瓶供氧，说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以后，崔月犁（原卫生部部长）同志说，他认识几位名中医。中医来了说，可以治疗。开了药方，我吃几副中药，好似转好了些。」志华从旁补充说：「爸爸的肺病，中医说有办法治，好转的可能性很大。」

赵则说，不再发展就好了。然后连连说：「无所谓！一切无所谓！」「现在的我是一切都可接受，没有什么不可接受！」

赵也许觉察刚才连说几句无所谓的话，太伤感了些，转口说，「我这肺部病带来的困难，我想不会长期的。会逐渐好些的。」又说，「过一段好些，我希望能到洪达家看望看望他。」我说，「哪里，哪里，洪达病情稳定后，他一定会到你这儿问候的。」

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说话，不觉已上午 10 时半了。本来，他今日会说说对国是的看法的。他一贯如此。他几位老下级、老朋友，两年多都不能见面。近日管制稍稍松动，他便申请第一个名单，叫我前来，我想，也是望我记录他对国是的主张。几位老朋友，他以为志同道合，政治观点一致，政治上人品上可以信赖，这一条，萧洪达在他心目中比我更看重。但我较洪达年轻，记忆能力写作能力强些，再加上在北京交游广。我知道的国内外大事，比洪达多些。所以今日先邀我谈，目的在此。但今日双方被一种自然的感情驱驶罢，竟来不及按谈话内容的缓急安排了。谈了一个多小时，都是赵的病情，赵的会客权，将他对国是的看法拖到以后了。当然，病情和会客权二事也是大事。

于是，我说：「紫阳同志，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来不及谈大局了。过一段，我再来，你再谈。为避免万一，或者你先录个音，将你的意见录了下来。」他未置可否。我想，过一段，我一定会来的。

他先请我谈对国内外大局的看法，我说了。尔后，他说，「我现在密切注意曾庆红〔67〕的动向。」

他说，「这时期发生几件事。一个是一位姓吴的新权威主义者，『六四』被抓，以后去了美国，写了《中南海纪事》。是著名的不同政见者，是我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这样的人物，照这些年老规矩是不允许回到国内的。但是，他回来了。据说是通过曾庆红批准或授意才回来的。所以吴说，曾庆红开明，对人有担待。还有《天安门真相》作者张良，现在也容忍。张良说：『他（指曾庆红）对中国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

近时，鲍彤也从北京郊区迁到城里来了，据说这也是曾庆红同意才能办成的。赵说，因此看，曾庆红这个人看来想办一些实事。」我说，「江泽民主政十几年，一些重大举措，据说是曾庆红出的点子。有好点子，也有坏点子。应该说曾庆红有功，但吹捧江泽民，搞江泽民的个人迷信，不好。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仍是树立猢狲聚，树倒猢狲散。曾庆红这个人，会有他的看法，因此我以为他是一个动态型人物。」赵听我一番议论后说，不！不！说：「我原也以为他这么做，是想捞政治资本。现在看不这么简单，他人很聪明，又熟悉中共高层内部运作情况。他父亲曾山（建国初任内政部部长）、母邓六金（老共产党员）。曾庆红这种人，必然考虑身后，历史、人民怎么样评价他！看来，他想留一个开明的形象！」

快到 12 时了。赵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

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近 12 时了，我担心他劳累，我告退。他送我到书房门口，拿出他原先已准备好的两盒月饼，要我收下。另一包，也是两盒，让我转送给姚锡华。

我顺脚进了里院。这里院北房、东西陪房，一概刚刚修缮过，红红的，绿绿的，增添了几分喜气。妞妞陪我进北屋客厅，赵的夫人梁伯琪老人端坐在一只米黄色布沙发上。面色不错。妞妞说，妈妈有时脑筋胡涂，有时清醒。我说了问候的话，她两眼直楞楞的。妞妞说，妈妈两眼失明了。

我到紫阳卧室看了看。比前几年整洁了，但药瓶子散放几处，难免带给人萧瑟的感觉。
下次再来罢，听他纵论国家大事。
～～～～～～～～～～～～～～～～
〔67〕曾庆红（1939-），1960 年加入中共。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2002 年至 2007 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200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

给舒元璋电话，嘱她代洪达一家、我一家、锡华一家，周日（10 月 17 日）到赵处送上花篮，祝贺老人 85 岁大寿。

幼女明明在家。她正好有个采访赵紫阳的提纲，并已经提前一周给了妞妞、志华。赵亦答应了采访，明儿欣喜与舒元璋前去赵家。

他们买了一盆澳洲松盆景，明儿自己还买了一个花篮，表达她自己对老人的景仰之意。

2004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

下午去探萧洪达，他病情好转、脉象好，于华在榻侧说：「每日打四种营养药，一瓶几百元，见好！」我、舒元璋、明儿说了 10 月 17 日给赵生日送盆景事，说赵一切好。以后我说了一些政局大事。萧说：「我很悲观！悲观！」此外，他说，「如此行径，如法西斯，我们几个人恐被当局作更严厉的处理！」听后稍感意外。

200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

晚，接志华电话，报告紫阳近况：「老人已稳定了，无危险，能吃饭！」估计十天半月后出院！

老同志上书胡锦涛，要求给赵紫阳会客权，胡批了三点。

200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去田纪云处面聚。杜润生到，杜说：「近一周一老同志通过王兆国转胡锦涛一函，请求给赵紫阳同志会客权。胡批三条：一、这个问题要解决；二、不要急；三、慢慢来。」

200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王雁南（妞妞）处讯：「病情通报：我父亲（赵紫阳）1 月 14 日晚休克，经抢救，仍昏迷。亲朋勿来探视。」

我一家人正在广州，心里为他祈祷！

2005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北京传话过来：现赵危险，深度昏迷。林若说到我处，说杜瑞芝也马上来。我晚住广州小岛招待所（珠岛宾馆）5 号楼，6 号楼住李锐。我与林若、杜瑞芝在我住处谈赵的后事。约好明日接着谈。后，我三人到李锐处，吴南生在，说些共同话语。

赵紫阳去世，中央电视台一字未播。

2005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大事不好！晨 7 时 10 分，明儿北京电话：「赵今晨走了！」我连续接田纪云电话，证实了！
一会儿，张根生也来电话。通告林若、杜瑞芝。

我嘱明儿想尽办法联络妞妞，到赵家去协办后事。

与林若、吴南生、张根生、杜瑞芝在我房间议赵的后事。议两小时许。初议：一、形势：当局不会隆重悼念；二、当局定严加管制；三、我们作为赵的老朋友、老下级，可自行组织松散的非正规的悼念和纪念活动；四、我讲两步走：第一步，临时悼念活动；第二步，出赵紫阳纪念文集、赵紫阳传、赵紫阳年表、赵紫阳文集、赵紫阳影集。

传来北京中央内部批示：一、赵紫阳长期工作有贡献；二、「六四」中有关赵错误的中央决定正确；三、由赵治丧小组处理治丧活动。任何地方不得另行悼念；四、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挑动。

在杜瑞芝院一房，放赵紫阳照片，挂黑纱，上悬吴南生一副「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横幅。我一家去一见照片，我控制不住自己流下眼泪，说「我们看你来了！」三鞠躬。除杜瑞芝外，陆续来此参加悼念的有吴南生、林若、李锐等十几人。

北京电话：曾庆红今早 5 时 40 分，去看望了赵，同往的有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

晚 7 时，我屏息听中央电视台如何发布赵逝世消息。一字未播！太令人失望！

晚 10 时，听贝贝（我三女儿杜星星的女儿）在纽约电话里读美国十二大报对赵的评价。

200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

晨，方实电话，方、徐孔、徐庆全（《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等人，昨天中午去了赵院。有李普女儿李欲晓、我的女儿明明在帮妞妞张罗后事，已将书房布置为简单的灵堂，几个花圈挽幛、子女们的挽联。

妞妞与我通话，说哥哥们（赵的男孩）也回来了。

白日，我要孩子们到街上复制了十幅放大的紫阳彩色照片，分送朋友。在宾馆我卧室客厅正墙挂上一幅。晚，我、老伴与我在广州的全家 12 口在我客厅向紫阳鞠躬祭吊。

200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

上午，张根生来房坐，说：「北京悼赵事有所进展，中央同意不将『六四』写入生平，同意扩大遗体告别仪式与会名额，但十三个人除外，中有鲍彤。」说，「我不去了！」林若敲门而入，说，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来电话，告别仪式在 28 日本周五举行，家属要求推迟，推迟在周六、周日。广东指名我去。我准备去。说中央有个十九人名单，不让参加，人名不详。为此我紧张起来，分别与方实、徐孔、舒元璋通话，与田纪云处电话打不通。方说徐庆全已前去赵家联系，说晚上可回答我。我亦与老伴协商我原定去桂林的行程要变了，我说我想与林若一起去北京。接徐庆全电话，说十九人名单中无你，但也没给你发讣告发通

知。为防止万一，我要方、徐、舒一定前往参加追悼会并代我签字，我速告萧洪达。

2005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

下午 3 时许，风云突变，北京传电话来，说杜导正获准参加 29 日赵的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说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又说「《炎黄春秋》报去的四十六人名单，皆批准，只划去了杨继绳。已给你发来中央治丧小组的讣告、车证。」

林若突然闯门。说：「听到省委老干部办通知，我可去。名单报上去，晚 8 时才最后定下。」

与林若协商、与家人协商，取消去桂林的计划，一定要去北京与赵最后见一面。这是我作为老人的老部下，应做的，不允许犹豫的，全家支持。

20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

晨 7 时 20 分，林若已到五号楼门口等我了。为奔丧一夜未睡好。飞机飞得极平稳，上午 11 时到达首都机场。

赵紫阳追悼会的种种规限

2005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

上午到八宝山。

晨 5 时 30 分，便醒了。7 时 30 分出发。徐庆全、舒元璋、徐孔一同赴八宝山。一路上警察密集，气氛紧张。

八宝山大礼堂外无字花圈排列在两侧，正面挂黑布，黑布上无一字。遇朱厚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何方（曾任张闻天秘书）。说遗体告别 9 时开始，可 8 时半便进人了。我们四人一排，进入大礼堂，正面悬赵生活照一副，照片上方横额一副「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我感情控制得不错，行三鞠躬礼时不掉泪，正面三鞠躬，又到侧面三鞠躬，又走到一米处看遗体，化妆不错，面色安详，两目紧闭，头发稀疏有光泽。在遗体右侧，有大军、二军、四军。遇到妞妞，我禁不住了，双手抱住痛哭。走出大礼堂门口时，遇杜星垣，又两人抱住大哭！进礼堂前，徐庆全照相，警卫人员不准。

我拿起照相机，近处不能照，我在人群远处照，一小警察又过来阻拦说：「不准照！」我一时火起，吼道：「是谁规定不准照？」他答：「上级」。我一腔怒火爆发，进城四十多年首次跳起来骂：「我操你奶奶！你他妈的！王八蛋！」小警察悄悄地走开了。出了憋在胸口好久的一口恶气！舒元璋说：「骂得好！」

下午 3 时与林若、吴南生等相聚。

下午 4 时左右，在机场等候飞广州时接徐庆全电话，说中央台公报新闻，一、不提赵任总书记、总理事；二、仍写上 1989 年春夏之交赵犯有严重错误。我当场高声转告大家。大家一片臭骂声。吴南生最生气，骂：「什么东西！」

我写了一部对赵紫阳录音补充的书稿

200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

上午，与老伴、舒元璋先去北京「三○五」医院慰问萧洪达。后转到富强胡同 6 号。妞妞接。她说，「几个哥哥已回去，这房子，老妈妈在，不会动的。妈妈身体好些，隔日问我爸在哪儿？我们答在医院！」

我介绍了纪念赵的几条，说了赵自述录音带共三份，你们这儿一份，明明在香港保险柜一份，锡华处一份。另一份文字的，你们这里也有。妞妞说：「是有一份文字的！」我说：「过一段再议如何处理。」「我写了一部对赵录音补充的书稿，也快完成了，十几万字。」妞妞说，「方便时我希望读读。」

妞妞说，原先说还有 4 月 5 日的清明节、有「六四」，所以驻我家的警卫班不撤，昨天，这警卫班突然撤走了！只留下一个秘书、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似乎松动了些。

我们要去看望梁伯琪大姐。妞妞先去看，回来说：「妈妈睡着了。」
妞妞明显瘦多了！

非常担心萧洪达的身体！

2005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

上午妞妞、志华来家。志华详细说了赵去世后，中办极不成体统的安排。

我说了赵的口述录音整理文本、纪念文章、画册事。妞妞说，他们家属回忆 15 年赵的生活，开始回忆，可出一套。包括赵的手头文件，内有几次上书原稿。

2005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

妞妞处，「赵口述」本整理好；序，我作。

2005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在赵紫阳逝世头几天里，我曾嘱托我明明日夜在赵家忙，帮紫阳的女儿妞妞（王雁南）张罗后事。据明儿说，那几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院内外挤满了悲伤的人群。今日我与老伴续志先来，可冷清了。胡同两侧停了几辆私家车，不见了警车。我们叩门，还是一位解放军小战士从门洞里探头询问，我们递上身份证。一会儿，小战士示意我们进去。外院原住的一个警卫班，似乎在收拾用具准备撤去。赵紫阳晚年独居的那个大书房紧闭了。中院、里院鸦雀无声空无一人，很有种人去楼空的悲凉，只那几树石榴枯干了，仍坚挺挺地竖立在那儿。

妞妞引着我们进里院东房坐下。妞妞说：「爸爸的书房，我们正在布置作为一个纪念他的地方。这里院东房，是我和先生的会客处。」这东房小三间，一间办公，两间会客。会客处内仍供着赵的那张穿灰蓝衬衣的平民遗照，照片下几只花篮里的花也已枯萎了。

妞妞说：「对爸爸的悼念活动告一段落了。几位兄长已离开北京。老母亲近来身体倒好些，头脑还是清醒一阵胡涂一阵。因怕她受不了，至今我们还不敢告诉她爸爸的消息。老人时不时打听爸爸讯息，我们说他

在北京医院呢！我们住的这宅子，老妈在，公家不会收回的。以后呢？不知道，以后再说罢。」

妞妞说，「爸爸走后，中央会不会给他出文集、传记？我们不知道。按道理说，该给出的。朋友们也认为爸爸这些文章，对今人后人会有启迪，该是一笔党和国家的精神财富。」

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下面一篇祭文——

1989 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就被软禁在这里了，直到赵 2005 年 1 月 17 日溘然长逝，才终于获得「自由」。这长达十五年多，赵紫阳的会客权一直是有一阵没一阵，松一阵紧一阵，极不正常，非常地不讲道理，可谓无法无天。那么，谁下的这个命令，谁就无法不承担历史的责任了！

实际上，中国百年来政坛上屡屡出现过这种软禁。冯玉祥被蒋介石软禁在山东泰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长期软禁在浙江奉化，后转江西，又转贵州息烽，再转台湾。这种软禁，是不依法办理的。这次赵紫阳被软禁，大体上又是软禁张学良的翻版。只是张学良还曾出兵逮捕了最高领袖蒋介石，犯了所谓的党法、国法，可赵紫阳只是在 1989 年的学生运动中，不赞成武力解决，力主劝导、引导。说到底，这只是一种政治见解上的不同。姑且不论赵紫阳的主张正确与否，就算是错了，也属于认识的问题，并没有犯法，也谈不上违背党章。中共虽撤了他在党内与国家的所有职务，但他还是中共正式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正如赵紫阳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大惑不解的：为甚么，为什么剥夺他会客的权利呢？这十五年来，中共虽给了赵生活上颇高的待遇，但他几次申请去广东，「管理人员」不准；他几次要求恢复他会见老朋友的权利，「上级」又不准。以至迫使他在 2004 年 8 月向前来的中办副主任抗议说你们再不准，你们将在历史上承担「终生监禁我」的责任。

北京有传闻，对赵的这种软禁，高层也曾有过议论，江泽民说是「经请示小平同志决定的」。这话如属实，这软禁的主意是谁出的，不言而喻。

现在，北京两个大会（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大会）已结束了。胡锦涛执政也两年了，北京学人对胡期望高，评价也是好的：一个 2003 年的「非典」，一个民工工资，一个三农倾斜政策，一个宏观调控，都获得百姓的喝彩。弊病自然也有：一个对江泽民个人功绩捧得过高了，一个动辄封闭报刊，再一个就是赵紫阳逝世后对赵的功过评价太不客观公正，悼念活动规格太低。

老干部都说不管怎么说，赵是前中共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左膀右臂，是立有大功的人物，而且赵又是幼时参加共产党，1938 年起便先后做根据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建国后做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靠政绩得到中共信任而步步升迁的一位实干家。纵有失误，也还是历史无法不肯定的人物。「六四」事件后十五年，赵又被长期幽禁，已经悲惨得很。这样的人物，死了，按中国人习惯，还该更宽容些。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掌权时，给周的讣告草稿中，写有周「生前犯有错误」一句。而毛泽东晚年尽管待人十分苛刻，看到此句都说：「人都死了，谁没有错误？」用笔将上述一句删掉。被众人推崇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位，为什么对赵的悼念、评价，不可以宽厚一些呢？北京有不少人以为胡温处理不当，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一处败笔，有的人因此对胡锦涛很有些失望。

然而，京城有传闻说，胡温此次对赵紫阳的悼念，原先想评价高些，悼念规格也高些的，只是几位老人从中干预，说什么对赵的处理是上一届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你们新一届领导人不该说什么话。

此刻，在赵紫阳去世两个月的时刻，站在赵紫阳英魂犹在的他的会客室，书房兼灵堂的这个坐南朝北的房间外，我百感交集，惟有泪千行。

2005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

上午，妞妞、志华来家。谈「口述」文字稿十五万字，又校对一遍，录音带缺一部份。我答应明儿从香港库存中取回一套给他们。他们已把原来的手抄稿打印出来，很好。以后再编再校，更好办了。

2005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

妞妞电话，问候。说起老太太摔了一跤，无事，我说「赵口述」一书，萧、姚、我三人请她们家属先起草一个书序，然后我三人再定夺。她答应了。

2005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

妞妞、志华来我家达成一致意见：

一、 赵口述序言 1,500 字，他二人起草；二、香港五军与明儿联系，整理录音带。
二、
说：梁伯琪老人摔跤后已愈。赵事未告。家有一司机、厨师。骨灰暂在家，以后再说。

2005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

中午，妞妞电话：「今晨 4 时，洪达叔叔走了。」我打电话与于华证实。于华说：「昨晚 11 时，一口痰堵住喉管。洪达弥留之际说，不准切喉管。医生不切，吸痰器吸不出，维持到今晨 4 时，闭气了！」说后事由中央军委与中纪委联合办，大约在下周四上午办丧事。此事我告姚锡华与舒元璋，请他再通知李普、杜星垣、邹瑜。我接通了林若电话，请他再通知吴南生。

洪达，我最要好的朋友！远走了！远走了！我虽有精神准备，拖了一年多了，他几次病危，但还是想他健在，那多好啊！

铁骨铮铮的挚友萧洪达走了

20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 30 分，前半个小时，我、老伴、舒元璋、王玉茹四人到三○五医院萧洪达告别仪式现场，在院部小礼堂。广东的林华清、刘春亭等先到。接着张根生、邹瑜、杜星垣、王志华到。我与洪达子女：燕燕、毛毛紧紧握手。他俩哭了。洪达留言，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不出个人生平。今日胡锦涛送了花圈，何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到。我与老朋友们站一排行大礼。洪达躺在鲜花丛中，化妆得极自然，那左后额上一痣都看到了。锡华病，卧床不能到，回来我与锡华说了现场。我与锡华为洪达病逝流泪不已。我说，「萧洪达后半生，在所有大是大非面临生死的紧要关口，在我辈中，均是佼佼者。」「文革」疯狂时，他是中南局驻《羊城晚报》工作组长，那时《羊城晚报》收归于中南局做机关报，我是第一把手。批斗大会表决开除我们十余人党籍时，你我十二人低头不说话，独独萧洪达一人严肃说：「我不承认！」1976 年批邓反右的广东省委会上，又只他一人公开反对揭发赵紫阳。「六四」前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赵紫阳，反对武力解决，反对「六四」后「清查」，拒不接受清查者谈话，绝对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三次主动向中纪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请求辞职。乔石一再恳切挽留，他非常坚决，说我萧洪达绝不在「六四」、「六四」后「清查」中再犯错误，留下遗憾！
果然，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走得潇洒，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向赵家子女介绍完成赵紫阳口述稿的复杂过程

200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

为赵「口述本」事，与锡华商定：一、目前形势严峻，家属如征求我们俩意见，我俩不赞成现在就出版。你可告他们并将田纪云意见相告；二、如家属坚持迅速出版，他们手中有赵十五万字的文字稿，姚说我整的那份文字稿，原放在我处，后来你与舒元璋又影印了两份，一份给了赵，一份给了你，这文字稿是完整的。不需明明处的录音带也可出版。家属如一定出版，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必须明确告诉他们，不可牵涉我们几个人，要保护我们；三、明明在香港私人公司〔68〕保存的那一套带子，家属如果一定要，可以给；四、我们几个老人，促赵录音、帮赵录音、整理文字，严密藏存，光明磊落，无一丝一毫私心，到今日，我们无一字泄露，无一字丢失。我们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老领导。就这么办吧！

200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下午，妞妞、志华、五军、五军媳四人来。我谈了政局，双方政治判断分歧，我还是盼好，可能好！他们以为不可能。谈到赵的口——「六四」及其前后，我说了操作过程：一、杜导正先建议；二、赵以为可从中南海借到材料，被拒，赵死心不想再搞了；杜、萧再劝，请赵对历史负责还是要做，大事年表我们去找；赵答应了；三、杜、萧与林若聚会，林提供录音机、录音带十盘；四、开始赵与几人录，不方便，赵自录；五、录的带，萧、杜汗流浃背地在杜家南房中听；六、录音带操作是一个长过程复杂过程。开始赵有一份早年拟定的关于「六四」经过的文字底稿，自录三、四万字。中间赵要杜再拟大纲，杜拟出，四人议论，萧、姚补充问题，赵再录；七、姚、舒整理成一个文字本；八、为防万一，决定「狡兔三窟」，交赵一套、萧一套、杜一套，萧将一套交杜，杜给姚；九、杜冒风险保存，东藏西躲；十、杜交杜明明藏香港保险柜。目的是保存、保护好，对历史负责，这一份赵口述，未来一定见青天。目前形势严峻，建议不要急出版，如出版，一定要保护家属、保护萧、杜、姚。妞妞、志华、五军一致说，不考虑出版，只是为了留存一份完整材料。

200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

今日是赵华诞。与舒元璋、明明、徐孔到赵家。路上买一束鲜花（百合），赵门口有「特」，先到赵书房向赵行大礼，我哭了：「老下级看你来了！」文怀沙、李普到。后看望了梁伯琪老人。

～～～～～～～～～～～～～～～～～～

〔68〕其实，这套录音带保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箱里。当年写日记时，为以防万一，几次提到都含糊其辞，不敢明说。

2005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田纪云：「昨日我与邓小平家子女玩球。我说，『六四』必须平反。」对方说，「是的」。

志华说了今年 1 月份，曾庆红在拉美访问答凤凰台记者要为「六四」平反，其实不对。曾只说：「要有一个过程」。

志华说，父亲今年弥留之际，田纪云来，父亲病房外站穿白大褂的人，我原以为是医护人员呢，后见他们出门，便脱去白大褂，才知是中办的人化妆的。太不象话了！人就要死了，都对人不放心！不准我们与死人照相！因此我们对共产党绝望了！

2006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

妞妞谈：一、香港明儿的一套赵录音带，全套交我们，收到了，仍缺沿海经济战略部份，不知是不是抄时丢了？盼再回忆一下；二、纪念爸爸第一集文稿，已在香港出版。二集，想到「清明」前出，安志文的、你的尚未收入，希望你们写来；三、今年一周年忌日，大家分散地自由地来看看就可以了，我们从 12 日到 20 日有人在。

200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

上午妞妞、志华来家。说老太太（梁伯琪）尚好。说 1 月 17 日赵忌日，李锐、李普来祭。有上访活动。又说赵录音带缺五盘，估计在锡华处，有机会问问。

2006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将我记录赵谈话的日记体书打印稿藏入「孙子兵法」盒内，还有光盘一个，另一个给明明保存。

五盘赵紫阳录音带失而复得

20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下午，先与舒元璋看望紫阳处。今日是赵紫阳生日，带上花。舒元璋说：「原怎么也找不到的紫阳那五盘录音带（妞妞多次查找的），忽然在我屋顶找到了，原来是锡华与我誊文字后藏到房上的。」这可了了我与明儿一件心事。

今日到赵家，平平静静。看到梁伯琪老人，端坐在客厅，地板是新的。老人面色不错，耳朵还好，我说了话，她说，听出来，你是杜导正啊！

录音带给了志华。

赵紫阳忌日二周年，赴赵家祭奠。

200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

今日是赵二周年祭日。照计划，与明儿、舒元璋先去玉泉营花卉市场给赵紫阳买盆榕树老根。

到达赵家，比预料的人多，书房后院有十几人之多，书房已摆几十个花圈，桌子上置紫阳笑眯眯大幅彩照。我在签到簿上一笔挥写三百多字，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内容如下：「今天，是你的忌日二周年，有些人出于多种动机，在人民记忆中在历史上抹去你的形象！办不到。

历史是无情的公正的。你与耀邦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主张的左膀右臂，你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功勋，尤其你在「六四」中的功勋将永远光辉，垂之史册；「六四」必平反，你「案」必平反。当局越不公正地对待此事，大家越怀念你，你的老朋友经常在梦中和你一起！」

田纪云说：「中央要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

2007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

昨晚田纪云约我谈话，我与明儿赴约。田说了许多，要点：

一、我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上提不少意见。看来引起胡锦涛的重视，派办公厅副主任张，带许多礼物送我。我说，「八一」后想与胡面谈一下，张答应，不成问题。看来「八一」后我能与胡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一次。

二、我提的意见，一个是坚定地沿改革开放路线走，绝不动摇；二是党中央要让人们说话，敢让人说话，不以言治罪；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具体硬措施，不能这么抽象，如乡镇直选，越南选中央主席都差额了；再一个是农民承包的土地权再延长。

三、新闻媒体管理工作意见，我那条尖锐意见，老伴给我扣下了，未送上去，说要我附扎实材料上去！

四、赵紫阳「大院回忆」一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国内外震动大。但当局抓不住任何一点点毛病，×××想下手，没下成，因为没理由。我田纪云，他不敢下手。你杜导正，也像外报说的，没有理由，也下不了手。

我觉得他将我作为知己，这事重大，我便说了几条：

一、这是大是大非之争。

二、今日只有你，有这个条件这个机会与胡锦涛在「十七大」前恳切面谈，太难得，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三、你一定要说支持胡温的是一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对胡温期望值很高。四、胡温要坚决顶住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破坏力量、反动力量。五、政治体制改革要向前，稳步推进，鼓励大家说话，要有几条硬措施，如直选、差额选、舆论监督，敢让人讲话。六、胡与温二人相互间紧紧团结，防止有人搬弄是非。田说，网上关于你的材料我读了。有你评价胡、赵的。你说胡耀邦，文武全才，读书多，赵从县长、书记一层层上，胡全面，但干实际工作干不过赵。胡、赵是邓小平理想的左右臂，很精彩。你又说胡最困难时，赵受到邓极大信任，赵此时候有机会给胡说好话，赵未说。但赵没有落井下石。这些话很好。材料中有一篇，标题就是杜导正不肯揭批赵紫阳，说中央「六四」后找你谈话，要你揭发赵，你不揭，后以年龄到，让你退，问你有什么意见，什么要求？你答：「没有」。

我写了赵紫阳逝世三周年祭文：要求为赵与「六四」冤案分段平反

200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与广东来的杜瑞芝约好，今日下午 4 时到赵家祭奠。姚锡华病重，只能与舒元璋同行。计划好了，我有午休习惯，心想下午 3 时出发便可。午休躺在被窝里思绪万千，去灵前说些什么呢？想了几条，索性爬起来再写个祭文吧！在道林纸上，竟一口气写成了。心里踏实了。堵车，我到赵家已 5 时 30 分，杜瑞芝久等了。妞妞、志华、五军接待。我、杜瑞芝等向赵行大礼。今日送来的花篮比去年还多。

我行礼后，双手捧祭文奉上，将祭文纸五页竖排放在笑眯眯的赵面前。祭文全文如下：

赵紫阳含冤逝世三周年

今天是紫阳同志含冤逝世的三周年，北京今晨忽然飘起满天轻雪。我想这是老天爷也牢记着你，没有忘记你，和大家一起来纪念你吧！

我正在读一本叫《遗嘱》的书。书中第四十五页有邓小平 **1992** 年初在武昌列车上的一段话。邓说：「对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又说：「『六四』以前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这是香港版，但内容我是相信的。这就是说「六四」后不久，小平对胡、赵并没有说绝，并没有做绝。

近二十年了，耀邦蒙冤一案已大体平反昭雪。党内外同志是满意的，欣慰的。

赵紫阳一案，至今当局口头有了若干微小的松动、调整。也可说有了微小的求实、进步。从赵支持反革命暴乱，到支持动乱，到支持事件，到赵逝世新闻稿中的「**1989** 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但从根本上说，这个案子没有平反，没有昭雪。而此案不管怎么说都是冤案错案。当然此案与「六四」缠在一起，处理起来有难处是可以想象到的。但冤案必须昭雪，这就是历史，铁定的历史。历史是无情的公正的。

现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一班人，亲民、务实，口碑不错，这种形势下将赵紫阳冤案列入中央工作议程，应该是合理的。彻底平反难处大些，但小步往前走是应该的可行的。譬如先开放有关赵紫阳问题的舆论环境，允许民间开些座谈会，允许发表有关文章。对赵案如何彻底正确处理，也建议中央决策层能考虑个预案出来，明年就整整二十年了。拖得太久对大家都不好。

去年 **7** 月号《炎黄春秋》发表田纪云撰写的《国务院大院回忆》文中多处提到赵紫阳三字，还附了一幅照片。中央一个部门对此很恼火，准备处罚我们这个刊物，近三期《炎黄春秋》又连载中国改革开放怎么搞起来的田纪云文章，更多处正面歌颂了赵紫阳，又配发了多幅赵的照片。读者反映好，中央有关部门再没有一句为难指责的话，这就很好。我和我的朋友们恳望当局、当局部门，履行宪法有关规定，对宪法范围内的言论、出版事宜，更宽容些，更宽厚些。

附上一笔，你的挚友萧洪达是同年「九一八」逝世的。「九一八」两周年，我祭了他。他对你怀有强烈的信仰，对你的晚年无限的崇敬，他今天不能来了，我代他祭你吧！
杜导正

2009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紫阳四周年祭日。上午，到赵紫阳院，妞妞、志华、二军、五军接待。我先送上祭奠的兰花、白菊花，鞠躬，禁不住老泪盈眶。信手写了想念的文字。再到东房坐，一批老友问我《炎黄春秋》事，他们说，现在大家靠你们一批老人，你是一个守旗子的人，保重！保重！要斗争到底！

挚友姚锡华又走了，原先的五个人现在只剩下两人了。

20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舒元璋电话：锡华昨日下午 5 时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了。我速告杜星垣与李普，今日下午 4 时与老伴去他家慰问。舒说锡华到医院后，肺部感染，堵痰，后心脏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下，以后突然停止跳动。

周五上午 11 时在八宝山竹厅告别，《光明日报》主持治丧。

姚锡华，80 岁，1944 年年初参加中共创办的华东文艺团体。「红小鬼」。建国后入团校第一期，因钻研学问，留校任团校教员。识学生舒元璋，结婚，1956 年后调《红旗》杂志。曾得陈伯达赏识，做编委。1965 年来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长，任我主持的《羊城晚报》社外编委。「文革」后任中南局文革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文革略受冲击。曾与我一起在《羊城晚报》挨批挨斗，仍坚持原则，不乱说。

姚「六四」中很好，支持赵紫阳，被免职。后不顾威胁与萧洪达、我、杜星垣与赵紫阳秘密来往。赵的文字录音是他与舒元璋二人整理的。与我往来密切，是挚友。斯人去也！朋友一场，写此句为念！

那日行告别仪式后，杜星垣与我悲切切地说：「当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就剩你和我俩人了！」我说：「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违反不了。「六四」与赵紫阳悲剧同样有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谁也违反不了的！」

2009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除了听从医护人员嘱咐点眼药、服药外，集中精力，写「赵紫阳口述」序稿。

这事，我早答应过的。但考虑到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敏感期，国家又逢经济危机，我不同意现在出版这本书。所以，序言的写作，一拖再拖。但萧洪达逝世后，姚锡华也走了，我又有病住院，原先操作此事的五人只留下杜星垣和我了，杜星垣又 96 岁高龄了。我想，我有义务写的。

住院后，妞妞又催促我赶快写，并说，只准备出一种英文版本。我今天便抱病开始写了。上午动手两小时，下午改一小时，形成了草稿，还算满意。明日再斟酌理顺，月末可交妞妞了。了却了一个大心愿，一件大事情。很长时间心头一直惦记的这个义不容辞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六四」和那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复辟反复辟」
（1989 年 8 月－1992 年 10 月）

友人说：「六四一枪，把人民与政府从中隔开了！」

1989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

昨晚锡华处。锡华情绪烦躁不安。说：「我下台不会超过 8 月底！下台原因是我『六四』中立场不鲜明。其实，更要紧的是怀疑我是赵紫阳的人。我现在干一天算一天。」「『六四』过了两个月了，政局半年后可大体明朗吧！如照邓十年路线搞，坚持改革开放；反腐败确有进展；政治上反自由化一定程度后，停下来，对人处理温和；『六四』大清查勿扩大化，那么中国局面将向良性变；否则，难说了。」

上午崇德夫妇〔69〕来。韩说，「六四」学生的口号和目的是反腐败。现在中央想反腐败，但牵连面太大，太深，既得利益太多，靠江泽民办不到。越知情，觉得难度越大。我刚从某省回来，那个省府主席大儿子和军人一起在深圳搞「军倒」，他还是副董事长。那董事长一笔几百万美元的军火买卖，规定回扣 5%，几笔买卖可得回扣数十万美元，将款存入外国银行。这些人，你能反得动吗？军人手有枪杆子，绝对权威，用枪杆子保护特权，受贿，那你能怎么办？韩越说越气，很悲观。韩说：「你（杜）65 岁，还有三十年活。三十年如何安排，是要有个打算。我是打网球，练字、看书。政局，我从旁观察，无能为力。」

我呢？静观今后半年。明朗后，积极了，我再办点事；不好呢？自己读书写书罢！

198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

正午，明明朋友小李来就餐，他是某报记者，挺斯文的。他说：「『六四』后这两个月，我们那儿议论国是，除生人，不回避。领导人说话少，插话，与大家一样。」「大家的情绪、观点，比『六四』前不是弱了，而是更强烈了，鲜明了！」「这开枪（指六四），使党陷入绝路，进，进不得；退，退不得。」我说：「中央如带头反腐败，反官倒，还是会得人心的！」答：「『六四』前这可以，现在不行了。」「人民对现政权绝对反感，根本不信任，必须下台！」「当然，党目前尚无任何政治力量可代替！未来也许会有更进步的党来代替！」说：严家其，原无多少人支持，现反有人支持，因为你开了枪！「军队内部也会变，先连长，后营长，后军长。38 军（军）长是典型。中国人民不是奴才，靠愚民政策不行。」他慢条斯理地说，但观点强烈。他说，他这些话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干部的观点。不止是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如此的，观点一样的。我以为他将情势估计重了，但反映了目前年轻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绪。这恐是当局者所料不及，也不敢正视的。政局「六四」后仍是沸腾的，只表面平静而已。

～～～～～～～～～～～～～～～～～～～～～
〔69〕韩崇德，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加入中共。1937 年任中共定襄县委书记，建国初任太原市长，后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今日《人民日报》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是中央的正确的声音，但太抽象了，因此不解决问题，也起不了安抚作用。你现在这种「六四」后天天「大清查」大逮捕，粗暴地处理人，使他们平静、安定是不可能的。

今日《清样》〔70〕说北京中学教师学生情绪，也大体与小李说的一样。

1989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上午，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权力接交仪式大会，在新华书店礼堂举行。王忍之，代表中央当众宣布，杜免职是正常工作「变动」。「杜领导新闻出版署两年，不是得过且过」。「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如出版物越整越坏，书刊市场混乱，主要是赵紫阳错误方针，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造成的。」

王忍之今日郑重宣布国家免去我新闻出版署署长职。

今日双方都在演戏。为什么免职？心中彼此都明白。

198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

下午，××（新闻出版署一名处级干部）来，说有一首顺口溜你听说了吧？我让他讲。他说：「会上说假话，会下说笑话，回家说真话」。又说常海（张常海，因「六四」有功升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说，「赵紫阳家有三百套西装，九百条领带，家里猫狗成群结队，完全资产阶级腐败化了。」我说这种说法第一不可能，第二用此诋毁一个国家领导人物，用心与手法也太低劣了！《光明日报》一记者来说：「大家说动乱危险，但今日大家也得冒这个险！」这代表青年人的一种激烈情绪，有一种「与汝偕亡」的情绪。他说：「时代前进了，你们这一套不行！目前只是挣扎而已！」我说：「我们老同志不这样看，如照小平同志讲话办，局面将向良性方向变化。因为十年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得到人民支持。小平近几次讲话很好。只是勿偏离就好了！」

1989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

上午去洪达处。洪达说：「大军二军已出国；四军在美；五军亦到港，说暂不回，只有一妞妞在家，前日有人看到她了〔71〕。说赵已搬到胡耀邦原住的房子（富强胡同六号），未到三○一医院，身体好。梁湘（《光明日报》老记者）来，说：「国内越是最不安宁时，对人民控制越会死。国人不闹不行，可再闹，会将赵紫阳处死，就说心脏病突发。民主党派不成气候，希望都在党内，在党内找代理人。现在的大批判一定会批到邓的头上。

～～～～～～～～～～～～～～～～～～～～

〔70〕即新华社编辑的、专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

〔71〕大军即赵大军；二军即赵二军，四军即赵四军，五军即赵五军，均为赵紫阳的儿子；妞妞即王雁南，为赵独女。

〔72〕昨日离开北京。离前，对中南海那样整他有意见。萧说，这么不相信老干部，这么不清不楚就拘留人。下午李××

〔72〕梁湘（1919-1998），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1981 年 10 月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梁湘任市长、市委书记；1988 年 4 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 年 9 月 14 日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

姚依林就说要破两个圈，一个资本主义圈圈，一个赵紫阳的圈圈。说赵的圈圈是什么意思？赵与十年改革开放路线如何划范围？」

晚到曾志家，亮亮正做「六四」检查准备。上午洪达说，林若在这两月中对那么处理「六四」的态度不如政法书记鲜明，此事已反映到北京，因此林若肯定要下来。

曾志大姐对先拘留梁湘再审查的办法有意见

198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

梁湘事已见诸报端。先反他处理「六四」错，反不了，改成反经济错。梁确有错，但，一、不要先关起来再审查，于法于规不合；二、究竟错到什么程度，须慎重。

何某来，说邓小平近日说：一、赵紫阳有功劳；二、对国外的有错的人，政策要讲究。大使馆找戈阳，希望她回来，戈说，「人各有志」。戈在美有人接待，虽亲人在国内，也顾不得了。戈，老同志，有贡献，有才学，「57 年」被错划右派，吃了大苦头。如何对待她，是大有学问的。目前这样把大部份知识分子、干部，甚至人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不知出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真令人疑惑，痛心，恐惧不已。

晚，×××（国家新闻出版署一副署长）来。说李××一次内部会上说，此次，最大收获是清出了赵紫阳。说新闻法要中宣部、新闻署一起搞。他不很安心。

晚到刘杰〔73〕处谈心。他为广大人民现在这么强烈反中央，忧心不已。他说，一朋友向他反映，说北京李锡铭、陈希同认为自己「六四」平暴有功，未进政治局常委，而沪的江泽民、北京的李鹏无功却进了中央常委，颇有怨言。未来中央的团结难说呢？路线不对，行不通，必整人。

1989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朗可（《新疆日报》副总编辑，我马列学院同学）来电话，匆匆告别：「我俩是挚友，一言相告。国内重大问题上，勿发表意见。只图平平安安生活。平时说话只说生活的事。再见。」说罢挂了电话。真诚是真诚，但我被党培养成了爱国爱民的一颗心，能甘心这么只顾自己平安吗？古人：文死谏，武死战。文臣以谏死为荣，武将以马革裹尸为荣，我呢？真难啊！简直想大哭一场！

看来，许多人，包括朗可这样五十年党龄的「三八」式老干部，一个「六四」，也吓破胆了！

1989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刘××（一文化人）来，谈此次学潮源于党腐败，激怒群众，积怨几年了，颇深，人民中流传许多故事。大学生家在城乡，听到许多；记者，尤其青年记者采访基层，接触亦多，绝大部份实出于爱护党，希望党振作起来。敌对势力介入，党内亦有斗争，与人民的要求、运动掺和到一起了。此时，动用大军，坦克、机关枪，将事情弄坏了。

～～～～～～～～～～～～～～～～～～～～

〔73〕刘杰（1914-），1935 年加入中共。曾任地质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河南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

一个作家说，这一枪，把人民与政府从中隔开了，把人民推到敌人一边去了。「六四」后又搞「大清查」，人人过关，人人检查，没完没了，怨恨敌对情绪更重了。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四十余岁，与动乱无关，也感到无前途，出法国了。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失望、绝望情绪。她甚悲观。我说了要她顾全大局的话，说照小平意见办，我们有前途。她说，现在小平说话已不灵。

1989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与老伴应邀去张帆（前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玖（北京医科大学眼科教授）家作客。隆重接待，房子整理过了，陈玖正忙于包饺子。一会儿，肖白（中央联络部局长）、丁一岚（邓拓夫人，前北京广播局局长）到，大家自然围绕着天安门事件谈。丁观点最明确，说这一枪开的很难收拾。说李敦白夫妇（中国籍美国学者）回京，李与我 1946 年在张家口相识，要好。李是中共党员，与我党患难艰险与共。此次回京住他家，家在美使馆区，家玻璃房子被打穿三十六个枪洞，说人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呀！非常难过。说国外对华友好的人，现在处境非常困难。说天安门事件是世界（现代）最大事件，最惨事件，最黑暗的事件。发生在 80 年代，怎么也理解不了。吃饭时，陈玖哥哥（大哥），哈尔滨一大学教授，说知识分子到现在对此事根本想不通。丁一岚说：「那晚我一夜没睡。我家住『惠通』饭店（长安大街复兴门西）东侧，在『桥（指护城河桥）西』地带，我到楼下看得清楚。6 月 3 日晚 8 时半后，群众将部队阻于这一带街道。部队多次广播，说我们履行任务，请大家让开。群众不让，先头部队用白色木棍挥舞起来，打伤过人，群众后撤。部队此时本可前进，但大部队要听候上级命令，用木棍开辟出的地方，因持木棍的人后撤，又被群众占领。又僵持起来，此时来了两队大学生，一队一、二十人，持大旗开进部队与群众之间。学生派代表与部队谈判，要求部队不要进城。部队拒绝要求。部队开枪将谈判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击毙了。群众以石头还击。部队开枪，此一带死三人。『桥』东，即木樨地二十四、二十二号楼一带，那里
枪声大作，伤亡的就更多了。」丁的话与韩崇德讲的接近。也是学生派代表谈判，然后我们开枪，学生扔石头的。丁为国家严峻形势忧伤不已。

1989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看曾志大姐。说阎明复〔74〕的检查已在部内过关，宋平找阎谈话，要阎下来，工作由一位副部长代理，阎住院，渐渐退下了。怪不得昨日统战部主持的会，阎未露面。又说亮亮几次检查过关过不了，有一位副部长，非要亮亮交代与赵紫阳的关系，想将亮亮打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小集团。反复追亮亮怎么看邓小平？怎么看赵紫阳？这样做法是建国后没见过的。晚洪达来，说运动到明年初才能结束。梁湘问题相当复杂，赵二军可能经他手出逃的，逃前住他家。而中央早与他打过招呼。

198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
上午翻阅资料（手稿），又找到了几篇。顺便翻了「文革」中新华社一些人揭发我的手稿。现在读来很可笑。不得不为的。但其中有乱上纲保自己的；也有中肯意见的。其中以××的违心话、过头话多而无稽。这幕戏，「六四」后又在演出，但举报人的量、举报人的积极性，比「文革」差多了，也不及反右派时。我党真是死不悔改吗？这样明显的错误，为什么非再犯一次不可呢？
～～～～～～～～～～～～～～～～～～～～～～～
〔74〕阎明复（1931-），1949 年加入中共。1986 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 年被免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90 年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91 年 5 月至 1997 年 7 月任民政部副部长。

下午出席「国庆」四十周年江泽民报告会。一楼空位达四分之一。大街上有些建筑物挂了红旗、彩旗；天安门大广场花坛许多。戒严部队的岗哨多了点。只是人民内心积怨甚多，欢乐不起来。四十年大庆，搞成这样子令人寒心。

晚与锡华玩牌，这不犯罪。

1989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冯东书（新华社名记者）来，海阔天空，无边无际，无拘无束，还谈了些高深的看法。他说：

一、6 月 3 日夜到 6 月 4 日晨，我与几个记者在现场，有的在「六四」拂晓前在六部口附近几百米处目击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人民亲眼见了，」还会有照片，在未来适当时机总会公之于世的。见到那种场面的

人，莫不义愤填膺，太野蛮了。

二、这个事件没有完，历史必作出符合实际的公正结论。

三、邓是彻底的输家，赵是赢家。赵（1）否定 4.26 社论；（2）见戈尔巴乔夫将邓抛出；（3）八字方针；（4）不出席 5.19 大会。赵自己对历史负责，对以后事件不负责。

四、邓十年路线正确，成绩也大，此次将胡、赵双折，自己架空了，无人贯彻自己的主张了。邓也就完了。五、现在班子不会执行邓路线，口是心非。六、还得流血。中国历史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七、但历史是要沿着自己的规律前进，谁也阻挡不了。八、「你（指杜导正）下台的正是时候。原有的人对你有些意见，现没有了。」

北京小干部说：「『六四』后一百天了，政府每一步都与群众愿望背道而驰。」

1989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上午，老伴、儿子、儿媳去小燕家过节。小燕大姐夫李某，北京一基层党支部书记，有见解，喜说反话，政治情绪甚激烈。基本点是：中共已完成了历史任务，不能钦定领导中国未来非我莫属，否则便武力镇压。望邓速去，组成新党新政府，中国才有救。理由：中共腐败已不可救药，自己整顿不了自己。天安门事件即表明中共自己不能整顿自己。群众你要反腐败吗？好，我先镇压，然后清查，让群众自己整自己。党政腐败呢？轻轻滑过去了。党、政府「六四」后一百天来，每一步都与群众愿望背道而驰，如开枪，如死伤人数，如清查，如对赵紫阳，对干部一一皆如此。因此群众对党、政府十分敌对，根本不与你合作。小燕大姐亦如此，姨夫如此。都是北京基层工作人员与基层干部。这种严重情况出乎我预料。

1989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冯健（新华社副社长）、李峰（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来坐。冯说，儿女们现在只对「六四」想不通，此事件牵涉面太复杂。李说，经济问题是基本的。只要明年老天爷帮忙，农业取得不比今年差的收成，经济不大滑坡，邓小平健在，估计可过得下去。他俩说完后，我（杜）还是老观点，我说只要坚决全面地照邓的主张办，我们能克服困难，群众不满可以缓解。文革就是这样！我们伤害多少人，一个三中全会的胜利，人们的怨恨烟消云散了。他二人说，「六四」中开枪派发言人袁木〔75〕，现在已不敢住在 22 号楼了，已搬家。

中组部审察干部小组人员说：「导正同志，怎么你连赵紫阳说的一个字都想不起来？」

1989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上午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审察干部小组。二楼一间小办公室，对方二人。很温和，比「文革」好多了，客气，气氛和好。请茶，劈头就问去赵处谈话一事。我如实说了，林若告，与洪达一块去。我谈维护邓这一旗帜，另抓反腐败，我的具体建议：处理好高干子女经商、特供、车辆、下乡随从人员等等。晤谈共 20 分钟左右，先等几分钟，以后外边电话不断，赵几次进出，坐不下来。我的意见没说完，谈话中断。对方说：「导正同志，据我们了解，你的记忆力非常好，怎么你连赵紫阳说的一个字想不起来？」我答：「一个字想不起来。」又问 5 月 1 日与刘杰等老同志一起上书一事，看来在紧追问赵的罪行。对方很失望，说：「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想起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你家谈，你来也可以。我们的电话是。。。」朋友说我们党十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真是可怕得很，可烦得很。看来要将忠心于党的同志都逼到造反才甘心。陈希同说，「『六四』『清查』要挖地三尺」。

下午，有朋友来，都对政局悲观，劝我不可再工作了，政局说不定如何发展呢，看书写书多好。党、国真无药可救了吗？欲哭无泪！

一老省委书记说：「现在对整个情况的判断，决策错了！凡坚持党性的正派人，都看不懂、不认可。」

198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上午梁×（时任新闻出版署某司长）、王×来，他们与别人一样，开口政局。他们说，知识分子与干部，到现在与党顶在两个问题上：一、开枪。开枪、死人，将矛盾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可挽回了；二、清查，反思。将矛盾激化了；三、对赵紫阳也是老搞法，不符合实际，不得人心。结果呢？应付了事。太原那个大个子宣传部长，到群众中做工作，头头是道，说我在外边讲了两个钟头，但回到熟人堆里却大骂了三个钟头。太原市委宣传部一汽车司机看到当日《山西日报》载的「赵紫阳讲话与山西动乱」，当场摔掉报纸，骂「胡扯！」岂不知在场的正是省委宣传部写这篇文章的人。都在做两面派，可怕啊！

晚看电视连续剧《水浒》24－27 集。伟人多磨难，中国也多灾多难，但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这个民族的繁荣、进步、发展，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没有他们，这个民族早衰亡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看刘×（一位老省委书记），他说杨汝岱〔76〕与赵紫阳久处，感情怎么也转不过来。中央决定撤掉他，但无后继人选。这样的事在预料中。现在，对整个情况的判断、决策错了，凡坚持真正党性的正派人，都看不懂，不认可，格格不入，如在台上又被逼作两面派，这是自然的事。杨汝岱也不例外，除非他出卖灵魂出卖良心。

～～～～～～～～～～～～～～～～～～～～～～
〔75〕袁木（1928-），1950 年加入中共。长期任新华社记者，1988 年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是「六四」中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是支持武力镇压「六四」学潮的活跃人物之一。
〔76〕杨汝岱（1926-）1952 年 8 月加入中共。1983 年至 1987 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87 年至 1992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9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

上午出席全国报协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的「报社经营管理先进单位评选会」。晚市委书记请吃饭，给我咬耳朵，说江泽民近日一次讲话，我看到了。其中说经济改革开放有二条路线：一条是五中路线，一条是赵紫阳路线，这不好。邓与赵分不开。这么一说非在下边搞乱不可。我们提了意见。另姚依林同志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要跳出两个圈子。一个是资本主义圈子，一个是赵紫阳的圈子。这两个圈子的提法也不妥。北京陈希同在内部说，「要批判赵的经济改革开放建设的错误，只争朝夕」。而邓小平说：「两三年后再争论」。这不明明与邓小平讲话对抗嘛！

1989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新闻出版署一处级干部）来电话，说中央文件来，讲邓小平与李政道谈话。内有一段我读给你：「赵紫阳、胡耀邦两人都是主张改革的。1975 年我将赵派去四川，两年改变了四川面貌。」我听后禁不住热泪满面，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禁不住啊！

张幼峰（时任中共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从广州来说，广州现在比北京政治形势更紧张。北京说，学运南移广州。从广东流亡国外者四十七人，广东抓所谓暴徒四十多人。广东是香港这个「和平演变基地」的

国内主要渗透地区。而中山大学又是渗透中的重点地区。我是书记。一切与我有关。我被怀疑，我又得清查别人，难死人了。我 3 次提出辞呈，不准。现说好今年末下。要过这一关难过啊！我无别事，上级只说我软弱、不坚定，不鲜明。临行与我握手时半苦笑地说，下次不知能否见面？也许你我被关起来了。悲哀！

张幼峰说，天安门这一枪，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谁也拯救不了。天安门事件后，这么清查，把打击面搞得这么大，把广大干部、群众都逼到墙角，逼到，或说推到敌对一方去了。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中山大学一万学生，几千教员。中老年知识分子，80%到今日不同意中央政策，青年知识分子 100%。国庆我开老教师座谈会，四十余位，都是建国初、中期从国外舍弃舒适待遇回国报效的「精英」教授。会上第一个便说，「回国，我后悔莫及。几次后悔。论待遇，月薪二百元人民币，每年增五元。政治运动不断，经常挨整。真正寒心啊！」座谈会不欢而散。

张幼峰说，邓的一套对头，但完了。现在说与做是两码事。口头说改革开放，实际上一个劲儿收。现在又是阶级斗争为纲，加计划经济。这么广东就首先完了。广东个体经营者纷纷拍卖家当。广东改革刚有起色，这下完了。这带来极大的不安。广东沿海养活了几百万农民工人，这几百万人又寄钱回家养活几千万人。这么一收，怎么得了！

198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新闻出版署处长）给我送来中央一正式材料。内容邓小平与李政道 9 月 16 日谈话摘要。「我退了，人还在，有好处。」「现领导班子自己处理问题，办好办坏用他们的实践证明。」「过去两个书记没站住，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比如赵紫阳，1975 年是我把他调到四川。那时四川饿死人，把他调到那么搞改革。三年见效。三年中，『四人帮』干扰一年，实际上是两年见效。人民有吃有穿有住。农村改革是他和万里带头搞的。胡耀邦在文革中表现很好，他是老红军。选的没有错。但后来他们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主要不讲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胡耀邦那段不反腐败，不健康的文艺他不管，提倡高消费。四个坚持，十一、二年来，我一年讲几次，但是他俩没有执行。」「动乱我要管」，「腐败很严重」，「十三大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胡、赵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自由化，但胡、赵都赞成改革开放。」「我们一心一意照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搞。」「第三世界想搞社会主义，我劝他们照自己情况搞。叫什么都可以，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

此要点，我读了两遍，摘记了一遍，再细读一遍，并在我日记抄件重点处画了符号。今日在日记中再抄一遍，复习一遍，加红笔符号一遍。愈读愈觉得老头（指邓）确是目前我国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比较起来最无私心的领袖。十三大路线不能变，这是决定当下中国命运的大是大非。目前国内显然有一股怀疑、否定、推翻十三大路线的逆流。如此，国家便完了。邓现在如此清醒，谁反对十三大路线就要被打倒，这是全国人民之福。邓对赵、胡也比较客观，有功有过，科学评价。不像个别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那么整人，那么置人于死地。读后感慨万千，扶手胸前，仰天长叹，欢呼邓大人长命百岁！有他在，我相信党有救，国有救。

198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依约我去萧洪达、杜星垣处。谈了邓与李政道谈话。萧已看到，杜未看到，一致叫好。但愿中央决策人物，能实实在在照邓的意见办。政治形势是左的倾向要克服；经济形势比预想的严重；人们情绪不好；银根吃紧，无流动资金；原材料、能源销路都成问题；外国压力。今年 9 月份轻工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速度大幅度下降，明年还会大滑坡。杜说，有些领导人的精力都用到夺权、巩固权利上，因此，「清查」、反自由化不遗余力，而经济工作无人力研究，抓得松，抓得不具体，什么都大甩之，老是几句口号。这不行。晚，刘×说，近日开生产会议，看到国家统计局材料，工业大幅下降，大家万分吃惊，怎么搞的？上

海不少工厂已半停工。黑龙江表面上在上，但成本、利润情况很坏。看来「六四」「开枪」以来，整个形势估计、决策、部署，都一个失误接一个失误，让人万分痛心。但当局者迷，像「文革」一样，莺歌燕舞呢！萧说，林若不行了，与去赵处有关。萧说：「中纪委大清查，本人已被通知个别谈话，但我很硬，我不谈。」

晚看《开国大典》，很真实，气魄大，蒋介石有自省的几句话，如「顺民者昌，逆民心者亡，」讲得对呢！国民党也顺应过潮流，得到过民心，1911 年，1925 年，也轰轰烈烈过。以后，衰亡了。我党呢？我党呢？要接受教训。我夺取政权完全正确，近十年光耀天地，这是基础；党员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好的。只是十年文革有大失误，「六四」以来大错误，快纠正，又理直气壮地向人民交代，把党、国搞好，生民万幸。

198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李××（《光明日报》老记者）来谈大局失误。谈河南省被派去工作组后，要大家相互举报，杨析琮（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对河南事件，只说动乱现象，不承认动乱，照赵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八字方针处理的，情绪上认为八字正确，对赵恋恋，因此在此次「清查」运动中态度不鲜明、不坚决，被人乘时乘机暗算。李说，杨析琮都 60 岁的人了，下来不就完了吗？留恋什么呢？古往今来，留大义、舍名位者人太少了。谈到高级党校研究生，他说，青年教师情绪，至今不同意中央决策。说了天安门国庆四十周年庆祝时的许多笑话：故意将金属钥匙带在身上，通过安检门时让戒严部队检查，不合格，然后借机不赴庆祝会场；身上带的食物塑料袋，必须是透明的，吹进气，然后踩破，发出响声，高声喊「爆炸了！」

阅陈云 1989 年 9 月 16 日致中顾委常委信及转发的 1987 年与赵紫阳、胡启立谈话，1989 年 9 月 7 日与李瑞环谈话。反形而上学；听取不同意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了？前几条都对，似乎有针对性。说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针对性亦强。前两点正确，帝国主义五个特点没有过时的观点，显然绝对化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资本主义企业全社会无政府的观点，显然都站不住脚。这些与邓的观点都有出入。两个文件（邓 9.16 讲话，与陈云此 9.2 至 9.16 口信）同时下达，将分歧公开化了。怪不得 9.16 邓与李政道说：「十三大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呢！

198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张根生说，中央派工作组来我们农研室，组长是严佑民委员（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很左，一到农研室，工作组一负责人便说，你们这么是动乱策源地之一。杜润生是赵紫阳的高参。其实杜只开两次会向赵紫阳汇报两次。张说，李鹏、赵紫阳发生分歧后，杜倾向赵，李不满，存心整杜，将农研室解散了。张说，我反正病了，他们整罢，整不出什么结果的。今年明年农业不妙，中央除宋平外，无人懂农业，李鹏说国务院全力抓农业。你不懂，抓得起来吗？开玩笑！

198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雍）文涛说，天安门开枪，虽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后果严重。对目前清查扩大化，他有同感。希望中央纠正。

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陈云说为什么不能改改呢？

198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晚，应邀去洪达处。毛毛（萧洪达的儿子）在场，毛毛第一句：国家可能出现 1960 年饥饿的形势。不吉利啊！海南岛外资大宗投资项目完全停止了。熊谷组——日本四大建筑公司之一，会长，包括于老板，曾

在「六四」后与王震谈过。熊谷株式会社开洋浦港基础市政工程，约投资一百亿元，现在不干了。海南搞成什么样子都难说了。

洪达说了几件事：一、6.9 小平就说：「十三大报告是十三大正式通过的，一个字不能改。」陈云当场插话：「为什么不能改改呢？」二、邓、陈两种治国思想，分歧甚重，中国未来照哪种办？这是核心。照小平办，国家有望，否则，难办了。三、李鹏是陈云手下的一个人物。四、王忍之是一个小角色，袁木、徐惟诚〔77〕只是几个小丑而已。五、广州大型企业如万宝也是月发 70%工资；乡镇企业纷纷收缩；私营企业撤摊，将钱存入银行。国外情况很坏。这几月滑坡。广东同志说明年上半年这一关就过不了。上海、沈阳更严重。六、再闹就不是学生了，工人、农民，珠江三角洲有外省农民工人、商人五百万，月收入三百至四百元，不会走的，国家经济大萧条，这批人会闹。七、政治上我们又将弦绷得太紧。中央、省市两级党员参加过「六四」游行的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一律处分，这很不合适。八、赵看来不会当敌我矛盾、党外问题处理了。林若在场，我与林若说，赵紫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最多是错误。邓对赵的评价还公允些。赵目前心情不好，负担很重。

～～～～～～～～～～～～

〔77〕徐惟诚（1930-），1946 年加入中共。1949 年后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北京日报》社长，1984 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是支持武力镇压「六四」学潮的活跃人物之一。

1989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昨晚到刘×同志（一位老省委书记）处。他传近日工作会议上，听说散发了王震、薄一波、陈云的书面发言。王震主张我体制退回到十年前去，说什么叫僵化！搞自由化才是僵化！薄一波也否定十年改革开放路线！这些不知是否属实，中央决策的内部分歧半公开化了，很不好啊！

今日我将刘×同志话给萧洪达说了，萧说王震不会做那样内容的发言，理由是：一、邓老爷子在，不敢；二、如发那么重要内容的话，他会事前征求杨尚昆的意见。尚昆处无此消息。一波的发言在我们中纪委的常委中传达了，不像传的那么激烈。然后，又说到赵紫阳问题，说到 1989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8 日晚中南海有关会议内容。他说大体可信。传说王震曾提出将赵送法庭，陈云反对，还是以党内问题处理，邓小平赞成陈云意见。

1989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

上午访萧克将军。萧当面跟我说：「今年 6 月 3－4 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已不多，再做做工作，可以和平散去，也可以解决问题嘛！」

下午读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刊物今年第九期经济学博士、一级研究员伊．安格罗夫文《多元化的政治观经济观》，内容核心：社会主义社会，垄断同样产生腐败。财产的垄断是政权垄断的基础。在垄断的基础上必产生虚构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与意识上的教条化。经济多元化，今后几十年应是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的形式不是目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提高国有化的程度，但它加速离开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把人排挤出国家所有制以外。经济、社会、意识、心理的不同，必导致政治多元化。三种模式：一种，改善了的一党制。党为主，与其它的党和谐，关键是党内外民主；二种，和谐的多党制，都为社会主义奋斗，但共产党不能永远绝对处于领导地位。能否领导，决定于政绩——全民投票。第三种，对立的多党制：反社会主义势力与党内所谓最纯洁的马列主义者（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国家的社会气氛具有对抗性。允许这种对抗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压力增强。这第三种是最可怕、最坏的政治局面。中国目前恐怕属于这第三种局面。很危险的。

邓小平再次呼吁改革开放放弃不得。

1989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晚，洪达来，带小平 1989 年 11 月 4 日与常委、尚昆、万里谈话材料。非常好。要点：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的工作。／安定团结，容忍、谦让、帮助，勿背后议论。／不稳定，有人就要打主意了。／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的集体领导。／请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照过去框框办事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如固守成规，有些失败，尝试，不关起门来搞。／过去失误的，如通货膨胀，弥补起来就是。／有事可议论，但不要变成公开争论／再说一下不争论的问题。十三大报告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不要随便触及这些改革开放。有的语言不妥，甚至错误的，可以不讲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说。／我决不讲我的领导绝对正确，没有绝对正确的事。／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没看出什么问题。也许有人看出来，但没人明确提出来。／现在批某些论点，但不能批十三大。／要持重，对这些要持重。／粗糙轻率地处理问题，要出事的。如对文革，必须因涉及许多人，第一个就涉及毛泽东。有人不赞成，也要顶住！／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十几年成果哪里来的？／认真搞几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唯一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
邓小平讲话，主题：一个安定，不乱——党内国内不内乱；
一个改革开放不要动，坚持下去。

邓的讲话，总的说，好极了！好极了！

党的希望在此。邓已看到问题的尖锐性，所以提出：「顶住！」

198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

今日我读东德、波、匈有关文章感慨颇多。我对东欧的反思概括为：这是一股世界性、历史性冲击波。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实践不怎么成功。先进分子是讲理想的，讲信仰的，为理想信仰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但先进分子是少数。多数人是现实主义者，讲实惠，讲生活富裕与否，其次包括精神生活。二次大战后四十多年，西方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也相当自由，尤其日本、西德、瑞士、瑞典、奥地利、芬兰、加拿大等等。反观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比西方差一大截，政治运动不断，冤案那么多，人民自然对西方制度产生了向往。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毛泽东（晚年）模式，不是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应该非常唯物主义的，符合生产力水平（包括文化、经济程度，包括生产管理能力等等）的，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基础上松散的经济联合体。

198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

洪达说，我从外地回京，我上书请准我辞职。我已三次请辞了。辞去中纪委副书记、常委、委员所有职务。乔石几次挽留我，我辞意已决。现在中纪委天天审批「六四」「清查」的案子，怎么查？我如签字，历史上要承担责任。如梁湘扣北京事，乔石不知，中纪委不知。是李×干的，与宋×商量过，说是要许、梁回京汇报海南岛洋浦港开发事，派了专机。许士杰〔78〕、梁湘来了。××要按「清查」办法处理，乔说，「这不合适。」「敷衍，也得让他们汇报一下洋浦港。」这么做了汇报以后，将梁湘扣下了。这种搞法令人发指！这是蒋介石与军阀的惯用手法。尔虞我诈。手段卑鄙。怪不得曾志大姐说，这么处理高级干部，令人寒心。

苏联、东欧巨变与中国「六四」为什么？得从内部找根源，虽很痛苦！

1989年11月26日（星期日）

今日阅读《清样》。我想了两部份：一为东欧、苏事；一为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事。波、匈后，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都抵制过潮流，但很快地，出奇地崩溃了。捷克在 11、17 日后动用武装镇压，死一人，伤数十人，总书记嘴巴也很硬，但几十万人天天游行，总理站到人民一边去了，总书记顶不住了，24日主席团、政治局、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此次东欧巨变与中国「六四」事件，确有西方的煽动、组织，但不是根本的，根本原因得从国内找。

～～～～～～～～～～～～～～～～～～～～～～～～～～～

〔78〕许士杰（1920-1991），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后，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中共海南省工委书记、海南省委书记、海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国内又要从党、国家工作的缺点、错误中找寻。一定要从主观上找，疼一点也要找。过多地推到西方恶意煽动，推到国内反动势力去，是意气行事，是主观主义，是推脱责任。这不可能解决问题。「突发性」是东欧和中国事件的特点。未来呢？中国党、国家与东欧不同。中共七十年奋斗、四十年建国，虽有错误，但终究成功。特别是近十年改革成功，成绩摆在那里，人民会支持我们的。问题在于天安门一枪开坏了，伤亡几千人，又在事后搞了一系列愚蠢政策，将矛盾激化。近几月又要改变成功了的十年改革路线，更是危险至极。

1989年12月20日（星期三）

读小平与布什特使谈话材料。小平说到天安门事件我党处理中有缺点。原话是要「使我们人民心情舒畅些」。意思含蓄，但能感觉出来。所以邓说：「布什有困难，我们更困难。我们要向人民交代。」

1990年1月20日（星期六）

上午李普来访。说赵紫阳已不当总书记。拉他下台，他有话说，有一个「我的发言」。为什么不给他在四中全会发言，为什么不将它（指「发言」）发至全党？起码的党内民主没有了。这样的党还有希望吗？现在党内什么话不能说，只能说莺歌燕舞，歌舞升平。

中国党无望了。他对政局甚为悲观。

1990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晚，萧洪达来坐。他已无官一身轻了，筹划本月 27 日赴粤，约 3 月末回京，说 3 月回京后设法见赵（紫阳）一面，了却心意。征求我和姚锡华的意见，我俩同意，说 3 月如见不到，以后就更难了。

1990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晨，偕锡华去人大会堂行 1990 年「团拜」。广场上人群稀落，会堂周围警卫森严，李鹏致辞，开始讲平暴，倒胃口，全桌除对面一人外，无人鼓掌。

晚，王忍之处与马仲扬（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同坐。我讲了我们的七个经济政策不变，政治思想界能宽松祥和，勿把关系搞得如此紧张，始终听小平的，我国能渡过难关。王忍之说，立场要鲜明。临别说：「我是死硬派。」又说：「军队只能用一次。中国再出现去年 5、6 月局势，将不可收拾。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粉碎『四人帮』后，千疮百孔，我几年整顿成功。现在又是，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整顿，我们可以好起来。」他将前提搞错了。「四人帮」、「文革」将党、国家引入绝路。邓、胡、赵并非如此，总的说，十年改革翻天覆地，有失误而已。新班子本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但「六四」错了，清查错了，要改变十年的经济政策错了，新班子错上加错，是自己将自己弄坏了，他接近中央核心。看来这个核心还是主观得很。这么搞下去，不行呢！

1990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

晚，洪达来，在锡华处说，武警班子是改组了，目的在加强控制，对原班子不大放心。说去年「六四」几十万军队围城，很显然，不只是对付学生、百姓，而且担心有的军队哗变。1989 年 5 月 19 日夜，杨尚昆召集我军首长开会，就宣布只有邓、我可调动军队，言外之意很清楚了，怕赵（紫阳）搞政变。赵问题已查清楚，对赵维持原决定，宣布审查结束。从赵孩子们处得知，赵身体好，有离休军队一干部送两条鱼给赵，赵小女儿举行婚礼，一到饭店，许多人围拢来问寒问暖。说明民心向背。赵在四项基本原则有失误，近几年作风上也有缺点，对赵批评可以，撤职也可以，但不能一棍子往死里打，不能非程序地专断处理。历史是公正老人，这一段必否定无疑。居心叵测者将被万人唾骂。

老同学哭诉「六四」黎明前血腥现场

1990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

中午，老同学杨××来坐，说：「杜，老同学，早想来谈谈心。谈天安门事件性质及引出的结论。」听起来，真实、完整，有现场，动感情，有分析，思想深邃，引人深思。越听越觉得该记录下来，珍藏，供未来研究参考。1954－1956 年，他与我在北京马列学院同班同学，但不在一个党小组，与我来往不很密切，目前政局复杂，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是否真正谈心呢？会套我吗？会出卖我吗？觉得这些又是多余的无聊的。听他说到，某军级干部在事件中搜集到若干大字报选材料，无处藏存，交给他深藏，他已将材料（包括日记与材料）用油布包好，藏在某某处。此时，我才相信他真诚待我，今日所谈皆肺腑之言，是心里淌着颗颗泪珠向我倾吐的。怪我年老，记忆力不及中年期博学强记，他走后，我就及时追忆追记，但人物、语言、情节，已有许多模糊了。遗憾得很了。下面就沿着他谈话的线索，先如实地记下罢。

「六一」前，战友某，军级干部，在部队被召集开会。会上说，要对天安门学生进行镇压。今日不谈应不应镇压，只谈执行不执行军令？否则以军法从事。每个领导人都必须表态。这位军级战友说，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从不曾有的。我军从来讲道理，和平时期对游行的首都学生开枪，性质非常严重，不让说道理，就要大家行动，这太反常了。这位战友非常为难、苦恼，仓促间决定；走为上计。借口到亲戚家看重病，偷偷来我家躲藏起来。其实这是谎话。以后他一直住在我家，我俩出于一种爱党爱民之心，冒着生命危险，那几天出没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大道上。

6 月 3 日晚 12 时不到，我俩藏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北京复兴门西）北门处花坛水泥墙南侧下。此时复兴门大街、木樨地一带人群如潮，坦克、装甲车装备的步兵从西往东开进。边闯进边开枪。枪声大作。这时的现场是：军队一开枪一冲，人潮后退，军队冲过去，人潮又复归到原地。

6 月 4 日晨 3 时左右，我骑着自行车，骑到六部口街（北京中南海西南）西，即电报大楼对面，长安街南侧，我先将自行车放在「庆丰包子铺」侧面小胡同内，有一青年人站一旁，我说请你帮我照看一下，青年人慨然允诺，说：「你老了，小心，你去看，我给你看好车！」那几天北京人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道德。确实是无人偷车，无人吵架，相互间充满一种人间的热爱礼貌。

我闯过大马路，看电报大楼大钟，已近 7 时。坦克几十辆几十辆列队由东向西冲来。这时，西单路口一带集结着几万人。又是昨晚复兴门大桥出现的那种场面：人群密密麻麻，堵塞了路口大街，坦克冲过来，开枪，人群向四处哄然散去。坦克一过，人群又重堵塞了回来。
（插：1989 年 6 月 5 日或 6 日上午我到班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司×××，北大的毕业生，写一笔好字，有些傲气，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六四拂晓，我在六部口北府右街南西侧中宣部出版局院南墙根。街上学生市民有几百人躲进这个大院避难。街上机关枪声响成一片，我在南墙缝中盯着西长安大街。就在邮电大楼正南方向，北京邮电门市部北马路西，有几十个大学生从东往西逃了过来。我看到坦克撞上去，当场碾倒十一人。」他说得很激动，很具体。这不会假的、错的。后来机关清查，无人揭发这件事。不了了之。）

老同学杨说，6 月 4 日 7 时多，我拖着悲愤但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一路上，我数血迹处，共五十三处。西单附近，两辆三轮车上血迹斑斑，鲜血还在从车上往地下流淌。

我顺路到了复兴医院（广播部西）。停尸房外立着一位发呆的小女护士模样的人。我打听情况，她立即友好地将我领入一小房。说，一夜了，我们医院先后收了北京三百多人，内死亡四十余人。停尸房还有遗体呢，你去看罢。我去数了一下，共二十八具。

（老友韩崇德，原为纺织部副部长，也告诉我：他大女儿在复兴医院作护士长，告父亲说，复兴医院死六十二人，伤一百一十人。）

杨说，这几天，医院医生们想打听死伤情况，彼此医院用如下巧妙语言打听：「我们力量不敷了，理不了，你们能收多少啊！」对方如数以告。这样数字大致出来了。

复兴医院：死四十八人，伤二百余人；

邮电医院：死二十人，伤一百余人；

三○一医院：死十余人，伤几十人；

杨说，这日上午我回到家里。我们四个孩子相继从街上回来，大家兜情况，全家人抱头痛哭！
杨说，6 月 4 日到 6 月 8 日，戒严部队继续开枪伤人。我们那一带，共死人九个。

复兴门大桥口，坦克值班。我与藏我家那位军级老友，到桥口，流着泪，对军人恳切说，枪口可不能向老百姓开啊！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看我俩年老，挥挥手说：「走开罢！走开罢！」我俩离开若干步。我女儿在我俩身后，目睹了一妇女到坦克前，质问：「解放军为什么向人民开枪！」解放军答「我们没开枪！」妇女怒，说，我邻居一人被你们打死了。双方争执起来，军人开枪将她击毙了。

那时，大家生命危在顷刻间，我每次出街来，多一个心眼罢，我在前边走，让我女儿在离我几十步外跟进。我对女儿说，爸爸若有意外，你好处理。

我四个孩子，那些天疯了似的，天天外出活动。我老伴胆小怕事，劝我告孩子们勿外出。我说，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会自己照顾自己的。让他们自己做主罢！

说到此处，老同学老泪涟涟。我也忍不住哭了。

杨继续说：6 月 4 日凌晨，关山复同志女婿被无故打死在临街的木樨地 24 号大楼外间厨房。子弹从走廊玻璃窗射入，穿过「女婿」头颅，打到屋顶，反弹到内房玻璃，穿过，掉到地下。这子弹头现在还被家人保存着。关山复，东北人，解放后做过吉林省委书记。与我一起工作过。「文革」中异常倔强。我为他家不幸去看望他，劝他莫说过激的话。他说：「段琪瑞杀死了三个学生（另一说杀死十二个），完蛋了！」

杨说，6 月 2 日，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生，已写好撤退声明，决定次日全部撤离广场。呆在天安门广场的是外地来京大学生。我们做做工作，可以和平方法解决。但为什么非将矛盾激化到动武的程度呢？我怀疑是有人显然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有学生说，是一出希特勒国会纵火恶剧。

我们开枪错了，譬如说我们是不得已的，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误杀误伤多少多少，也能取得群众的一些谅解。我们不这么做，坚持说我们完全正确，编造不实之词，引起群众极大反感，今天是 20 世纪 80 年代，晚上天安门情况，用红外线摄影机，都拍摄得一清二楚。我们骗得了谁呢？

杨说，天安门事件后，我们紧接着搞「清查」。有的戒严部队任意逮捕、使用酷刑。我亲戚，任清华大学一系的大学教授，他的一位助教，被一张照片敲定参与了打砸军车犯罪行为。这位助教的一家人作证无此事。戒严部队不承认，助教说，不要别人证明，这照片可证明。戒严部队说，怎么证明？助教说，照片上的我头发这么短，我今天的头发这么长，从砸军车到今日被审，前后只半个月，我头发能长这么长吗？说得戒严部队哑口无言。释放。但助教被捕去后，已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出狱后第三天死去。医生解剖，内

脏全被打坏。家人控告，对方想给两万元了结。家人不干，此事至今仍未了结。北京「清查」8 个月了，北京人说，逼得大家人人养成「双重人格」。对你说一套，假的；对自己说一套，真的。

各单位「清查」，绝大部份人都是你保我，我保你。几个大学给人做「动乱」期表现的结论，都是我说你表现良好，是一级学生，你说我表现良好，是一级学生。

他说完上面目睹的「六四」现场后，概括地、庄重地谈了他的几条：

一、天安门事件参加者上百万人，时间两月，主要口号：反腐败，反专权，要民主。

二、天安门事件混进了坏分子。几百万人运动，古今中外不可能没有少数坏人混入。

三、天安门广大群众总体上支持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维护中央领导，维护国家政权，只要求改进领导改善领导，即反专断反腐败。而专断专权必导致腐败。

四、几次机会均可以和平方法解决完全不必动用坦克。

五、酿成这么大事件，非用武力解决，我怀疑是有人在中间搞国会纵火案。

六、「六四」伤亡北京人民数千人，见到现场者，无不抱头痛哭。此举太伤害人民感情了。

七、事件后，不敢面对现实，承认处理中有过失，绝对肯定自己完全正确。80 年代科技，真相掩盖不了，越掩盖越被动。此事真相，北京人知，外地也知了。

八、接着「清查」，人人过关，出现人的双重人格，会上一套，背后一套，逼得大家对政府更反感。

九、事件前，人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只是对政府有不满，事件后，到今日，已忍耐到极限，不对政府抱任何希望了，希望换班子。

十、中国天安门事件激起了东欧、苏联巨变，导致了苏联东欧巨变；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也非改革不可，即不能独裁，要让大家讲话。

十一、戈尔巴乔夫一套不能说那么正确、完善，存在着风险，但从发扬民主这点说，将会得到人民支持的。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除人民说话的恐惧感。少数人的意志强给多数人总不行。

十二、中国迟早必然会出大事。

杨郑重说，共产主义无疑比资本主义好。我们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解放全人类。但什么叫解放？解放什么？我的这位战友说，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人民享有不受压迫的权利。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党执政后，可以不尊重人民的意志，想怎么摆弄人民就怎么摆弄人民。1958 年「大跃进」是这样，「文革」更是这样，此次天安门事件又是这样！

杨说完了，我说，我们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代表人民利益，身先士卒，保护群众，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今日呢？真难说了。齐奥塞斯库怎样？戈尔巴乔夫一套，很难说完善、成功，绝对正确，但他提倡民主，放弃专权，是值得深思引人深省的。共产党执政，拥有对人民生死予夺的权利。如滥用权力，常常导致错误决策。

我说：
一、今日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乱。中国人口多，文化素质低，一乱，必野蛮几百倍，打砸抢爆发，比「文革」还惨。中央现在提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还是得人心的，合潮流的；

二、中国能否稳定，决定于能否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能，则经济发展，制度民主，全党全民大团结；否则，经济萧条，专制独裁，党和民族分裂，危险极了！

1990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

晚，看洪达，与洪达聚谈。

洪达说赵（紫阳）只写「我的发言」，连检讨二字都不说，激怒邓。本来，要保留他中央委员一职，因此一抹到底了。洪达说，赵案已了结，写了结论，报上去不批不办。此事越拖越被动。

1990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大会（我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闭幕式。闭幕前通过香港基本法时，虽未全票通过，有几票反对几票弃权，但万里宣布通过后，大会响起历时近两分钟的狂热鼓掌声。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我将手掌都拍痛了。这是本届大会以来最精彩的一幕。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国啊！

李鹏下午 4 时 30 分举行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以下几点有新意，讲得好：一、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理论概念有快一年他不提了。二、讲到要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张办事。这也是他近年来一直回避的。

三、天安门「六四」惨案他说：「事后可以考虑，也许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段话非常重要，既是我长期藏在心头，希望我们领导人这么说一下的。这就可以缓和知识分子和人民对我们的强烈不满。

四、明确宣布家庭承包责任制适合绝大多数农村。五、海南洋埔区开发政策不变。六、允许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发挥作用，政府继续扶持。七、说了赵紫阳同志，加「同志」二字，口吻比前几次缓和。李鹏对莫斯科塔斯社记者答问时还讲了「发展社会主义没有完整
无缺的形式」之类的好话。

李这些观点如是真情实意的，那可就好了。众多人说，李是口是心非，名义上是这一套，实际上反对这些东西。

199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

下午小顾来谈。说李鹏答国内外记者问，尖锐处是如何评价「六四」。李原话是「可以采用别的方法解决」，发表文字时改成「也许」「可以考虑」，而且将这个句子移在后末端。对「六四」如此评价，松了个大口子，这非同小可，是党中央、国家对人民第一次让步。相信或是邓小平说了，或是政治局常委决定的，不然李鹏绝不敢绝不会这么说的。这为今后让步改正开了路。

小顾来，说听人传，万里小儿子今日去美国，临行时对他的同学说，我绝不回来了。又说老爷子辞职，未被接纳，老爷子不同意对赵（紫阳）的处理。说：「我与赵来往相处多年，说他支持动乱分裂党，我不能接受。」

小顾说，李鹏记者招待会前，徐惟诚召集首都大报总编辑，说任何记者不能提「六四」事，否则拿该报总编辑是问。说这句话时拍了桌子。

李鹏说：「赵紫阳是党内走资派。」

1990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张幼峰来京开会。洪达派车接，我去他下榻的木樨地一招待所。三人谈一小时。交谈国家大事。他说，中国问题从深层次说，是邓与陈（云）有原则性分歧。邓主张改革开放，也卓有成效。陈对邓这一套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不久前人民大学几位教授带头给陈云同志写一封信附一文章，文章题目是〈商品经济是万恶之源〉。传说陈回信在上边批：「我早有此看法」。说去年秋后，陈要邓力群撰写《七十天》，从七十天看十年。幼峰说我看到过邓力群起草的这个草稿大纲，第一条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有失误处，说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有失误处。李先念说：「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在党内，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李鹏同志说赵紫阳是党内走资派。江泽民同志说戈尔巴乔夫是东欧事件的罪魁祸首。袁木说，江的讲话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李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说大家的立场观点感情现在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一整套，综合起来，便看得清清楚楚了，「六四」后，党内国内确实有这么一种主张、一种力量，要推翻、要从根本上修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纲领，经十三大完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方针政策。

近一两月，李鹏反复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正确，带来全国十年巨大进步等等，不知是真是假。大家要拭目以待。

邓小平同志说过，反复说过，十三大报告是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一个字不能改。改革开放，谁反对谁下台。我们（指萧洪达、姚锡华我们三人）是拥护邓的死硬派。自以为实事求是，经常做调查研究，我们以为邓这条路线虽有缺陷，但总的说是完全正确的，不容更改的。

三人为国家经济形势发愁叹息。

我向中央上书：雁北农民现在非常害怕我们废除包产到户。

1990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今天，我向中央正式提交了我写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现在农民非常害怕我们改变农村政策害怕废除包产到户》。

为什么写这份报告？今年 2 月下旬到 3 月上旬，我和《光明日报》老记者郭铸（山西雁门关一带人）回山西老家，随行还有我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秘书贾三陵。我们到雁北几个县、六七个村访问了十九天，写了一个调研报告。抗日战争 1942 年时，我是雁门关附近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有些老村、区的干部，还认识我。早在 1983 年和 1986 年，我曾两次访问过这一带。因为熟悉，我便能够了解到农民一些心里的意见。「六四」后一年了，国内尤其北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农村政策，主要是包产到户，还有发展乡镇企业，议论纷纷，分歧甚尖锐。若干国家领导人，热衷于反和平演变，全面系统地批判赵紫阳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这分明是明批赵实批邓，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再批下去，国家改革开放路线就被批光了！非常非常危险啊！我是拥邓、拥赵、胡坚定的死硬派，但「六四」后，农村情况究竟怎样？农村干部和农民究竟怎么想的？他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我心中也无数。现在走了十九天，农村情况我大致明了了，很高兴。回到北京便正式整理了这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

这份报告今天通过内部交通上交中南海了。〔79〕

199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

下午赴杜星垣处，洪达也跟来了。杜说，前些天，有一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干部，去赵紫阳家谈，后又跟我小孩说了。此老干部说了许多，说看到赵的女婿了，说赵身体好。杜说：我大孩子说，赵 13 岁参加革命，为革命六十年，去年即使犯错误，也只是 5 月初到 5 月 19 日十几天，是六十年与二十天比，为何不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一棍子打死，公平吗？经得起历史检验吗？洪达说，退一步说，要处分了但他是党员，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公民，虽属党内审查，但他有宪法法律赋予的人身自由。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那么大错误，还可到处活动。今日赵实际上不能离开那个小院子一步。实际上失去一切自由，这算什么东西？毫无道理。

写《大失败》的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4 月中旬发一文章，说：「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统治中国的由老一辈革命者组成的老人统治集团，将在二至四年退出舞台。」「在他们离去后，那么肯定会出现严重的内乱。」布的估计绝对了。但有几分道理。我以为一切决定于我们党能否紧急有效地自变，改正错误，发扬我长处，我党有望。否则，完了！

张爱萍老上将拒不认错

1990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

某说，王震打电话给张爱萍说，你为什么发起签名反对戒严？张答：「你老糊涂了。我们的信写的什么，你看懂了吗？问题是你们身边的人将我们的信捅到社会上去了。我们没办法。」王说不下去。后王推举彭真找张谈。张有准备，写了一信带去找彭。彭客气婉转，说动机是好的。

李先念找另一上将说，你为什么发起签名反对戒严？又说，赵紫阳给了你什么好处？该上将被激怒，用拳头猛击桌子（另一说法，猛击沙发）说：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不欢而散。
又决定找萧克谈。王不敢找萧克。此事不了了之。

晚徐孔及夫人宝珍来了。宝珍说，「《人民日报》人心惶惶无心工作。洪达也说过，《人民日报》今年继续清查，明年才登记党员。宝珍说，杜润生已被通知暂缓登记。五十余年老党员了，对得起党就可以了。
～～～～～～～～～～～～～～～～～～～～～～
〔79〕这份报告的底稿我还保留着，全文四千多字。要点如下：在导语一段中，我说；「访问后，给我的感觉是，农村总的说是稳定的，但隐藏着忧患。」「近几年，这一地区农村经济形势，包括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相当好，比 1983 年和 1986 年又有了速度较快的发展。和十年前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形势有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面比 1983 年和 1986 年明显严重。」在报告的正文，我概括了所谓严重的内容：一、农民对地、县、乡、村四级干部当中少数干部作风的严重腐败问题，反映非常强烈；二、现在农民负担过重。在这两条中，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以说明这种严重性。三、农民现在非常害怕我们改变农村政策：「去年（1989 年）7、8 月份，受『六四』事件后国内大气候影响，雁北一带农村传说共产党的农村政策要变，引起农民的不安，经过我们做工作，情况逐步稳定，但还是很不踏实很担心的。」报告接着讲了雁北农村干部现在热衷于搞「规模经营」的情况：「有些好的农村干部搞规模经营，确出于公心，效果不错。多数干部搞规模经营，是从中为个人谋私利，农民吃亏很不满意。但是，这部份农村干部堂堂正正说，还是毛主席的集体经济政策好，这些年搞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错了！你们不看，北京报纸又天天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吗？」为此，我在报告中就此情况写了一大段我个人的建议：「我不同意一些报纸现在那样大张旗鼓宣传集体经济如何如何好的作法。现在大多数农民害怕，农民不接受这个东西。陈云同志 1978 年末，就说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这一头稳定，天下太平，农民这一头不稳定，天下大乱。现在看，我国农村这一头总的说不错。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是十年来我们搞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这个政策完全成功了。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从此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理解他们的，使我们党重新取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家庭承包责任制，当然不是永久的，但在目前干部作风差，管理水平低，经济条件不具备，群众觉悟程度和文化程度有限的条件下，还是不动为好。动了，就动了我们的根本。所以，从全国农村来说，任何想动摇家庭承包责任制，认为它曾经起过作用，现在已经过时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危险的。」顺便再说一点，那时，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虽然被免职，但给中央高层的信函仍可以通过内部交通，不经任何审查直达中南海。所以，我这份报告就这样送上去了。以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种级别的老干部再给中央高层写报告、送材料，必须通过现职管理部门先审查，通过后才能上交。这恐怕不好吧。

1990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

上午，萧克一秘书对我说，现在大家有不少意见，憋在心里，这种局面不行啊！

下午给我在山西省农村的外甥写推荐信，给大姐家人带点礼物。黄昏送外甥走。外甥说，对共产党有意见可以说，但不能打倒。为什么呢？譬如说，这房子是我花钱出力盖的，你们什么人就要来住，可以吗？允

许吗？我干吗？中国天下是共产党打出来的，别人来坐天下，中国共产党自然不干。

这种情绪，在中国农民中有传统市场，虽不科学，但农民接受，于统治者有利。

199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杜星垣忽然驾车来家坐。杜说，赵是 89 年 4 月 25 日去平壤访问的。而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正是在赵离开北京当天或次日急急忙忙开会的。为什么不在赵走前开？为什么不等赵回北京后开？当时局势并未紧张到非在此日召开不可。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看来不很正常，不很地道。

杜说，到秦城监狱探监（因「六四」被捕的人）的人，几乎异口同声说，你们做得对，没有错，以此种话勉励慰藉在监狱者。警察看守们为此惊讶不已。杜说，这是民心，违抗不得的啊，这对我党我政府来说，太危险了！

1941 年与我在广灵县深山区见过面的老边区青年工作者王振邦（时任内蒙自治区一厅长），今日与妻子来家坐。说前日从大同坐硬卧车来京路上，旅客不回避自己的看法，议论国家大事。我问，看样子，是些甚么人？答，看样子是供销社一类干部。说，我俩坐在一边不说话，听他们议论，他们说，这些年经济改革工作总设计师是邓，办具体事的是赵（紫阳）。现在一说成绩都是邓的，一说错误都是赵的，这说得通吗？对赵要一分为二，

有成绩、有错误才公平。又说，北京的事，我们也知道，微妙得很呢。

陈云主张杜润生等四个老党员不要缓登了！
1990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将《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格局》读完，约十万字。
此件中叙述赵 5.19 实际解职后，仍三次要面见邓，反对武力镇压。到 6 月 1 日或 2 日，仍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说：「我还未解职，为什么电话打不出去？」对方支吾。赵说：「请将我致邓小平意见记录在案：千万不要开枪。否则，我党千秋功业毁于我们之手，无法向后人交代。」接电话的秘书们听了哭笑不得，有的苦笑着说：「已是傀儡了，还说这些话！」

晚，遇韩天石（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谈国是。韩说：一、对杜润生四位老人是否缓登记党员事，陈云批示：「老同志了，登记了吧！」此讯确实。但直到今日未在中顾委传达。估计上边意见不一致；二、荣毅仁，据香港《明报》消息，久居美国和加拿大，人大常委会开会他已几次不到会了，别人造谣说他出逃，他如反对，会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此事棘手！三、国家经济财政情况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光头痛医头，无多大效果，这是预料中事。

顾××（新闻出版署一司长级干部）说，李瑞环被架空了。中宣部一头，徐惟诚、李彦只听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的，不理睬李瑞环一套。上周优秀短新闻发奖大会上，李瑞环说了一套得人心的话，总的精神是宽容松动。徐惟诚会后说，目前不能松动。文化部那头，李瑞环说话也不灵。姚锡华说，李瑞环一系列讲话，主张意识形态界松动、宽容，如能行得通，中国舆论环境不会这么紧张得人透不过气来。

顾说，徐惟诚文革中投靠张（春桥）、姚（文元），写黄帅，是「梁效」写作班子的成员，是张、姚手下用笔杀人的大将。粉碎「四人帮」后受审查，李锡铭将他保了。他写信给胡耀邦，胡用了他。紫阳上台后，告李锡铭说，这种人不能管意识形态。李锡铭被迫将他由管意识形态调去领导经济工作（赵与李锡铭这段话我当时也听到过，是确有其事的）。徐惟诚恨透了赵。因此，赵倒霉后，他利用权力反赵报复。据「中南海」人说，「四二六」社论就是徐惟诚执笔的。此人现在掌握着中宣部大权，我早就看出这是李鹏、李

锡铭、陈希同为发展自己系统权力精心布局的一只棋子。

1990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

晚，洪达来谈。一，中顾委杜润生、李锐、李昌、于光远党员登记事。陈云是中顾委主任，是中顾委主要负责人。决定此四人「缓登」后，有关人员去杭州向陈云口头汇报。陈未表态，说不日回京再说。回京后，给薄一波、宋任穷和常委一信。信上说，这四人缓登记事，我考虑很久，以为这类政治思想问题处理上，应慎重。中国党历史上教训很多。且去年「六四」情况那么特殊、那么复杂，大家情况不明，犯了错误。所以，老同志了，还是登记了罢。对经济案件，生活作风案件可严。说这四位老同志的问题「记录在案」就可以了。此件已印发到副部长以上干部。这事太大。这不是四个人的问题，而是与中央与北京市正要处分几千副处以上干部那个经中组部、中纪委批准全党执行的文件唱了对台戏。陈云说了话，那些左王、左将们必听的，不敢不听的。不管如何，这是一件于党于国大有利的好事。这是又一个要将党内外人际关系松动一下的讯号。

1990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

下午，杨沫（著名作家，《青春之歌》作者）夫妇、文怀沙老来坐。从 4 时起到 8 时走。所有说话都被文老包场了。他引经据典，中外古今，雅见俗知，滔滔不绝。确是有学问的人。对天安门事件处理，义愤填膺，说孩子们，都是我们的后代，有什么错，如此使用暴力，向谁说得过去。有坏人，自然的，那么将好人坏人打在一起。说小平一生光辉，这个事将形象毁了。我对耀邦崇拜，他知人。说紫阳儿子官倒，大家有意见，但他在「六四」紧急关头，站在人民一边，5.19 到天安门对学生说来晚了，我老了无所谓了，但你们。。。泪流满面，非常感人，我都哭了。这一下，人们对他没意见了，从历史说，他高大的形象树起来了。

他不太了解我，不敢放开说，只左一个导正是好人，右一个导正是好人，大概是以为凡去年因「六四」后撤下来的干部都因同情学生撤下，我也是其中一个；另一是在郑州看了我题「生做炎黄子孙的人，死做炎黄子孙的鬼，终生不做愧对炎黄子孙的事」一幅字，对我人格产生好感。

刘×（一位老省委书记、中央老部长）从江西、河南回京。说近日中央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会由宋平主持。江、李讲话。会上，对家庭承包责任制正确与否，争论激烈。反对包产到户，主张推行集体经济的，一个是陕西的省顾委主任张哲，一个是北京市的老左们。李鹏也大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到会的其它省市负责人都用了不同语言，仅对张哲骂人提意见，说目前包产到户政策不能更改。张哲不知何许人也，想来是王震一类老朽人物，不知世界情况，不研究今日中国，只抱住毛主席晚期的片言只字，乱放横炮。中国若依了他们，农村马上就会大乱。

说田纪云因病请假。南方来人说，田到广州，背后「牢骚」很多，什么不怕油锅煮之类。「六四」以来，田在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特区政策上，坚持了十三大报告精神，讲了不少好意见，看来是有胆有识人物。

1990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和锡华去探望雍文涛。文涛详细回忆了陈云同志致中顾委信，与洪达说的一样。强调这封信不只是对于光远、李锐、李昌、杜润生讲的，而是指类似问题如何看，如何妥善处理，是一个大政策。我党到紧要关头，陈云同志总是有些决定性的好主意，文涛说，现在运动到这一步，许多单位里有私心的人露头整人了。历次运动如此。他估计陈云同志精神贯彻下去后，国内党内政治气氛会好转。这几天北京老同志为此奔走相告，一概认为是好消息，对党好。但能否将决定贯彻执行，大家放心不下。因为党内有一股左的势力，在台上，手中握着实权，又以阳奉阴违敷衍呢，也是因为中央说话出尔反尔，各说一通，政出多门，

将大家的信任破坏了。所以再好的主意下来，大家也担心实现不了。

1990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

李庄（刚刚卸任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应约来坐。

李庄说：「我的想法是，党和社会主义两条不能动，我信仰坚定；反腐败，我坚定。」

我说我是三加二，三是：一、绝对不能乱；二、社会主义旗帜不能倒；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这三条前提下，有个二，即一、狠抓反腐败；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为代表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正确的，要坚定地贯彻下去，既反右，也反左，以反左为主。如此，我党现在虽然困难，我们能挺过去。李庄听了我的三加二后，拍案叫好，说我俩心路一样。

李庄说，我俩这种想法，在我接触的圈子中，即部份老干部中，居少数。多数觉得党已无望，一片灰色绝望情绪。

我说，我接触的老干部中，我这个三加二能被接受，代表大家的观点。

1990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

读「参考」1377 期，内载郑小瑛——我国音乐女指挥家，今日从瑞典回京，谈我留学生问题。说：「不久前有五十人被批准在瑞典获有永久居留权，一些人为其中一人办庆祝会。这位学生在会上突然说到永久居留权意味着同祖国永久割断联系，于是感情失去控制，首先失声痛哭，在场其它人也跟着哭起来，哭得十分伤心。」「他们都还年轻，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国内，他们怎能不思念自己的亲人，怎么能一辈子流落异国而不思念自己的祖国！」

读到此处，禁不住眼泪滔滔而出。去年「六四」和「六四」后，我们许多政策太伤害人了。
张秀平（时任《新闻出版报》副社长）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告。他来了，说：「中宣部派来新闻出版署领导『清查』的张某，近日找我谈话，说中央要了解杜导正去年『六四』前后 50 天内的表现。对方提了几件事：一、『六四』后，杜在与人通电话时说过不满开枪的意见。你知道吗？二、杜到过中南海，找过赵紫阳，时间？用甚么车？说了什么？你知道吗？三、『六四』前后的其它表现。我如实地回答了。」

「六四」后，我这些事都告诉过他。他以前做过我的秘书。对开枪问题，我打过电话给王忍之和魏巍（名作家，晚年很左），内容是「六四」后，有的戒严部队战士开枪伤了人，如新闻出版署干部杨成禄的哥哥，在火车总站路口过路时被击伤。另外直升飞机向人民剧院宿舍楼顶扫射。我将直升机扫射的事告诉了魏巍，他反映给了聂帅，聂帅过问过，总参反映说直升飞机开枪是误传。说我到中南海事，我说在去年 6 月 18 日王维澄找我谈免职事时，地址在中宣部办公室，我扼要地谈了这件事。以后，王忍之来我家谈工作，我详细地谈了这件事。此后，约在 8 月初，中央的领导干部审察小组打电话来，要去中组部谈，对方一位中组部局长，一位是处长，我严肃地讲了赵通过林若要我与洪达去他家，时间 5 月 14 日晨，不到 20 分钟，当时天安门广场形势异常紧张，赵屁股坐不定，一会儿秘书叫他出另间房接电话，电话不断。我的谈话便断断续续，我谈的要点是：一、绝对维护邓小平这面旗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狠抓反腐败，高干带头。其余来不及谈，便告辞了。因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

事隔一年了，此事我原以为早已了结。我行为光明磊落，符合党章手续，内容与动机都正确无误，怎么又翻腾了。我想，一是赵的审查结论要定了，还想搜集材料，核对材料，找到我这件事上来。二是中宣部系统要结案，此类人与事，要覆查核实。

他们做贼心虚，内心虚得很，不信任别人，又要整人。

1990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冒雨去穆青（时任新华社社长）处。新华社新楼，也没什么异样感。楼梯口先碰到冯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和周原（新华社名记者）。先到冯健办公室坐。周原话多，抢着说：「老杜，早想看你了。我们老记者派了冯专访你，向你致意。你在『六四』前说开枪我辞职，果然做了，有骨气，老记者崇敬你。」再到穆青处，路上，冯健反复说，「现在没法工作。」访穆青，先谈韬奋基金会事，然后谈国是。他说：「免掉李鹏总理职务是可靠消息，绝非空穴来风。只等待时机合适时。」我说，此次路线斗争涉及小平，他健在几年，走前将班子安排好，否则，天下大乱，穆青表示首肯。过一会儿，周原、冯健闯入，谈修改焦裕禄稿（用于出版的书稿）。穆青说：「老杜很久没来，得多谈谈。我与老杜的心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连着的！」我向他个别谈了去年 5 月 17 日我代六位省委老书记起草「六四」紧急条陈八条，5 月 31 日八宝山我与阎明复谈如开枪我退党事，以及赵约我去中南海谈话三件事，穆青听了说：「老杜，这三件大事，哪件他们都可以给你上纲整你。」

冯健送我出来，冯说，国家经济形势一塌糊涂，但李鹏说已走出低谷，这明明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现在李在电视上一亮相，大家就关机了！」

穆青说：「我明年下！」

1990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

上午，中宣部驻新闻出版署领导干部审察小组以张某为首共三人来家访。张说明来意，即系考察现任领导人，后部要求也查查离开第一线的。张通知我两周了，说要核对材料。一种条件反射吧，听到有此类人员查证材料，就有一种「文革」时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强烈的厌恶感。我心境坦然，一切可上对天地可下对良心。

我有西瓜不会招待；我有良茶也不想招待，照我家习惯，有客来是必上茶水的。与老伴说好，以白开水招待这班令人讨厌的棍子。但我好客成性，或许老奸巨猾罢，他们来了，我还是以茶相待。

张要我先说，我要他先说，我说，你要核对材料嘛，你们先说，我来回答。对方提了去年 5 月到中南海赵紫阳家事；给中央写信建议为学生游街开政治局会议事；要人去了解天安门广场情况；你说过「六四」后中央将改革开放的缺点、错误估计大了等等。我回答，去年 5 月 13、14 日去赵家属实，我讲坚决维护邓小平威信，又建议狠抓反腐败。赵表示同意。张问：「赵还讲了什么？」我说，没有，当时天安门广场情况异常紧张，赵顾不上详细听取我的意见。第二，我说我的去年 5 月风波中的回顾与检查书面材料中，已说得清清楚楚了。我补充了一点，我对军队进城大规模开枪想不通，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万万万万不要开枪。如一开枪，从历史看，说不清楚了。没有派过周轩进、周洪力了解天安门情况。更无人指使我。

张两次要我谈谈我的下级顾××、张秀平 5 月 19 日前后来我家几次？谈了什么？情绪如何？我答，那时来我家的老中青年干部，老中青知识分子很多，他俩找过我，谈什么，记不起来了。情绪与老干部比激动些。他再问，有什么特别意见吗？我说，他俩与我这种干部相隔几层，内心有什么，找我这个老上级谈，会有分寸，不会谈出格的。

其实我清楚记得顾和张很激动地谈过很激烈的不满「六四」的话。我不会说的，出卖他俩的。以后他们走了，这场令人恶心的戏便草草结束了。

1990年7月30日（星期一）

读《人民日报》7月30日第五版许征帆的〈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楚〉。文说1987年1月赵紫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楚」。这话赵会讲，不知什么场合讲的。无论怎样，作为总书记，这种话总的说，不说好。作为问题是可以研究的。而且邓小平

同志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邓近些年还劝非洲国家领袖「不要搞社会主义，要努力将生产力搞上去，改善人民生活，这么做了，叫什么主义也可以。」因此，《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名为批赵，实则批邓。此文还是用大写的马列引文说明自己的观点，实践呢？它回避了。因此无说服力。只说明目前政治斗争复杂性，有机会就要批邓干邓。

高狄（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办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6月18日引《明报》6月8日一篇报道后，加编者按，冠以「要警惕敌对势力的阴谋」，文中杀气腾腾，全「文革」式语言。编者按说有些类似的流言蜚语，在报社也有人传播，有些事是不是我们报社的人传出去的呢？甚至这个报道是否报社的人写的或提供的素材呢？因此报社清查工作必须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此文反映中央两种主张两种力量在《人民日报》问题上的较量。高狄恶劣面目暴露无遗。

新班子对邓小平「六四」有关方针精神执行得很差！

199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

小平同志去年处理「六四」的基本思路是：为国内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惜「六四」时大动干戈，以为这么做了，无非招来国内外一个时期痛骂。但是国内，我有安定的秩序，可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经济建设，使生产、生活好了。这样，过一段大家也就不骂了。邓小平同志的想法是：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路子对、效果好，有小失误，失误改了便可。万万不可动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整个框架结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面呢，他批评胡耀邦、尤其赵紫阳有错误。这一面，希望在「六四」后大力加强。小平这些估计、设想大体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这么对「六四」，这么处理，我坚决想不通。

小平这些结论、设想，被执行路线的小集团有意无意曲解或抵制了。看来只李瑞环通，江泽民和稀泥，李鹏、姚依林暗中抵制。李、姚纠正四项基本原则方面的软弱的错误，纠正过头了；藉「六四」、藉四项基本原则方面的错误，企图否定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框架，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非常危险的错事；农业上企图否定包产到户，主张集体经济；工业上，压制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甚至压制乡镇集体企业，恢复 50 年代、60 年代只扶持国营大企业的作法；企业内部又否定改革了几年的厂长责任制，恢复党委书记制，否定承包制。还采取一系列倒退的从历史说是反动的措施，结果极严重地伤害了经济改革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包括他们的骨干，使工业生产一蹶不振。

只幸小平同志去年秋，坚决制止了李鹏等企图明批赵暗批邓的狂妄计划，说得很尖锐，如「十三大报告是正式通过的，不是哪个人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有一次用「文革」后过多否定毛泽东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来从侧面说明不要批赵，不要批邓。「要批，两年后再说。」邓力群等确已拟定了批赵计划，拟定了几十个题目，组织了写作班子。「四人帮」时期的一批写作棍子，如徐惟诚等，都重新重用了。此事因为小平坚决制止，党内大部份同志支持小平观点，加以李鹏那套经济措施不得人心，脱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碰得头破血流，工业生产去年「六四」后大滑坡，他们原希望今年好转回升，谁知今年春大滑坡加速。这样，李鹏他们才不得不收敛，采取了一些头痛医头的政策性措施。对承包制、对乡镇企业、对私营企业、对银行信贷都开始松动。外面戏称李鹏执行的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可李鹏等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十年正确的经济体制经济建设路线。「六四」挫伤了干部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

小平希望镇压「六四」维持稳定，经济上去，过几年大家也便安静了，不骂了，现在看，实践得很差，只是维持会而已，矛盾实际上在继续激化，危险度在加大，未知数在加大。香港徐四民那句话是对的：「高压下的稳定不可靠，很危险，酝酿着更大的动乱。」这是同志们非常希望避免的，但这是目前不能不接受的一种可悲的局面。

赵紫阳上书要求审查结论，邓小平批办，李鹏拖，有人说邓小平说话不灵了！

1990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

晚上洪达来，与锡华、我谈话。他说，今年 4 月末，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一信，信内容的轮廓是：我七十有二了，身体健康状况不甚好，党中央审查我年多了，盼能速作出正式结论。邓小平批：应尽快处理。将信批给江泽民。江开会协商，李鹏说，今年 4、5、6 几个月，是政治敏感月，此时处理恐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此事便拖下来了。这件事，说明邓说话不灵了，有个力量不理睬邓的话。洪达还说，赵现在身体，别的还好，只是读文件、看书一两小时后，偶然出现失明状况。

萧克等七位老上将反对武力镇压「六四」

听到枪声后，萧说这下完了！

1990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

上午，萧克一位秘书对我说，去年「六四」前，萧克等七位老上将上书中央，反对开枪镇压。那时我们在萧克身边，七上将上书后，仍有几位上将来电话，要签名。我们答：你们自己上书罢。萧克在旁补充说，王平也上书了，是单干。他说，事后李先念给张爱萍打电话（或谈话），说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开枪不行。张爱萍答：「我没感到什么生死关头。」以后王震打电话给张爱萍批张上书事。张答：「我是接受历史教训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哄抢我军缴获的军用物资。我们急电中央，请中央指示能否开枪。毛主席答：你们这是要中央承担开枪的责任。办不到。要否开枪？你们自己决定。」这位秘书说：「萧克同志上书后，心情非常沉重。6 月 3 日夜听到大街上枪声大作，萧克同志难过地说：这下完了！以后两餐饭吃不下去。」

这位秘书还说，《雪白血红》纪实报告文学一书出版后，王震拍桌大骂：这本书是大毒草。作者与有关编辑都被当局拘留了。批判文章据说都审查过了。很有点「文革」的味道。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不作下文偃旗息鼓了。我想与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批评话有关。邓小平不久前说：「经济上不去，我们一切完蛋！」

1990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下午，冯征（我的老战友，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来我家客厅谈心，先发问：这儿有没有「窃听器」。后走到我卧室谈，着重谈胡耀邦、赵紫阳问题。我说，赵紫阳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上，依着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实践，还有创造性，功劳很大，有目共睹，谁反也反不了。失误不能说没有。一个宏观控制弱了些，一个有些急于求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也有失误。说到这儿，冯插话，你说的前两条对，说四项基本原则有失误，不能这么说，失误到哪儿呢？要有，也是邓小平先说，邓说话随便。冯看来对胡、赵评价很高，认为邓小平与有关同志对胡、赵处理不公，胡、赵蒙冤。几次说外界有人说，包括好朋友魏巍都说老杜（杜导正）是赵紫阳的人。当然你不是赵紫阳个人的人，如说崇敬赵紫阳，在赵紫阳问题上说公道话，说真话，那说你是赵紫阳的人，也没什么不光彩的。要顶住！说到天安门事件，事件的性质与我们大规模开枪镇压，冯说广大参与者是一片爱国赤忱，定为动乱、暴乱是胡扯，开枪更是完全错误。我说肯定会翻案的。天安门我们党中央下令开枪镇压死伤那么多人，这种事绝对错误，绝对要翻案。冯说：「不久就会翻案。」我问对国内政局如此评估的同志，在你们军队高、中层干部中有没有三分之一？他说，三分之一没有，但不是少数。

邓是棋盘高手，现在不说话，紧要关头会杀出来！

199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

散步遇亮亮（陶斯亮）。亮亮说，赵（紫阳）的女婿来我家坐，说赵很关心最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情况。说赵简直是阶下囚了，还日夜惦念国家经济状况，为国操劳。如他主政，他会想出些对策。因为他求实，内行。但人家把他当作敌人对待，自己何必自作多情呢！可悲可叹！

晚，在锡华家。胡羊（《光明日报》老记者）要到朝鲜去。胡从安徽来，说：「今年粮食丰收是事实，但吹得那么凶，有假。」「工业可说一塌糊涂，此次亚运会，大家很反感，一个是大家气不顺，一个是停产闹红火。圣火到处，工厂停工，人山人海看火炬。老百姓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三是集资摊派。生产上不去，生活不改善，靠一个亚运会，大家热情便沸腾起来，可能吗？我就沸腾不起来。「文革」的坏东西又起来了。现在最可怕是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你哄我，我哄你，混日子。我胡羊党培养多年，官可不做，但人不能不做，我要做人，不做官。」

锡华说，听说邓现在不管事，邓说了话，以陈云为首的顶着。去秋陈云就说，「六四」是十年改革的悲剧结果，邓要负责。我说，邓现在不说话，此说不确。即使是事实，我以为也是一种现象。只要邓头脑清楚，必要时他会说话的。邓是高明的棋手。紧要关头，他会杀了出来，扭转乾坤的。邓一生三上三下，总的说，他言行正确，这十年改革开放，邓功劳非别人可比，在开创独特的社会主义中国模式这一点上，他理论与实践成就，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向披靡的毛泽东同志相媲美。古今中外，功勋卓著的人，当然会有失误，不可大惊小怪。中国目前的唯一希望在邓小平身上。我是一贯如此认识与对待的。

乔石说中国不坚持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

199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今日报载乔石考察大别山，内有几段话：「农村政策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在现阶段，它最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能说责任制的潜力已发挥尽了！现在农民很关心我们的政策变不变！」

「乔石强调，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给全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必须明确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今后的发展必须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他说中国经济不坚持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经济工作纵有千难万难，这条道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否则，中国的城市富不了，农村也富不了！」

乔石这两段话说了真话，反映了农民的意志和利益，说明他还能听取意见。从此不可将他看作官僚，但不知他能否不动摇。洪达上次与他个别谈话，他也有还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表示（情绪）。所以，洪达才冒失地向他说了人民对李鹏的看法。乔石未表态，也不能表态。
乔石可能成为中央核心中同意李瑞环观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的一个人物。但愿如此，为党祝福！

199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下午，去俱乐部游泳，遇到曾涛（曾任新华社社长）、阎明复。阎正在换衣间放下小行李袋，面色红润。我上前紧紧握手，向他致敬意。他说他要搬家到万寿路北大楼。去年「六四」开枪前，5 月末，向杨西光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在贵宾室，南排沙发前，他那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我与他站起来说话。那时北京政治紧张到喘不过气来的地步，大规模血腥镇压即刻来临。我说 4 月学潮起始，少数人闹，我甚至赞成过小平 4 月 26 日上午讲话，如迫不得已，我不惜武力镇压。但以后百万人上街，成千上万工人、干部、居民、教授上街，若开枪，后果不堪预料。我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向阎明复建议，说万万万万不能开枪。我说的时候很激动，流下了两行热泪。我说：「如开枪，我退党！」阎明复拍着我的肩膀诚恳地说：「老杜，放心，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怎么会开枪呢？」以后开枪了，阎明复因不坚决赞成开枪，被「清查」免职了，我也很快被「清查」免职了，被罢免了。

今日是一年多来第一次见到他，无限感慨埋在心中。祝他健康。他不足 60 岁，还可以有所为。

199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下午，到广东省中山市原库充大队去。1964 年春我与陈炳光（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一起在这里与农民「三同」，赵紫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志正在这里蹲点搞「四清」。「四清」很左，整日整夜批斗村干部。

那时的「四清」积极分子，有中学生上官婉仪与老农妇陈二妹。她俩还有十几位老农民今日等在村口迎我到村中，还是那条旧路，弯弯曲曲的，旧房子原来多砖瓦的，今日一半旧房还是老样子，另一半全是新建二层楼房。

当年紫阳同志住的那个碉楼还矗立在旧地方，它的北侧，旧房依旧，但南侧、东侧都是新式楼房了。这南边的楼房便是上官婉仪家。她领我们去看她的新居，小院，有一株茂盛的杜鹃花。

婉仪说，她现在当上妇女主任，每月工资三百元，自己种地，一月收入二百元。她丈夫在村信用社工作，月收入五百元，大儿子 18 岁，在打石场做工，前几年月收入至少千元以上。三女儿在本村鞋工厂，月收入三百元。这一家一年的收入至少万元以上。

村干部说，这村几百户，家家有一人做工人或经商，又经营一小部份地，全村户平均收入一万五千元以上。

她们领我参观了「四清」时的公社办公楼，楼内有赵紫阳同志当年与众乡亲合照的横幅大照片。沿街墙壁上新被糊上多幅欢迎我的花花绿绿的纸标语。标语是「欢迎赵紫阳秘书杜导正来视察！」很有意思！

临别，上官婉仪亲切地说：「杜同志你回北京代我们问赵紫阳好！」连续说了两次。陈二妹 70 多岁了，也说：「库充大队人问赵书记好！」

过长江大桥，从左边或右边摔下去，一样都是三十米。

1991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今天下午，应《现代人报》邀请，我与该报采编人员座谈。我谈了一些观点，大家反映还好。现将我的观点记录如下：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论述，实践证明有许多正确的，但某些论断有待纠正、完善和发展。譬如我们以前认为，资本主义一个个企业内部生产是有计划的，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社会生产才是有计划的，因此就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现在，社会发展的结果证明，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了。例如欧共体，就是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分工与合作。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失败，但是如果没有以前这些失误、失败，像「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产生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正确的路线。

1978 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为我党的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总结了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并被大会通过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两个基本点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一个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辨别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只有更快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反对全盘西化，一个是改革开放。我的理解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必须改革开放。我暂且把全盘西化比作「右」，把走回头路比作「左」。这个「左」的、「右」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干扰后果哪个更糟？我认为一样糟。譬如过长江大桥，从左边或右边摔下去，一样都是三十米，决不能说左比右好，说走回头路比全盘西化好〔80〕。

199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到人大会堂宴会厅「团拜」。许多大桌都空无一人，约有 500 个空位子罢。这是我从广州调来北京十几次年团拜中，属首次。江泽民讲话，特别是李鹏致辞时，掌声零零落落。李鹏讲了一句好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要动摇。曾建徽（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徐惟诚、袁木在桌子间穿来穿去，想看到什么朋友罢，好做文章。曾建徽两次过来要与我握手，我扭头去了。

中午在小燕家家宴。她亲戚不少，都是 40 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位哈尔滨医院医生，说：我来天坛医院学习一个半月了，这儿的医护人员，尤其青年护士，私下说话，真吓死人啊！他们说，我们北京几百年没有任何政府这么开枪镇压人民的，日本人没有，段祺瑞没有。这笔账非算不可的。一位音乐学院老师说，中国共产党，你们这些老一辈人，结束了军阀统治，统一了中国，这功劳磨灭不了。但你们一代代这么整人，把人往死里整，连胡耀邦、赵紫阳都这么整，这能说明你们这个党正确吗？毛泽东在世时，你们那么肯定他，一死，不是该否定的都否定掉了？今天这么说，这个党如何如何正确，说得天花乱坠，明天呢？

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比邓小平早一年说：「没有十年改革，去年『六四』风波我们顶不住！」

1991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3 月 26 日，《现代人报》整版发表了我的珠江三角洲采访札记，昨日他们电话告我的。我这篇长篇通讯万

余字，内有六个插题：「似乎比太湖流域还要繁荣些」——珠江三角洲印象之一；「富裕源于产业结构的两个变化」——珠江三角洲印象之二；「没有乡镇企业，中国式社会主义不存在」——珠江三角洲印象之三；「东莞有今天，全靠中央给了好政策」——珠江三角洲印象之四；「这是不是一种雇佣劳动及其它」——珠江三角洲印象之五；
～～～～～～～～～～～～～～～～～～～～～～～～～～～～～～～～～
〔80〕我这个讲话后被全文刊在《现代人报》上，大标题就是这个观点：「从左边或右边摔下去，一样都是三十米」。

「十年改革究竟好不好？谁有意见，请他到我们这么看看」——珠江三角洲印象之六。

整篇长文，是 1990 年尾到 1991 年初林若陪我在珠江三角洲转了四十天后写下的。党内目前复辟反复辟斗争激烈，尤其是在是否继续搞包产到户，搞乡镇企业等农村政策上分歧严重。此番下乡，原本只想进一步摸摸情况，解答头脑中的困惑，连笔记本都没有带。后来，看着，听着，越来越兴奋，便情不自禁地要记录下来。先是掏口袋里的纸片记，后来索性买来笔记本做起了正式记录。这篇文章就是这些记录整理后写下的。

让人兴奋的，正是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它已完全不同于我当年在广州工作时的印象。一路走来，我发觉珠江三角洲的富裕与繁华，已超过江苏省的苏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公路两侧都是农民崭新的住宅，二、三层的小洋楼一片连成产一片。南海县大沥镇和西樵镇，都是各有两万多户的乡镇，农户银行存款平均两万多元；每两户中有一户有摩托车。我还听说，顺德县比我看的这些地方更加富裕。

一路的所见所闻，都在在说明邓、胡、赵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功。那些反对包产到户，反对乡镇企业的观点，鼓噪所谓反和平演变的，简直非常可笑。

对这些，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在实践第一线的干部群众的心声。他们说的都是大白话，我几乎是原话照录，直接搬到了文章中。如新会县委副书记冯天佑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必须工业化。农村没有乡镇企业，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存在。这十年放开手让农民办企业，我们县的乡镇企业从几千万元搞到十三个亿。我们的体会是：乡镇企业搞得越好，农村政治情况就越好，我们的工作越好做，党的凝聚力就越强。」东莞市副市长是本地人，从村支书一直做上来的，他陪我参观时，一路上左一句右一句，说了许多心里话。他说：「东莞有今天，全靠中央给了好政策。说来稀奇，东莞这地方还是那块地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干部呢还是我们这批干部，只是政策变了，群众就爆发了无穷无尽的能力！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政策变，把十年的政策变掉，那样，人民完了，国家也好不了。改革，这么大的试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出点问题很正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防止以次要的否定主要。从我们这里看，政策变回去，社会肯定大乱。我们八千个企业，养活了外省和本县七十万打工的人，他们在家种田一个月收入三、五十元，在我们这么做，收入是二、三百元。你政策退回去，这七十万人怎么办？」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讲的更为精彩。他说：「十年改革，我概括五条成就，五条经验。成就，一是建国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二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十年；三是社会最安定的十年；四是人民心情最舒畅的十年；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最明显的十年。没有十年改革，去年『六四』风波，我们顶不住！」〔81〕

1991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

洪达说，杜星垣在深圳看了万里，说起赵紫阳，万里说：「他有什么错!?」杜搞点调查报告，很认真，田纪云说：「我都管不了，你那么认真干什么？」田纪云在四川曾是杜的助手。洪达意志消沉，说这个党没有救了，我只当是小民百姓，吃吃玩玩算了！
～～～～～～～～～～～～～～～～～
〔81〕《现代人报》发表的这篇采访记，同年春被《羊城晚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转载。文章发

表在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谈话前一年。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的「没有十年改革，去年「六四」风波，我们顶不住」的话，与一年后邓小平南巡中的谈话，简直一字不差。

199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读文件，《清样》载陕西省委书记张一段话。说一手硬一手软，我不理解为何将硬的一手软下来。搞活企业的各项政策，必须继续坚持，但有的地方现在搞企业整顿，收企业的权，卡企业；承包要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但现在解释为只照顾国家一头利益，扩大再生产有什么不好？过去企业改革，简政放权，现在模糊了；招工权，过去给了厂长，现在收回了；30%的职工晋级权，过去厂长定，现在这权也收回去了。真改革的政策措施没出台多少，一年来，批了一通能人治厂，又搞了一阵核心与中心，又搞了反厂长特权，奖勤罚懒也不敢提了。好了，这样，我们企业我 1985 年承包，几年内固定资产增十倍，产值增四点五倍，年利润增四倍。现在很困难。

陕西省委书记说的这种倒退的做法，最近不知为什么，现在突然偃旗息鼓了。我想与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批评话有关。邓小平不久前说：「经济上不去，我们一切完蛋！」

小平同志这句话入骨三分。古今中外，尤其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把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当作第一位任务，作出成绩，终究统治不下去。赵紫阳同志有一句话是对的：「保加利亚一位党的首领说过，一个国家不能靠信仰生活。在战争时期对广大人民来说，另外对共产党人来说，政治思想工作能起决定作用；和平时期对广大人民来说，改善物质生活，能否生活得好，起着决定作用，政治思想工作起不了决定作用。」

读《清样》三六六期，上载〈还俺种田的自主权——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呼声〉。小岗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祥地，是第一个获得种田自主权的地方，实行改革以来，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活逐步改善，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1990 年又大丰收，家家粮食吃不完。但这里农民现在也眉头紧锁。支书说，现在农民的自主权少了，一切照上面的指令办，种什么作物，也不管条件，一刀切下来，不想种就强迫你种。搞形式主义，大路两旁都种水稻，以大路为线，搞定向栽培。严宏昌（带头搞包产到户的那位农民）的妻子说，我对种烟最反感。我们这里从无种烟习惯，不会种，不会烤。我家两年种了四亩烟，只收二十来斤烟叶，一亩上级罚我们一百元，我倒贴二百元。如改种花生，亩产可四百斤，一斤八角钱，还能收三百二十元，四亩地就多收一千多元。现在农民没有种田自主权，负担过重，我们向上级反映，上级说，不要老躺在大包干的功劳簿上，不能干就算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话不说了。你叫咋种就咋种，咋罚就咋罚。

199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晚，张广友来，说邓小平打电话给万里，打招呼：「不要逞能！」大概是说不要提与邓不同的意见罢。广友说，因为万里一直不同意现在这么处理赵紫阳，说赵有什么错！万里原先情绪很坏，近时略好些。万里劝田纪云，说你有三种做法：一、辞官不干；二、紧跟上头；三、挺着肚皮干。田接受万里意见，照第三条做。在济南二月会议上，说不要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一定联系起来，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不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定联系起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说这是邓的话，今年春说的，他说田纪云 2 月份就讲，胆子够大了。改革开放的旗帜，现在又热门，都在抢，都在说，连李锡铭、李鹏也大说特说。李鹏前时还说，改革在整顿治理以下，服从整顿，现在自己给自己解释说相互结合，可以并行。广友说，万里捎话给杜润生不要检讨。张说，我前不久拜访杜润生，杜将你的文章（指我 1991 年 3 月〈珠江三角洲札记〉）拿出给我看，说现在就是要像杜导正同志一样，用现场动人的事迹宣传十年改革的成果，说明改革开放路线不可动摇。文章很好，你读后退我。

1991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下午将埋藏在阳台陶缸内的 1989－1990 上半年的日记取出。是去年初夏时埋的。日记用塑料纸包了三、四层，又装在铝合金饭盒内，先放在大缸里，盖上玻璃，玻璃上又放一缸，缸内种了牵牛花。那时心中有种恐怖感，脑子里还有「文革」噩梦，只怕有人来抄家，如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便完了。「六四」后，我含着一腔悲愤，惦念着我的党、我可爱的国家，受到如此糟蹋，又不能说话，因此唯有通过写日记，记下这心里淌血的日子。

看望李普。李说，近时两种力量短兵相接。受邓力群支持，中国人大（人民大学）的何新，还有王××，在宋×支持下，开会正式讨论十年改革开放的失误。何新说，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不是什么发展生产力，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会上有人说，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邓小平说的，邓力群说，「管他谁说的！」

199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

《解放军报》转载我的〈珠江三角洲采访札记〉文章看到了，我那句引谢明仁注目的话「没有十年改革，『六四』风波我们顶不住」没删去。此话会引起许多读者的议论的。

洪达来坐，说杜瑞芝等在深圳看望万里，问目前国民经济发展趋势。万里说，这么搞维持不下去。锡华说，张汉青（时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陪习仲勋，习说，「说胡耀邦有些错误，还说得下去，说赵紫阳有什么错误，便说不下去了！」

1991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晨，王×（国家新闻出版署处长）从四川省绵阳老家回来后来访，说四川人民不满我官员，编了以下歌词：

远看是只狼，近看是「工商」，你说他是国民党？他戴着红领章。你说他是共产党？
又吃又要抢！
大盖帽，两头翘，
手里拿着防风罩（抽烟用的打火机），
兜里装着避孕套，
吃了被告吃原告。

说杨汝岱顶住了李鹏砍乡镇企业风，所以四川日子好过。从四川看，经济未走出低谷。「与我要好的人说，农村布满干柴，一点就着。」说四川社会秩序现在很坏，我回绵阳当日，一时装模特儿连小保姆被勒死在宿舍中。

王说，香港消息，小平说，赵紫阳聪明，点子多，但听不进意见。不要都批，都批了，中国党史便没有了。王说，赵紫阳专案组内一人说，对赵的结论已作出，但不敢公布，因与十三届四中全会结论太不一样，即四中全会说，赵支持动乱分裂党，现在是「赵支持学生动乱」，王说，赵紫阳项目组的人，都接受了「文革」中搞刘少奇、邓小平以后被翻案的教训，非常慎重！

1991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

上午，杜星垣来坐。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研究室编辑的《昨日要情》上，已第三次登了有关赵紫阳同志问题，希望及早处理的下层意见。最近一次是今年 7 月四川省上报学习江泽民「七一」周年讲话，

文末一段话说，赵问题两年了，该有个结论了。说中央给赵打招呼，要赵作个检讨，中央好下台阶，赵就是不检讨。说经济工作中有问题，我查查可以，别的我不能说。传说可安排政协副主席，赵也不干。

杜星垣又说，鲍彤只承认一条错，即 1989 年 5 月 19 日戒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对戒严意见不一，赵反对，李鹏哭了，说我是烈士后代，要戒严，争论激烈，鲍彤是政治局常委秘书，到会晚了，出门便有人围上来询问，鲍答：「内部意见不一致。这是泄密。别的我没错。」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1991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到萧克家开会。休会时，萧一位秘书告我说。不久前小平同志将政治局常委召去，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都应保护与支持，在坚持公有制主体经济的前提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企经济，都应得到适当的发展，不能忽视，更不能取消。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不要搞任何片面性。

这一时期，宋×、王××等人在李鹏支持下，拚命批判生产力标准，批判改革开放，天天反和平演变，天天嚷着姓社还是姓资。小平这番话明显是针对这种局面说的。赵紫阳听到江泽民在重庆鼓励人们说真话消息后，高兴地说，求上帝帮他一生能持这种求实态度。

1991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

下午到萧洪达、杜星垣处。

星垣说 9 月 1 日见到赵紫阳。紫阳说，江泽民同志到重庆市，与一模范大中型厂长谈话。江问：「大中型企业要搞活有没有『招』？你跟我说实话！」答：「没有『招』！」江说：「你说了老实话！」赵紫阳说这是重庆市一个负责同志近日亲口跟我说的。赵听了此话，很激动地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招」，今日最、最、最要紧的是中央最高决策人，能不能听到真心话！敢不敢听真心话！会不会整说真话的人！毛泽东同志伟大了一辈子，晚年喜欢听奉承话，喜欢听假情况，被奸佞小人与政治投机分子利用，「耳又聋来眼又花」，吃了大亏。以至于发展到「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差点儿灭亡。今日江泽民同志能说这句平凡的但真正伟大的话，对说真话的干部予以肯定、予以表扬，这使人心花怒放！我党或许有救。求上帝保佑他，帮他一生能持这种求实的态度，生民是幸！他作为领袖也是积了阴德。

杜星垣还说到前不久《人民日报》那篇〈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发表前那晚，电视广播此文时还有「姓社姓资」一段话，次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字时删去了。星垣说是江泽民打了电话要报社删去的〔82〕。

星垣说今日看《清样》，有一段话极好。说农村家庭承包制后，农民说：「有房有地不靠你，有粮有钱不求你，有了困难就问你，你不解决我骂你，你若整我我告你！」我说，这几句概括了我们十年农村改革后新型干群关系。虽属偏颇，但反映了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种欢欣鼓舞的解放感，那种主人翁感。这是继我们「土改」后农民第二次精神大解放，是今日中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这种「改革」，「六四」我党顶不住！

199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上午，约洪达到星垣家坐，星垣说，此次八中全会通过农村问题文件，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路线、政策。原来宋平搞的农村大纲，是马上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得到王任重等的支持。江泽民咬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才重新起草。看来，江泽民愿意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虽无新见解，胆子小，但能坚持总是好的。

昨晚刚来我家服务的小姑娘芳芳，真切地说，叔叔，现在农民最怕政策变。我们家承包了五亩苹果地，每亩种八十棵，一棵树苗二元买进，一百六十元，另外每年向大队上缴管理费四十元，共二百元。八年后成

果，前后投资上千元，这农村政策如果一变，农民便毁了。

农民天天怕政策变！因此不敢投资呢！

这种心情我深知，但感动不了教条主义者，「左王」们！洪达、星垣与我还说了紫阳问题，历史是公正的老人，迟早会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只苦了他了，牺牲自己罢！

199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晚，洪达来说，前几日遇到赵紫阳。说，赵身体好，练太极拳、气功、练字，看大本参考数据，看得仔细，还在数据上圈圈点点，不久前，写过一信给中央，说原允许我去北京碧云寺区散步，每周一次。现在天冷了，能否扩大几个点去散散步呢？「上级」拒绝。「上级」要王任重去找赵，以保障赵的安全为由拒绝。王任重此次算知趣，拒绝领受这一任务。以后一直无消息。

洪达又说，赵 1989 年四中全会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发言，即那个《我的发言》，会议限定他十分钟，赵不管这个限定，快读了二十分钟。当时政治局委员参加，叫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不少人列席。会议由李鹏主持。原意，赵保留中央委员。赵发言坚持真理不认错，李铁映发难，主张清除（赵）出中央委员会。表决时，李鹏宣布，到会的都可举手！这不是胡闹吗！以后四中全会正式开会，赵又要求大会就自己的问题发言，大会拒绝。赵要求小组会上发言，又被李鹏拒绝。

1992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

～～～～～～～～～～～～～～～～～～～～～～～～～
〔82〕此事发生在 1991 年 9 月 1 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第二天即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其中两次提到「要问姓社姓资」的内容。然而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上，人们却没有看到「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当时不知道，后来事后打听到我才知道，就是当天江泽民总书记听了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宣部长，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中央的机关报，一个社论两个版本，这在中共的新闻史上还是没有的，这个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

我在广州休息。下午，杜瑞芝来谈。不断传来邓小平、杨尚昆近日来广东考察的零星消息。传说中的消息是：一、邓在武汉火车站散步时与关广富（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说，「现在国家的主要倾向是左倾」；二、邓在深圳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还可以大些，步子再快些」；三、「广东在全国开放改革中要做龙头」；四、「现在打开电视，都是开会开会，接见、表彰，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嘛」！五、杨尚昆在深圳时说整顿治理，不能把好的政策整掉嘛！
又说，紫阳同志对国事看法（是）：一、中国改革是大势所趋，谁都改变不了；二、邓去世后，也有可能出现短暂逆流，但它是短命的，会引起大乱子。对苏联，认为俄罗斯资源丰富基础好，如与德、日连手，几年后，经济可能腾飞。

政治局会上，田纪云当面责宋平淡化包产到户意见，
疾呼中国抛开包产到户，中共肯定完蛋！

1992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

今晚洪达、我邀赵紫阳大儿媳来宾馆聚聚。她说，田纪云叔叔前段与我谈：「跪着死站着死一个样」；田说，「八中」政治局会议，宋平提出农村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淡化，发展农村经济要放在次要位置。这很错误！很危险！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田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除了拍桌子以外，什么话都讲了，田说抛开包产到户发展经济，搞什么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肯定完蛋！万里支持田。说农村工作中央分工由田纪云管，怎么突然由宋平管，什么道理？李瑞环支持田。别人不说话。李鹏反对田。会上多数支持田的意见，反对李鹏、宋平意见。

赵的儿媳说：「赵紫阳现在生活规律，晨打太极拳，饭后气功、看书，午休、练字。晚上听 BBC，眼睛有白内障，他桌子脏他看不到，我看到了，他不信，说桌面上干净！」「他别的系统都好。心脏好，肝脏好！」

洪达与我送一份小礼物给她，代问赵紫阳好。很感人的。

1992 年邓小平南巡，猛烈反击明反赵实批邓的左倾狂潮！
说谁不搞改革谁垮台！

1992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

下午 3 时，在广州珠岛宾馆，牛振午（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等来看我。牛振午系统地概括地谈了邓小平此次南巡讲话要点。以后，广东老书记任仲夷来，说他看到了小平在深圳谈话记录稿。谈中间，另一老书记林若来，我们议论了一下。牛振午与任仲夷谈的与我在广州不断陆续看到的更原始的记录大体相同。因此，我补充了小平讲话要点是：一、深圳特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反对。现在实践证明，特区政策成功了。二、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再过二十年，就总体说，会超过香港，某些方面不如它。这就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东做了龙头。今后十年要继续做龙头。四、「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垮台！谁反对改革开放，请他睡觉去。」「当前国内主要是左倾。」（我说这句话是小平在武汉车站与关广富说的。任仲夷说小平在广东也讲了类似的话。看来此话属实。）五、「马列的书我读的不多。我就是胆子大。我看重实践。群众去试验，成功了，坚持；错了，改正。包产到户就是农民创造的，赵紫阳与万里总结推广的。」六、现在打开电视，天天开会，天天讲话，哪有那么多话讲。社会主义靠这个不行。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83〕

陈开枝处传来消息，邓身体好，非常高兴。走在哪里，便与广东同志一起照相。

林若说，邓小平一面吩咐，不要报道我的讲话，另一面，他走在哪里，众多的录音机放在他身边，他并不干预。说明他希望将他的讲话传出去。

任仲夷说，邓此次讲话，非常好，必在全国引起震动。

萧与我认为，邓这是有感而发，已到了非讲话不可的紧要战略性关头。一是我国又面临腾飞的机遇。错过去，越南都会跑到中国前面去；二是国内大体稳定了；三是李鹏等人很猖狂地反邓的路线。这材料估计被邓拿到。邓此次是猛烈反击，然后很可能采取重要的组织措施。不然他这一套救中共救中国的惟一正确主张就放空炮了！

邓南巡后又到首钢、东北呼吁改革！群众又动起来了，势不可挡，非常喜人。

199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

杜星垣来，谈了几条：一、小平南巡讲话回京后，又去了首钢发表谈话，近日又去了东北。目的在推动改革开放。在首钢，他说了放权；说 6%的发展速度等于倒退，错失时机，后果不堪设想。小平说：「他们（意指江泽民、李鹏）不懂经济，我不懂经济，但我能听懂经济。朱镕基懂经济，为什么不用！」小平说，「速度上不去，就下来嘛！」二、现在核心是人事，李鹏必须下。朱镕基、刘华清要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中央顾问委员会肯定要撤销，如有能力，成立个顾问小组，将赵紫阳、杜润生等组织进来参谋。四、赵紫阳「十四大」后，小平说了，「给他自由！」赵肯定得到自由了！五、我刚从四川回京，我又去了上海，改革开放在下边又确实发动起来了，势不可挡，非常喜人。小平现在是发动国内群众，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更有生气！

1992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冯征拿来「首钢」传达小平到首钢活动讲话原始记录稿。小平 5 月

22 日到首钢，有李锡铭、陈希同、邓楠、卓琳陪同。小平讲话约四千字，要点：一、要放权。首钢曾立项上报，国务院长期不批。将发展机会错过了；二、国民经济 6%的速度发展等于倒退。第二台阶，靠第一台阶补，第三台阶，发展上去了；三、「我（现在）说了也不灵」明显将话锋对准现任的江泽民、李鹏，即江、李体制。说明小平真急了。
大家请吴塘读，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专家）、我拚命记录。

199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晚，与洪达在锡华家坐。锡华说，外电报，鲍彤一案已在北京中级法院判决，罪状是泄露国
～～～～～～～～～～～～～～～～～～～～～～～～～～～～～～
〔83〕1992 年 1-2 月，我和萧洪达应林若邀请，来广州休养。邓小平来广东后，有萧洪达、林若的老下级随行。这位老下级几乎每天将邓小平的谈话寄给萧。所以，我俩能及时看到邓的原始谈话记录。
家机密，支持动乱（锡华说是反革命煽动），判刑七年。鲍彤一概不认账。他妻子，在美国的儿子要求上诉高级法院。外电评此案如此判决，一是可能为赵的问题划句号，为「六四」划句号。也可能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遏制。友人以为鲍彤一案，是个别人制造的类似希特勒的德国莫须有的「国会纵火案」，子虚乌有，目的在击倒赵，击邓小平。他说这件事，可恶极了，判鲍彤案的签字者，未来会押上人民审判台，历史也必将他们的姓名钉在耻辱柱上！

199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洪达夫妇来锡华家玩，我与老伴去陪。说起十四大人事，洪达说，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处理「六四」事件不动摇第一；改革开放第二；这点上，他与陈云相同，因此人事上不可能有大调整，这带来后患。说邓身体有病事，他一再警告勿外传，这是核心绝对机密。最好朋友也勿说。我托他给赵紫阳同志带去《炎黄春秋》杂志第七、八两期各一册，山西老汾酒一瓶。我在杂志扉页上写了几字：「紫阳同志：国庆好！保重！合家好！杜导正率全家敬你！」他爱喝两口，选一瓶老汾酒给他，以表点心意！真难死他了！冤死他了！一代功臣，一代豪杰，一代领袖的悲哀！我代天地为他哭嚎！

1992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

晚，洪达夫妇来。洪达悄悄与锡华和我说：「下周十四大，已通知我列席。我去。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问题，已作出决定，审查定案；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关于赵的原决定；老党员了，原生活待遇不变；要乔石与赵本人谈话。」我说，「历史会作出正确决定。现在这些决定只能是短暂的，但也好，可人身自由了。我们要快去探望！」洪达说：「还要看看安排，一窝蜂去也不行。」

199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

补：11 日晚，锡华电话告：洪达打电话找不到你。锡华与我今日下午赴农展馆，路上送我一纸条，上写梁伯琪电话号码，轻声说洪达要你先与她联系便可看望。洪达说，我去看了，说近日有些熟人要看你。赵说，我这里没有困难。12 日下午 8 时我拨号码叫「大姐」，对方是年青男人的声音，说「梁在后边洗衣服」，「过一会儿来电话！」我说我叫杜导正，他答：「过一会儿再来电话！」显然不很正常。照说，赵紫阳已宣布审查结束，也恢复了自由，但中国政治历来谲秘多诈，加十四大开幕，首都政情也确较前复杂，外国几百个记者盯着所谓热点，赵当然是中心之一。组织上加强警戒也说得过去。

晨，洪达来电话，说：「我也是先叫于华（萧洪达夫人）打电话找梁伯琪。先找到传达室，传达室传进去话，以后说等电话再答复。次日梁来电话，可立即去。我去了。」
赵受了三年监苦、委屈、孤独，日子自然很难忍受的。现在可以见见人了，算是苦中一点点酸楚的甜味罢！

乔石宣布中央对赵的处分决定。赵明确拒绝接受！

199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杜瑞芝从广州来说：10 月 8 日，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找到赵（紫阳）家谈话。乔石主讲，掏出发言稿读，声音低微。赵说，你声音大些！乔石讲几条：维持 1989 年 7 月中央四中全会关于你错误的决定。同时宣布审查结束；政治局同志很关心你身体健康，以后一切生活待遇不变；外出时给组织上打个招呼；希望顾全大局。赵说：「一、我不同意中央关于我错误的决定。二、我只在会上提出『六四』风波处理的几条意见，这是正常的，总不能说是分裂党。三、我只出京打过一次球，为什么以后监禁我？（此时，赵声音激动）。四、以后给我人身自由，自由活动。五、对我的决定，要求给一个正式文字的东西。六、我不接见外国记者，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乔石等答应，将赵的意见向政治局上报。

199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今日，（中共）十四大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接着举行闭幕式。大家屏息以待。中午过后不久，杜瑞芝同志来坐。他说，10 月 14 日上午我去看望了赵（紫阳同志）。我静静地听他讲，偶然插几句话。

杜说：「杨氏兄弟突然失宠，简直一抹到底，近因是在邓处，杨尚昆说：『我下，杨白冰上，进入政治局常委。』此话引起大家与邓的反感。远因是对『六四』，杨尚昆不够坚决，邓有怀疑，对杨产生了疑心。」

杜说：「赵说，邓的基本思路是经济上大开放大发展，但政治上，中共领导权，中共领导的政权，是绝对权威，不容任何挑战，谁挑战便要坚决制止，包括镇压，不惜采用武装手段。」
杜说：「赵说邓的内心世界有两条：一是改革开放路线。此次十四大，改革开放路线写入十四大文件，合法化了，他向上帝有了个交代。万一出事，也是十四大负责；二是『六四』事件，这是邓的心病，他非常担心别人算账，所以一再说，『六四』事件上，一点口子不能开，坚决维持原结论，绝对不许翻案。（因此，鲍彤案，他要求重判，判了七年徒刑）。对赵紫阳案，他不许翻，此次九中全会决定维持原结论，即赵支持动乱，分裂党中央。」

杜说：「赵说，邓是绝对专权的思路，邓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无个人专权、独断，无一政党专权独断，天下便要大乱，什么事情干不成！邓常说，只能一个婆婆，不能有两个婆婆。邓在这点上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决的，绝不含糊的。」

杜说，「十四大」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但政治体制改革未触及。赵说，十四大后看新班子如何处理这个政治改革的问题。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政治上有两种改革方案：一、加大政治民主、政治自由；二、继续目前这种我党、苏共一贯的集权专断办法。如照第一方案，我们党会成功；如照第二种方案，肯定会出问题。

杜说，江泽民一身四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经济领导小组，是邓建议建立的。这个小组，江是组长、李鹏任副组长，朱镕基是副组长，大部份实权交给了朱镕基，李鹏实际上被架空了。

杜说，赵面色红润，头脑极清晰，头发全白了。赵表示，我非 50 岁的人、非 60 岁的人，我已 74 岁了，

在中国条件下，我余下的时间只能表示沉默！

杜说，赵最难过，觉得委曲的是，他对邓忠诚，绝无二心。虽然见解上有不同，但在感情上、态度上是很信任、很尊重邓的，怎么就一下子被整掉、说我有野心呢！赵说，1989 年 4 月末，我出国朝鲜前请示邓，邓小平还说：你再干两届！还那么信任我。

赵说，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是作为总书记的会谈。以后邓谈，邓说，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即中共两党、两国恢复了正式关系。

外界对此有反映，说邓非中央委员，更非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应叫正式恢复了（两党）关系。于是我出面解释，说邓是中国的最高领导，附录目的在维护邓的威信。赵说，戈尔巴乔夫回国途中发来一份电报，说你们中共出现一个

赵紫阳，这是你们中共的幸运！这个电报，估计给我帮了大倒忙，惹恼了邓小平，邓小平极不满。

赵想 11 月份赴广东。

附录一：

赵紫阳同志会见索尔兹伯里〔84〕的谈话（1987 年 11 月 5 日）

赵紫阳与索尔兹伯里的谈话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精彩的表述：十三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条路线，当然「十三大」对这条路线的表述更完整更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先有了这个理论，这条路线，才去实践。实际情况是人民在那里创造，如包产到户等等，我们用求实的精神加以肯定、推广。立这条实事求是路线，邓小平有大功。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应中国新闻出版署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新长征的书，1987 年 11 月 5 日，赵紫阳同志接见了他，就我国当前改革、开放问题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了重要谈话。

索尔兹伯里由我陪同，与赵紫阳谈了两小时。我是顺手记录的，翻译是徐慰曾。这份记录是我与徐二人共同于同年 11 月 11 日整理成的。

这个谈话很精彩，但从来没有在媒体发表过，故收入本书。谈话原文如下：

赵紫阳同志会见兹尔伯里的谈话

（1987 年 11 月 5 日在中南海二○二贵宾室）

索尔兹伯里（以下简称索）：你们的十三大开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现在你们是新的领导人，在新的时期，用新的思想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我是非常高兴的，你和我都是同样看法罢！

～～～～～～～～～～～～～～～～～

〔84〕索尔兹伯里（1908-1993），即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曾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二战时深入前线着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曾获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和多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1972 年及以后曾五次访华，访问过中国许多高层人物，大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走了一遭。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于 1985 年 10 月在美国出版，次年出中文版。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

国内对我们这个会议看来很满意。国外的反映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在「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表述了在这个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条路线，当然十三大对这条路线的表述更完整更明确了。

这条路线在我们国家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原来的认识并不很清楚的。这条路线为什么使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问题就在于这条路线符合中国的国情。坦率地跟你这位老朋友再说一遍，开始的时候，我们搞改革开放，并没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并不是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出发去改革去开放的。我们是从实际出发的，从实际出发搞改革带来了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论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完整地提出三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希望全党同志考虑任何问题只能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毛泽东同志的行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贯彻到他的晚期，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毛主席的行动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你已经知道我国农村改革是从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我们的工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开始的时候，这些做法都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来源于基层来源于人民的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具体地讲到这些办法，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一条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效果看，尊重群众的创造，一切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三中全会有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因此当基层出现了包产到户这些办法以后，我们不是象过去那样，马上简单地把它否定掉。这些办法，群众中的这种创造实践，在 60 年代初也出现过，那时就叫做联产到户，各地方都出现过，工厂也出现过自负盈亏，也出现过工厂要重视利润。但是，当时我们的思想路线不对头，把这些都作为修正主义压下去了，批判了这些东西。这一次就不同。1978 年以后出现了这些办法，我们采取的态度与 1962 年就不同了，我们很重视这些新生的事物，我们要看一看这些办法的效果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了这些做法对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很有好处，我们就把它肯定下来。那时我们还没有预料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给农村带来这样大的改变，对农业生产带来这样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只提出，包产到户只在一亿人口的地区，交通条件比较差，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先搞，为什么呢？就是还想再看一看。我们当时并没有在全国马上推广它，而是说，究竟怎么搞好，请各地干部群众自己去创造，去选择。当时有人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说，可以。结果联产责任制效

果很好。这样，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推广开了。当然具体形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一开始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但农民和干部都不愿意说它是包产到户，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我所工作过的四川省，下面也叫做包产到组。名义说，只有养花的、养鱼的专业户搞了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普遍地搞了包产到户。）我给先生介绍这段历史，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重申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前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那么农村出现的这种改革，城市的改革都不可能受到我们的重视。可以说根本就发现不了，更谈不到发展了。小平同志在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我国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一部份农民脱离开土地，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叫做乡镇企业。比如温州搞的乡镇企业，各地方也搞乡镇企业。这个，开始也是少数人搞，以后效果很好，我们看准了它的经验，就把它全面推广开。人民中的这种创造，被我们承认，被我们推广，得到这么大的好效果，在起初我们又是看得不那么清楚。以后工业也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生事物，比如合股、租赁、债券，我们也都是这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人民群众在那里创造，我们看一段，看准了就加以推广。

国外有人说，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国内的人很支持这种改革，但是心里不是很踏实，都说效果不错，但是解释不清楚，在理论上说不清楚。「十三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份阐述，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以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普遍的赞成，我想原因就是这样。过程是这样的，三中全会根据几十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即从实践出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后群众在那里创造，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第三步我们总结了群众的这些创造加以推广，并完善了我们的概念，完善了我们的理论。这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这个理论对我们今后的实践会起很大的作用。我希望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反映出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过程。

索：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你刚才介绍的情况，你把中国的改革作了简明的介绍、解释，当时（指 1960 年）你们情况很困难，农民就提出联产责任制，这个办法本来就很好的，但是毛泽东不赞成。70 年代末，中国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你们碰到同样的状况，为什么就能很快肯定群众创造的联产责任制呢？请再谈谈你的感受。

赵：我个人是很相信这套东西的。因为 50、60 年代，我在广东工作，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58 年我们搞大跃进，失败了。失败以后，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农民为了渡过这段困难，自己想出办法，就叫做联产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结果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都恢复得快，农民生活都好一些。当时为了渡过这个困难，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但是觉得包产到户这个提法太危险了，我就把它改了个名字，叫做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1962 年秋在北戴河开会，我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是人民公社的高级的管理形式。起草文件后，我送给陈伯达看，我问陈伯达，这个文件行不行，他不置可否，他说，最后看毛主席怎么说吧。当时类似的这种做法，许多地方都有，安徽叫责任田，所有搞责任田的，情况都比较好，死人都少。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毛主席否定了它，否定了包产到户，批评「三自一包」。我幸运，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是我在广东不得不停止这个办法。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一听到安徽搞包产到户效果好就深信不疑。为什么呢？就是前面说过的，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听到小平同志，听到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要从社会效果出发这样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联产责任制效果很好，我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一听说安徽这样搞，我就放心地在四川搞了联产责任制。至于农村的改革为什么先在安徽、四川搞开？因为 1962 年曾希圣在安徽那里搞过联产责任制，我在广东也搞过，所以安徽、四川这两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我说的这段历史，杜导正同志也清楚，当时他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

索：我也可以作证明，因为我在沿长征路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能不能说，中国数千年的历

史当中，现在中国农民生活是最宽松的？

赵：这个，还要研究一下。中国唐朝有个「贞观之治」。听说那一段农民生活不错，当然还要研究。但是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现在可以说是最好的。还有一段，就是土改、初级社那一段，中国农民生活是不错的。现在你到农村去问，解放以来什么时候生活最好？农民都说，现在生活最好，另外就是互助组、初级社那一段好。现在可以肯定，中国农民生活，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是最好的。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作为领导人敢不敢承认事实，敢不敢承认事实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否符合你的主观愿望。

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的实事求是。当时中国党内的另外一些人，要按照欧洲的办法搞，结果那套办法不行。

赵：噢！噢！索：毛泽东这么聪明，为什么到他的晚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走到另一方面去，为什么呢？

赵：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做了很好的回答。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加工的产品好不好，首先取决于材料来源，还有就是加工的能力。毛主席到了晚年，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很难反映到他那里。50 年代毛主席除实地考察外，还做到了好话要听，不好的话也要听，后期他就不行了。57 年反右扩大化，59 年反右倾，党内的关系太紧张了。所有向上反映的情况，都要考虑毛主席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所以我们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党政要分开，搞社会民主，首先要解决党内的民主制度问题。搞政治体制改革，发扬党内外民主，我们这样做时，尽管可能会不那么方便，但是可以避免大的失误。

毛主席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些观点都是很对的，但毛主席晚期，因为党内生活不正常，虽然他自己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行动和这些道理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很多，因为我是远距离的，中央其它的老同志看得比我可能更清楚些，但是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当时对我来说，感受也是很深的。

1961 年春天，国民经济很困难，毛主席找我，我说了几件事，他都赞成。我说征购粮的问题，农民是希望一头搞死，一头搞活，意思是国家征购的数字是死的，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国家要多少定下来，别的归他们自己支配。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农民希望定下来，是这样」。我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的人希望国家要他上缴多少粮食、多少东西也定下来，毛主席也同意。那个时候正在搞食堂化，食堂浪费很大，农民又吃不好，拚命吃。我举例：小孩子闹肚子，不吃饭少吃饭，他爸爸揍小孩，说饭是公家的，吃饭不要钱。我说农民自己在家吃得好，毛主席当时也同意。所以毛主席的晚期，主要是完全不了解情况。有人说，当时毛主席对国内的情况没有对国外的情况了解的多。

索：我向中国很多老同志了解过，他们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错误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比如食堂，比如公社。

赵：毛主席打了二十二年仗，他指导战后中国的建设和工作的时候，往往使用战争时期的办法，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战争的时候，开始的红军，后来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当时是不谈物质利益的，也不可能谈物质利益，但是仗打得很好，所以毛主席非常相信供给制，非常相信思想工作，不相信物质利益。再者，毛主席过去指挥战争，主要运用了运动战的战术，部队经常大转移。毛主席战后搞建设，也搞过几次大转移。开始建设内地，不建设沿海地区，而中国那时是沿海地区发达，他却要在内地搞。57 年以后又要搞沿海建设，把内地的经济向沿海转移。64 年又要备战，又把经济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就这么来回调屁股，调了几次，损失非常大。

索：是这样。现在内地还有许多山洞。

赵：毛主席很讲辩证法，但他的后期形而上学很多。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战争时期得不到什么外援，他都提力争外援。建国后他反倒提出，自力更生是绝对的，谁要利用一点外援，谁就是修正主义。1962 年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说：「不吃进口粮，不搞修正主义」。本来我们可以进一点粮食，中国的劳力很多，搞经济作物要靠劳力，经济收入比较高，都搞粮食，把经济作物给搞掉了，得不偿失。

索：我觉得毛主席尽管有缺点，但是也有很好的优点。一个是对邓小平，开始让邓小平当秘书长，后来又当总书记，「文革」后期，周恩来病危的时候，又把他重用起来。

赵：毛主席对邓小平有过很高的评价，但是毛主席始终坚信自己路线的正确。他看出来，如果让邓小平主持工作下去，他的路线就贯彻不下去，所以用了一段邓，马上又批判他。我虽然和毛主席接触少，因为地位关系，但是我相信毛主席不是个人质量上的问题。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天，他都认为自己的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悲剧。

索：我与邓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接触了他的材料，邓小平与毛主席的后期正好相反。邓小平的后期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一切看效果，我这个说法对吗？

赵：对。邓多次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关于他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问题，小平同志反复给我们讲，我现在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但是总是 80 多岁的人了，再过几年，如果我思想胡涂了再退，那就不好了。我们说，你现在身体还好，可以多搞几年。邓坚持说，正因为我现在还不胡涂，我退下来有好处。

索：我觉得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我希望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记住这个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可以退，但是总认为别人没有我办得好。

赵：1963 年毛主席跟我说过，说他见过几个大人物，这些人的名气可大了。当然这个请你写书的时候不要写进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见到孙中山了，他觉得孙中山老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人到了晚年，是他声誉最高的时候，也往往是他最脱离实际的时候。

索：我作为记者，见过许多重要人物，比如丘吉尔，战争时期他了不起，战后选举的时候他落选了。后来又把他选上来了，但是他的能力和精力都不行了，但是他又不下。邓小平正是在他的晚年，失去他灵敏的思维以前，就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把重担子交给像你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你们有能力，干劲充沛，我祝你们成功。

赵：你沿着长征路线走了一趟，这不仅仅是你的体力好，而是你怀着一颗对中国人民炽热的心。这条路我都没走过。

索：我写长征是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光看书是不行的，所以我要爬红军爬过的山，淌红军淌过的河流。路上我和夫人在一块，当时比较困难，我夫人说，我们可能走不到头就会死在长征路上，结果很好，一路上她根本没有害病。现在全世界在注视着你们新的长征，新的进展。你们现在的长征和过去不同，新长征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和计算机打交道。我相信你们会成功，当然也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你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你们说，你们要成功要上百年的时间。你们有宏伟的计划，你们是无私的，都是为人民做好事情，这都非常好。

赵：在北京工作的中央机关同志，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利益，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有了这样基本的一条，还不够，还得加一条，就是求实精神。光有为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还不行。如果光有为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这一条，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对头，

同样地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害。当然你立场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利益，这当然不行。一定要有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再加一个求实的精神。我的信心就是建筑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从 1978 年工作到今天，九年来总的说我们的事情办得是好的。但是 1978 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国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至于十三大以后，我们的前景是甚么？总的说有两条：第一我们有希望，第二前进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问题肯定不少。但是我们不谋私利，又能够做到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想我们不致于出现了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当然我们对困难已经作了充份的估计。有了这两条，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想清楚。我这个人是顺台阶被提上来的，20 岁当县委书记，20 岁多一点当地委书记，以后在省委、在中央。几十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辨别是非并不是非常困难。未来我们肯定会碰到困难，但肯定可以解决。2 号晚上我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国家虽有变化、有成就，但困难还很多。我说了两条：第一我们在前进当中，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原来的基础差，困难很多，这一点我们宁肯估计得多一点有好处，我们还可能出现曲折，但总的说我们有信心。你写《长征》那本书中有一段「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近日《美洲华侨日报》说，我作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历程中的新觉醒。我很赞成这个话。我告诉先生，国内人民，大学生，对我这个报告最满意的是，我这个报告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听了比较踏实。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学生对十三大报告有这么大的兴趣。有人说，反自由化后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淡漠，现在看来不对。十三大期间，学生看电视，听我那个报告的情况，是很动人的。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胜利三十八年了，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现在我们确实悟出一些新的东西，人民也悟出许多新的东西，包括大学生。

现在对中央谈什么问题，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甚么是符合实际的，他们心中有数。

索：我非常高兴你提到大学生。我们接触到中国许多大学生，包括留美的学生。你们留美的大学生是优秀青年，他们很用功，很爱国，关心国内形势，对美国学生很有影响。我想这些青年回来后，能不能找到发挥才能的场所。今天我看到《中国日报》，讲一些单位不要大学生，他们认为这些人格格不入。

赵：我了解的情况是：（1）女大学生很多单位不要，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2）学校的结构有些不合理。教改包括这个内容：理科多，工科少，理科基础知识是好的，但接受单位希望工科。留学的也是理科多工科少。大部份高材生都是搞理科。今后为了四化，理科也要，但更多的是应用。教育结构存在问题，还未解决，要逐步解决。工厂要中级人材，大专学生多、中级科技人员少，大学生到工厂去，往往从事中专工作，浪费了。教育和科技改革，要与现代化建设结合。

索：你们的教育投资不大。你们的「超导」了不起，走在世界前列。你们的教育投资比例小，美国教育投资很大。

赵：我同意，国内也是这样，民主党派经常提意见，每次人代会我都挨批评，但是这几年我们投资教育的经费还是有很大增加。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注意。不久前我批了一个文件，支持「超导」研究。但中国教育的投资是廉价的，我们只要你们十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你们十分之十的结果。

我和你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国庆，第二次是十三大，祝你健康，祝你写作成功，再见。

附录二：

赵紫阳同志谈国家对媒体管理应开放

（1987 年 7 月 18 日）

1987 年 7 月 18 日上午 11 时到 12 时 25 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南海官邸大院东南角小会客室，召见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我，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姚锡华两人。

据知内情友人说，这是赵听到反映我与姚锡华当时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85〕后，做为老上下级关系，有意给我和姚打招呼的。这次赵的谈话，我有一个简单笔记在手。多次读，觉得仍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照原笔记抄录在后：

赵：改革，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谁改谁好。东欧、苏联日子比我们好过。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外，尤其苏联、保加利亚，四十年了，国内无动乱，生产发展，人民生活过得去。成立互经会后，他们经济更发展了，但与西方比，他们又落后了，这差距在加大，越来越大。西方靠科技，靠科技的强大促进经济的力量，资本主义的统治又得到改善，他们从利润中拨出一批给劳动者，对高额收入者征收累进税，使阶级矛盾缓和，人民不想革命。瑞典的福利社会经验，尤其值得人们研究。日夫科夫（保加利亚领导人）说：「人民不凭信仰拥护社会主义。人民凭得到的经济利益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在战争时期，人民出于战争，出于改革制度，如我们的土地改革，拥护、支持我们党。现在呢？我们再不改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还会拥护我们吗？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对的！非改不可，戈尔巴乔夫也真在改！改，必须，但改到哪儿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有个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在我党。苏联改革阻力在人民，因为人民过得去。我国改革，人民盼改革，怕我们改革的政策变，我改革阻力在掌权的领导干部，他们老怕改革「越规」。

耀邦同志以为领导上同意我们政治上也要大变革，他又同情弱者，所以在反自由化上不积极。其实，中国自由化思想会长期存在。这要靠我们的进步，靠我们教育。自由化大潮泛滥是可以避免的，耀邦当时领导上软弱了一点。

我的看法是对自由化思想，要特别考虑知识分子中的中间人士人心的向背。我们党在这类问题上多少年的失误，造成他们一种不正常的心理：你支持我反对，你反对我支持。所以我们的政治形势应宽和、和谐。弦不要绷紧了！越紧，知识分子中间群众越脱离我们！

这牵涉到报刊、舆论的管理。我们党与国家，只整两类：一、煽动群众不满党不满社会主义的；二、毒害群众，煽动打砸抢和淫秽的。其它的，不以为然，管多了不好。我的意思，国家对出版对舆论的管理思维是：该管死的管死，其它的放开，睁一眼闭一眼！把管死与放开的关系处理好。现在要点是放开！另外，什么叫淫秽？要把它与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

～～～～～～～～～～～～～～～～～～～～～～～～～

〔85〕我那时，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坚决支持，因而在一小段时间内，对邓小平又有些盲目崇拜了。所以，在「清除精神污染」时，我虽然并没有粗暴地整人，但并不消极。

此次谈话，还谈到胡乔木、邓力群、熊复〔86〕。大意是：小平同志也说，胡、邓在党内是读马列书最多的同志，但「左」，跟不上形势。说熊复在涿县作协大会上的讲话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骨干人物。还提到北京市委的徐惟诚。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很活跃，是姚文元重用的一个笔杆子，这次反自由化，他说了许多话，与「文革」时说的一样。小平同志也说，这几个人左，但老左，阻碍改革。这些人还是要用，但分工要变变。李锡铭要徐惟诚这个市委副书记管意识形态，很不恰当，我

已明令让徐惟诚分工管别的，以后管财贸了。

附录三：

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

杜明明〔87〕

赵紫阳走的从容，人们关注着他临终前的情景。本文由赵的晚辈写成，披露了他由入院到溘然长逝的一些细节，值得细读。香港《明报月刊》——编者

依然关心每一位老朋友

1 月 17 日（2005 年），我们来到富强胡同六号紫阳寓所的书房兼会客室。

真没想到，三个月前的今天几乎是同一时辰，我们站在同一个位置，心情却是如此的不同。那是 2004 年 10 月 17 日，紫阳伯伯 85 岁生辰，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知道，2003 年紫阳伯伯就停止了打高尔夫球，放下了赋闲之后才拿起的球杆。

一年前，大家知道他患了肺病。这一年里，他断断续续住院治疗。每住一次医院，身体状况就更差，呼吸要借助氧气罩。

前三个月的今天，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看望者络绎不绝。他指着我们带来的大盆景澳洲松，对我们问长问短，有说有笑。他靠氧气罩呼吸，可是他还关心着每一位老朋友，记得那天，我们还特意多买了一个鲜花篮，一进书房就放在门口，怕花对他的呼吸不好。他笑着对我们说：「不要紧，不要紧，拿进来吧。」

戴着氧气罩呼吸的紫阳伯伯对几位看望他的老朋友介绍疗病的经验。他说应当趁早吸氧，医生认为他吸氧已经太晚了。他详细地介绍应当怎么注意，一直到他女儿妞妞（王雁南的小名）心痛地说：「人家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歇会吧！」紫阳伯伯又问：「现在老百姓的日子怎么样？民工的问题怎么样了？拿到工资了吗？农民生活怎么样？」我们接着还谈了许多许多。

～～～～～～～～～～～～～～～～～～～～～～

〔86〕熊复（1915-），1937 年加入中共。1949 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是粉碎「四人帮」后坚持毛泽东「两个凡是」的活跃人物之一。

〔87〕本文原载《明报月刊》2005 年第 2 期。发表时用了郑曙光、林君的笔名。

如今，这里已是物是人非，成了紫阳伯伯的灵堂。一路的花圈、鲜花。白色的玫瑰、百合、菊花、杜鹃，铺天盖地的白色，加上白色的挽联。「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一切都彷佛倾诉紫阳伯伯一生的清白、高洁、无瑕、坦坦荡荡、无怨无悔、木高于林。

人们偏爱送上白色的鲜花，大概也是出于对他的人品的赞赏！

入院每顿饭仅一碗小米粥

2005 年 1 月 17 日清晨，我们被一个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初以为是闹钟，翻过身再睡，但过了几分钟又响了，这才想起来可能是手机的短讯，赶紧打开。昨晚我们特意没关，就是想等妞妞的消息。因为在 16 日，

正在外地开会的我们接到了妞妞的关于紫阳伯伯病重的短讯。凌晨赶回。这晚，怎么也睡不着，就给几个医生朋友发了短讯，希望他们介绍一些另类专家给参谋参谋。此刻手机短讯显示的却是：「他今晨平静的走了。他终于自由了。衷心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念和支持。雁南。1 月 17 日，7 时 39 分。」

可是，2005 年 1 月 6 日，紫阳伯伯肺病又一次发作。与往日不同，这次发作严重，他休克了，立即送进了急救室，这就是被香港媒体误传的「死亡」假消息。因为抢救及时，三分钟后，紫阳伯伯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一下就认出了守在身旁的女婿王志华，知道自己曾一度失去知觉。他跟孩子们和医生们谈起刚刚闯过来的一关，潇洒地说：「要是就这么走了，也挺好！」听妞妞说，他这段时间每顿饭只能吃一碗小米粥，吃完后累出一身大汗。他说什么也不肯由别人喂饭，不论是医院的护理人员还是自己的子女。他对伴随他身边最后十五年的唯一的女儿妞妞说：「你怎么比你妈妈还啰嗦？」

衰弱的人去厕所是个大问题，经常会耗尽全身气力。于是为他拿来床上大便器，但他不肯，只好作罢，医生也只得同意他戴着氧气罩进厕所。后来，把轮椅式的坐便器放在病床边，只要从床上移过去就能使用。他试了一次，效果果然不错，他笑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
就在大家都稍感宽慰，以为他病情稳定了，妞妞准备如期赴日本从事商务活动时，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据周围人说，1 月 14 日，紫阳伯伯坐在沙发上，呼吸突然急促，同八天前发病一样。他平静但很认真地告诉医务人员：「情况不好。」可是护士们仔细观察仪器上显示出来的各项数据，未发现恶化迹象，于是安慰他不要紧张。但直觉使他清晰地感到了危险的信号，他对护士说：「不对，你们不知道。」

医生赶来，建议他上床检查，他已经没有力气上床了，轻声对医生说：「坐着再休息一下。」但就在上床之后，他休克了。

据在场的人说，紧接着的一小时十分钟，紫阳伯伯没有心跳、呼吸、血压！上呼吸机、用药——医生全力以赴，采用了能够采用的一切医疗手段，他的呼吸、心跳才逐渐恢复，血压也有了一些。医生对守在一旁的王志华说：「情况很不好，请叫其它的家属来吧。」此时，王志华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

1 月 15 日，紫阳伯伯的情况有所稳定。虽然处于昏迷中，但生命迹象仍在持续。特别是看到排出的尿液，医生信心大增，说肾功能好。全家人都抱着再次抢救过来的希望，妞妞也启程飞赴日本。

不过，有的医生有些担心，对王志华说：「呼吸机一般只能使用七至十天，超过期限必须停用，如病情得不到缓解，就要考虑切开气管等措施。」

紫阳伯伯的病情这天急转直下，刚刚降落在日本机场的妞妞，打开手机后第一时间就听到了王志华紧张而慌乱的呼唤：「赶快回北京！」她没出机场就买了回程机票。紫阳伯伯的儿子赵大军、赵二军、赵四军、赵五军加上能够赶回来的孙辈都回到了家中。为便于他们值班配合护理，北京医院还专门腾出了几个房间让他们休息。

这一天，妞妞又以短讯的方式回答了心情急切的亲戚和朋友的关心：「他昨晚又一次休克，经抢救，现仍处深度昏迷。仍很危险。现不能探视，请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每天 9 时到 10 时为他老人家祈祷吧！」

临终前泪水流淌不止

1 月 16 日，紫阳伯伯仍全天昏迷。持续的昏迷和抢救已超过四十八小时，情况继续恶化。当晚 10 时后，输入了那么多药液，直到第二天凌晨 4 时，竟连一滴尿也没有排出。这是肾脏功能和微循环衰竭的明证。医生的表情顿时凝重了。

泪眼被这无情的宣告惊呆了！

五个儿女依次单独走到紫阳伯伯床前，把所有的爱与痛、哀怨与歉疚向老父亲作最后的倾吐。成长在老干部家中的孩子都很少跟父母有亲昵的举动，此时，他们握着老人的手，不停地在他瘦骨嶙峋的手背上抚摸，赵五军失声说道：「爸爸，你不仅生下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怎么做人，你放心，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良、正直，我们的所作所为决不会玷污你的名字！」
突然，一个奇迹出现了，久经风浪而不爱流露情感、更很少在孩子们面前掉泪的老人，眼角处竟然滚出了晶莹的泪花！紧接着，那泪水竟像喷涌的清泉流淌不止。

哦，我知道，他听见了孩子们的话。他放心了！

看他们的挽联：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妞妞再也无法控制感情，扑到老父身边，泣不成声地说道：「爸爸，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曲了，你走吧，慢慢走，你走了就自由了！」

这时是 1 月 17 日凌晨 5 时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一行人闻讯也赶到赵紫阳的病房。

清晨 6 时 30 分，紫阳伯伯只剩下游丝般的呼吸和若有若无的脉搏。监测仪器上他的心脏艰难而顽强地跳动着、跳动着；坚持着、坚持着！孩子们明白：「他是舍不得我们啊！」这最后的十五年，他时时处处关怀国家大事，但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自己的儿孙们。今天几乎所有的子女和孙子都在这里了，他怎么舍得就这么走了呢？最后，他还是走了，他用最符合自己心愿的方式——尊严地离去！他走得安详，一身铮铮傲骨，撼天动地！

1 月 17 日晨 7 时 1 分，紫阳伯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大家将他的书房布置成了简朴素穆的灵堂，遗像用的是前几年在院子里拍的——穿着浅灰蓝色丝绸衬衣、面带微笑双手插腰的生活照。儿子五军说：「选这张，因为他已经是个老百姓了。」

赵妻至今不知老伴逝世

中午，灵堂还没有设立，赵的老下级萧洪达、杜导正、姚锡华及其夫人于华、续志先、舒元璋等人便送来了花圈；《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方实、徐孔、吴思、杨继绳等人携带着花圈也来了，还有陶铸女儿陶斯亮及夫婿理由、杜导正的子女杜明明几姐弟用白色玫瑰和百合做成的花圈。第一批来到的人还有朱厚泽、李普、黄玉茹等。

接着，送来花圈的有叶剑英后人全体、陆定一和徐海东的全体子女。更多的是不知名的老百姓，成百上千。

田纪云送的花圈上写着：「敬爱的紫阳同志千古，田纪云李英华率全家敬挽。」紫阳伯伯被鲜花簇拥着，

挺立在三九严寒的凛冽寒风中。一批一批吊唁的人们，把自己献上的鲜花摆在遗像旁。

来的人都问到躺在内院的紫阳夫人梁伯琪伯母，她没有出来见大家是因为中风后遗症。长期卧床的梁伯母至今还不知道老伴走了，没人敢向她透露实情，怕她受不了。

一个老大娘冲着门不断地鞠躬，两个福建的商人也驱车赶来富强胡同，出租车司机说：「车费免了，替我多鞠几个躬。」旁边的花店，送紫阳的花免费。

已经记不清流下了多少眼泪，身前身后人们的哭泣都引起每个人泪河的泛滥。泣不成声的人们没有忘记紫阳伯伯——一个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驱！素不相识的人接踵而至，签名吊唁，相拥痛哭。
我们随着人流步入了紫阳伯伯昔日的书房——今日的灵堂。泪眼朦胧，抬头看着紫阳伯伯的遗照，我们一下楞住了：身着灰色丝绸衬衣的紫阳伯伯微笑着看大家，他的微笑是那么安详动人，目光是那么深邃超脱。我竟一时泪止语塞。突然，我懂了，我知道他根本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和我们同在。

附录四：

赵紫阳回忆录幕后推手是中共几位老人〔88〕

江迅

赵紫阳三十小时录音出版回忆录，幕后推手是四位中共老人：前国家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而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提供录音机和磁带。杜导正草拟了提纲，写序言。录音带复制多套分置几处，最后由赵的旧属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出版。鲍朴指称出版前在香港曾被十几人轮番跟踪，但出版消息曝光后，跟踪者即消失。

人生真是一部不断书写的历史。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四年多之际，他生前秘密录下的三十小时录音讲话，在 2009 年 5 月整理成英文版 Prisoner of the State（《国家的囚徒》）、中文版《改革历程》先后出版，引爆全球「六四」热门话题。赵紫阳远走了，留下的录音却继续书写历史，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反思，对「六四事件」真相的披露，无疑刮起一股「赵旋风」。

《亚洲周刊》获悉，赵紫阳这三十小时录音的幕后关键推手，是中共四位退休老干部，他们是：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他们从 2000 年起，即在不同的地点，开始这项秘密党史记录的工程。

今年 86 岁的杜导正，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今年 95 岁的杜星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四川省委书记、水电部副部长；已于 2005 年 9 月去世的萧洪达，曾任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办公厅主任；已于 2009 年 3 月去世的姚锡华，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广东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他们都曾经与赵紫阳共过事，是他的老部下，是与赵紫阳来往最密切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另一位远离北京、住在广州的前省委书记林若。他在赵紫阳开始向四位老人口述回忆之后，听杜导正访穗时提及此事，即提供了录音机和录音带，要用声音将被压制的秘密记住。

最主要的幕后推手杜导正，5 月 18 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参与赵紫阳录音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一共是五个人，现在已经走了三个。全部录音就是我们四个赵紫阳的老部下一手操作的。」

据知，这一录音是杜导正最初发起的，最后也是他完成的。他说：「这部书的序言三千字左右，是我写的。我开始不愿写序，赵紫阳家人多次提出。拖到今年 3 月，我住在协和医院，他们又来催我。后来，我想，参与的几个人，紫阳和萧洪达、姚锡华三个走在我们前面，如今剩下我和杜星垣，年纪都大了。这么一想，我就对紫阳家人说，我写序义不容辞。我写得很平和，很公正，很稳妥。」杜导正说：「我曾经建议，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中英文版书，避过『六四』，在 2009 年『六四』以后出版，但这一建议最后没有被接受。」

他说：「赵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他在这些录音中，主要讲的是『六四』，而后讲的是『六四』前因后果，讲他自己的看法，又进一步谈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功和过，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前后，建国和治国中的成和败，谈了共产主义的兴和衰。我一再鼓励他谈，可以说，赵紫阳与胡耀邦相比，赵读书没有胡读得那么多。耀邦读书特别多，紫阳读书显得少些，他退下来以后才读了很多书。退下来，他有时间了，看了很多材料，结合他的实践经验，作了很多思考，海阔天空地想了很多问题。他的录音谈话，

是一层一层展开的，很有条理。」
～～～～～～～～～～～～～～～～～～～～～～～～～
〔88〕本文原载《亚洲周刊》2009 年第 21 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杜导正说，1989 年「六四」事件后，政治气氛很紧张，他们这些赵紫阳的老下级与赵的关系都断了，他们去不成赵的家，赵也无法与他们打招呼。直到 1992 年气氛才开始松动。他们才与赵紫阳恢复了联系。杜导正第一个向赵紫阳提出：「你要留下东西，你是当事的一方，把你了解的情况，把你的看法写下来。古今中外，大人物都有回忆录。」赵紫阳开始不同意，说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吧。

一次，杜导正与萧洪达一起去见赵紫阳，杜导正回忆说：「那次，我话说得很重，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惊天动地，你是重要的当事人一方，你应该留下你的声音。这对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有价值的。你有这份责任，对党负责，对百姓负责，对这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你应该也必须讲出自己的看法。后来他总算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杜导正草拟了一个提纲，摆出几十个问题。赵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数据，却被当局拒绝。杜导正说，那次对赵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一开始，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都在场，当时没有录音，由杜导正笔录，他曾做过记者，有笔录的习惯。赵紫阳谈，他们四个人在旁听。一次，杜导正去广州见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杜导正说起赵紫阳谈话的事。他俩都觉得应该录音，免得记录不准确，被人怀疑真假。林若说，他有一台最好的录音机，让杜交给赵紫阳，那天还给杜十盘录音带。那以后，赵紫阳的谈话就开始录音了。

杜导正说：「赵紫阳的谈话录音，前后复制了三套，赵那里一套，姚锡华那里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们都有了录音，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讲述得很有条理。谈话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错的，给人很多启示。当然，他谈话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赞同，有些观点可能还是错误的。一次，我对萧洪达说，根据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马上就可以出版。当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杜导正还未被找麻烦

至今，当局没有找杜导正就此事谈话，他说：「执政党和政府，比过去文明多了，如果是在过去，我们这些人都会被拉进监牢去了，不入狱的话，至少都发配去青海、宁夏了。总体上说，现在是大大进步了。问题是我们希望它进步得再快一点。」

英文版《国家的囚徒》已于 5 月中旬推出市场，反响强烈，各地书店奇货可居。中文版《改革历程》，将于 5 月 29 日在香港上市，由鲍彤儿子鲍朴任出版人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他父亲鲍彤是赵紫阳前政治秘书，目前依然被当局软禁在北京寓所，他是出版书的主要策划者，他自认「这是赵紫阳留给我的最后任务」。《改革历程》首印八千册已被大小书店书摊预订完，由于事前低调保密，不知情的印刷厂没有准备印刷纸张，出版消息突然曝光，印刷厂措手不及，急急购买纸张，匆匆加班赶印。

鲍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他知道这一份录音带的存在是 2005 年，是赵紫阳去世以后，录音带分散在几个不同的人手上。从他们手中收拢，集中在一起，整个过程非常困难，什么事都不能在电话里讲，这一过程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真正文字工作整理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了。录音带除了赵紫阳本人自己有一部份以外，流散在他们几个人手上。实际上不是一整套在谁手里，至少有两、三套，是被复制过的，不同的部份在不同的人手上，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全套录音带。赵紫阳本人也没有全套的录音带。

鲍朴说，那几位退休的中共老干部功劳很大，成功说服了赵紫阳，由他以谈话的形式录音。据悉，有一次不是在赵紫阳自己家里，而是到某人家里去谈的。去的时候，中央警卫局把那人家里的胡同和街道的汽车

全部赶走，一条街道的汽车全都清走，动作那么大，连公安局也来了人，赵紫阳进了那人家里后，中央警卫局的人就在门外站岗。赵紫阳出门一趟很不容易，因此他们觉得，外出谈话这种方式不太合适，其实，赵紫阳外出的机会也实在不多。

鲍朴说，1993 年，赵紫阳写了一个回忆录似的文字材料，录音时，他几乎是照着这材料讲述的，整个录音过程是 2000 年开始的，到 2003 年，SARS（沙士，非典）爆发那年，赵紫阳的身体已经很差，因此，赵紫阳的录音是在这之前的一、二年里完成的。从录音带听得出，有些地方是重复的，虽有重复，但重复部份的谈话，条理依然很分明，只是口语上的不同。因此，很明显是照着事先精心准备好的稿子讲的，不是随意的谈话。至于这批稿子现在在哪里？鲍朴说：「我确实不知道，没有人发现过。」

附录五：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赵紫阳《改革历程》序言

杜导正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有关材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我近年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在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讲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失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六四」以后，有时间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古今中外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池，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 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 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的口号，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 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做出几句评价，说他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2009 年 3 月 22 日

附录六：

父亲谈萧洪达·明明

萧洪达伯伯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之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俩人结成生死之交。爸爸对萧伯伯的评价是，铁骨铮铮，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萧洪达，广东省潮州人，在上海参加新四军，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后担任叶剑英的办公室主任。1961 年，萧伯伯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此时，爸爸出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已经五年，但是与萧伯伯谈不上熟识。

1966 年初，爸爸调到《羊城晚报》，开始了与萧伯伯长达四十年的友谊。

《羊城晚报》是陶铸 1957 年指示创办的，主办单位是广东省委。有一段时间《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市委机关报。1965 年末，陶铸又把《羊城晚报》定为中南局机关报。为了办好这张报纸，陶铸下令调来仍在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的爸爸和萧洪达合作办报。萧伯伯任第一书记兼第一总编辑，爸爸是第二书记兼第二总编辑。过了一个月，爸爸又担任了总编辑及党委书记。这样，爸爸与萧伯伯就来往多起来。

1966 年夏，「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羊城晚报》遭到冲击。萧伯伯带了一个工作组进驻报社，与爸爸共同维持报社的正常工作。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对着各种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揪斗，两人日夜相处，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7 年春节前，在中央排名第四的陶铸被打到，受陶铸器重的萧伯伯和爸爸也失去了「保护伞」，被多次揪斗。给爸爸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年春节。那一天，几百名造反派斗了他们整整一天。也就是这次揪斗，让爸爸感受到萧伯伯的骨气。

批斗大会上，萧伯伯、爸爸、丁希凌及十几个人被押上台后，造反派点名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这时，萧伯伯不再沉默，大声地说，以这种方式开除我们的党籍，不符合组织程序，我也跟着抗议。

批斗会结束后，萧伯伯、丁希凌叔叔和爸爸一起坐公共汽车到萧伯伯家。在萧伯伯家的顶楼，被开除党籍的冤屈让他们难以承受，三人忍不住掉下眼泪。丁希凌长吁短叹地说：完了完了，我们被开除党籍了。爸爸说：党籍是由党来开除的，今天是几百人的群众大会，这开除不行吧。萧伯伯则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不算数，我们不要理睬他们。萧伯伯的骨气让爸爸和丁叔叔振作起来。

此后，在多次揪斗中，爸爸与萧伯伯达成默契，不管他们共同挨斗还是分头挨斗，两人在晚上总要设法见个面。爸爸说，咱家那东边不是有稻田吗，稻田东边不是有铁路吗，铁路东边不是有一牛奶厂吗，牛奶场西边一条马路有一棵一棵的树，从北往南第三棵树下，我们两个人经常约定半夜在这儿碰头，交流情况，说说心里话。这是一种生死关头紧要关头说不出来的亲密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相依相助，爸爸与萧伯伯成为生死之交。

1976 年初，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揭发批判已从广东调到四川任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赵紫阳。

在会上，有两位常委揭发赵紫阳紧跟邓小平的所谓罪行；爸爸有两个做文字工作的老朋友，也翻出笔记本，一条一条揭发批判赵紫阳。而作为省委常委的萧洪达伯伯，则一字不说，生生顶着巨大的压力。这时候，

赵紫阳正被「四人帮」囚禁在北京京西宾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萧伯伯却给赵紫阳悄悄的写了两封信，派友人送到京西宾馆。在大是大非的关头，萧伯伯义无反顾。后来，当爸爸知道这件事后，经常拿来教育我们。

到了这年春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在中央，「四人帮」酝酿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的阴谋，并下令让各省省委书记表态。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招来了身边几个高参——萧伯伯、吴南生叔叔和爸爸，问对北京这电报可怎么表态。爸爸说，当时大家态度都很鲜明地表示反对，但中央催得很紧，明天天明以前必须回报。韦国清要我们想办法。我们几个一夜都没有休息，商量怎么回复，电报怎么写。韦国清身体不好，后半夜他过来了。韦国清是工农干部成长起来的指挥员，越南著名的奠边府战役，就是陈赓与他共同指挥的。他平时正襟危坐，很少说话，但这样稳重的高级指挥员此时都火了，他用手拍了桌子，说，他妈的，老子和他们拼了！我记得拂晓时我们终于帮他写好了一份搪塞的覆电。

粉碎「四人帮」后，萧伯伯与爸爸先后调往北京。萧伯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爸爸到新华总社。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单位，但依然联系密切。对于当时拨乱反正的三大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萧伯伯和爸爸观点一致，坚决支持，并经常相互交流情况，相互鼓励。

1989 年「六四」，萧伯伯和爸爸极力反对军队镇压学生与市民，对事件结果极为悲伤。萧伯伯三次拒绝中央挽留，坚决请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职位，坚决不在「大清查」中留下历史的污点。

此后，萧伯伯、爸爸、杜星垣伯伯和姚锡华叔叔一起，进行赵紫阳口述录音的工作。这些，在爸爸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爸爸说，萧伯伯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道德高尚，处理问题、看问题实事求是。最了不起的是，他骨头硬。对的，就坚决坚持，就决不屈服，就敢于担当。

了解到萧伯伯的品格，我也理解了他为什么对「六四」有那么科学的态度，对赵紫阳的许多主张为什么那么至诚的支持，对帮助赵紫阳做回忆录会那么执着！

附录七：

凡事预则立，「六四」善后碎步走〔89〕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访谈录·徐庆全

徐庆全：1978 年，我们党以壮士断腕的气概，抛弃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启了改革的航船，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界到学界，都在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作准备，有些媒体已经开始了纪念活动。您作为新闻界的一位老领导，可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杜导正：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综合国力增强了，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能吃饱饭了。民主法制的建设也在逐步进步，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是「碎步前进」，还不能满足改革发展的需要，但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在民间，已感觉到推进改革的紧迫性，这些，都是值得颂扬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讲三十年的伟大成果，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不能仅仅就在这上面打转转。因为三十年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央的决策也并不是件件都正确。我们也走过许多的弯路，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因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绩讲透，经验教训必须总结。

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其先决条件之一正是长期的社会稳定。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是有着空前共识的。但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稳定的过程中有没有在无意间埋下不稳定的隐患呢？近几年连续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不是在显露出某种端倪呢？您怎么看？

杜：有专家说，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达到一千美元以上，就会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2005 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3 年至 2003 年间，我国群体性上访示威事件数量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的总人数也由约七十三万增加到约三百○七万。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世界瞩目，但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党政腐败

～～～～～～～～～～～～～～～～～～～～

〔89〕本文发表于内部刊物《北方期货．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8 年）专号。

等等问题，也凸现了，自然容易引起这些群体性事件。我认为，这是社会大发展、大转型期间所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是，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徐：由此说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发展、大转型期的大国而言，加强社会预警系统的研究和建设就十分重要了。

杜：《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事，事先有准备，就能得到成功，不然就会失败。老子也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事情在平稳安定的时候，就容易把握；在没有发生变化先兆的时候，就容易筹谋；在脆弱的时候，就容易分析判断；在微弱的时候，就容易化解。在事情变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最好处理；在没有发生混乱之前最好制止。古人的话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此，党和政府现在启动针对社会各种层面的预警系统迫在眉睫。

徐：做到防患于未然。

杜：对。贵州省的瓮安事件，就是新近发生的典型的事例。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为什么会闹大，竟然上万人上街烧毁县政府的大楼呢？一些领导就敏锐地洞察到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说，这是我们一些干部平时打压群众，以至于简单的事酿成大型的暴力事件。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更尖锐地指出民意不畅，自然形成「言塞湖」（与汶川大地震时的「堰塞湖」谐音）局面，决堤泛滥就是必然结果。
徐：长期矛盾一朝引爆，看来不是瓮安一地的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分配不平衡的当下，这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在瓮安表现为矿群、移民和拆迁，而在别的地方，则可能表现为别的纠纷。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民众权益受损，因而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不对等，不能充份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则很少能够例外。

杜：现在，在我们国家，更存在着一个政府的自我定位的问题。我们的政府仍旧基本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政府仍旧承担了过多的组织经济、领导经济的重要职责。如果我国政府不大承担这个职责了，事情也许好办多了。这个问题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改革，关系重大，这就不去评论了吧？

徐：您说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在现代社会，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平衡利益分配格局，维持一个公共产品供应充份且财富分配较为公平公正的格局。要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财富体系，就必须以充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前提。否则，政府权威的维持，就必然以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萎缩为代价的。这样，政府的权力的外延就更大了。

杜：政府权力边界过大的同时，必然把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包揽到自己身上。政府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当事方，难于做到应有的超然中立，难于平衡利益格局，这对政府公信力无疑是莫大伤害。但如果政府明确自己的权责，将主要力量用于充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在公民权利充份保障、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基础上，就不难发展出成熟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社会矛盾就不难有多种出口，一旦矛盾出现，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就会起作用，可以随时就地消化，不至于潜滋暗长，一发难收。

徐：其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单靠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恐怕还不够，尤其是在政治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

杜：是的。即使一个完善的社会秩序，也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更何况在宪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到位的因素，个人权利很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以为，除了法律赋予公民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外，政府还应该允许他们通过其它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比方说藉助于媒体，或者和平抗议等等方式。这样做，虽然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但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可以提供一个缓冲的地带，既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民情，也会避免出现类似瓮安的规模较大的「激进」行动。

关注瓮安事件，我总在想，最应该反思的无疑是政府。如果对待群体的和平抗议，哪怕是因为误解而引发的抗议，首先要真诚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人浮于事地推诿；如果不但推诿还动用警力，那么事情就激化了。

徐：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从西欧现代史上看，民众的「抗议」分三种类型：竞争性、反应性和主动性。竞争性抗议主要发生在占有同等权利或资源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反应性抗议是典型的弱者对强者的抗议，而主动性抗议呈现了抗议者的组织化与制度化。

杜：其实，民众的和平抗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宣泄渠道。我去过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经常能看到一些人游行抗议的举动。我在美国纽约市住了一个半月，那里白天常有民众抗议市长，而晚上市长依然笑容满面地出现在电视上，发号施令，行使他的市长职权。这有什么嘛。在人家国家里，这种和平抗议就像家常便饭，是社会的常态现象嘛。

徐：除了民众的和平抗议这个渠道外，媒体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出气口」。

杜：完全正确，媒体是畅通人民群众信息最重要的一条表达渠道。它不仅仅是「党的喉舌」这一种职能，而更重要的应该成为民众表达声音、宣泄情绪的「出气口」。

徐：其实，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早已成为共识了。

杜：媒体不仅仅是民众的「出气口」，更重要是，应该成为社会预警系统的窗口。任何社会矛盾都有一个形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如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会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反之，如果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就可能使矛盾加剧，转化成现实的公共危机。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能敏锐地发现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苗头，并及时预警。在预警过程中，媒体一方面下情上达，及时将各种信息反馈到相应的政府部门，督促事情解决，避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造成井喷式爆发，危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上情下达，又及时地将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传达给民众，引导公众选择正确的行为，对有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如社会上一些群体事件，往往起因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若媒体能及时地报道事实的真相，就很难酿成事件；再如一些公共安全事件，总有各种各样的预兆出现，若媒体能够及时给大家提个醒，就可能减少此类事件。

徐：贵州瓮安事件的酿成，就验证了您上面所说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列举了引发这一事件的三种矛盾：一是矿群纠纷；二是移民纠纷，三是拆迁纠纷，这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相互交织，在当地早已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及时有效的解决。如果媒体能及时掌握群众的不满情绪，通过采访报道发出预警信息，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促使问题解决，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

杜：除了媒体之外，政府还应该关注、重视弱势群体的表达权问题。上海发生的「杨佳事件」，有评论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表达权利。促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是，从去年 10 月 5 日受到上海警方调查，历经多半年的时间，虽经过两次调解，杨佳的申辩却没有使结果有丝毫良性变化，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作出了最坏的选择。

当然，杨佳固然不能代表群体事件中的所有民众，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绝望情绪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站在这个基点上分析，几起群体性事件虽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徐：大禹治水成功了，就在于他是「疏」而不是「堵」。我们的政府面对目前的情况，也应该考虑，如何使和平抗议规范化、媒体表达权制度化的问题。

杜：说到「疏」与「堵」，我们现在处理一些社会事件，常常不是「疏」而是堵，就是「水涨坝高」的做法，即水涨一丈，筑坝一丈二。这样的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除了规范抗议行为、媒体表达权制度化等以外，政府还必须充份保障公民的权利。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几起事件为镜子、为推动，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是一个基本共识，但社会稳定必须奠基于人心的稳定之中，才是可靠的稳定，可持续的稳定。而充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尤其充份保障利益博弈过程中民众的谈判权利，则是稳定人心的前提。这恐怕是我们反思瓮安事件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徐：咱们话题还是回到纪念改革开放这件事上吧。您刚才说的在歌颂我党我国三十年来伟大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是哪一方面？我们想到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是否也要预警一下？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杜：说到总结经验教训，我自然想到 1989 年的「六四」事件。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是在国际国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着。这也是总结三十年改革历程绕不过去的一件事。即使今年想办法绕过去了，不提它，明年也绕不过去，因为明年是这一事件二十周年的日子，

国际国内都会关注这件事，国际上的关注度可能会更强烈一些。既然绕不过去，我们就需拿出理性的原则来面对它，设想一个稳妥的周全的应对方案。

徐：您是说，政府也应该把解决这件事纳入社会预警系统？

杜：你说预警系统也可以。我想说的是，应该及早有所考虑，及早策划一些应对政策，也就是怎样在适当的时机给民众一个求实的、可以接受的说法。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时，学生们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改革进行了十年以后，全国人民当时最关切的大问题，也是使执政党面临困境的大难题。有了如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支持，党中央如果与人民齐心合力，决心清除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个大难题就都不难解决。中央既可摆脱困境，也可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中华民族更有可能在清除腐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顺利发展。可惜，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事情走向了另一面，从历史高度看，应该说我们是犯了错欠了债的。

徐：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对「六四」事件作出科学评价，才能还历史上的账。

杜：这个账怎么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对「六四」事件重新作出科学评价，一揽子解决，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要完全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会牵涉到许多尖锐的政治问题，须纳入民主和法制轨道，依法办事，这是个大工程。因此想近一两年彻底解决，各种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碎步前进，我个人以为现在为「六四」说几句公道话却是可以的。

徐：您的根据是什么？

杜：首先，「六四」悲剧发生后，包括很多政府官员在内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定会平反的。甚至中央的高级官员，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在去世之前也说，「这是我们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老一辈高级将领张爱萍、萧克同志等一大批人，早就提议为「六四」平反。而且，「六四」后不久，中央对「六四」问题的定性就由「反革命暴乱」、「暴乱」、「动乱」又改为「政治风波」、「政治事件」，一步一步在减弱。而且，据传说在近几年来，中央也几次复议关于「六四」的问题。

徐：2004 年，中央破例地公开纪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的去世是引发「六四」的导火索，但中央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反响却非常好，很得人心。2005 年，在「六四」中下台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去世，追悼会尽管有意地控制，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也不尽人意，但党内外对中央的这些做法也还是认可的，对中央的难处也是体谅的。

杜：这些事实都说明，对「六四」问题的认识，朝野基本上是存在共识的。

其次，现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继续维持，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稳定还能保持，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开启政治改革为海内外所期待。这都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都为我们提供了稳妥碎步解决「六四」这个历史欠账的好时机。况且，以邓小平同志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用行政力量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现在，离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二十年还剩下一年时间，正是启动「六四」问题稳步解决的好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也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由此说来，如果中央主动稳妥碎步解决「六四」问题，非但不会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反而会带来官

民双赢的局面，既对得起死者和历史，也对得起子孙和未来。

徐：看来您对这个问题有过较深入的思考。那如何解决呢？

杜：我的想法是先对「六四」说几句求实的公道话，逐步形成为其后「六四」平反被平和地接受的社会基础。具体有这样三条建议：

首先，媒体报刊上先逐步放开，不要把「六四」再当成一种绝对的禁忌。因为，（1）继续讳言「六四」的话题，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心虚气短。比如，「六四」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对「六四」讳莫如深，在外交场合和响应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维护稳定。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老是这样遮遮掩掩，确实有损于我们的形象。

（2）媒体上对「六四」逐步开禁，对于涉及到「六四」中的人和事情，像「4.26 社论」、赵紫阳同志的评价等，让作者自己评价，媒体选登。这样做，一是有利于人们逐步接受对「六四」的认识，二是慢慢形成此后一揽子解决「六四」问题的大气候，一旦时机成熟后中央出面解决，不至于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其次，中央可以先撇开「六四」问题的定性这个敏感问题，而从一些技术上作一些准备。我也考虑了几步：第一，把「六四」问题拆分，先说阶段性的事情。比如，先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对四二六社论进行重新评价，在赵紫阳同志逝世忌日由中央出面召开纪念座谈会，等等；第二、逐步撤除对有关人士的通缉令，准许流亡在境外原学生、职工人士返国、探亲、等；第三、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给「六四」死难者家属一定的抚慰，或给予一些生活上的经济补偿。

徐：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党在 1978 年之所以能凝聚党心、民心，一个伟大的举措是平反冤假错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去世后五年，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对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还要早些，是毛去世两年后就作出决定了。那个「四五反革命事件」，一经平反，立刻举国欢腾。中共不但没有垮台，而且非常地得民心。看来，还历史的欠账的确能开启新的转机的。

杜：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历史的伤口需要平复，民间的积怨需要释放。社会矛盾多发，热点、敏感问题层生，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牺牲一些公民权利，因此，中央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对敏感历史事件不愿触及，虽然可以暂时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毕竟仅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因为，现行体制虽然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经济领域非常成功，但这种体制也导致许多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有些是社会发展中难免的；有些是我们这种体制主观上造成的，绝非维持现行体制就能解决，如果以稳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公民社会和实行民主政治的良好平台，那我国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都能取得更大成功，我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景历来是看好的。
徐：谢谢您接受采访。

附录八：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与发展〔90〕·杜导正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六十年前，我是一个 25 岁的毛头小伙子，六十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六十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 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一段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六十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 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

〔90〕原载《炎黄春秋》2009 年第四期。

这样，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 年到 1978 年，这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 年至 1949 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的。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辨证的、和平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 1820 年，GDP 仍占全球约 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更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一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我们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虽不能说蒋介石政府就是卖国的，但它有动摇性，尤其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前，那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地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 14 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来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军」是坚决抗日的。我那时读到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小册子，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仰的。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许多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在取得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看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的共产党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 1944 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讲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 1944 年 2 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份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有耳闻目睹，觉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三条，是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绝大部份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几千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 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在线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 1947 年开始土改。那时候，农民分到土地，无不从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取得了政权以后，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因此，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建设和土地改革这三个方面的成功，共产党政府壮大起来了，才能在 1949 年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毛泽东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 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空前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毛泽东二十七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质量、「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片面的。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局限；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他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继续革命」为手段，藉助政权的力量体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后，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本质上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的暂时让步。到 1965 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筹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

公理公道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 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大家的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的威望在全党全国完全树立起来了，跟着他走，能有错吗？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华北总分社，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后来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以，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和党中央所作出的决策，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那时，我们都会

说毛泽东讲过的那几句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时我们真切的感受是，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只是面团，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啊。我们这种对毛服膺的心态，也助长了毛的为所欲为。

再说第二条。这第二条，事实上与第一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毛才能弃置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那个时候，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91〕，毛主席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 1953 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弃了。
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再说第三条。毛泽东 1944 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话当年我就印象深刻，认为说得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然而，为什么到了 1949 年建国后却没有实现？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1980 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份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这些话说得好，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隆中对」。l945 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91〕民粹主义思潮出现在 19 世纪中叶的俄国。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主要观点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 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和请求是「引蛇出洞」。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 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策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机制。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质量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质量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一种好的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它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它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我觉得，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一个没有好的体制的社会，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付出的血和泪也实在太多了。

邓小平：「叫甚么主义都可以」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尽管他在世时，有人就对他颇有微词；尽管对他的评价，若干年后才能更清楚一些。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来看，他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论功绩，比起毛泽东恐怕还要大一些。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扭转乾坤的壮举。邓小平带领人民开辟了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迎来了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时代。

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的治党治国的路线确实突破了中共层层陈规陋习。有些人惯于讥讽「白猫黑猫论」，说它不够深刻，但是，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幸福，这就是一切！邓小平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 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

邓小平理解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又是什么？政治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法律；政党制度是多元的，不能叫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多党接受共产党领导，是靠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说理，靠服人；最高权利机关是人大，而不是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六、七千万中共党员仅是全国十三亿人口中的一部份。经济上，更是多元的，有国有的，也有大量私营的，中外合资的，个体的，哪种形式对发展有利，谁就占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上，从一元化

向多元化渐进，在毛时代的不可能有的西方文化也陆续进入国内。

应当说，邓小平这种理解，是从进行中国建设的现状出发的，而不是机械地去强调什么主义。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大意是，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尽管在有些人眼里，邓小平这些话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穷困凋敝的局面，先去强调什么主义再发展，势必又会陷入到毛时代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中而不能自拔。先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人民、国家富裕起来，再谈什么主义也不迟。这正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经过几年发展后，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49 年建国前，我们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毛说要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是什么？可以说是「准备阶段」，我看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政治上抠字眼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就是来源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更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比如说，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就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我们既往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更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所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当然，这方面理论有待学者阐述完善，进一步公开地把道理讲透，而继续纠缠「姓资姓社」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现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的觉悟程度、社会组织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现在的中国只能执行邓小平主张的这样一条路线。以后会怎样？再过一百年再说。未来会是一元化吗？我看未必，恐怕会更多元，更文明。但展望未来，为未来奋斗，不能再靠「乌托邦」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已经实践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来当然也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但是，邓小平时代的三十年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放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变迁下去认识，去比较，中国的进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艰难！简直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变革。反对改革的人士可以对今天充满抱怨，可又有谁能把中国拉回到三十年前？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也是允许的。但是，两个三十年的变迁，是历史的大关节，是历史的大变革，是能够超越个人的经历，也能够超越个人看问题的角度的。未来中国的方向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近来，有一种声音逐渐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声音是，主张反对新的「两个凡是」，这显然是指对邓的评价。的确，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对他确实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我以为，必须仔细分析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承认，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就是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方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其实质即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是必须继续弘扬的主要遗产，而他的失误与不足的地方要改进和完善。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他在 1980 年和 1986 年曾有过两个极为精彩的讲话，阐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当时，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们，都热切地期望邓能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期望？是因为我们觉得，邓在全党、全军、全国有极高的威望，他的魄力也已为事实所证明。但遗憾的是，邓却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进展不大，改革一直在「跛足」进行。因此，我以为，邓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未竟的事业，越来越成为时代强烈的呼唤。像我这样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能感到这种时代的呼唤，中南海比我们的感受应更加深刻。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造就了邓小平这位巨人。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等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路线，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向前推进。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时代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这个时代，也仍然是需要巨人并且可以造就巨人的时代。

2009 年纪念共和国六十周年，必然也是思想解放、争议纷呈的一年；加之国际经济风云动荡，中国国内的改革大业也面临严峻考验。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似乎又有一轮蜂起的态势，有些人不免忧心忡忡。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戏拟一副对联的上联给我：「左安门，右安门，左右逢源新华门，左右安稳」。他没有想到下联，但从上联看，他是有些担心的，甚至有些消极情绪在里面。而依我看，尽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但「新华门」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旗帜不能动摇，邓小平理论不可动摇。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事都要权衡方方面面，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之时，谨慎周到极有必要。改革的促进者们应当理解、支持和富于建设性地提出主张。而政治家的思考必当是先讲是非，后讲厉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建国六十年中的两个三十年的对比中，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最主要区别中，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回归与发展的历程中，是不难搞清楚的。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我是乐观的，也是有信心的。

杜导正和这本书——编后感言

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中文版面世，引起震动。书本身的价值自不待言，人们更诧异的是，被软禁多年的赵紫阳，行动受到严密监控，居然还能留下秘密录音！读罢书，谁是赵紫阳秘密录音的幕后推手，自然为人们所关心。本书的作者杜导正，正是四个幕后推手中最主要的成员。这本《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抄》，向读者揭示了赵紫阳秘密录音形成的过程，记录了赵紫阳录音之外的三十多次谈话。

蒙杜老厚爱，责成我首先对书的框架和结构作点编辑工作，然后交付出版社。这样，我就得以较早地读到了这本书。编辑完成后，我想就杜导正何以会写这本书、关于这本书的编辑框架两个问题，做点说明，权作编后感言吧。

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

作为杜老的「忘年交」，我在 1990 年山西忻州召开的徐继研究会上与他相识，1994 年，他把我带到了他主持的《炎黄春秋》杂志社，至今与他相交已经十五年了。
杜老常常说：「我是一个小人物，只是与许多大的历史事件相遇而已。」这当然是杜老自谦的话。在我这样的晚辈眼里，他一点也不「小」：14 岁参加中共，历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1949 年后进入中共意识形态领导层工作，由新华社河北、广东分社社长而至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由《光明日报》总编辑而至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到 1990 年我认识他时，他已是一个八年以上的老部长级干部了。在我这个大学教师眼里，已经是很「大」的官了。至于他所经历的「大的历史事件」，则是到他手下工作以后才慢慢了解到的。

与杜老同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很多，但喜欢读书的人却不算多；是读书人，而在 1949 年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做领导又当记者用笔来工作的，则更不多。这是杜老的幸运。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使人明智，使人思索；而读书与「行」结合在一起，则就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对于杜老来说，这个「行」字，就是勤下乡，勤调查，勤以笔记录现实。以「读」获得认知，以「行」提升思考，则使杜老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博闻强记，通古及今，有高度的历史感；二是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的走向，能有相对清醒的自省意识，相对正确的判断。他所说的「与许多大的历史事件相遇」，就是源于这种相对清醒的自省意识和判断的。

譬如，在 1958 年「大跃进」中，严酷的现实使他由盲目的欢呼很快陷入自省。由自省而思索，独立思考取代了盲目崇拜。1959 年 4 月他就「上书」陈述「大跃进」带来的种种恶果，因而与 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段悲伤的历史迎头相撞，成为广东的「小彭德怀」。直至「文革」十年浩劫，他当然无法幸免。五十四场揪斗，他顶住了，并由此开始对党、对国家命运更进一步思索。

譬如，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由邓小平、胡耀邦等引领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他实时意识到这种大潮对匡正毛泽东晚年所造成种种恶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奋不顾身投入其间。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不能算是「大官」，但其扼意识形态领域言论的地位，却将他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这三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他跻身于这段历史并不遗余力地推动这段历史，在新华社获得了「杜大胆」的雅号。

而与本书主题相关的 1989 年「六四」事件，他也可以与大多数部长级高官一样，明哲保身地观察、缄默，他却选择了与当时党和政府不同的立场，站在了爱国学生及人民的一面，站在了赵紫阳一面。在「六四」后的「清查」过程中，他被免职，被组织上「谈话」，也使他再一次「与大的历史事件相遇」。

杜老这种选择，不只是因为他是赵紫阳的老部下，更多的是源于他对历史走向相对自觉的把握。有道是「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如果不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很难看清自己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遑论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六四」后，杜老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他所孜孜追求的党的前途担忧。「吟罢低眉无写处」，就只好将一腔忧伤向日记诉说。而作为一个历经意识形态风云的「老记者」，杜老这份日记，却不是个人的忧伤呻吟，而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大记录！

因为对历史走向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六四」后，杜老在「与大的历史事件相遇」后，又主动成为「大的历史事件」的担当者之一。他与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一起，秘密促成了赵紫阳的录音。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的问世，毫无疑问，是一个现在有影响、将来也有影响的「大的历史事件」。

1989 年「六四」后，作为中国的改革家、思想家，曾作为中共总理、总书记的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六年，其处境之险恶，若不是本书的记载，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按照中共长期以来党内斗争所形成的「潜规则」，一个人被推到中共的对立面之后，不管他原来地位多高，位置多重要，也不管他的主张多正确，统统都要被抹杀；而与之相伴随的是，这个人也基本上淡出了原来上下级同僚、甚至亲朋好友的视野，「门前冷落鞍马稀」。原因无他，是中共党内多次残酷斗争的「株连」方式，使人恐惧。而杜导正、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四位可敬的老人，却千方百计地寻找看望赵紫阳的机会，并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促成了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这种历史的担当，自然源于他们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走向的把握！

担当「大的历史事件」，而又记录下来这一担当的过程，为这一「大的历史事件」留下见证，则更是一种历史的重任。杜老又担当起来。每次与赵紫阳见面的所见，赵的每次谈话，他都详细地记录在日记之中。在书中，杜老多次提到，为防范中共某些部门可能的搜查，他为保存这些日记而煞费苦心。主要不是担心因此惹祸，而是怕这珍贵的历史记录被淹没！

在把这本书稿交给我时，杜老说：「我是中共抱大的娃娃党员，中共成败皆有我小小的一份。晚年毛泽东时代，我同样是很『左』的。经历了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文革，又经历了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我不得不做出反思，沉重的反思。加之身边一大批高明老友的启迪和勉励，我思想上、政治上，做事做人渐渐觉醒了。晚年好些，晚晚年又好些。退下来后这二十年，我自认为党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办了《炎黄春秋》杂志；第二件是推动赵紫阳秘密录音，为历史留下见证；第三件就是把这本日记体的书稿出版。」他郑重地说：「这本书不是我个人的，是关于『六四』和赵紫阳，关于 1989 年至今的时代记录，应该留给时代，留给后人。」

我能揣摩出这话的份量！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

本书是日记体。按照惯常的编辑体例，日记体自然应当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而本书的编排却打乱了时间顺序，将如何为赵紫阳酝酿秘密录音，以及录音过程和赵的谈话的日记放在前面；而将 1989 年至 1992 年关于时代的历史记录放在下篇。这其中有下述的考虑。

作者原来的书稿，只有本书上篇和中篇两部份内容，记录赵紫阳秘密录音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赵紫阳的三十多次谈话内容；而下篇的内容，虽然也正在整理，但拟日后另外成书。杜老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我斟酌再三，认为还是合为一本书好。我的理由有两条：

一、　这段历史，可看作是赵紫阳秘密录音及谈话的时代背景。

赵紫阳与「六四」分不开；「六四」又影响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作者虽然在 1989 年「六四」后至 1992 年，无缘与赵紫阳见面，但他的日记，始终离不开「六四」和赵紫阳。可以说，「六四」和「赵紫阳」，是这段历史的两个关键词。在这段历史中，在作者交往圈子中，上至中央高层官员，下至普普通通的百姓、编辑、记者和学者，就「六四」和「赵紫阳」这两个关键词，都表达了几乎一致的观点，「心有戚戚然」，心灵就是相通的。而被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的赵紫阳，虽然一墙隔阻了外面的世界，但与作者，以及作者笔下的人，同样是「心有戚戚然」。在这个民心所向的时代舞台上，赵紫阳始终是不可遮盖的舞台背景。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位老人才能做赵紫阳秘密录音的幕后推手；同样，有了这样的背景，赵紫阳才由不愿做回忆到积极拟定提纲，严肃地留下录音，给历史作交代。因此，留下这段历史记录，有因有果，历史的脉络就更清晰一些。

二、这段历史，有助于人们对赵紫阳秘密录音内容，以及作者所记录的赵紫阳录音之外的谈话的理解。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以邓小平为首、胡耀邦与赵紫阳拥趸，基本上有十年时间。对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实践——从包产到户开始，到特区的建立，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而是来自于一些人固有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毛泽东晚年时代的僵化观念。从意识形态上拷问改革是「姓资姓社」，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数次大的争论相伴随。而在前十年和「六四」后三年，争论得尤为激烈！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上上下下都被卷入。在中央高层，以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为一方，以另外几个老人为一方，分野明显，酿成了改革年代的「双峰政治」。「双峰政治」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被作为「卒子」抛出，「六四」被弹压，以保全中共执政合法性这个「车」——「社会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 年「六四」后上台的江泽民等领导人，在「双峰政治」的阴影下左右摇摆。若没有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在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和平演变」的风潮中，不仅私营企业会「倾家荡产」，改革开放也一定会被断送！

在赵紫阳秘密录音的《改革历程》一书中，以及作者在本书记录的赵在秘密录音过程中与作者等四人的谈话中，赵紫阳以亲身的经历，讲述了改革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同时反思了改革过程中各项决策的得失。上述的「双峰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但赵紫阳《改革历程》是对历史的「政治交代」，而与作者等四人的谈话则是敞开漫谈，海阔天空地臧否时政，二者都不是改革年代历史的完整描述。

与此相比，作者所记录的这三年的历史，虽然也不是完整的历史，但来自各个渠道的「口述政治」，勾勒出了改革年代的纷争的时代大背景，与赵紫阳的录音及录音之外的谈话，两者相互参证，会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尤其值得珍贵的是，作者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数次以一个老记者的身份深入广东、山西等地方实地考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平民百姓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

实践和理论的根据。所写出的几篇大的调查文章，至今仍是研究这段历史所必须重视的材料。这些，在作者的日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鉴于此，作者将这部份的日记又作了删节，编入书中。

也有老友担心，这部份背景的交代虽然很必要，也很重要，但不如让读者直接看其最关心赵紫阳秘密录音的过程及谈话的内容为好，将背景放在后面也可让读者细细品味。这个建议自然不错。写作，本有「渐入佳境」和「先声夺人」两种思路，但关键要有「文似看山不喜平」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部份放在前面或放在后面，也不妨碍这个效果。因此，书中才打乱了时间顺序，将这一部份内容置后。这是应该特意向读者说明的。

徐庆全


藏觀
書察